

钱理群 著

# 生命的沉湖

「学苑话题」

生活·讀書·新知 三联书店

钱理群 著

生命的沉湖

—学苑话题—

生活·讀書·新知 三联书店

Copyright © 2006 by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作品版权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所有。

未经许可，不得翻印。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生命的沉湖 / 钱理群著.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2006. 8

(学苑话题)

ISBN 7 - 108 - 02463 - 2

I. 生... II. 钱... III. 随笔 - 作品集 - 中国 -  
当代 IV. 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027218 号

责任编辑 郑 勇

装帧设计 蔡立国

出版发行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 22 号)

邮 编 100010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市松源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06 年 8 月北京第 1 版

2006 年 8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 本 635 毫米 × 965 毫米 1/16 印张 25.25

字 数 290 千字

印 数 00,001 - 10,000 册

定 价 28.00 元



钱理群，1939年3月生于重庆，祖籍杭州。1960年毕业于人民大学新闻系，在贵州任中专语文教员18年。1981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获硕士学位，留校任教。为北大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现代文学和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精神史，近年关注中学语文教育问题。2002年8月退休。

主要著述有《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合著）、《心灵的探寻》、《20世纪中国文学三人谈》（合著）、《周作人传》、《周作人论》、《丰富的痛苦——堂吉诃德和哈姆雷特的东移》、《大小舞台之间——曹禺戏剧新论》、《1948：天地玄黄》、《学魂重铸》、《拒绝遗忘：钱理群文选》、《话说周氏兄弟》、《走进当代的鲁迅》等数十种。



学苑话题书系书目

- 01 陈平原 当年游侠人  
——现代中国的文人与学者
- 02 钱理群 生命的沉湖
- 03 夏晓虹 阅读梁启超
- 04 周振鹤 智者不语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刊行

责任编辑 郑 勇  
装帧设计 蔡立国

# 目 录

## 第一辑 生命的沉湖

- 003 矛盾与困惑中的写作  
——《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笔谈
- 009 读洪子诚《当代文学史》后
- 017 现代文学史研究的历史回顾
- 030 现代汉语文学所走过的道路
- 036 略谈“典型现象”的理论与运用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方法的一个尝试
- 050 “找回失落的文学世界”  
——答《南方文坛》记者问
- 062 文学本体与本性的召唤  
——《诗化小说研究书系》序
- 069 令人大开眼界的文学史景观  
——读《20世纪贵州文学史书系》
- 079 作为左翼作家的端木蕻良  
——《端木蕻良小说评论集》序
- 086 用现代中国人自己的话真实地描写自己  
——《20世纪中国小说大学生读本》序

095 研究思路的开拓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9年第1期编后记

098 面对新世纪的期待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1年第1期编后记

102 文学研究与当代生活的对话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2年第1期编后记

106 学术研究要言之有物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3年第1期编后记

109 理科文学教育的意义与困惑

——《北大理科学生作文选》序

114 追求工、理、文科的融合

——钱宁学术思想与教育思想概述

## 第二辑 精神散步

135 岁末谈读书（二章）

138 回到常识

140 经典的意义

143 北大校园里的“兔子”

145 谈谈先父天鹤先生的事

148 翠鸟远飞了

150 王瑶的意义

——《王瑶和他的世界》编后记

152 我与20世纪中国文化研究

- 154 沟通心灵的桥梁  
——《彩色插图中国文学史》韩文本序
- 156 《散文选刊》卷首语
- 158 喜读《新青年文丛》  
——在一个座谈会上的发言
- 165 评《文艺争鸣》的几篇文章
- 170 《文艺争鸣》百期诞辰赠言
- 171 当代四作家论  
——一句话评语
- 172 要有自己的想法和发现  
——评袁筱芬《何处是家园——诗学视域中的〈憩园〉》
- 177 自然科学与文化重建
- 181 文学与科学原本是一家  
——《民族植物学论文集》序
- 184 为学生的网站写几句话
- 185 新世纪寄语青年  
——应北京大学学生会之约而写
- 186 我存在着，我努力着，我们彼此搀扶着  
——在长江读书奖颁奖会上的讲话

### 第三辑 运交华盖

- 189 1999 年总结
- 196 2000 年伊始



208 我在做这些事

——2000年总结

222 2001年回顾

## 第四辑 炼狱之火

231 “民国以来最黑暗的一天”

——“三一八”惨案七十三周年祭

244 我感到惊心动魄

——黄昌勇《王实味传》序

247 对共和国历史的另一种书写

——在《一个平民百姓的回忆录》座谈会上的发言

251 “燕山偶语遭奇祸”

——《燕山夜话》的命运及其影响

257 面对血写的文字

——初读林昭《致人民日报编辑部信》

262 二十九年前的—封书信

271 “咬紧泥层根不死”

——读韩乐群《刺梨蓬草》

278 失败者的不归路

——蔡玉镶《突围——一个底层知识者的人生体验》序

290 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的声音

——读文有感

294 另一种纪念

——《我们心目中的蔡元培》序

- 300 也算“立此存照”  
——1999年4月10日在北京大学中文系演讲的开场白
- 305 致北大校长的一封信
- 308 我的某种不安  
——致一位年轻朋友的信
- 316 “伪士当去，迷信可存：今日之急也”  
——王东成《生活与艺术人格》序
- 320 坚守我们的信仰，在今天的中国  
——读袁沙《新诠详注〈文化偏至论〉》
- 325 我的忧虑、困惑和挣扎  
——在上海大学“全球化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转变”国际研讨会上的发言
- 333 “真的知识阶级”：鲁迅的历史选择  
——在韩国学术讨论会上的发言
- 345 心有灵犀——一束通信

## 第五辑 魂归何处

- 383 能写的与不能写的  
——《拒绝遗忘：钱理群文选》序
- 390 本应归全家所有  
——《钱理群文集》（四卷本）后记
- 392 后记
- 393 再记
- 394 三记

## 第一辑

### 生命的沉湖

任何时候都不能忘记，作为生活在当代中国的学者，我们的学术研究的问题，只能来自（或立足于）中国本土的现实；而对问题的学术性的解决，又必须是学理性的，有距离的，更带根本性的思考与研究：应努力在这二者之间保持必要的张力。





# 矛盾与困惑中的写作

——《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笔谈

《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一书初版于1987年8月，修订本则于1998年7月出版，其间间隔了十多年，正经历中国文学研究从80年代到90年代的变迁，作为本书的作者之一，我自己的学术思想，包括文学史的观念与追求，都发生了某些变化，这种变化也会不同程度地体现在对本书的修订上。但因为是集体写作，我们三人在合作过程中，又并未对文学史观念这样的全局性问题进行过深入的讨论，这本身也造成了本书内部的不尽统一与平衡这样一些根本性的弱点；但又因为我们是研究生的同学，在一些重要问题的认识上又自有一种默契，这就使得本书大体上保持着某种统一性。——当然，我下面所谈的一些问题，也主要是我自己的想法，并不代表其他两位作者，这也是要预先说明的。

本书初版本在写作与定稿过程中，我正热心于和另外两位同学——子平与平原合作提倡“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全书完成后，由我负责统稿并执笔写“绪论”，也就很自然地将“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基本观点写了进去。这样，《三十年》一书就因为我的关系，而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概念有了某种联系。今天回过头来反思“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这个概念，我仍然认为它的基本精神是站得住的，并且已经事实上为学术界普遍接受，当然也还

有不同的意见，这也是正常的。但如果联系我自己当时的基本思想倾向与追求，文学观念与文学史观念，今天看来，当时对“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具体理解与分析，又确实存在着一些问题。这些问题更多的恐怕是我个人的。我曾在一次与韩国学者的座谈会上，谈到我今天认识到的问题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受到80年代乐观主义与理想主义的时代氛围的影响，我对中国社会与文学的现代化的理解与前景预设是充满理想主义与乌托邦色彩的，我几乎不加怀疑地认定，西方的现代化道路就是中国的现代化的理想模式；西方现代化模式与现代化本身必然产生的负面，则基本上没有进入我的观察与思考视野，对现代文学史上曾经出现的对“现代化后果”的思考与描述，都被简单地称之为“民粹主义”而加以否定。与此相联系的，就是受到“西方中心论”的影响，“撞击与回应”的模式印记是十分明显的。记得“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概念提出不久，在一片叫好声中，我的导师王瑶先生找我去，进行了一次严肃的谈话，他问我：你们讲20世纪为什么不讲殖民帝国的瓦解、第三世界的兴起，不讲（或少讲，或只从消极方面讲）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运动、俄国与俄国文学的影响？正是王瑶先生的及时提醒，使我开始反思，更使我懂得了应不断对自己提倡的东西进行质疑，这是直接影响了我以后的思考方式的。第三方面的问题，也许我自己是更为严重的，这就是历史进化论与历史决定论的文学史观的影响。新比旧好，新的总是胜过旧的；历史是沿着某种既定的观念、目标（我们称之为“本质”、“必然规律”）一路凯歌行进，即使有一时之曲折，也是阻挡不住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的，等等。

以上三个方面在80年代的思想、文化、学术界，以及具体到现当代（20世纪）文学史研究中，或许有一定的代表性，在90年代就自然受到了冲击。首先是现实生活的无情事实粉碎了80年代

关于现代化，关于西方现代化模式的种种神话。与此相联系的是“西方中心论”的破产。这都迫使我们回过头来，正视“现代化”的后果，并从根本上进行“前提的追问”：什么是现代性？如何看待西方的现代化道路（模式）？什么是我们（中国，东方国家）所需要（追求）的现代化道路（模式）？这些问题对于我们这些现代文学的研究者，同时也是专业的追问：如何理解“现代文学”这一概念中的“现代”两个字？它是一个“时间”的概念，还是包含了某种性质的理解？那么，文学的现代性指的是什么？而这些问题都涉及到我们这门学科的性质、研究范围、它的内在矛盾等等关系到自身存在的根本问题。同时被追问的是，现代文学历史的起端：它究竟应按我们所提出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概念从上一世纪末（晚清）开始，还是从“五四”开始？——王瑶先生当年就不同意我们的“晚清起端论”，这一时期就有更多的朋友就这一点提出了质疑。对于“五四”新文化运动，也提出了这样的追问：该如何看待“五四”时期新、旧文学的斗争，由此开始的“新文化（新文学）叙事”，这种叙事肯定、凸显了什么，又否定、淹没了什么？在这种叙事背后隐藏着怎样的历史观与文学史观？等等。除了这些前提的追问之外，有关“现代性”问题的广泛思考，还引发现代文学研究中的一系列问题，诸如：（1）如何从中国文学、学术自身的发展，特别是晚清、民国（还有的朋友上溯到明代）以来文学、学术的发展，来揭示“五四”文学变革、现代文学的诞生的内在理路与线索；（2）如何将现代文学置于与现代国家、政党政治、现代出版（现代文学市场）、现代教育、现代学术……的广泛联系中，来理解文学的现代性问题；（3）如何从更广阔的视野来考察中国现代文学与世界文学的关系——不仅是英美文学的影响，同时关注英美之外的西方国家及俄国与东方国家文学的影响；（4）在中外文学关系的研究中如何认识与处理“接受外来文化

的影响，实现中国文学（文化）的现代化的过程，同时又是反抗殖民主义的侵略与控制，争取民族独立与统一的过程”这二者的关系；（5）如何认识与处理本世纪文学发展的总格局中，新、旧文学，雅、俗文学及其关系，新文学内部的不同组成部分，自由主义文学、革命文学及其关系；（6）如何认识与处理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城市与乡村、沿海与内地之间发展的不平衡，及其在文学上的反映，由此形成的海派文学与京派文学的对峙与互渗；（7）如何评价反思现代化后果的文学作品及作家……所有这些反思都为现代文学的研究打开了思路，开拓了领域，但同时也带来了新的困惑。人们似乎十分容易地就从一个极端跳到了另一个极端。例如反思“五四”，就把“五四”新文化运动视为“断裂传统”的罪恶的渊藪，并连及对“五四”启蒙主义、激进主义以及以后的革命文学的全盘否定，对自由主义、文化保守主义作家及其文学的理想化；强调现代文学与传统文学的内在联系，就不敢肯定外国文学的翻译介绍对中国现代文学的产生与发展的巨大影响，在民族主义情绪膨胀的时候，连是否需要继续向西方学习似乎都成了问题；在重新评价旧体文学与通俗文学时，出现了对新文学（例如新诗）的全盘否定，在一些朋友看来，新文学不过是外来文学的移植，唯有通俗文学才是真正的“本土文学”。在注重于对现代文学与现代出版、教育、学术等外部关系的研究时，却又忽略了对文学形式、文学语言的变革，现代审美观念、趣味的建立……这样一些更加关乎文学现代性的内部关系的研究，等等。而在指出上述倾向时，又很容易地跳到（回到）另一个极端。

面对这一切，我感到了极大的困惑。如果说80年代提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概念时，思想比较单纯，也充满了自信心，看准了某一点，就毫无顾忌地，旗帜鲜明地大加鼓吹；那么到了



90年代，思想就变得复杂了，脑子里充满了“问题”与“疑惑”。借用我的《丰富的痛苦》的说法，似乎是从堂吉诃德转向了哈姆雷特——尽管骨子的堂吉诃德气仍要时时显露。我发现，对大至国家、民族、社会的现代化道路，具体到自己专业范围的文学的现代性，我都只能说“不”——我拒绝、否定什么，例如我无法认同我们曾经有过的现代化模式及其相应的文学模式，我也不愿全盘照搬西方的现代化模式及其相应的文学模式；但我却无法说出我到底“要”什么，我追求、肯定什么。径直说，我没有属于自己的哲学、历史观，也没有自己的文学观、文学史观。因此，我无法形成，至少是在短期内无法形成对于20世纪中国文学的属于我自己的、稳定的、具有解释力的总体把握与判断，我自己的价值理想就是一片混乱。我不过是在矛盾与困惑中，勉力写作而已。这并不只是因为年龄的增长，而实在是因为90年代中国与世界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的变化太大了，我们所面临的问题太复杂了，而且我们对这一切太缺乏思想准备了，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是在为自己80年代的单纯付出代价。

在我看来，从80年代末到90年代，包括我自己在内的许多人又经历了一次大绝望，其深刻程度并不亚于文化大革命那一次。绝望也是一种清醒：我终于明白像自己这样的知识分子、学者，能够做什么，不能做什么。因为我是“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概念的提出者之一，很多朋友都期待我能够写出一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这样的期待对我的压力是不难想见的；但我今天却要公开坦白承认：在可以见到的日子里，我大概是无功完成这样的使命。但我并非无事可做：我所要做与能够做的，是在“文学现代化”这个大题目下的一个一个的具体课题的研究——单是我们在前文所提出的每一个问题，都是要花大力气才能做出一些差强人意的回答的。这或许是一种“低调”的策略选择：只说自己

想说、又能够说的话，对虽然想说、却一时说不了的话，不妨暂时悬置起来——因此，我对当年对“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概念的倡导并不后悔，那是迟早要解决的课题，只是现在我不愿也无力多谈罢了。这也是我这次参与修订《现代文学三十年》的基本指导思想：我们删去了原来包含有许多总体概括的长篇“绪论”，而代之以现在这个偏于提出问题的简短的“前言”，在具体的文学史叙述中，也偏于对具体作家、作品的分析，以及对文体发展中的各种文学现象的梳理，这都是文学史研究中的基础工作。这也是一种文学史的重写——从基础重新开始。

1998年10月21日写于燕北园

## 读洪子诚《当代文学史》后

读了洪子诚先生的这本《当代文学史》，感到很兴奋。我的第一感觉是，“当代文学”终于有了“史”了。——这确实是一部标志性的著作。

对于当代文学能不能写史，一直是有争论的。老一辈的文学史家都是主张把“文学评论”与“文学史”区分开来的。他们认为当代文学可以有评论，而难以写史，因为缺少作为历史叙述必须有的距离。这样的考虑并非没有道理：缺少了时间的距离，许多文学现象内在的矛盾的各个侧面都没有充分地显露，匆忙地就已经暴露的侧面去做历史的叙述与判断，就有可能遮蔽暂时还没有凸显的、甚至可能是更为深刻、内在的方面。更重要的是，当代人写当代史，固然因为有切身的体验，而触摸到另一个时代的研究者所难以把握、体味的某些神韵的东西；但正因为所要叙述与评价的对象与研究者自身的生命与命运有着如此密切的联系，也就会因主观情感的过多投入，而遮蔽了文学发展的复杂性。我们不妨回忆一下近五十年来对当代文学的认识过程。曾经有一度（尤其是文化大革命期间）我们是把中国的当代文学看作是“中国历史，甚至是人类历史上‘空前未有的文学’”的。而在“文革”结束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人们又几乎是怀着极端的反感来回顾这段历史，在很多人看来，十七年的文学，特别是“文革”时期的文学都是一片空白，除了惨痛的历史教训之外，没有留下

任何可以进入历史积淀的东西。现在，到了世纪末，我们又有了许多新的经历与体验，随着“文革”结束后这二十年文学与文化、思想的发展，当代文学历史（包括十七年文学与“文革”文学）的各个侧面的问题都逐渐得到显露，使得我们有可能有距离地，比较客观、冷静地来看待这段历史，进行一种更加学术化的研究，这时“史”的写作条件就成熟了。而洪子诚先生近二十年来一直在当代文学史这个领域默默探索，尤其着力于人们认为无史可写的十七年文学与“文革”文学的研究，并且取得了一系列阶段性的研究成果，可以说他是最有准备的一位学者，因此，由他来承担已经成熟的历史课题，写出这部具有相对完整的史的体系的当代文学史，绝不是偶然的。而且，在洪著之后，我们又读到了陈思和先生主编的《当代文学史教程》，也在试图建立起自己的当代文学史的叙述体系。这都表明，当代文学的研究已经进入了一个“史”的建构的阶段；而且可以预期，当代文学史的研究将逐渐与当代文学评论分离，而成为“20世纪中国文学史”研究的有机组成部分。如果这样的预期成立的话，对洪子诚先生（以及其他学者）所作的建构当代文学史的尝试，进行学理的总结与讨论，就是一件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的工作。

很多朋友都注意到，洪子诚先生的新著，是一部私人写作的当代文学史，而有别于集体写作的教科书体式——当然，也如陈平原先生所说，这本书仍然在一定程度上承担了教科书的功能，从而构成了写作上的内在矛盾；但我关照的重心还是其“非教科书”的方面：它所显示的洪子诚先生个人对这一段历史的一种观察、体验与理解，把握方式与视角。因此，我注意到本书的叙述中反复出现的几个关键词（概念）：“体制化”、“一体化”、“规范”、“等级”与“权力结构”。这些概念所表达的是当代中国文



学（也就是我所说的“共和国文学”）的基本生存状态与特征：这是按照国家与政治的意志与组织力量所建立起来一种高度“一体化”的文学体制，它从文学的生产到流通都是高度计划化的，所要建立的是一种规范化的文学秩序，一种等级化的文学权力结构。记得当年我们一起规划“20世纪小说史”的写作时，曾经提出要努力寻找最能体现特定时期文学特征的文学典型现象；那么，这种受着共和国的政治文化、权力结构制约的文学的计划性与规范化，就是洪子诚先生所找到的、并要尽力抓住的当代文学的典型现象。在我看来，他正是以此将全书的叙述“拎”了起来，形成了一种叙述结构。全书围绕着这一核心，展开了以下几个方面的叙述：（1）这种文学体制的建构——这就是第一章所讨论的：如何通过“刊物，文学团体”将作家的文学活动，包括作家自身，实行高度的“组织化”；如何通过“文学批评和批判运动”，建立新的文学规范，制造出符合规范要求的作者与读者；如何通过“作家的整体性更迭”，建立起新的文学权力结构，并形成相应的“文化性格”。（2）所建立的文学规范与秩序——这就是第五、六、七、八、十一、十二章所讨论的“诗的体式”、“小说题材的分类和等级”、“散文的创作模式”等等。（3）所建立的文学体制、规范的内在矛盾、冲突、缝隙与反叛——这就是第三、四、九、十诸章所讨论的“左翼文学内部的矛盾”、“对规范的质疑”、“隐失的诗人、诗派”、“被压抑的小说（指通俗小说）与寻求新的替代”、“非主流文学与最初的‘异端’”等等。（4）一体化、规范化文学的历史运动——它与新文化运动的关系（第一章：40年代文学的“转折”）；它的发展趋向、指归（第十三章：“走向‘文革文学’”，第十四章：“重新构造经典”），分裂（第十五章），解体以后建立新的多元文学格局的挣扎与努力（下编：“80年代以来的文学”）。——这样，作者就建立了一个

自足的当代文学史的研究与叙述体系。

如果以上的分析与概括大体符合本书的实际的话，我们可以看出如下特点：首先，研究者不再把历史考察与叙述的重心放在对文学作品与文学现象的价值评判、作家的历史定位上——这至今仍是许多当代文学史家与文学史著作的关注中心；也不试图去揭示所谓历史发展的“本质”与“必然规律、趋势”——这至今仍是许多当代文学史家与文学史著作的既定目标。作者给自己提出的要求是“努力将问题‘放回’到‘历史情境’中去审察”（见本书《前言》）。或者如作者在和我的一封通信里所说，“竭力‘搁置’评价，把‘价值’问题暂且放在一边，而花力气考察当代文学某些概念、事实、运动、争论、文本、艺术方法产生的背景、历史依据、渊源和变异”。据作者说，这样做的目的是“增加我们‘靠近’‘历史’的可能性”（《前言》）——这与陈平原提倡的“触摸历史”和我所强调的“历史的现场感”，大概有类似的追求。

其次，面对这样一种规范化、计划化的文学，作者也不是着眼于价值评判，比如，做严厉的批判性的审视，这也是我们在类似的当代文学研究中经常看到的。当然，作者也并非没有自己的价值评定，那种批判的意识读者在字里行间是不难体味的；但作者的用力点显然不在这里，因为如恩格斯早已指出的那样，道德的义愤是不能代替科学的研究的，作为一个文学史家，作者的任務是要尽可能如实地揭示出作为一种文学的历史形态的各个方面。因此，本书用很大的篇幅来显示：即使是这样一种高度划一的文学，也依然存在着内在的矛盾、冲突、缝隙，而且也必然产生对规范的质疑与反叛，这就使得文学的发展依然存在着某些可能性，并非是某些人想当然的毫无松动的“铁板一块”，也不那么单一，而依然有自身的复杂性，甚至某种程度上的丰富性。作者

更是把这种“文学的一体化”看作是一个运动的过程：它有自己的渊源，有自己的发展，直至推向极端以后，走向分裂、变革；而在变革中也依然存在着“一体化”的努力。也就是说，这样的历史运动也是复杂的，并非一路直奔某个既定目标的。我这里反复用了“复杂”这个词，是针对着那种至今仍到处可见的过于单一、明确、直线的文学史叙述，而强调洪子诚先生所做的“复杂叙述”的努力的启示意义。

而我特别感兴趣的还是在这复杂叙述背后的作者对待历史的态度：既包含着对彼时彼地的历史情境的理解，又不回避历史的严峻方面。这与我一直追求的“设身处地”与“正视后果”的原则也是相通的。应该说，这样的原则与态度运用于当代文学，特别是十七年文学与“文革”文学，是有相当的难度的：人们很难摆脱主观情感形成的遮蔽。因此，我特别想说一说本书对“革命样板戏”的历史叙述。作者首先改变了从政治上给“样板戏”定性的思路，而将其归为“激进文化思潮”的产物，这就使对“样板戏”的评价从政治的层面转向了学术的层面，同时又指明了“样板戏”所代表的“文革”文学与始终存在的、建国后不断发展着的激进文化思潮的内在联系，具有了一种历史感；又通过对“样板戏”的形成的细致研究发现了“在‘样板戏’的创作过程中也并不拒绝对传统艺术的吸取和利用”，进而指出“在‘文革’中，激进派强调‘样板戏’等创作与过去文艺（包括中国五六十年代的‘社会主义文学’）的决裂，这之中包含着策略上的考虑”，“文化人在创作中的重要地位，对民间文艺形式的借重，以及从‘宣传效果’上考虑的对传奇性、观赏性的追求，都使文艺革命的激进派的‘纯洁性’的企求难以彻底实现”。正是包含着这样一种理解，作者对“样板戏”所做出的分析是有说服力的：“在‘样板戏’的不同剧目中，存在着许多差异。一些作品

更典型地体现了政治观念阐释的特征（如京剧《海港》），另一些由于其创作文化来源的复杂性，使作品也呈现多层、含混的情况（如京剧《红灯记》、《沙家浜》、《智取威虎山》，舞剧《白毛女》、《红色娘子军》）——而这正是这些剧目在政治意识形态有了很大改变的时空下，仍能保持某种‘审美魅力’的原因。”但作者也并没有因此回避客观存在的“样板戏”与“文革”政治、文化的密切联系以及由此产生的严重后果：“政治权力机构与文艺生产的这种关系，在‘样板戏’期间，表现得更为直接与严密。作家、艺术家那种个性化的意义生产者的角色认定和自我想象，被破坏、击碎，文艺生产完全纳入政治体制之中。”人们自然会注意到，这仍然是着眼于对文学自身发展的损害的学术的分析。这种分析是包含着批判性的价值评价的，但作者也只是“点到为止”，并不做情感的渲染与尽兴发挥，有的读者或许会有不满足感，但我认为，这恰恰可以视之为“史家笔法”。这同时也显示了一种叙述风格，我想把它概括为“绵里藏针”，“在委婉里见犀利，于稳健中显锋芒”。我甚至觉得这在一定程度上也是显示了洪子诚先生的个性的。——这样的私人性的文学史著作本来也是可以、而且应该有作者的个性投影的。这或许涉及更为复杂的问题，这里也只点到为止吧。

洪子诚先生在本书的写作中，处处显示出他是一位有着严肃、认真的学术追求的学者，他自觉从事着将当代文学研究学术化的工作。而在我看来，更为难能可贵的是，他一面追求着、实验着，又不断对自己的追求与实验进行质疑。我曾因此与他有过一次学术通信。我们本来也约定要进一步写文章来展开讨论。现在看来，我们都太忙，子诚先生身体也不好，我真不好意思逼他写文章。这里不妨将他的来信摘抄几段，希望能引起讨论：“我感到矛盾与困惑的是，我们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搁置评价，包括审

美评价？或者说，这种‘价值中立’的‘读人’历史的方法，能否解决我们的全部问题？在这条路上，我们能走多远？”“各种文学的存在是一回事，对这些作出选择与评价是另一回事。而我们据以评价的标准又是什么？这里有好坏、高低、粗细等等的差异吗？如果不是作为文学史，而是作为文学史，我们对值得写入‘史’的文学的依据又是什么？如果说文学标准、审美标准是必要的话，那么，我们的标准又来自何方？在这种情况下，‘历史还原’等等，便是一句空话。我们最终只能依据强烈的主观性，来作出我们的选择和判断”。另一个问题是，“当我们在不断地质询、颠覆那种被神圣化了的、本质化的叙事时，我们也要警惕将自己的质询、叙述‘本质化’、‘神秘化’。我要提出的问题是，是不是任何的叙述都是同等的？我们是否应质疑一切叙述？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我们的叙述与右翼分子、反犹太主义者的叙述是同等的吗？在一切的叙述都有历史的局限性的判定之下，我们是否会走向犬儒主义，走向失去道德责任与逃避必要的历史承担？另外，如果‘历史真实’、‘本质’是完全可疑的，‘意义’是虚构的，那么，我们的工作的内在动力何在？我们究竟还在追求什么？是否有可靠的立足的根基？如果‘本质’不存在，那么，‘非本质’同样也没有意义。在认识到历史的‘含混性’和主体的‘脆弱性’之后，我们是否应该放弃希望？或者说，‘希望’还有无可能？这是一连串不能不解决的问题。对这些问题我至今未能想清楚”。——而这也正是我也没有想清楚的，我们大概要继续想下去。同时，我们也还要继续做这样、那样的文学史研究与写作的实验，我们不能等一切想清楚了再去研究与写作。这是一个没有完结的不断思考与不断探索又不断质疑的过程。在这个意义上，洪子诚先生的这部《当代文学史》也只是他的阶段性的成果，他自己当然不会满足于此，人们对他也有着更多的期待。——但我

在写着“期待”这两个字时，又颇有些犹豫：一个真正的学者是不必理会别人的所谓“期待”的，他只是按照自己的内心欲求写作，或者不写作。

1999年11月1日写毕于燕北园

## 现代文学史研究的历史回顾

对中国现代文学进行“史”的研究与描述，始于1922年胡适的《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在此之前，现代文学的发展，经历了理论的倡导、创作的实绩显现等阶段，已经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1920年教育部通令全国中小学“改国文为语体文”，使“以现代白话文取代文言文”的现代文学的基本追求在教育制度上得到了落实。而胡适的《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的出现则意味着现代文学开始进入历史叙述，走出了积淀为传统的第一步。此文是为上海《申报》馆50周年的纪念特刊《最近之五十年》所撰。根据纪念集体例的要求，胡适的历史叙述从1872年写起，也即以《申报》的出世为开端，这本身是反映了现代文学的萌芽、诞生、发展与现代出版的密切联系的；而这一年也正是作为“桐城派古文的中兴的第一大将”曾国藩去世，从此“古文的命运又渐渐衰微下去了”。因此胡适给自己规定的任务是“要记载这五十年新旧文学过渡时期的短历史”（《日本译〈中国五十年来之文学〉序》）。他强调，这五十年经历了“古文范围以内的革新运动”，证明古文已经走到了尽头，必然“及身而绝，没有传人”；而同时期白话小说的大发达，“乃是中国‘活文学’的一个自然趋势”。直到“1916年以来的文学革命运动，方才是有意的主张白话文学”，宣布“白话并不单是‘开通民智的工具，白话乃是创造中国文学的唯一工具’”，“这个运动老老实实在的攻击古文的权威”，“老老实实在的宣告

古文学是已死的文学”。可以看出，胡适建立了一个“白话—文言”、“活文学—死文学”、“新文学—旧文学”二元对立的历史叙述与评价模式；并且按照进化论的历史哲学，断定“白话—新文学—活文学”代表了文学发展的前进趋势，从而为确立新文学存在的合法性与文学的正宗地位提供了历史的与学理的依据。在特别重视所谓“文统”的中国，这对才只有五年历史的新文学的立足，是至关重要的，因此鲁迅在读了胡适的论述以后，大加赞扬说：“这种历史的提示，胜于许多空理论。”

胡适关注的中心是由传统文学向现代文学转变的历史“必然性”与内在机制，他是将现代文学作为传统文学的一个继承、发展（对他所说的“活文学”传统）与否定（对他所说的“死文学”的传统），也即传统文学的“最后一章”来叙述的，而不可能将现代文学作为一个独立的历史时期从传统文学结构中分离出来。这当然也与现代文学尚在形成过程中这一客观事实有关，因此，早期现代文学史著述大都采取了这样的结构与叙述方式。如1926年大光书局出版的赵景深的《中国文学小史》即是以最后一节讲现代文学，题为“最近的中国文学”；1929年中华书局出版的陈子展的《中国近代文学之变迁》，以1840年鸦片战争为近代文学的发端，而以“十年以来的文学革命运动”作结。1930年陈子展又出版了《最近三十年中国文学史》，从戊戌维新以后的文学写起，也是把“五四”文学革命与近代文学改良运动联系在一起考察的。值得注意的是，1932年由无锡国专学生会出版的钱基博的《现代中国文学史长编》。他所说的“现代”始于爆发辛亥革命的1911年，止于写作时的1930年。作者显然站在“古文学”的立场上，并有意忽略“五四”文学革命的意义，称“新文化、新文学者，胡适之所以哗众取宠取荣誉，得大名者也”，关于“五四”以后的文学的叙述只占全书的二十五分之一，成了名副其实的



的“尾巴”。作者并不讳言，他对“五四”白话文学“著其异议，穷其流变”，是为了“俟五百年后之定论焉”，与前述胡适的叙述与论断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本书采取的资料长编的写法，保留了以后的文学史叙述常常忽略了一些史料。

在新文学的优秀作品作为白话文写作的范本进入中小学语文教科书以后，新文学又开始成为大学文学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1928年杨振声任清华大学中文系主任，明确提出“创造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文学”的办系宗旨，先后为高年级学生开设“中国新文学研究”与“新文学习作”等课程。1929—1933年间，朱自清在清华、燕大等大学讲述新文学，并且编写了《中国新文学研究纲要》，虽迟至80年代才正式整理发表，但却是第一部大学新文学研究课程的教材。它既有文学史的性质，也有当代文学批评的性质，其最突出的特点是以作家的创作成果为主要研究对象，并且十分注意文体的发展，显然着眼于对新文学创作的艺术经验的历史总结。

这一时期更为引人注目的是周作人于1932年在北平辅仁大学的演讲以及随后整理出版的《中国新文学的源流》。周作人给自己提出的任务是要沟通新文学与传统的关系，让新文学进入历史。他因此提出了“言志—载道”的二元对立的叙述与评价模式，以取代胡适提出的“文言—白话，死文学—活文学，旧文学—新文学”的二元对立模式，强调“明末的新文学运动”中间经过了“清代的反动”，对这反动的反动就产生了“五四”新文化运动，从而“认定民国的文学革命是一个文艺复兴，即是四百年前公安派新文学运动的复兴”。周作人的《中国新文学的源流》是有着更为强烈的“史论”色彩的，他是从自己的文学观与历史观出发去描述新文学的历史的。而他所提出的“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的历史循环论的观点，与胡适的历史进化论也形成了鲜明的

对照。

1933年，王哲甫的《中国新文学运动史》由北平杰成印书馆出版，这是被研究者认定的“第一部具有系统规模的中国新文学史的专著”（参看黄修己《中国新文学编撰史》），也就意味着“新文学”终于从传统文学中分离出来，单独成史。在此以后又出版了王丰园的《中国新文学述评》（1935，北平新新学社）、吴文祺的《新文学概要》（1936年，中国文化服务社）。这几部著作与朱自清的《中国新文学研究纲要》一样，都兼具文学史与当代文学批评两种特质，而且都是明确以“五四”为开端的“新文学”的发展（运动、理论与创作）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从而开创了“新文学”的历史叙述。

1935年，上海良友图书公司由赵家璧主编，出版了十卷本的《中国新文学大系》，不仅汇集了“新文学第一个十年”的大量的资料，精选了有代表性的理论、小说、诗歌、戏剧、散文作品，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而且每卷的长篇“导言”本身就构成了一部新文学史。由于编选者或是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人物（如蔡元培、胡适），或为这一时期最有影响的文学社团的中坚（如文学研究会的郑振铎、茅盾，创造社的郑伯奇，语丝社的周作人、鲁迅），或为各文体的主要代表作家（如小说家鲁迅、茅盾，诗人朱自清，散文家周作人，小说家与散文家郁达夫，戏剧家洪深），因此，《中国新文学大系》可以看作是新文学的创造者对自身历史的一次大规模的复述，也就把以“新—旧”对立为主要特征的新文学的历史叙述推到了极致：新文学的文学正宗地位不但得到了不容质疑的确立，而且几乎成了现代文学中的唯一者，所谓“旧文学”（通俗小说、旧体诗词、传统戏曲）被排斥在历史叙述之外，坚持“旧文学”观念的文学流派（如学衡派、鸳鸯蝴蝶派）与作家也只是作为对立面而存在。这样的历史叙述模式与背后的理

念（历史进化论、为人生的文学观），都对以后的现代文学史的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作为对新文学自身历史经验的总结，应该说《中国新文学大系》确实达到了较高的水平，各分卷“导言”所做的许多精辟的分析与论断，经常为以后的研究者所引述。

30年代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思想文化界的影响日趋扩大，这在文学史研究中也反映。前述王丰园的《中国新文学运动述评》与吴文祺的《新文学概要》，都是以鲜明的阶级论的观点进行新文学史的描述与评价的；他们都强调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性质，与这一时期瞿秋白关于“五四”是“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启蒙主义文艺运动”的论断（《普罗大众文艺的现实问题》）是完全一致的。1939年生活书店出版的李何林的《近二十年中国文艺思潮论》，更是一部自觉地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研究现代文艺思潮的专著。作者强调：“近二十年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性社会的急速发展的复杂性，使中国的文艺思想，不能完全重复欧洲二三百年来文艺思潮的过程；而要在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的基础上，尽他的历史责任。”本书也正是努力从中国自身的“社会经济原因与阶级基础”上去分析现代文艺思潮的历史演变的。而在对“五四”新文化的性质的判断上，李何林也同样坚持“所谓‘新文化’在‘文化’之上加上一个‘新’字，是指资本主义文化”。

1940年，毛泽东发表了《新民主主义论》，对“五四”以来的新文化运动做出了新的历史概括。他提出了“新”、“旧”民主主义革命的新概念，并以“五四”运动为“无产阶级所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从而根本改变了关于“五四”的“资产阶级性质”的论断，而强调“五四运动，在其开始，是共产主义知识分子、革命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他们

是当时运动中的右翼)三部分人的统一战线的革命运动”,“五四运动是在思想上和干部上准备了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又准备了五卅运动与北伐战争”,这就将五四运动直接与中国共产党的成立连接起来,从而确认了中国共产党及其文化思想在中国现代思想文化史与现代文学史上的主导地位。

这一重大的历史叙述、评价的改变,深刻地影响了以后的现代文学史的研究与写作。首先领悟了毛泽东的意图,并在研究实践上做出反应的是周扬。他在为鲁迅艺术学院授课而编写的《新文学运动史讲义提纲》(讲义部分内容于1986年在《文学评论》上发表)里,明确提出,“新文学运动的形成与发展”,是以十月革命的影响,马克思主义革命学说、哲学思想与艺术理论的介绍,苏联及资本主义国家内的无产阶级文艺作品的大量移植为“外部条件”的;而其“内部条件”,则是“‘五四’以来中国共产党对新文化运动在思想上与组织上的领导”,“共产主义思想在广大人民中的传播,和许多共产主义者的作家艺术家的努力”,由此而建立了一个“无产阶级及其政党所领导的新文学运动”的叙述与评价模式。

这一模式,在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革命取得胜利并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以后,几乎是顺理成章地成为一种国家意志。1950年,刚成立的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召集的全国高等教育会议通过了“高等学校文法两学院各系课程草案”中规定“中国新文学史”是各大学中国语文系的主要课程之一。1951年在教育部的主持下起草的《“中国新文学史”教学大纲》,又明确规定,“学习新文学史的目的”是“了解新文学运动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关系”,“总结经验教训,接受新文学的优良传统”。“新文学史”成为独立的学科,并在大学的文学教育中占据了与古代文学分庭抗礼(甚至是超越)的位置,这一方面有力地证明,新文学在短短

的三十年间，已经由不被承认到形成独立的体系，自成史的传统，并成为大学学术与教育的有机组成部分，这无疑具有重大的意义；但同时又意味着，新中国的现代文学史研究与教学，从一开始，就被纳入了国家意识形态，不仅为新政权的合法性与正统性提供历史依据，而且也成为新的文学、文化创造的规范。这样，现代文学史的研究刚成为独立的学科，又立刻从属于新民主主义革命史，这就构成了以王瑶的《中国新文学史稿》为代表的五六十年代现代文学的历史叙述的内在矛盾。

出版于1951、1953年的《中国新文学史稿》第一次将“五四”新文化运动为开端，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为止（1917—1949）的现代文学作为完整而独立的文学形态来加以研究，从而实现了与传统文学史的分隔；同时又是完全自觉地对现代文学做有距离的历史的考察，从而实现了与当代文学批评的分隔。《中国新文学史稿》所创建的现代文学研究的新的范式：注重文学与时代关系的文学观念，“人民本位主义”的价值观；“时代为经，文体发展为纬，先总论，后分论”的体例；大量引证原始材料，多描述，少判断的叙述方式，都对新中国的现代文学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另一方面，在前述国家意识形态的影响下，《史稿》提出了新文学史四个历史时期的划分，着意突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开创意义与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指导意义；在对新文学的性质、特点的论述上也尽可能与《新民主主义论》相一致，从而出现了总体的概括与实际的叙述、分析之间的不相一致，后来就遭到了“抽象肯定（党的领导等），具体否定”的批判，显示了这一代学者的学术困境。

在《史稿》之后，还出现了蔡仪的《中国新文学史讲话》（1952，新文艺出版社）、丁易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略》（1955，作家出版社）、张毕来的《新文学史纲》（1955，作家出版社）、刘绶

松的《中国新文学史初稿》(1956, 作家出版社)。尽管各有特色与贡献,但仍囿于“现代文学史是中国革命史的一部分”的总体框架,而且有越来越政治化的倾向。

随着中国国内政治形势的变化,人们又强调“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矛盾是中国社会主要矛盾”,提出了“兴无灭资”的任务;王瑶等人对新文学反帝、反封建的性质的强调,以及对所谓“资产阶级作家”的历史进步性的有限肯定,就受到了严厉的批判。为了突出党的作用,为社会主义文学的发展提供历史依据,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对“五四”新文学做出了新的解释:强调“新文学运动一开始就在共产主义思想指导下进行”,“具有社会主义因素”,一部中国新文学发展的历史,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发生、发展、壮大和成熟的历史”。

反右运动以后,周扬在《文艺战线上的一场大论战》中又以“无产阶级路线与资产阶级路线的斗争”来概括“五四”以来新文学的历史,并且特别提出了与左翼“内部资产阶级分子和资产阶级文艺思想”,也即“修正主义文艺路线”的斗争问题。这是用“无产阶级—资产阶级”、“马克思主义—修正主义”的二元对立模式对“新文学”做进一步的分解,从而将现代文学史的研究与描述对象更加狭窄化。以致1959、1960年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复旦大学中文系学生集体编写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册)、《中国现代文艺思想斗争史》,将胡适、周作人、徐志摩、沈从文、戴望舒等“资产阶级文人”与胡风、冯雪峰等“修正主义、反革命”都打入“另册”,作为批判的对象。到了文化大革命时期,江青等更是提出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专政论”,指明“这条黑线就是资产阶级的文艺思想、现代修正主义的文艺思想和所谓三十年代文艺的结合”(《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这就把现代文学史的叙述逼入

了“几乎没有研究对象”的绝境。

在“文革”结束以后，1979、1980年陆续出版了唐弢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三卷本（第三卷由唐弢、严家炎共同主编）。此书初稿完成于1962年，1978年以后重新修订、补写，是继王瑶《中国新文学史稿》之后，影响最大的一部现代文学史著作。它所采取的由一人（数人）主编、集体写作的方式，所建立的“教科书”的体式（强调“尽量吸取学术界已有研究成果，个人见解即使精辟，没有得到公众承认之前，暂时不写入书内”），所力图建立的文学史写作的规范（如“采用第一手材料，反对人云亦云。作品要查最初发表的期刊，至少也应依据初版或者早期的印本”；“期刊往往登有关于同一问题的其他文章，自应充分利用”；“采取‘春秋笔法’，褒贬从叙述中流露出来”等），所身体力行的实事求是的严谨学风，是影响了以后几代学者的。此书的写作，在60年代是在左的时代氛围下维护现代文学史研究的学术品格的一次艰难的努力；而80年代的修订，则是适应“拨乱反正”的时代要求，对建国以后的现代文学的历史叙述进行了重新审视，既吸取了有价值的成果，又力图打破其越来越狭窄的格局，从而使本书及后来改写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简编》成为一部“承上启下”的著作。

在80年代出现了一批现代文学史的著作。其中较有影响的是林志浩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1979、1980年，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黄修己的《中国现代文学简史》（1984，中国青年出版社；1988年作者又出版了《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史》），钱理群、吴福辉、温儒敏、王超冰的《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1987，上海文艺出版社；1998年重新修订，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等。这些著作大都是采取“教科书”的体式，既注意吸取最新研究成果，力图显示本学科已经达到的水平（因此需要不断地修订）；又充分

考虑教材所应有的相对稳定性与可接受性。这一时期的文学史著作最引人注目的是对“现代文学”性质的认识及相应的文学史价值观的变化。较早出现的文学史著作（如唐弢本、林志浩本），针对把现代文学看作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发展史”的模式，强调了现代文学的新民主主义性质，以是否具有“反帝反封建”的倾向，以及这种倾向表现得是否深刻、鲜明，作为评价现代文学作家作品的基本标准。随着研究工作的深入，人们又发现了这仍是一个思想与政治的尺度，于是又有了“文学现代化”概念的提出，其中包括了文学观念的现代化，作品思想内容的现代化，作家艺术思维、艺术感受方式的现代化，作品创作方法、表现形式、手段的现代化，以及文学语言的现代化等等。价值观的变化带来了研究格局的突破，长期被排斥在外的文学思潮、社团、流派、作家、作品……重新纳入研究视野，给予了新的评价，现代文学的丰富性与复杂性开始呈现出来。“现代性”标尺的提出，也意味着对“新一旧文学”对立模式的坚持与深化：它所强调的是“新文学”的“现代性”，于是又有了“现代性—非现代性”的二元对立。

80年代（并且延续到90年代）的一个重要趋向是从“思潮流派”的角度做历史的叙述。最早提倡这一研究思路的严家炎在他影响很大的《中国现代小说流派史》“绪论”中指出：“流派是时代要求、文学风尚和作家美学追求的结晶”，“由于它不是只表现在各别作家身上，而是表现在一群作家身上”，进行流派研究，就“可以帮助我们掌握与分析纷纭复杂的文学现象，从中整理归纳出某些脉络，发现和总结小说发展的某些规律与经验，不仅能指出同一时间内的横的分化，而且也能指出前后不同时期的纵的关联”，这大概是反映了这一时期研究者“将文学史的描述回到文学自身”及寻求文学发展的内在“规律”的追求的，因此成为最



有影响的文学史的把握方式。前述黄修己本及钱、吴、温、王四人的《三十年》尽管还不是思潮流派史，但都是把思潮流派的发展作为重要的叙述线索；而在文体史的研究中，思潮流派（或作家群体）就成为主要的研究对象。这方面的代表作除严家炎的《中国现代小说流派史》之外，还有杨义的《中国现代小说史》三卷本（1986，1988，1991，人民文学出版社）、孙庆升的《中国现代戏剧思潮史》（1994，北京大学出版社）、孙玉石的《中国现代主义诗潮史论》（1999，北京大学出版社）等。

当然，思潮流派的视角并非唯一的，从其他角度切入的有影响的文体史还有叶子铭主编的《中国现代小说史》1、2卷（1991，1992，南京大学出版社）、俞元桂主编的《中国现代散文史》（1988，山东文艺出版社）、陈白尘、董健主编的《中国现代戏剧史稿》（1989，中国戏剧出版社）、葛一虹主编的《中国话剧通史》（1990，文化艺术出版社）等。专门研究文学思潮与文学批评的专著则有马良春、张大明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思潮史》（1995，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温儒敏的《中国现代批评史》（1998，北京大学出版社）等。随着研究视野的进一步扩大，还出现了过去较少涉及的《中国现代儿童文学史》（蒋风主编，1987，河北少年儿童出版社）、《中国少数民族现代文学》（王保林主编，1989，广西人民出版社）、《中国翻译文学史稿》（陈玉刚主编，1989，中国对外翻译公司）、《海外华人文学史初编》（陈贤茂等著，1993，鹭江出版社），这些著作都尽到了开拓之功，丰富了人们对现代文学的认识。

80年代中期，黄子平、陈平原、钱理群提出了“20世纪中国文学”的概念，对文学史的研究与叙述也产生了很大影响。据倡导者自己的解释，“这一概念首先意味着文学史从社会政治史的简单比附中独立出来，意味着把文学自身发生发展的阶段完整性作为研究的主要对象。这一点将带来一系列问题的重新调整（问题

的提法，问题的位置，问题的意义，等等)”，“这个概念中蕴含着一个重要的方法论特征就是强烈的‘整体意识’”，“并不单是为了把目前存在着的‘近代文学’、‘现代文学’和‘当代文学’这样的研究格局加以打通，也不只是研究领域的扩大，而是要把20世纪中国文学作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来把握”。这一概念提出后，学术界反应强烈，并逐渐普遍接受。最初的成果即是倡导者之一的陈平原撰写的《20世纪中国小说史》第一卷（1989，北京大学出版社）。本卷将“20世纪中国小说”起点定为“1897—1916”，把研究的重心转向“中国小说从古典向现代的嬗变”，同时“把东西方文化的撞击，域外小说的刺激与启迪作为中国小说产生发展的文化背景”。这其实是反映了一种新的研究趋势的：晚清与民国的文学研究在80年代末与90年代受到了普遍关注。本卷的一些具体论述，如“小说市场、小说家的专业化、新小说的商品化倾向”的研究，小说发展中的“雅俗关系”的研究以及“小说文体”的研究，都对以后的研究产生了影响。以后又陆续出现了大跨度的文学史研究成果，如范伯群、朱栋霖主编的《1898—1949中外文学比较史》（1993）、刘增杰主编的《19—20世纪中国文学思潮史》（1992）、黄修己主编的《20世纪中国文学史》（1998）、孔范今主编的《20世纪中国文学史》（1997）、姚春树主编的《20世纪中国散文史》（1999）等。

到80年代后期与90年代，现代文学史研究中有着深刻影响的“新一旧文学”二元对立的模式开始受到了质疑。首先是一些作为新文学对立面的文学社团、流派，如学衡派、鸳鸯蝴蝶派等，进入了人们的研究视野，在重新发掘与研究原始史料的过程中，这些流派的实际面貌得到了更准确的描述，它们与新文学的关系，也得到了更为复杂的呈现。而一些被文学史叙述长期排斥在外的所谓“旧文体”，例如通俗小说，更是引起了许多研究者的

兴趣。苏州大学以范伯群为首的研究群体在这方面做了大量的开拓性的工作。在从通俗小说与严肃小说（或称新小说、探索小说、高雅小说）的互动关系中去研究与描述现代小说的发展，已经成为一些研究者的一个新的思路。一些有影响的文学史研究著作，如杨义的《中国现代小说史》、钱理群等的《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修订本、樊骏主编的《中华文学通史》近现代卷，都对通俗小说的发展历史做了专门的描述。作为“新—旧文学”对立模式的哲学基础的历史进化论与历史决定论，在90年代也引起一些学者的反省，从而孕育着历史观与文学观的更大变化，这对文学史的研究与写作产生的影响也许是更为深远的。

在90年代文学史研究与著述中，还出现了两个值得注意的现象。一些文学史著作，如冰心主编、董乃斌、钱理群任副主编的《绘图本中国文学史》（1995，祥云出版公司）、张炯、樊骏等主编的《中华文学通史》（1998，华艺出版社）开始把已经从古代文学史中分离出来的现代文学的历史叙述，重新回归到中国传统文学的大叙述中，这是为了更好地揭示中国现代文学与传统文学的内在联系，同时也是意味着近现代文学经过一百年的积累，已经积淀为传统的有机组成部分。因此，从表面上看，似乎是对早期胡适等人的叙述的回归，却有着不同的意义。长期占主导地位的文学史的“教科书”体式也开始了有了新的突破。杨义等的《中国现代文学图志》（1996，人民文学出版社）把传统的“书话”发展成文学史的新的体式。谢冕主编的《百年中国文学书系》十卷本（1998，山东教育出版社），则“通过一个典型年代里的若干个‘散点’来把握一个时期的文学精神和基本特征”，在对历史的把握与描述中都突现生活的细节的作用，同时强调各卷都是独立的个人著作，以“回到一家之言的传统”。这或许预示着文学史的研究与写作将走向更加个人化与多元化。

## 现代汉语文学所走过的道路

在20世纪末，法籍华裔作家高行健以现代汉语写作的文学作品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这是一件令人高兴的事。或许我们可以趁此机会，对近百年的现代汉语文学所走过的道路，做一番简略的回顾。

这一段历史是以“五四”文学革命为起端的。“五四”文学革命在某种意义上首先是文学语言的变革。胡适在发难之作《文学改良刍议》中即旗帜鲜明地主张以白话代替文言，“今日作作文诗，宜采用俗语俗字”，并比之为“但丁路德之伟业”。以后胡适又在《建设的文学革命论》一文中将文学革命的目标归结到“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十个大字：“我们所提的文学革命，只是要替中国创造一种国语的文学。有了国语的文学，方才可以有文学的国语。有了文学的国语，我们的国语才算得真正国语。”这表明“五四”的先驱者首先是要突破晚清白话文运动的二元论，强调白话文不仅应是“启迪民智”的工具，运用于启蒙教育，而且要“做一切文学的唯一工具”；因此，它既要求以口语为基本，以实现语言与思维、口头语与书面语，即想、说、写的相对统一，又要求对口语进行文学的提炼，并在口语的基础上吸取其他语言成分，创造出适应现代人的思维、情感表达、交流要求的，具有思想与艺术表现力的现代文学语言，从而创造现代汉语文学。而这样的现代汉语文学的创造正是为现代国家民族共同语言的形成

与发展奠定基础的：“国语有了文学价值，自然受文人士的欣赏使用，然后可以用来做教育的工具，然后可以用来做统一全国语言的工具。”（胡适：《〈中国新文学大系〉第一集的〈导言〉》）

而这样的现代汉语文学（当时称为“新文学”或“白话文学”）将是怎样的一种文学呢？先驱者们也提出了自己的理想与追求。周作人在他的很有影响的《新文学的要求》一文里，即明确提出：“这文学是人生的”，“这文学是人类的，也是个人的”。他并做了这样的概括：这是“人道主义的文学”、“理想主义的文学”，是“个人以人类之一的资格，用艺术的方法表现个人的情感，代表人类的意志，有影响于人间生活幸福的文学”。这里，对文学的个人性与人类性的强调，与前述对文学在形成现代民族国家的共同语言中的作用的强调是相辅相成的。

但“五四”先驱者的倡导，从一开始便遭到了强烈的反对。林纾在著名的致蔡元培书中即断然不许“都下引车卖浆之徒所操之语”进入文学的殿堂。严复轻蔑地将“白话文学”比作“春鸟秋虫”，可以“听其自鸣而止”。林纾则扬言“悠悠百年，自有能辨之者”，大有要长期对阵之势。面对压力，先驱者们明确地意识到，“一个文学运动的历史的估价，必须包括它的出产品的估价。单有理论在接受，一般影响的普遍，都不够证实那个文学运动的成功”（胡适：《〈中国新文学大系〉第一集的〈导言〉》），因此，他们以“拿出实绩”互勉与自励。鲁迅后来回忆说：“五四”的作家们在“写法”上做了多方面的尝试，“也有漂亮和缜密的，这是为了对于旧文学的示威，在表示旧文学之自以为特长者，白话文学也并非做不到”（《小品文的危机》），为了使现代汉语文学写作在中国立足，真可谓“煞费苦心”。而这样的“创立现代汉语文学语言”的目标是吸引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国现代作家的，从而形成了一个持续不断地进行文学语言实验的传统。这里，仅就手头有

的资料略举几例。冰心这样谈到她的文体追求：“我主张‘白话文言化’、‘中文西文化’，这‘化’字大有奥妙，不能道出的，只看作者如何运用罢了。我想如现在的作家能无形中领略古文与西文，拿来应用于新文学，必能为今日中国的文学界，放一异彩。”（《遗书》）周作人则提出了他的文学语言设想：“以口语为本，再加上欧化语，古文，方言等分子，杂糅调和，适宜地或吝啬地安排起来，有知识与趣味的两重的统一，才可以造出有雅致的俗语文来。”（《〈燕知草〉跋》）鲁迅在《我怎么做起小说来》一文里强调了从中国传统戏曲与美术中的吸取经验：“我力避行文的唠叨，只要觉得够将意思传给别人了，就宁可什么陪衬也没有。中国的旧戏上，没有背景，新年买给孩子看的花纸上，只有主要的几个人（但现在的花纸却多有背景的了），我深信对于我的目的，这方法是适宜的，所以我不去描写风月，对话也绝不说到一大篇。”老舍则说他追求“一种简单的，有力的，可读的，而且美好的文章”，“要把顶平凡的话调动得生动有力”，烧出白话的“真正的原味儿”来（《我怎样写〈二马〉》、《言语与风格》）。除了以上几位作家以外，还有沈从文、张爱玲、赵树理、冯至、艾青、穆旦、曹禺等一大批语言艺术家，经过他们的可以说是艰苦卓绝的努力，终于使得现代汉语在口语的基础上，不断地吸收了各种语言成分，成为一种具有相当大的容纳力的，富有丰厚的文化底蕴的，极有表现力与创造活力的语言，由此创造出的现代汉语言文学，以其深广的民族文化的背景，世界性的文学眼光，对个人、民族与人类命运的关注，对人性的开掘，而成为20世纪世界文学中的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在我看来，像鲁迅、老舍、沈从文这些作家，都是可以问鼎诺贝尔文学奖，与20世纪东、西方世界的文学大师并肩而立的。而如“五四”先驱者所期待的那样，从1920年当时的中央政府教育部宣布以白话为国语，通令全国中小

学采用以后，现代汉语文学作品大量进入中小学课本，并成为大学文学教育的重要内容，这都极其深刻与广泛地影响了整个民族的思维、言说方式与心灵世界，在凝聚民族精神上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而同样值得注意的是，由中国本土所创造的现代汉语文学，在本土之外也得到了响应，这就是海外华文新文学的产生与发展。这样的在中国本土之外的国家与地区，用现代汉语写作的文学，是在“五四”文学革命的直接影响下诞生的，在最初阶段，它是一种“华侨文学”、“留学生文学”，可以看作是本土的现代汉语文学的一个分支。但随着绝大多数华侨加入侨居国国籍，一些土生华人加入汉语文学的写作队伍，华文文学成了所在国文学的有机组成部分，就显示出了与中国本土的现代汉语文学不同的特色。当然，运用现代汉语写作本身，就意味着一个巨大的中国文化背景的存在，许多作者本人的中国本土生活的经验与生命体验，更会对创作产生直接、间接的影响，而且有了所在国文化背景的参照，有了一定的距离，对中国本土文化也会有新的体认；但另一方面，作者的海外身份与经验，当然也更容易融入所在国文化以至世界文化之中，对超越国界与民族界限的人类普遍情感、人性与生存困惑更会有特殊的体验与感受，这反倒更接近了前述“五四”先驱者所提出的“个人以人类之一的资格，用艺术的方法表现个人的情感，代表人类的意志”的现代汉语文学的理想，从而体现了一种独特的价值。

在世纪末的最后二十年，随着中国社会、经济、文化的巨大变革以及世界格局的重大变迁，现代汉语文学又有了引人注目的发展。首先是中国本土的作家继承“五四”文学革命的传统，更自觉地进行现代汉语文学语言的实验。这里正好有一篇高行健写于1982年的《读王蒙的〈杂色〉》。文章特别赞扬王蒙“发挥了他

运用现代汉语娴熟的技艺，并且善于创造”：“新词、新的句法自然而然地从他笔下流泻出来，明快，流畅，而又新鲜。他不固守语言的陈旧规范，力求创新，而这种创新读者又不难接受。这也是当代作家在语言艺术上应有的追求。王蒙正是在这种有成效的追求中创造了他独特的语言风格，即自由活泼的联想，词、词组、句子的并列和对比，跳跃的句式结构和长短句相间。”事实上，这样的现代汉语文学语言的创新欲求，也是属于高行健本人以及他同时代的许多中国当代作家的。无论在人心浮躁的80年代，还是商业大潮冲击下的90年代，始终有一批作家忠实于文学，默默坚持着创造更有活力的现代汉语文学的实验。他们当中就有王安忆、史铁生、韩少功、李锐、北岛、余华、张承志……这样一些有实绩、有潜力的杰出者，他们的作品不仅赢得了中国本土的读者，而且在日益发展的中外交流中被介绍到海外，产生了影响。在此前后，本土之外的现代汉语文学（华文文学）更有了长足的发展。不仅所在国家与地区的范围更加扩大，而且涌现出了白先勇、陈若曦等一批有影响的作家。而一些非华裔的外国作家，如澳大利亚的白杰明、韩国的许世旭也开始尝试着用现代汉语进行写作。这都表明，现代汉语文学写作自然是以中国本土为基地，但确实已经超越了国界，成为一种世界文学现象，而且还有继续发展的趋势。

尽管我们的历史回顾十分粗疏，但却已足以说明，经过大半个世纪的努力，现代汉语文学不仅在中国的本土中深深扎根，而且成为20世纪世界文学中的有机组成部分，它的文学业绩与对世界文学的贡献，已经是不容忽视的客观存在。因此，本世纪最后一年的诺贝尔文学奖授予一位现代汉语的写作者，应该说是顺理成章、瓜熟蒂落的。而由高行健获此殊荣，在我看来，也是有充分理由的。如前所述，他是一位对现代汉语文学有着自觉追求的



语言艺术家，80年代他在中国本土从事创作时，就是实验戏剧的主要代表作家之一，他对现代话剧观念与语言的创新，已经显示了他的无拘的创造力。90年代他又成为华文文学创作的重要代表作家，更自觉地“将自己对（东西方）两种文化及传统与现代的体会，灌注到创作中去”（高行健：《戏剧：糅合西方与中国的尝试》），他所坚持的独立的个人性的写作立场（《为了自救而写作》、《我主张一种冷的文学》），以及他对“现时代人的处境和人类普遍的生存状态”的关注（刘再复：《〈灵山〉是一部什么样的小说》），都使他与“五四”开创的现代汉语文学的传统有了更高层次上的承接与发展。他的作品所显示的原创力与想象力，说明这是一位有着巨大潜力的作家，人们有理由对他寄以厚望。

当然，正如一位中国作家所说，文学创作不同于体育竞赛，不可能有绝对冠军，高行健无疑是杰出的，却不是唯一的。而且说到底，一个独立的作家绝不会以获奖（包括诺贝尔文学奖）为自己的追求。人们之所以为高行健的获奖感到高兴，是因为它将有助于扩展现代汉语文学在世界上的影响力；我们自己也可以借此机会来检阅大半个世纪的努力所获得的成绩，总结与交流经验，思考与探讨新世纪现代汉语文学的发展道路。像我这样的专业研究者也从中受到了许多启示：或许我们应该突破单一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格局，而从本土与海外现代汉语写作的互动中来考察20世纪现代汉语文学的发展。本文的写作，也算是一个尝试吧。

2000年11月5日写毕

## 略谈“典型现象”的理论与运用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方法的一个尝试

谈起研究方法，人们首先想起的是对西方研究方法的借鉴。80年代大陆学界的“方法热”，主要走的就是这条路，在某种意义上，我们这一代学者也是由此而走上学术之路的。我想，以后的年轻学者大概也还是要不断地向西方学习与借鉴，对此不应该有什么动摇。近年来，又有人强调对中国自身传统的借鉴，这自然是一个新的觉悟，对今后中国学术（包括现代文学研究）的发展会产生深刻的影响。不过对传统的内涵、外延的理解，似乎还存在着某些差异。有些人讲传统就是中国古代文化（文学），是不包括近百年来的现代文化（文学）在内的，他们不承认经过一个多世纪的努力，已经形成了一个不同于古代的现代文化（文学）传统，甚至认为，现代文化（文学）割断了中国文化（文学）的传统，当然谈不上对它的继承与发展。这自然是一个不符合事实的偏见，但也从另一面提醒我们，在进行现代文学研究方法探讨时，不仅要注意对西方与中国古代的研究方法的借鉴，同时也应认真研究并总结本世纪文学（文学史）研究的历史经验，从中有所吸取与借鉴。正是出于这样的考虑，我选择了现代文学研究的奠基者之一的王瑶先生在方法论上的一个重要建树——“典型现象”理论，作为我的论题。

一

王瑶先生是在讨论“文学史”与“文学理论”这两门相近学科的区分时，提出他的“典型现象”论的。他在引述了列宁《哲学笔记》的观点：“现象比规律更丰富”，“任何规律都是狭隘的、不完全的、近似的”，要“反对把规律、概念绝对化、简单化、偶象化”以后，指出，在文学理论的研究中，理论原则一旦被抽象出来，具体现象就自然失去了意义；但对于文学史的研究，“不讲文学现象，就不能构成文学史。因为某一现象除了它和其他现象所共有的同一本质以外，还包含有不同于其他现象而为其所独有的纯粹个别的因素”，这不仅是体现了历史更注意特殊的事例的特点，而且也是由“文学必须以个性的独创性为生命”的特点所决定的。<sup>[1]</sup>但另一方面，文学史事实上又不可能包罗一切文学现象，而必须有所选择，选择本身就包含了或一程度的抽象与概括；文学史研究还必须理清历史发展线索，建立一系列文学现象之间的联系，这就更需要理论的抽象——尽管我们可以承认文学史的抽象是一个较低程度的抽象。任何抽象、概括必须要以不同程度上损伤文学现象原生形态的丰富性为代价。既要保留作为现象特征的丰富性、具体性、个别性，从而使文学史图景呈现某种模糊状态，同时又要进行或一程度的概括、抽象，以揭示文学现象的内在联系与共同特征，从而使文学史图景具有一定的清晰度：如何同时满足显然相互矛盾的这两方面的要求，就成为文学史研究的特殊困难所在。王瑶先生的理论贡献，正是在于他找到了“现象”与“规律（内在发展线索）”、“特殊”与“一般”之间的中介：“典型现象”，从而为解决上述文学史研究的两难问题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路与途径。他指出，“文学史要求通过对大量文学现象的研究，抓住那些最能体现这一时期的文学特征的典型现

象”<sup>[2]</sup>。“典型现象”的特点正在于，它既是从现象中抽象出来，概括了特定时期文学的共同特征，或是作家创作中的不断出现的稳定性特征，同时，又不失去现象本身所特有的具体性、生动性与丰富性。“典型现象”是王瑶先生文学史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他在很多文章中都从不同的角度，用不同的方式做过精彩的阐发。例如，在一篇题为《希望看到这样一本书》的文章里，他又提出了“从一个人看一个世界”的主张；对于“一个人”（一个作家）可以有两种考察方式：“如果只把他们的主张和行为单独地作为孤立现象来考察，那么这些只是个别历史人物的贡献和成就”；如果把“一个人”看作是在他的身上体现了特定时代的某些特征的“一个人”与一个“时代”的统一体，那么，这个“人”就成为一个“典型现象”：当选定从这“一个人”看“一个世界”时，对这个“人”就已经进行了某一程度的抽象，但这种抽象又不离开其个别特征的丰富性。王瑶先生认为，这种“通过某一视点来总揽全局”的方法，也即是“通过典型的历史现象的角度来综述这一时期文学史的全貌”，“可能是既具体有征又能体现发展的轨迹”，是最能满足文学史的要求的<sup>[3]</sup>。

值得注意的是，王瑶先生还多次指出，他的“典型现象”理论是直接受到鲁迅的启示，并且是以鲁迅的文学史研究为楷模的。他非常重视由许寿裳公布的鲁迅未完成的“中国文学史”写作计划，并做了这样的阐述：“（鲁迅）把六朝文学的一章定名为‘酒·药·女·佛’，关于酒和药同文学的关系，我们已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一文中得知梗概，女和佛当然是指弥漫于齐梁的宫体诗和崇尚佛教以及佛教翻译文学的影响，这四个字指的都是文学现象，但它既和时代背景和社会思潮有联系，又和文人的生活与作品有联系，是可以反映和概括中古文学史的特征的。他把讲唐代文学的一章取名为‘廊庙与山林’，那是

根据作家在朝或在野而对现实采取不同的态度和倾向加以概括的，其意盖略近于他的一篇讲演的题目《帮忙文学与帮闲文学》，目的是由作家的不同的社会地位来分析作品的不同倾向的。他善于捕捉普遍性的能够反映本质意义的典型现象来论述，其中就体现了规律性的认识”<sup>[4]</sup>。从王瑶先生对鲁迅文学史研究的理论与实践的上述总结，再结合王瑶先生自己的研究实践（这主要体现在他的《中古文学史论》一书中，如《玄学与清谈》、《小说与方术》、《文人与酒》、《论希企隐逸之风》等章），我们可以看出，无论是鲁迅，还是王瑶先生，对历史上的文学现象的把握都有三个侧重点：一是文学自身的发展，二是作为文学创作的主体的作家（生活方式、情感方式、思维方式、心态，等等），三是文学发展的文化背景（一个时代的社会生活、民情风俗对文学的影响，文化各领域各学科与文学的关系等等）。这里，显然抓住了两个中介环节：一是“文化”作为最终决定文学发展的“社会经济状况”与“文学”之间的中介，一是作家的“主体精神结构（情感、思维、心态，等等）”作为影响、制约作家创作的“文化背景”与作品“文本结构”之间的中介。而在把握这些环节时，鲁迅与受他影响的王瑶先生又总是从具体可证的现象形态的基本元素入手，如“酒”、“药”、“佛”、“女”之类；所选择的这些基本元素都具有典型性的特征，或能体现特定时期的文学特征（如“女”所象征的宫体诗的繁荣），或表现文人（作家）精神的特殊风貌（如“酒”所象征的颓废、隐逸之风），或是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影响文学发展的诸文化因素中起着决定作用的环节，有人称之为“文化焦点”（如“佛”所象征的佛教与佛经翻译的影响）<sup>[5]</sup>。这些典型现象（元素）自然是从大量的文学现象的比较、分析中提炼出来的，以此作为切入口，进行深入的、多层次、多侧面的开掘，就能做到“抓住一点，而总揽全局”，以“小（具体而精

微)”见“大(时代文学风貌)”：这正是文学史的写法。

## 二

以上，是对王瑶先生的“典型现象”的方法论及其来源(对鲁迅研究经验的总结)，所做的简单介绍。应该说，他的这一方法论对大陆的现代文学研究是有影响的；作为王瑶先生的学生，我自己多年来也一直在进行这方面的研究试验。下面，将结合我自己的研究实践，谈谈我的一些体会与思考。

首先要说的是，在具体操作实践中，“典型现象”的功能与把握方式、途径又是多样的，并无固定的法式，在这方面有相当广阔的创造余地。这些年我主要进行了以下几个方面的尝试：

一、十数年来，我做了三位现代作家的研究，也可以说是解剖了三只“麻雀”：鲁迅、周作人与曹禺。在研究方法上我考虑得最多的，即是如何最充分地显示这三位作家不可重复的个性，同时又揭示出其内在的典型性、代表性，做到王瑶先生所要求的“从一个人看一个世界”。这里，似乎有一个认识过程：在最初的个案研究中，我已经隐隐地感觉到，周氏兄弟几乎是领导了中国现代文学发展的两大主要潮流，抓住他们两个“审观点”，是可以“总揽(现代文学的)全局”的；随着研究的深入，我的这一思路愈加明晰，在最近所写的一篇文章里，提出了这样的看法：周氏兄弟的不同的文化选择与生命形态，不仅代表了20世纪中国人的生存危机，以及向这危机挑战的两种不同的范本，而且也体现了人类天性中的两个根本对立的特性——在后一点上，可以把周氏兄弟看作是类似“哈姆雷特与堂吉诃德”那样的超越国家、民族与时代的人性的典型<sup>[6]</sup>。我想，按照这样的思路去研究周氏兄弟，即把他们当作中国现代思想文化，以至人类文明发展过程中的“典型现象”，既揭示各自现象形态的具体性、个人性，又将

其典型化（符号化），揭示其内在的象征意义：这或许可以打开周氏兄弟研究的一个新的途径吧。

但任何典型都有其局限性，存在某些涵盖不了的盲点。周氏兄弟也是如此：他们都是历史的强者，也必然是历史的孤独者，他们的许多历史选择与行为几乎是无可、也无人效仿的。因此，在研究了周氏兄弟之后，我还必须再寻找一个历史的弱者的典型，在“他”身上显现了大多数人（知识分子）难免的人性的（知识分子）的弱点，他的历史选择与生存状态、生存困境也就具有更大的普遍性与典型性。曹禺就是这样的理论与方法的设想、要求下，进入我的研究视野的，于是有了《大小舞台之间——曹禺戏剧新论》一书的写作。

以上对三位作家的研究都是将对象从复杂的历史过程中抽取出来作抽样的，解剖麻雀式的标本分析；在达到了对历史与文学发展中的典型现象的具体把握之后，还必须再把这些典型现象还原到复杂的历史程序与联系中去总揽全局。于是又提出了进一步研究 20 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气质，探讨其与世界知识分子的内在精神联系的课题。这显然是在追求时间与空间的更大跨度，更广泛的历史概括性、抽象性，以至某种形而上的哲学意味。但同时也就面临着一个陷阱：弄不好，会坠入理性的抽象王国，成为脱离现实的单纯的精神思辨；或者成为材料的拼凑、浮泛的空论。这时，仍是王瑶先生的典型现象理论提示了我：必须找到“具体可征”的“审视点”。经过反复的研究，我终于选择了“堂吉诃德”与“哈姆雷特”这两个文学典型。——他们正是我所需要的具体与抽象、个别性与概括性（一般性）的统一：作为文学形象，自然是具体、个别、有血有肉的；但他们却概括了人（知识分子）本性的两个不同侧面，具有显然的象征性，自然有助于对 20 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气质的把握；这两个形象从

西向东的移动、传播过程中，不同国家、民族（由诞生地的英国、西班牙，到作为中介的德国、俄国，直到中国），不同时代（从17世纪到20世纪）的知识分子（从狄更斯到歌德、海涅，到屠格涅夫、陀思妥也夫斯基，到鲁迅、周作人，等等）对这两个文学形象的评价、阐释，都是具体的，并且可以做实证考察、研究，具有极强的可操作性的，而同时又可以从中提炼、概括出人类知识分子的精神共性与内在的精神联系。这样，“堂吉诃德和哈姆雷特的东移”在我的研究课题里，就成了一个文学典型现象，人性的、哲学的普遍抽象的生命命题（如本书所讨论的理想与现实、信仰与怀疑、个体与群体、思想与行动等等）获得了可感的生命载体，抽象的精神现象的研究与具体的实证的研究获得了有机的统一。——这正是我在《丰富的痛苦——堂吉诃德与哈姆雷特的东移》一书中所追求的。

以后，在《1948：天地玄黄》一书的写作中，这样的“从一个人看一个世界”的思路又进一步发展为“从一个年代看一个时代”。我原先给自己选择的课题是《四十年代文学史》这样一个断代史的题目，而且是一个多卷本的计划：打算分成“文学思潮、文化背景”、“作家的生活与精神研究”、“文学本体发展研究”、“主要作家、作品点评”、“年表”等五卷来写。这样一个文学史的写作构想尽管规模很大，面面俱到，却因此而失去特色：仍然摆脱不了“文学背景+作家、作品”的框架。我为此而苦恼不已，迟迟不能动笔。当谢冕先生向我提出选择有代表性的十个年头，写多卷本《百年文学史》的计划时，我立刻意识到：这是对王瑶先生典型现象研究的一个发展，正是我所要追求的。——不是面面俱到，平铺直叙，而是突入“一个审视点”而“揽全局”。关注一个年代，就更集中，更具有历史的具体性与可操作性，可以把容易为大文学史所忽略或省略的人与事，历史细节纳入视野，如



一本书（如《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的出版经过，一份杂志（如《大众文艺丛刊》）创刊的里里外外，一位作家（如朱自清）逝世的前前后后，以至这个年代普通人、一般知识分子读什么书，喜欢听什么音乐，看什么电影，街头巷尾流传什么笑话……这样一些日常生活中的细节，都具体入微而生动形象地进入了我们的文学史叙述。这正意味着历史观念的悄悄变化：人们更加关注的是一定历史时代的人（包括知识分子、作家）在日常生活中的具体存在。从另一方面说，对特定历史年代的选择本身，就已经经过了或一程度的概括，例如，选择“1948年”作为历史叙述的切入口，就是因为这一年正是20世纪历史（也包括文学史）上的两个时代，一个将亡未亡，一个将生未生，进行最后的生死搏斗的一年，抓住这一年，不仅可以展示中国文学从40年代以来，特别是1945年以来发展的趋向，而且决定以后（1949年以及1949年以后）中国文学发展方向的一些基本因素已经孕育于这一年文学的发展中。正是在这个意义上，“1948年文学”本身就已经构成了一种典型的文学现象，人们确实可以从这一个年代看到整个时代的文学。

二、在进行《心灵的探寻》一书写作的研究方法的设计时，我在王瑶先生的典型现象理论的指导启示下，提出了“单位观念”、“单位意象”的概念与操作设想：“每一个有独创性的思想家与文学家，总是有自己惯用的、几乎已成为不自觉的心理习惯的、反复出现的观念（包括范畴）、意象；正是在这些观念、意象里，凝聚着作家对于生活独特的观察、感受与认识，表现着作家独特的精神世界与艺术世界，它打上了如此鲜明的作家个性的印记，以至于可以在其上直接冠以‘×××的意象’、‘×××的观念’，从而构成了我们所要紧紧抓住的最能体现作者个性本质的‘典型现象’。而作家作为一个语言艺术家，他的独特观念、意

象总是通过独特的语言（词语）表现出来的。由此而产生了如下研究路线：从作家在作品中惯用的、反复出现的词语入手，找出作家独特的单位意象、单位观念（包括范畴）；然后，对单位意象、单位观念进行深入的多层次的开掘，揭示其内在的哲学、心理学、伦理学、历史学、美学等丰富内涵，并挖掘出其中所积淀的传统文化、外来文化的多种因子，以达到对作家与古今中外广大世界息息相通的独特的精神世界与艺术世界的具体把握”<sup>[7]</sup>。——以后这成为我的现代文学研究的基本方法。

所谓作家的单位意象（单位观念）因其功能、意义的不同，大体上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作家对一定历史时代人的生存状态、生存体验、生存困境的一种发现（感受、概括），是艺术家形成与表达自己的“思想”的特殊方式。我在一篇文章里谈到鲁迅的思想与表达方式时曾这样说：“具体的、生动的、形象的现象形态，不仅对鲁迅的思想的形成，而且在鲁迅思想的表达上，都具有重要的，甚至是决定性的意义。鲁迅与其说是运用逻辑的力量推论出社会、历史、人类、人性的理性认识，不如说是运用了自己深切观察而体验感悟到这一切。构成鲁迅思想的基本单位（元素）的，不是抽象的逻辑范畴，而是一些客观形象与主观意趣统一的、典型化的单位意象，例如‘死火’、‘过客’、‘影’、‘墙’、‘夜’、‘求乞者’、‘杀人团’、‘无物之阵’、‘吃人的筵席’、‘戏剧的看客’、‘染缸’，等等。正是这些文学化的意象、语言，赋予鲁迅哲学所关注的人类精神现象、心灵世界以整体性、模糊性与多义性，还原了本来面目的复杂性与丰富性。这样，鲁迅所要探讨的精神本体的特质与外在文学符号之间，就达到了一种和谐与统一。”<sup>[8]</sup>而我们今天的研究，则既要揭示这些意象背后的哲学意蕴，又不能将活生生的思想加以切割。——其实，这样的单位意象（观念）不仅存在于鲁迅作品中，可以说一切关注人类生存的

作家都会有属于自己的单位意象与观念。就我研究的范围，周作人有“风雨”、“水”（“小河”），曹禺有“挣扎”、“残酷”、“被捉弄”等等。后来读昆德拉《小说的艺术》，发现他也有“存在编码”、“关键词组”的说法<sup>[9]</sup>，其实是同一个意思，或许“存在编码”要更为确切。

还有一类单位意象（观念）是表示作家主体的生存状态与心态的。比如，我在研究鲁迅散文时，从鲁迅的自述与友人的回忆中，发现了“夜”这一鲁迅的单位意象与其散文创作的内在联系：“夜”不仅提示了鲁迅写作的环境、氛围，而且暗示鲁迅这一创作主体的“孤独者”的存在与“悲凉”心态。而这孤独的个体的存在体验，一方面折射着鲁迅所生活的时代，与制约、影响着鲁迅创作的历史文化背景有着密切关联；另一方面又决定着创造主体与读者之间的紧张、排拒关系以及以“独语”为特征的独特话语方式的采用。这样，“夜”这一单位意象（典型现象之一类）就不但具有鲜明的形象性，具体性，甚至构图性（请想想“夜幕”、“灯”、“鲁迅”、“文稿”四者的镜头组合吧），而且具有超越的象征意义与广阔的概括力，它几乎可以引起人们关于鲁迅散文（也许还不只是散文）的文化背景与创作主体的关系以及创作主体精神结构与文本结构的关系……的种种联想、体验与思考，与鲁迅其人其文浑然融为一体。“爱智者”与“常识”则是周作人的单位观念，前者是周作人自我身份的确认，后者看似只涉及周作人散文的内容与观念，但与“爱智者”构成一个整体，就暗示着周作人作为“爱智”的“凡人”的自我存在方式，以及他的“凡人的信仰”、“凡人的悲哀”的特殊心理结构与心境，并由此决定了创作主体与论述对象和读者的双重平等与双重宽容，和周作人行文与读者接受上的自然、平和、亲切与从容。初步的研究实践，似乎已经显示出这样的前景：通过对作家作品的单位意

象、单位观念（关键词组）的丰富内涵（多义的象征性）的深入开掘，将有可能把文化背景、作家主体心理结构、作品文本结构的分析，作者、作品、读者三维空间的探索这样几个方面有机地统一起来。

三、典型现象、单位意象、观念，不仅是从大量的文学现象中提炼出来，是研究的结果，同时又是描述的重点，即在整个文学史的叙述中，都必须紧紧抓住突出这些典型现象。我曾经这样设想：如果小说创作有“小说叙述学”，文学史的写作，也有“文学史叙述学”，也有叙述视角、叙述语调的选择这类问题，而这正是被我们长期忽略的；在文学史的叙述学里，应该将具有典型意义的历史细节置于特别重要的地位。就我个人而言，我心向往之的文体是一种报告文学体的文学史——这自然不是追求报告文学的虚构性，恰恰相反，文学史中的每一个历史细节都必须是有充分的史料根据的，绝不允许杜撰；所要追求的是报告文学那样丰富而具体、生动的典型现象（人物与事件）与典型细节的描述，以及由此造成的现场感。在某种程度上甚至可以说，文学史叙述即是一连串的典型现象、历史细节的联缀，但又不是材料的简单堆砌，而是通过新的叙述，赋予旧材料以活力，因此每一个材料的引述都具有一种发现的意义，并在材料（典型现象）之间建立起一种新型关系，这就构成了对历史的复述与再述，既不是“六经注我”，也不是“历史本来面目”的复原。这里，或许可以举一个例子：在《1948：天地玄黄》一书写作中，我用力最多的就是全书的开头，写了几稿都不满意，原因即是没有找到恰当的典型细节，于是又回到当年的报刊上去爬梳，终于有了重要的发现：诗人冯至在一篇散文中提到，1948年1月1日凌晨，他突然从梦中醒来，在万籁俱寂中，听到邻近有人在咳嗽，咳嗽的声音时而激烈，时而缓和，直到天色朦胧发亮了，才渐渐平息下去。冯至

因此而感到了“一个生存者是怎样孤寂地在贫寒的冬夜里挣扎”。而今天我作为一个研究者透过历史的尘埃，却发现了这一细节（包括冯至当时的感受）背后的典型意义：它反映了那个特定历史时代的真实：“‘生存’成为压倒一切的需要，于是有了生存者的挣扎与选择，有了生存者的文学。”这样，这一历史细节（“深夜咳嗽”）就成了我所要叙述的1948年那个时代及文学的历史象征，而且也规定了我这本文学史著作的充满历史沧桑感、悲凉感的舒缓而沉重的叙述方式与叙述语调。我当时甚至感到，抓住这一典型细节，全书的写作就有了“魂”了。

### 三

我们或许可以做一点总结：所谓“典型现象”、“单位意象（观念）”、“历史细节”，都必须具有具体性与普遍象征性的双重品格。文学史既然主要通过这些“典型现象”、“单位意象（观念）”、“历史细节”去展现时代生命与文学的历史，一个文学史家就必须对于具体、生动的细节，历史的现象形态保持浓厚的兴趣与职业敏感，同时，又必须具有发现、捕捉细节与现象背后的普遍象征意义的思想穿透力。这里所提出的实际上是一个有别于文学家、文艺理论家的文学史家的思维特点的问题，这也是过去我们很少注意的，而这又是关系到文学史自身的独立存在，即“使文学史成为文学史”的问题，现在也只能把问题提出，更深刻的认识还有待今后的深入讨论。

这里还要强调一点，文学史所要把握的是一个历史时代生命、文学生命之流的整体涌动，而不仅仅是对每一个历史生命细流的精细考察，或者说，对具体细节的发现、描述是文学史研究、写作的起点，最终所要达到的是整体的把握。因此，对于一个成熟的文学史家，不仅要具有捕捉细节的敏感，而且还要有一

种整体感，对时代生命与文学的总体氛围、对象的混沌感觉直观把握。缺少这一点，达不到这样的境界，文学史家的思维就会淹没在具体的历史细节之中，笔下的文学史图景就不免流于琐碎，失去了历史生命本身所具有的活力与气魄。

这就说到了“典型现象”、“单位意象（观念）”、“典型细节”本身所存在的盲点，或可能出现的陷阱。——任何理论、方法在有自己的独立价值的同时，总是存在这样、那样的局限。如前所说，我们强调现象、意象、细节的典型性，是希望寻找、发掘文学发展的共同特征与线索，以便使文学史的图景有序化。应该说，这样的共同特征、发展线索是存在的，因此我们的典型化提炼就有了根据；但这样的存在又是有限的，这也就决定了我们的典型化的努力的有限性。这就是说，文学的发展更有着自己的为共同特征包容不了的个别性、特殊性，在发展线索之外的超前、滞后、中断与偶然，如果不能清醒地认识这一点，把文学发展中的共同性、普遍性绝对化，就会导致对历史（文学史）的简单化与抽象化，甚至落入“历史决定论”与“成者为王，败者为寇”的历史观的陷阱。这提醒我们，在充分地重视典型现象、典型细节，以勾勒出文学发展的某种轨迹的同时，还要注意那些显示文学发展的个别性、特殊性、偶然性的文学现象与细节，不要忽略了主导性的轨迹图像不能包容的文学现象，其中孕育着文学发展的另一种可能性，常常在经过了历史的中断以后，在另一种历史条件下，成为发展的主导方向，而这恰恰显示了文学发展的超前性与非连续性特征。——我们所要描述的文学史图景，应该既是有序的，又是无序的。

以上，比较多地谈到了我自己在王瑶先生“典型现象”的方法论指导下的研究试验，不仅在追求过程中时有力不从心之感，也就是追求与实现之间的距离，而且我的总结也仍停留在感性经

验的范围，缺乏理论的严密与深度，但仍提供给会议，自然是希望得到师友们的指教，同时，也包含了这样一层意思：对已有的研究从方法论的角度进行科学的总结，或许是我们寻求现代文学研究方法上的新的突破的一个途径。

1998年4月17日整理于燕北园

### 注 释

[1] [2] [4] 王瑶：《关于现代文学研究工作的断想》，《王瑶文集》5卷，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1995年版，6页，7页，7页。

[3] 王瑶：《希望看到这样一本书》，《王瑶文集》7卷，48页。

[5] 参看王依民：《文化焦点·心态·文学史》，收《先驱者的足迹》，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66—68页。

[6] 钱理群：《有意味的参照——读孙郁：〈鲁迅与周作人〉》（手稿）。

[7] 钱理群：《心灵的探寻》“引言”，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8年版，19—20页。

[8] 钱理群：《中国现代思想的历史形态——鲁迅思想论》，《精神的炼狱——中国现代文学从“五四”到抗战的历程》，南宁：广西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33—34页。

[9] 米兰·昆德拉：《贬值了的塞万提斯的遗产》，收艾晓明编译：《小说的智慧》，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24页。

## “找回失落的文学世界”

——答《南方文坛》记者问

问：最近，广西教育出版社出版了由您主编的《中国沦陷区文学大系》，引起了学术界与读书界的关注。您能谈谈这套书的出版经过吗？

答：这套书的规模较大，共分“新文艺小说卷”（上、下册）、“通俗小说卷”、“诗歌卷”、“散文卷”、“戏剧卷”、“评论卷”、“史料卷”7卷8册（已出版前6卷），共约540万字。从1992年底开始策划，到1998年底正式出版，历时六载，实属不易。手抚这厚重的一本本书卷，我确有如释重负之感。这要感谢书系的两位顾问王元化、严家炎先生，他们不仅对这套书给予了最有力的支持，更始终如一地关怀我的思想与学术的成长。还要感谢我的两位合作者，“大系”的副主编封世辉、黄万华先生：万华是沦陷区文学研究最早的耕耘者之一，这套书凝聚了他的许多研究成果；世辉则是编选工作的实际主持者，他的认真、细心、严格与严谨，对提高“大系”的质量可以说是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所有的编选者范智红、吴晓东、朱伟华、孔庆东、叶彤、谢茂松，自然是功不可没，尽管都是我的学生，但我仍要向他们表示谢意。当然，我更要向广西教育出版社的几位领导——江淳、李人凡、唐永亮、赵汝明先生以及夏日炎等责任编辑致敬，因为他们是在我们为“大系”的出版四面碰壁、几乎绝望的时候，毅



然伸出援助之手的——由于可以想见的原因，这套书显然不可能得奖，却要有巨额的投入，出版的动因只能来自对学术发展的一片热忱。因此，沦陷区文学研究的专家、北京社科院文学研究所所长张泉先生说《中国沦陷区文学大系》是“本世纪出版界和学术界联手在中国现代文学领域完成的最后一项宏大工程”，这是说出了真实的。

问：作为主编，你提出编选《沦陷区文学大系》这一学术课题的最初动因是什么？

答：学术界的朋友可能知道，我在80年代曾与黄子平、陈平原二位友人一起提出“20世纪中国文学”的概念。进入90年代以后，我在完成了《大小舞台之间——曹禺戏剧新论》（1991年2月）、《丰富的痛苦——堂吉诃德和哈姆雷特的东移》（1992年8月）以后，又把研究的重心转向20世纪中国文学的研究上来。我当时面临一个“从哪里切入”的研究方向的选择。于是注意到了40年代文学的研究：在我看来，在20世纪中国文学（文化）的发展中，它居于“‘五四’新文学（文化）”与“共和国文学（文化）”这两大板块的交替、转折的时期；我设想，如果从中间突破，就可以带动两头的研究，或者说，拎起40年代，整个20世纪中国文学的研究就活了。而当时，大多数研究者的兴趣还集中在“五四”时期与30年代文学的研究。我因此断定，40年代文学是一个有较大研究潜力与前景的研究领域；并决定追随已经默默耕耘数十年的开拓者之后，带领我的学生一起加入这支“垦荒队”。我预期，从原始资料的发掘开始训练，再进行作家作品的筛选，文学现象的梳理、归纳，以至理论的分析、概括，让学生参与这样的研究工作的全过程，这可能是引导他们“进入学术”的一个较好的途径。也就是说，我是出于学术发展的前景与培养学

术人才（研究生）的需要这两个方面的考虑，而在90年代初开始40年代文学的研究的。而我具体选择编选《沦陷区文学大系》这个课题，则是对40年代文学研究现状进行了一番调查与分析的结果。我发现，已有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对解放区、国统区文学的研究，并已整理出版了《延安文艺丛书》（湖南文艺出版社，1988）、《中国抗日战争时期大后方文学书系》（重庆出版社，1989）等大型资料集。无论是原始资料的搜寻、整理，还是研究的深广度，沦陷区文学研究都是一个相对薄弱的环节，而且自有其特殊的难度，而这恰恰是最具有挑战性的。在进入沦陷区文学研究的具体操作时，我一方面在《现代文学研究丛刊》上组织了研究专号与专栏，以集中反映已有的研究成果，以图引起学术界的关注，吸引更多的学者参与这个领域的研究工作；同时，以编选《沦陷区文学大系》作为研究的起点与突破口。我当时对这一课题提出了三个要求：一是对沦陷区文学原始资料进行一次全面的搜寻与梳理；二是以高质量的“导言”的形式，对沦陷区文学的主要方面——文学思潮的演变、各文体发展的轨迹、代表性作家（含批评家）、作品的文学成就与贡献以及沦陷区文学的总体特征与文学史地位……做一次系统的分析，希望在已有的研究基础上，对整个沦陷区文学的研究有一个新的推动与开拓；三是在这一过程中，为沦陷区文学与40年代文学研究训练一支队伍。现在，这套《沦陷区文学大系》终于出版了，我所预期的三个目标也已大体实现，这是我特别感到欣慰的。

问：您刚才谈到，沦陷区文学研究有其特殊的难度，能不能做一点具体的说明与发挥？

答：这大概有两个方面。首先是资料发掘的困难。正如张泉教授在他的关于这套“大系”的评论文章《20世纪中国新文学史

料建设的圆满终结》一文中所说，长期以来，整个沦陷区的文学与文化是“被打入另册”的；“抗战胜利以后，这一时空中的一代写作者大多在文坛上销声匿迹，有关文献或被销毁或被封存，就连仅仅显示馆藏状况的题名目录类工具书，也将沦陷区排斥在外”，可以说，“《中国沦陷区文学大系》就是在连最基本的报刊名录都没有的情况下，从一步步发掘、整理原始资料起步的。可见其工作量之大”与难度之大。正因为如此，这套“大系”在现代文学史料学上的意义得到了学术界的充分肯定：不仅发掘了一批重要的作家、作品，而且第一次整理了1268条沦陷区文学大事记，钩沉了466个文学（文化）社团、611位作家的基本情况，编写了1200种杂志与报纸副刊介绍、1648种书目与简介，并特别编入了台湾日据时期的资料、有关日文的报刊和日人参与的社团资料。如此大规模的覆盖面广的资料发掘与整理，正如社科院文研所的研究员、沦陷区文学研究的专家徐迺翔先生所说，是“第一次全面地向世人展示了沦陷区文学的真实面貌”，从而为沦陷区文学的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问：听了您的说明，我感兴趣的是，为什么沦陷区文学与文化会长期被打入“另册”？

答：这也是我想说的第二个方面的问题。沦陷区文学是在异族侵略者统治下的文学，这样的特殊性决定了对沦陷区文学的评价与评价标准，一直存在着分歧与争论。有一种观点认为，沦陷区文学除了少量反映人民抗日爱国情绪的作品，在本质上没有跳出“汉奸文学”的大框架，因此没有什么历史意义，更没有研究的价值，被打入另册是理所当然的。这种观点，不仅囿于文学和抗战有关与无关这样一种题材决定论，更隐含着一种观念：在异族统治下，作家（知识分子）只有辍笔沉默这唯一的选择，只要

动了笔，开了口，就在客观上起到了粉饰太平、帮助侵略者的作用。这种观点，看来振振有词，究其实却颇类似于中国历史上道家们的高论，即所谓女子遇到了强暴，便死掉，“世道人心便好，中国便得救”，否则即是“失节”，这都是“五四”时期为鲁迅所痛斥过的（参看《我之节烈观》）。如果历史真的像这种“透底”的逻辑所要求的那样发展，那沦陷区就真的成了“无声的中国”，沦陷区的文学也就变成了一片空白，而这恰恰是妄图灭绝中国民族语言与文化的侵略者所期待的：这正是鲁迅所说的，“左”到了“底”，就变成了“右”（参看《透底》）。历史当然不会这样发展。只要有人，有人的精神要求，就会有文学，就会有人说，发出这样或那样的声音，沦陷区也不例外。只是沦陷区作家所面临的言说环境与生存境遇更为严酷：在异族侵略者的铁蹄下，既不准他们说自己想说而又应该说的话，特别是“爱国抗日”的话语；又要强制说（不准不说）自己不想说、也不应该说的话，于“言”与“不言”两个方面都处于不自由的状态。在这种情况下，“奉当局之命”说话的“汉奸文学”确实有，理所当然地被历史所淘汰，自然也不会入选“大系”；反抗禁令，大胆直言，表达爱国抗日的民族情绪的，当然弥足珍贵，在“大系”里得到充分的肯定，也是没有问题的。但这两方面的作家、作品都是少数。对大多数作家而言，能够顶住压力，不说（或基本上不说）当局强迫他们必须说的，就已经很不容易；但他们还要努力寻找自己想说、而又能够说的话，选择与探索在这种特殊境遇下自己的言说方式：正是在这样的言语的挣扎、自我生命的挣扎中，沦陷区作家顽强地抗御着异族入侵者的文化同化，维系着民族语言与文学的存在与发展，艰难地进行着精神火炬的传递：沦陷区文学正是作为“战争废墟上的精神存在”而获得自己的独特价值的。我们在考察与评价沦陷区文学时，必须对处于这一特殊

时段、特殊地域里的中国人（包括知识分子）的真实的生存境遇与文学境遇、图景有一个深切的了解与体察，凭着“想当然”的、而又是不容质疑的先验结论去任做评判，至少是隔膜的。

**问：**你这里谈到的“想当然的、而又是不容质疑的先验结论”对研究工作的影响与危害，恐怕并不只限于沦陷区文学的研究。一切结论都应该是对对象进行了认真的调查与研究的结果，这本来是一个常识，却常常被忽略了。我感兴趣的是，你们在对沦陷区文学进行了这样大量的调查与研究以后，对沦陷区文学，以至整个中国现代文学有有一些什么新的发现与认识？

**答：**你这个问题问得很好，也很大：一切研究工作的目的与价值就是要有发现，有新的认识。我们之所以花这么大的力气做原始资料的发掘与整理工作，就是期待沦陷区文学的研究者在我们所提供的事实材料的基础上，不断有新的发现与认识；而我们自己，经过初步的研究，自然也有了我们的一些认识。这都已经体现在“总序”与各卷的“导言”里了。这里只能简单地说说我们的总的看法。在我写的“总序”里有这样一段概括：“沦陷区作家们所创造的文学业绩是不容忽视的，它在中国现代文学发展的历史过程中，是一个不可或缺的环节，它有自己的，其他历史时期、地区的文学都不能替代的独特风貌和独特贡献，忽略了这一段文学，我们所描绘的现代文学史图景，总是残缺的。”社科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樊骏先生在评论这套《大系》时，也指出：“虽然像个别的外国学者所谓的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国文学，最有价值的部分不在大后方和抗日民主根据地，而在沦陷区的论断，并不符合历史的客观实际；但如果失去了这些，的确无法认识众多作家的创作业绩，对于整个现代文学历史的把握势必出现诸多的缺漏与空白。”樊骏先生因此说，本书找回来的的是一个失落的，不可

忽视的文学世界。

问：这是一个很好的概括。您能简要地描述一下，找回的是怎样一个文学世界吗？

答：我试试看吧。人们在考察沦陷区文学图景时，首先注意到的是沦陷区文学与以“五四”文学革命为起点的新文学传统之间的内在联系，以及与同时期的大后方、敌后根据地的文学的同步性。这可以说是沦陷区大多数作家的一个自觉的追求。在东北沦陷区与华北沦陷区都有“乡土文学”的提倡与论争，产生了很大影响。倡导者就明确地将“乡土文学”归结为“描写真实”、“暴露真实”；也有人指出，“乡土文学”“至少含有‘民族’、‘国民’、‘现实’、‘时代’这些意义在内”。反映在文学创作上，就像樊骏先生所概括的，在沦陷区作家的作品里，“仍然相当普遍地保持了思想的启蒙和忧患意识交织的人文精神，乡土情结和平民倾向渗透的题材题旨，以及现实主义创作原则等传统”。而与同时期文学的同步现象更是引人注目。可以随便举几个例子。比如40年代曾有过“战争浪漫主义”的提倡，并构成了抗战文学的主流（参看拙作：《战争浪漫主义及其反拨与超越——40年代小说理论概观》），这样的倡导与实践发生在大后方与敌后根据地是可以理解的；但在沦陷区那样的环境下，却也有“新英雄主义与新浪漫主义”文学的呼唤，这大概是许多研究者所意想不到的。很多文学史都以较大篇幅论及抗战时期“民族形式问题”的论争与对通俗文学的提倡和讨论；但人们却不知道在沦陷区“关于新、旧小说”的讨论，关于“小说的内容与形式问题”的讨论中也都涉及民族形式与文艺的大众化、通俗文学的问题，而在上海《万象》杂志组织的“通俗文学运动专号”，更是把问题的讨论引向了深入。大后方曾有过对“色情文学”的批判，但并未做学理的探

讨；相比之下，北平《国民杂志》社“关于色情文学”的笔谈就更具有理论色彩。在文学创作上，这些年人们在研究40年代文学时，都注意到战争时期“校园文学”的特殊地位与作用，但讨论的范围主要集中在西南联大作家群；实际上，在遥遥相对的北方燕京大学、辅仁大学的校园里，也同样培育出了一批诗人与散文家。其中就有今天成为著名演员的孙道临，《大系》诗歌卷收入了他以“孙羽”的名字发表在《燕园集》里的诗作。沦陷区所存在的充满“大地的气息”的现实主义诗歌与以“沉重的独语”为特征的现代派诗歌两大流派，与大后方的诗歌发展也是遥相呼应的。在小说创作上，人们经常谈到《四世同堂》、《财主底儿女们》这样的家族小说，但如果不同时论及发表在沦陷区的梅娘的《蟹》、爵青的《欧阳家的人们》等同类题材的小说，至少也是不全面的。而袁犀、爵青所做的具有现代主义色彩的文体尝试，特别是张爱玲的极富创造性与个性的小说创作，同样应该看作是对40年代小说形式试验的重要贡献。以上海为中心的沦陷区话剧创作与职业剧团商业性演出的空前繁荣，与大后方的剧场艺术的发展，交相辉映，把中国的话剧运动推向了新的高潮。沦陷区成就最大的随笔与诗化散文小品，不但在创作渊源上明显地受到了周作人、何其芳的影响，而且与40年代散文发展的趋向也是一致的。所有这一切，都说明了沦陷区文学是“五四”以来的中国现代文学的不可或缺的有机组成部分；在40年代，它与大后方的文学、敌后根据地的文学，确实构成了三足鼎立的格局，只有从三者的相互呼应与补充中，才能全面而深入地把握这一时期文学的面貌。沦陷区的主要代表作家，如小说方面的张爱玲、钱钟书、师陀、袁犀、爵青、梅娘、苏青、关永吉、郑定文、沈寂，诗人吴兴华、路易士、丁景唐、沈宝基、南星、朱英诞、黄雨，散文家周作人、张爱玲、纪果庵、文载道、唐弢、柯灵、南星、林

榕、沈启无，剧作家李健吾、杨绛、师陀、柯灵、陈绵、周贻白、姚克、顾仲彝，通俗文学家还珠楼主、宫白羽、王度庐、郑振因、刘云若、予且、秦瘦鹃、程小青、孙了红、徐卓呆，批评家李景慈（林榕）、张守谦（关永吉）等等，都对40年代文学的发展做出了不可忽略的贡献。他们在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有的已经得到承认，有的恐怕要在我们这次发掘以后才会引起研究者的注目吧。

问：您谈到了沦陷区文学与大后方文学、敌后根据地文学的相互呼应与补充。人们更关注的可能还是“互补”的这一面，也就是沦陷区文学怎样以自己的特殊风貌，给这一时期的文学，以至现代文学增添了新的东西？

答：我们在前面提到沦陷区的作家在“寻找自己想说而能够说的话，探索在特殊境遇下的言说方式”，其实这本身就意味着一种不同于别的时段、地域的文学的“新的文学风景”的选择与形成。我在“总序”里，曾引述了沦陷区一个杂志的《发刊献辞》里的一段话：“我们愿意在政治和风月以外，谈一点适合于永久人性的东西，谈一点有益于日常生活的东西。”这大概就是沦陷区的一部分作家终于找到的“想说而又能说”的话题与相应的言说方式吧。在这似乎是被动的选择背后，其实是隐藏着更为深刻的生存体验、心理动因与观念变化的。当战争毁灭了一切，不仅危及国家、民族的生存，而且每一个具体的个体生命都受到了实实在在的威胁，人们就会重新关注在太平岁月往往被忽略、遗忘的身边的东西，发现正是这个人的琐细的日常生活构成了最基本、最稳定，也更持久永恒的生存基础，而个人的生存又构成了整个民族、国家，以至人类的生存基础。这样的个体生命的生存体验在一部分作家那里，就上升为一种新的历史观：“凡人比英雄更能代



表这时代的总量。”由此产生了新的美学追求：从注重人生斗争、飞扬的一面转向注重人生的和谐与安稳；从用“斩钉截铁”的“强烈的对照”写“极端的人”，转而用“参差的对照”写“不彻底的人物”；从追求“力的成份大于美的成份”的“悲壮”，转向追求“苍凉”的人生与审美境界（张爱玲：《自己的文章》）。反映在创作实践上，就出现了“以凡人的眼光去写普通人的日常生活”的文学潮流，这种凡俗化的倾向（个别比较成熟的作家则兼有超越性的追求），构成了沦陷区一部分文学的一个鲜明的特色，并因此给40年代文学与“五四”新文学带来了新的东西：首先，这些作品尽管不正面描写战争，如上所说，实际上却隐含着对战争中人的个体生命的生存困境的关注，也就是说，所提供的是一种“个人性的，个体生命本位”的战争体验与文学表达方式，与40年代占主流地位的“社会性的，民族、国家本位”的战争体验与文学表达方式，形成了一种互补。其次，对普通人（凡人）日常生活的关注与文学表现，对同一时期的前文所述的英雄主义、浪漫主义与理想主义的文学也形成质疑与挑战，但二者同样构成了一种互补。

沦陷区文学的另一个鲜明特点，是处在特殊的政治高压与经济的困境中，文学市场的需求，就越来越成为文学发展的更为直接的动因。写作成为沦陷区作者的一种生存方式，或者说，写作对于沦陷区作家具有“解决精神的饥渴与谋生的物质需求”的双重意义，作家也就徘徊于“内在精神追求”与“市场的需求”之间，艰难地寻求二者的契合点，又为二者的矛盾而陷于深刻的困惑之中。具体到文学的创作上，就表现为“雅”、“俗”的相容与相斥，在二者的张力中，出现了“雅文学”与“俗文学”对立中的接近趋向，从而构成了沦陷区文学的另一个重要文学潮流。这对于“五四”以后所形成的雅俗对立的文学二元结构自然是一个

有力的冲击。正是在“表现战争中的个体生命体验，关注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与“雅俗交融”的文学潮流中，出现了张爱玲这样的战争年代文学中的“一个苍凉的手势”，出入于雅与俗、传统与现代，取得了突出的艺术成就，具有鲜明艺术个性的代表性作家；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张爱玲是沦陷区文学的一个标志，或者说，沦陷区文学因为有了张爱玲，和她站在一起的有前述一大批各有成就、个性相异的作家，才终于在文学史上站住了。现代文学馆研究员吴福辉先生在《鸟瞰沦陷区文学全貌》一文中，也有过类似的概括：沦陷区小说家的相当部分是“向两个方向发展：或者是隐蔽的、象征性的、寓意的小说，仿佛在高度压抑下转向内心；或者是大众的言情小说、武侠小说，就像如履薄冰中向往轻松和追求惩恶扬善的幻影。其中既旧又新、引今入古、大俗大雅的，是张爱玲”。这或者也是文学史家的一种共识吧。

问：您讲得很有意思，但这恐怕是一种“事后”的文学史的总结。因此，我还想问，实际的文学图景比您的描述是否更为复杂、丰富？

答：这是当然的：任何文学史的描述总是要把实际发生的文学过程不同程度上加以简化的。且不说我们所强调的沦陷区文学的两大潮流、倾向本身就是对大量的文学现象的一种提炼，单就这两大潮流、倾向而言，在对日常生活的关注与描述中，确实出现了底蕴丰厚，甚至达到了对生命存在的开掘与思考的作品，但大量的却是琐事的无谓咀嚼和孤芳自赏，显示出生命的苍白的平庸、以至无聊之作。在文学市场的冲击下，自然也会出现大量的媚俗的、粗制滥造、趣味低级的作品（这在商业性戏剧演出中尤为突出）。这就是说，现实的文学图景总是混乱的，所谓文学发展的丰富性、复杂性其实正体现在这种混乱之中。因此，历史的当事人

对现实文学状况的观察与估计往往是偏于悲观的。但正如鲁迅所说，“文坛是无须悲观的”，因为“总归有许多所谓文人和文章也者一定灭亡，只有配存在者终于存在”（《“中国文坛的悲观”》），文学史研究所要做的大概就是这样的历史的淘汰、筛选工作吧。

问：最后还要问一个问题，《中国沦陷区文学大系》的出版，对那一特定历史时期文学的总结，对今天的文学发展是否具有某种启示？

答：坦白地说，当初编选这套“大系”，完全是出于现代文学学科发展的需要，确实没有考虑过它的当下意义。不过，书既然是出版在90年代末，您又提出了这个问题，我想了一下，或许可以说这么一点意思：沦陷区作家所面临的“自己”想写什么与“他者”要求写什么、允许写什么之间的困惑与选择、探索言说方式的艰难，固然有其特殊的历史条件，但正如清华大学蓝棣之教授所说，“从过去几千年的历史或过去一百年的历史看，作家很难有理想的写作环境，或者说历史很少为作家提供理想的写作空间”，在这个意义上，沦陷区作家所面临的写作困境又是具有某种普遍意义的，对于后来者自然就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而且，细细想起来，他们当年所遇到的一些具体的创作的困惑，例如如何在“内在精神追求”与“文学市场需求”之间取得平衡，强调“个体生命体验，关注日常生活”与作家主体精神境界、生命（生活）质量的关系，这些问题今天似乎也同样存在，我不敢说这是不是历史的循环，但过去的历史总是能给后人提供某种借鉴，这倒是不争的事实。就说到这里吧，感谢您及贵刊给我这样一个谈自己主编的书的机会。

1999年6月13日整理于燕北园

# 文学本体与本性的召唤

——《诗化小说研究书系》序

这是开拓现代文学研究的新领域的一次艰难的尝试，是我和年轻朋友做了多年的梦。

“梦”开始于在韩国外国语大学任教的1994—1995年。在异国他乡，我苦苦地寻思：如何为“已经不再年轻，正在走向成熟”的中国现代文学（这是1994年现代文学研究会西安年会上的结论）提供一个新的设想和思路。于是写了一个“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大纲”，选择了“两个突破口”。其一是探讨现代教育、现代出版、现代政治与现代文学的关系；其二就是本书系的最初设想，目标是“对20世纪中国文学的经典作品进行精细的文本分析，抓住‘有意味的形式’这一中心环节，总结现代作家的艺术创造经验，进行理论升华，逐步建立‘中国现代诗学’”，具体计划则有：“编选《20世纪中国文学经典》”、“出版《20世纪文学经典研究丛书》”、“在大学开设‘20世纪中国文学经典研究’课程”等项。而且还有具体的“研究工作的组织方式”的设计：一方面“争取前辈与同辈学者的支持，同时也尽量吸收年轻学者（包括部分在校研究生）参加，组成老、中、青三结合的作者队伍，为培育学术新生力量探索道路，‘出书’与‘出人’应是同时产生的两个结果”；一方面“与出版社充分合作，发挥出版社的中介与组织作用，把学术著作的写作与出版纳入统一的计划中，

从而实现学术研究与流通过程的结合。这就有可能为在商品经济条件下，如何进行学术研究的组织工作探索一条新路”。——显而易见，这是一个有着多重目标的雄心勃勃的研究计划。因此，1996年在石家庄召开的现代文学研究会理事会上，我当众宣布这一《大纲》时，许多朋友都认为理想主义色彩过重，难以实现。我却信心十足，兴致很高。开始进行得也确实顺利。1996年12月，即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了由我与谢冕先生编选的《百年中国文学经典》。之所以将筛选出“经典”（名著）作为工作的起点，是因为我们认为，现代文学的“大厦”主要是由文学“经典”（名著）所支撑，研究的重心应转移到对文学经典（名著）的研究上，而不能只是一窝蜂地去挖掘“冷门”。在“序言”里，我重申了对经典作品创造的艺术经验进行理论概括的目标：“我们想为正在进行的对本世纪的文学进行反思，包括文学史的写作与教材编写，提供一些基础性的事实材料。比如，对‘文学现代性’的讨论，是不是可以从这些已经形成的现代经典作品（小说、诗歌、戏剧、散文）出发，从对既成形态的考察与艺术经验的总结中，引出必要的理论概括呢？至少这是可以一试的。”当然，我们也强调，经典的删选工作将是不断进行的，既不可能由一二人说了算，也不可能“一锤定音”，所谓“经典”也只具有相对的意义。

下一步，是从哪里入手，去进行百年文学经典的研究？我们决定先进行一次实验。大概就在1995—1996年间，我在北大开设了一门“四十年代小说研读”课，主要是对一批处于边缘地位的小说进行文本的细读。在一次课堂讨论中，我做了这样一番发言——

记得在一次闲谈里，我与吴晓东聊出了一个“发现”：在

现代文学作品里，艺术水准最高的作品往往是（当然不是“全部是”）带有抒情性的，或者说是具有某种诗性特征的：抒情诗的成就远远高于叙事诗自不待说；戏剧中的精品，无论是曹禺的《原野》、《北京人》、《家》，夏衍的《上海屋檐下》，以至郭沫若的《屈原》，无不具有浓郁的诗意，《家》里的“新婚之夜”那场戏，更是按诗剧的写法来创作的，《屈原》里的“雷电颂”，径直就是一首长诗；散文中的名篇，从朱自清的《荷塘月色》，到何其芳的《画梦录》、沈从文的《湘行散记》，也全都是“诗化”的，而中国现代散文的经典之作鲁迅的《野草》，研究者就干脆称之为“散文诗”了。现在来看小说。从鲁迅的《故乡》、《社戏》、《在酒楼上》、《伤逝》，郁达夫的《春风沉醉的晚上》、《迟桂花》，到沈从文的《边城》，废名的《桥》，以至四十年代的萧红的《呼兰河传》、冯至的《伍子胥》、孙犁的《荷花淀》，等等，显然构成了一个“现代抒情小说”（或称“诗化小说”）的谱系，并且达到了现代小说的最高水平：这些，恐怕已经成为学术界的共识了。把以上的文体分别考察综合起来，我们是否可以作这样的“提升”，或者说提出这样的“假设”。说“假设”是因为还需作更深入的论证，甚至提出各种颠覆性的“反证”：抒情性（诗性）是中国现代文学的一个基本特征。对这一命题自然是（而且是必须）从各个方面来展开论述与论证的。人们很容易就联想起中国作为一个“古老的诗国”的传统的巨大影响，人们也会注意到西方象征主义诗学的影响。我与吴晓东在讨论中据此而设想，或许正是这样的传统的与外来的文化精粹的汇合，成为中国现代文学中的诗性特征能够得到比较充分的发展的资源性的原因。（参看：《对话与漫游：四十年代小说研读》，上海文艺出版社，

1999年版)

正是基于以上认识，我们确定了第一个选题：“诗化小说研究”。初选的作品有：鲁迅《伤逝》、《在酒楼上》、《孤独者》、《故乡》等小说，沈从文的《边城》，废名的《桥》，冯至的《伍子胥》，萧红的《呼兰河传》，芦焚的《果园城记》，骆宾基的《幼年》，汪曾祺40年代的部分小说。我们设想，首先对入选的每一部作品进行文本的细读，做出详尽的点评，并写出长篇的美学分析的论文；然后，在此基础上，提炼出若干诗学范畴与“中国现代小说诗学”的一些命题，写出一本探讨性的论文集。

我们的设想，得到了广西教育出版社领导的充分理解与支持。1997年盛夏，丛书的主编、作者与出版社总编辑李人凡先生和有关编辑聚集桂林，做了长达十天的集中研讨。应约而来的作者都是北京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在校或刚毕业的博士、硕士研究生。遗憾的是，王晓明先生临时有事，未能赴会。对于我，我相信对于每一个参与者，这都是一次终生难忘的学术漫游，真正的精神盛宴：我们黎明即起，在桂林山水的掩映下，大声地朗读作品，流连于语言文字的声光色影之中，时而争执不休，时而沉湎于遐想而不语……当夜色笼罩，小城的一切都变得模糊，我们一边散步，一边继续讨论，更多的是沉默中的回味，淡然而又安适。一切都是美的：美的风景，美的人，美的语言，美的心灵；身处其间，精神特别放松，洒脱而从容，心境也分外柔和、明亮。最难忘的，是那一刻（仿佛是一位朋友正在朗读《果园城记》）没来由的突然感动，泪水盈目，一句话也说不出：但或许就在这一瞬间，我懂得了什么是文学与文学研究。当年跟着王瑶先生研究《故事新编》，曾有过这样的感悟，现在它又悄然而至，真是美妙极了。——就是在我一生的研究中，这样的时刻也实在

不多。

而且，我们的整个研究也几乎难以为继。当大家离开桂林，回到各自居住的城市，就立刻从梦境落入现实。原定一年后交稿，却遥遥无期；倒是这次讨论的副产品《20世纪中国文学名作中学生导读本》在广西教育出版社朋友的再三催促下于第二年问世。不能交稿自然是因为忙，有新的任务压身。但也许还有更为内在的原因：径直说，约定的作者中的大部分人在世纪末的中国思想文化与文学的变化、动荡中，又有了自己的新的兴奋点，在观念、心态上，都有了一些变化，这样的文学形式的审美的课题似乎已经失去原有的吸引力，变成一个虽并未忘怀、一时却难以接近的越来越遥远的梦了。这一点，我是能够理解的：我自己在世纪末的最后几年里，也是因为更侧重于面对现实中国的问题而身不由己地卷入了时代的旋涡之中。当然，也有几位朋友，如晓东、洪涛，仍然坚守文学本体的研究，在一片世纪末的喧嚣中，继续不无孤寂地默默耕耘。但他们也遇到了自己的困境：尽管我们设置的目标相当吸引人，但真正实施起来，却有很大的难度。如他们在各自的研究专著的“后记”中所说，对废名与沈从文的小说进行美学的提升，都是几度踌躇，费尽周折的。在这个领域任何一点新的推进，都要付出特别的努力。我理解他们的难处，珍惜他们的劳动，同时也在焦急地寻找新的同道者。因此，1999年我应邀参加武汉大学中文系的博士论文答辩，读到了张箭飞的《鲁迅诗化小说研究》，所感到的惊喜，是可以想见的。特别是张著对鲁迅小说音乐式的解读，更是实现了我多年的一个梦想：我很早就凭着直觉感到音乐是走进鲁迅艺术世界的一个途径，却苦于自己缺乏起码的音乐修养而只能望门兴叹，记得我的一个研究生在我的蛊惑下曾经一度想进音乐学院，以打通音乐与文学的研究。现在，箭飞开始了这样的尝试，我真是为之兴奋不已，并



且坚信这是一个很有研究前景的领域，我期待着箭飞在这方面做出新的成绩。

我自己则在事实上越来越远离了文学的同时，内心深处却越来越迷恋文学。因为我发现，我们的整个文学研究与文学教学都越来越远离文学了。我曾在课堂上公开表示我对北大中文系的本科生与研究生（其实也包括我自己）的两大不满：一是习惯于不着边际的宏观“神侃”和烦琐的所谓科学分析，而不注重文本的细读，特别是对文学语言的品味，失去了起码的艺术感悟、敏感与直觉力；二是将对中国的现代作品的研究，变成西方的或中国传统的某个理论、概念的正确性或可行性的一个实证，成了自己得心应手地构筑模式、摆弄材料的智力游戏。在我看来，这两种倾向都有可能导导致文学本性的丧失。另一方面，这些年，包括我自己在内的许多人都把注意力放在文学的外部关系的研究上，从思想史、学术史、文化史的角度切入，在这方面已经或将要取得的成绩都是无可非议的；但从现代文学研究学科发展的全局来看，对文学形式与审美研究的忽略，则有可能导致文学本体的丧失。正是基于这样的忧虑，这些年我以相当大的精力从事文学教育：先后在北大开设理科“大一语文”，中文系本科学生的“现代文学经典文本细读”以及研究生的“《野草》研读”，主要引导学生逐字逐句地品味作品的精微、美妙之处，培育学生对语言的感觉、体悟。我对中小学语文教育的关注，其中心点之一也是倡导真正的文学的阅读：在我看来，在小学、中学、大学的文学教育与文学研究生的培养中，对文学本性和文学本体的强调，都是一个“基本功”的训练：不仅是文学研究的基本功，更是基本的人文精神的熏陶，人的（国民的）基本素质的培育。对于我自己来说，这更是一种精神欠缺的补偿。1999年，我在一位年轻的学者所著《鲁迅小说的形式意义》序言里，曾写过这样一段话：“我无

法回避自己内心深处对文学形式，特别是对文学语言的迷恋。它们对于我是一种近乎神秘的诱惑。我知道自己的精神气质与文学艺术有着本能的亲和，而我所受的教育与在扭曲了的时代里所形成的多少被扭曲了的积习，又使我与文学的审美之间，横隔着某种障碍，“明明本性上具有审美的欲求，面对鲁迅已经达到的艺术高峰，要对之进行描述与阐述却显得力不从心。我从这里感到了一种命运的残酷。而有这样的隐痛的又似乎不只是我一个人”。

今天，当吴、刘、张三君的书稿终于汇集到我这里，该由我来为这套“姗姗来迟”的“诗化小说研究书系”作序时，我又想起了上述这番话。我要感谢这几位作者，是他们的努力使我的（自然也是他们自己的）以“建立中国现代诗学”为目的的“文学本体研究”的计划迈出了实施的第一步。我自己无力实现的“梦”由年轻一代部分地变为现实，这是令人高兴的。但我也似乎从他们的艰难跋涉中，感到了某种“力不从心”，进而担心残酷的命运还会继续下去。或许更为重要的是中国社会、思想文化的外部条件总是不利于这样的研究，它的被忽略、孤寂、边缘化，至少还会延续相当一段时间。但也正因为如此，它的意义与价值却又是不可否认与抹杀的。这就要求选定了这样的研究道路的年轻的学者，能够有一种精神的“定力”：不为外界的轻视或诱惑所动摇，同时又注意不断地充实、完善与发展自己，坚守文学的本性与本体。我坚信，泡沫终要消散，沉潜者终会浮出历史的地表：我向他们表示最大的敬意与最美好的祝愿。

最后，还要向广西教育出版社的领导与有关编辑表示敬意：他们的耐心等待与始终一贯的支持，表现了他们对学者与学术工作的深刻理解，同时也表现了出版家的远见卓识。

2000年3月21日写于燕北园

# 令人大开眼界的文学史景观

——读《20世纪贵州文学史书系》

## 一

这套何光渝先生主编的《20世纪贵州文学史书系》，计有《20世纪贵州小说史》（何光渝著）、《20世纪贵州戏剧史》（王颖泰著）、《20世纪贵州散文史》（艾筑生著）、《20世纪贵州诗歌史》（安尚育著）四种，还有一部《20世纪贵州民间文学史》（何积全著）正待出版。拿在手里，真是沉甸甸的。

我以双层身份读这套书，自有话要说。

我不是出生在贵州的，但在这块土地上度过了人生最为宝贵的时光，离开以后也依然将贵州视为第二故乡和精神的基地，也算是半个黔人吧。因此，当我一打开书，就被光渝先生“总序”中的一段话击中了——

我们是贵州人。早在我们从各种文学作品中获得对文学的最初印象，铸造着我们各自的基本文学趣味之前，脚下这片生我养我的土地，就已经把她所蕴含的文化基因注入了我们的血脉和心灵。

这里所说的“土地——文化基因——人的心灵”的关系，是耐人寻味与深思的。这个问题复杂而微妙，我说不清，说实在

话，也没有想清楚。这里只说与此有点关系的一个想法。我曾注意到一个现象：贵州的艺术（美术、音乐……）的成就与影响似乎高于文学。这里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我总觉得与贵州这块土地的特点有点关系。高原之上，孤独的人的个体与大自然直接感应，发生心灵的共鸣，激发想象与灵感，是更能培育艺术的基因的。而文学则要仰赖语言文字，文本意义上的文化（文学）传统的熏陶（其中一部分也会内化为文化基因）也许是更为重要的。这就说到了与本书系的写作更有关系的贵州的文学传统的问题。光渝先生在“总序”谈到最初的写作动因时，说了一番颇为动情的话——

中国文学史上，曾有不少虽不显赫但也并不默默无闻的地域文学，在今天的习见的文学史著作中，仅仅是淡淡一笔，有时甚至连一笔也没有。贵州文学的命运即是如此：仿佛这块土地上从未产生过文学，没有过文学历史的发生与演变。但是，我们确实有过！然而，百年过去了，千年过去了，在文学史事实上已逐渐成为中国人耳熟能详的知识体系的今天，我们仍然没有看到有一种对于贵州文学整体的、真诚的描述。临到这世纪、千岁之末，我们还能让这样的命运再落到21世纪贵州人的头上？

我由此想起了三个方面的问题。

首先，贵州当然有自己的文学，特别是近百年来，已经形成了一个文学传统，以致我们今天有可能写出这洋洋大观的“20世纪贵州文学书系”，这都是无须争辩的事实；但如何评价，却显然存在争议。在这方面我也同样没有专门的研究，但凭着我的有限了解，仍比较倾向于本书系主编的意见：贵州文化的最大特点在

于它是一种“来自四面八方的，以输入为主的、多元的文化结构”，这就决定了“贵州不是一个文化意义上的大省”。而这一点，“对于贵州20世纪小说（以及整个20世纪贵州文学）创作的影响，可以说是至关重要的”。一方面，要充分肯定贵州文学的成就与存在价值，以增强自信心；另一方面，又要承认与正视贵州文学积累的相对贫弱——对20世纪贵州文学所做的历史总结得出这样的结论，可能是我们的自尊心所难以接受的，但我们也只能面对事实，并从中激发出更加强大的自我创造的内在冲动。这是我在下文中还要强调的。

其二，不管怎样，既然有了文学的实绩与实际存在，那就有了进入文学史的历史叙述的要求与权利。为什么又始终没有看到“一种对于贵州文学整体的真诚的描述”呢？这使我想起鲁迅当年曾谈到，近代以来，中国常常处于“被描写”的地位。这是一个弱势民族（国家、文化）在与强势民族（国家、文化）遭遇时经常面对的尴尬。在现代中国文化（文学）的总体结构中，贵州文化（文学）无疑是一种弱势文化，也就会面对“被描写”或根本被忽略的这类问题。而问题的解决也只能是我们自己用自己的话来真诚与真实地描写自己。这正是贵州的学者的历史责任：小则为乡梓效力，大则为考察中国的文学（文化）提供一个独特的视角。贵州文化的外来输入性的特点以及它的多民族大杂居、小聚居的特点，形成了多元的文化结构，正是中国文化中独特的存在，因而具有了特殊的价值。而我们在真诚地描述自己之后，还要做一个工作：把它融汇到乡土教育中，真正转化为贵州这块土地的精神、思想、文化资源，代代相传下去。我这样提出问题，与我这两年特别关注中小学教育有关，也是受到了“五四”先驱者们的启示：他们在创造“五四”新文学（即现代汉语文学）时，除了理论的倡导，始终抓住创作试验与教育两个环节：

首先创作出具有现代思想的，同时具有文学价值的现代汉语文学作品；这些作品大量进入中小学课本，并成为大学的文学教育的重要内容，这就会深刻、广泛地影响整个民族的思维、言说方式与心灵世界，在凝聚民族精神上产生巨大的作用。我由此而设想：是不是可以利用我们的研究成果，比如对黎庶昌、李端棻、姚华、黄齐生、蹇先艾、谢六逸、何士光等各个时期的贵州代表作家的历史地位与创作成就的总结，对包括新时期在内的大量优秀诗歌、小说、戏剧、散文作品以及少数民族文学作品的筛选，编选出普及性的《贵州文学读本》，或者与教育部门合作，编选贵州中小学的“乡土教材”，作为语文课本的补充读物。而上述研究成果更可以补充进大学中文系的现当代文学教育中，关于贵州文学的研究也应成为大学科研的重要课题，甚至还可以为开发贵州人文景观提供资源，成为社会文化教育的一个重要内容。我们的目的是要使生活在贵州这块土地上的人，从小在知晓中国与世界的文化名人的同时，也熟知自己本土的文化的创造者，与他们进行精神的对话与交流，这对黔人的精神文化素质的培育，潜移默化的影响，是不可低估的。而贵州文学也只有影响到青少年，才算是真正在贵州这块土地上扎根了。——我这里所说，全是理想主义与浪漫主义的畅想。但也并非没有实现的可能。关键是我们愿不愿意从实实在在的具体的每一件一件的实事做起。

最后，我还想谈一点：我们在一再地强调如何认识、整理、研究贵州的传统文学（文化）资源，并努力将其转化为自身的精神资源的同时，也不能忘记或模糊了一个基本前提：吸取文化（文学）、精神资源的目的是什么，也就是说，“继承”与“拿来”绝不能代替我们自己的新的“创造”：前者仅是手段，后者才是目的。特别是我们自身的资源处于相对贫弱的状态，创造就更重要。即使是继承与拿来，也不能局限于贵州一隅，而应有更

开阔的视野，中国的与世界的、人类的眼光。文学上的创造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这里自是无法展开；我只想说一点：我们应该关注的是“现在”的“人（贵州人、中国人、世界人，三者既区别又相通）”的“生存”状态与困境，以此为中心进行我们的思想的与文学（形式、语言）的探索与创造。因此，我赞同本书系主编的这一意见：一味地从地域文化背景中去发展贵州的小说与文学创作，或许会有“胶柱鼓瑟之嫌”，似应“格外注重‘文化’在‘现在时态’的综合展现”。据说，一些年轻的少数民族作家已经开始了这样的新的追求：他们“并不过分强调自己作为少数民族的某些优势和特色，不像其前辈作家那样在作品中较多地描绘和渲染民族的风俗习惯，而是把笔触的重点放在对于民族问题和命运的思考上”，“强调对生活的体验与展示”（见《20世纪贵州小说史》527页）——这里对民族“现在时态”生活的关注，与更带根本性与超越性的民族问题与命运的思考，都展现了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的某种新的可能性。尽管前面的路还很长，但新的可能性已经并将继续出现，这就足以使我们这些关注贵州文学发展的远方游子感到欣慰的了。

## 二

作为一个20世纪中国文学的研究者，我对这套书自然是特别有兴趣。这些年关于20世纪中国文学已经出了不少专著，但像《书系》这样系统、全面地叙述一个地区的20世纪文学发展历史的，我还从未见过，这是自有开拓的意义的。而我最为看重的还不是这一点，而是这套书的写作，对我们整个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的启示。

讨论20世纪中国文学，首先注意到的是它的源头。这些年，晚清文学、民国初期文学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研究，始终是

学术界的研究热点。但目前这类研究大都限于少数中心城市，这就多少有些遗憾。这回一打开《书系》，每部著作的开篇第一章都有关于从晚清到“五四”的贵州文学现象的梳理与研究，这在我至少是大开眼界的。于是我因此知道了1907年7月17日贵州第一份报纸《黔报》问世，并辟有发表文学作品的“杂俎”、“谐谈”、“短篇小说”栏目。作者说：“若与京、沪等地报纸出现的时间相比，却几乎晚了近半个世纪”，但我却愿意从另一个角度分析这一事实：现代报刊的出现，无疑是中国文化的重要新质因素，对现代思想、文化、文学的变革有着深远的影响；它从在京、沪等城市出现，到在贵州山区落户，是一个由中心向边缘逐渐扩展的过程，看似很慢，意义却非同小可：历史变革所达到的广度与深度往往是要看它对边远地区的蔓延、渗透程度的。因此，1905年，贵州最早的铅印印刷厂遵义官书局创办；1908年，贵州最早的白话小说《越南亡国史》（未署名）在《自治学社杂志》创刊号发表；1913年10月，贵州第一部新剧作品《维新梦》（黄齐生等著）在贵阳达德学堂公演；1919年1月，新剧《人道引》（即《黑奴吁天录》）在贵阳公演；1919年3月，少年贵州会创办白话文报纸《少年贵州日报》，成为宣传科学、民主新思潮的重要阵地；1919年6、7月贵州报刊上出现了第一批受“五四”新思潮影响的新小说……这样一些史实的发掘与考订，以及各专著所描述的：梁启超与贵州政治文化界的深远关系与影响（《散文史》）；这一时期贵州的以“达德戏班子”为中心的新剧创作与演出，魏香庭的改革川剧（《戏剧史》）；小说创作中的“文白并存”的格局（《小说史》）；“古典诗歌向现代新诗转型的缓慢历程”（《诗歌史》）……都能够丰富与深化我们对世纪初处于历史转型期的中国文学变革图景的认识。在这方面，似乎还存在着一个相当大的研究空间，目前这样的偏于史的发展线索的梳理，还只是一个



开始。

随着研究的深入，这些年对“20世纪中国文学”的外延与内涵的认识都有新的拓展。其中一个重要方面，就是“汉民族文学中心”的破除，引入了少数民族文学的叙述；“新文学中心”的破除，引入了曾作为新文学（新小说、新诗、话剧）对立面的通俗小说、旧体诗词、戏曲发展历史的叙述。对这样的变化也有朋友持不同意见，他们仍然坚持“现代文学”的研究应是“新文学”的研究。这里确实涉及对“现代文学”（包括20世纪中国文学）的理解：“现代”（“20世纪”）只是一个时间概念，还是同时有某种质的规定性；这又同时引出了现代文学（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这门学科的性质、研究对象、范围……这一系列的问题。我个人认为，这些问题确实重大，应充分展开讨论与争辩，同时也不忙做结论，持不同观点的朋友完全可以按自己的主张去进行研究，无须求统一。而且，在我看来，将少数民族文学、通俗文学、旧体诗词与戏曲引入20世纪中国文学史的叙述，这绝不是简单的拼盘式的“1+1”，它所引起的是研究格局的根本变化：不再是孤立的分别的研究，而是从“汉民族文学”与“少数民族文学”，“新小说”与“通俗小说”，“新诗”与“旧体诗词”，“话剧”与“戏曲”……二者的既对立、竞争、制约，又相互渗透、影响的“关系”中去把握作为多民族文学的20世纪中国文学以及20世纪小说史、诗歌史、戏剧史的生态发展，由此将会出现一个新的文学史景观。我曾在好几个场合与文章里，鼓吹这一设想，但我知道，真正实行起来，会有许多的困难，单是原始材料的发掘、梳理，就非一日之功。

现在，我在这套《书系》却看到了这样的试验。与其说这是不谋而合，不如说是贵州文学的特点决定了作者必须打破原有的单一的文学史叙述格局。如《书系·总序》所说，“不论从现实和

历史的角度来看，贵州都是多民族的贵州，是一个多民族大杂居、小聚居，各民族文化之间既有差异，又有交融互相促进的一个多元体系”。另一方面，前文所提到的贵州文化的外来输入性的特点，又使它的文化中保留着不同时代、区域的文化的影响的痕迹。这样一个多元的文化结构也许在贵州的戏剧中表现得尤为典型。据《贵州戏剧史》的作者王颖泰先生的研究，贵州戏剧计包括以下多种成分：土著民族的戏剧，如布衣戏、侗戏；流传于汉族与少数民族之间的民间小戏，如傩戏和灯戏；汉民族的地方戏，如贵州花灯剧、黔剧（最初称文琴戏）、贵州梆子；此外，还有从外地流入贵州的古典戏剧（杂剧、传奇等）与地方戏曲（如京剧、川剧、评剧、越剧、豫剧、湘剧等），以及从海外传来的戏剧（话剧、歌剧、音乐剧、舞剧等）。多剧种的并存，相互影响、渗透，又坚持各自的特色，充分地满足了生活在贵州这块土地上的各民族人民的多种艺术需求，同时也保留了极其丰富的戏剧遗产，这其中的艺术经验，是值得认真总结的。《贵州戏剧史》一书中，对侗戏《珠郎·娘美》有过专节的详尽、精到的分析。《珠郎·娘美》先是作为叙事歌与故事在侗族地区民间广泛流传，后由本民族作家于1921年（一说1910—1916年）改编成侗戏，由民间戏班在侗族聚居与汉、侗杂居地区用“双语（以侗语为主，杂用汉语）”演出，以后又传至省外，并在流传中进行加工、改造。据作者的研究，清代侗戏作家大多从汉族传书、戏曲中选材，而《珠郎·娘美》却是直接根据本民族民间叙事歌与故事改编，“这使侗戏文学真正成了反映侗族生活的新文体”，这本身就是有时代特色的。而在长期流传、不断改造的过程中，不但侗族自身的民族色彩越来越浓，而且从内容到戏剧形式都对汉族戏剧有所吸纳，研究者甚至认为其中也有“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某些影响。如作者在“绪言”中所说，目前已出版的一些戏剧史著，

均未将少数民族的戏剧纳入研究视野，在我看来，《贵州戏剧史》（以及其他几部专著）的独特之处与贡献不仅在于特别关注民族戏剧（文学）的叙述，而且充分注意并展示不同民族戏剧（文学）的相互渗透、影响，相互促进的“关系”。在这方面，也依然存在着较大的研究空间，本《书系》的研究只是一个开始。

《20世纪贵州诗歌史》的作者“绪言”中，有一段论述也引起了我的很大兴趣：“（在贵州）古典诗歌向现代新诗的转型经历了缓慢的历程，直到20年代中期才出现以蹇先艾为代表的新诗人，诞生了有规范化意义的新诗”，“由于新诗诞生的迟缓与发展的嫩稚，在前半个世纪的贵州新诗还不像在全国文学发展中的地位取代旧体诗词成为主潮，而是新诗与旧体诗词并存，同步发展，这就是贵州诗歌创作的分流（现象）”。作者认为，这一现象说明“贵州边缘文化的地域环境，使贵州的诗歌创作与全国诗歌发展拉开了极为复杂的距离”。作者对贵州诗歌发展中的“新诗与旧体诗词并存，同步发展”的“分流”现象的概括，无疑是一个重要的“发现”；但我认为，与其说这是一个弱点与不足，不如说这正是贵州诗歌发展道路的独特之处，而且从本书最后一章《旧体诗词谱新声》看，这一特点是保持到“新时期”的。这一“贵州现象”本身就是可以丰富与深化我们对20世纪中国诗歌发展图景的认识的（作者未能将“新诗与旧体诗词的同步发展”作为贯穿全书的基本线索，可能是一个遗憾）。类似的现象，在我看来，也存在于戏剧领域：从《20世纪贵州戏剧史》的叙述中，我们同样可以看到，外来的话剧、歌剧等戏剧形式的引入，确实构成了20世纪贵州戏剧发展中的新的因素，具有不可低估的意义；但在贵州普通观众中产生广泛影响，真正进入他们的日常生活的，还是民族戏剧与地方戏曲，而它们自身也是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变革的。这就说明，如果我们戏剧历史的叙述仍然局限于话剧史

的单一格局，将民族戏剧与地方戏曲排除在外，不仅是严重脱离戏剧实践，违背历史真实，而且也不利于戏剧的多元化的发展。因此，像《20世纪贵州戏剧史》这样采取“戏剧思潮、话剧与歌剧、传统戏曲文学、民族戏地方戏”四条线索交织的复杂的叙述结构，是对现有研究格局的一个突破，对20世纪戏剧史的写作，以至20世纪中国文学史的写作，都是有启示意义的。

《书系》的主编最后说：“写这部20世纪贵州文学史，于我们、于贵州，都是第一次。草创之举，筚路蓝缕，甘苦自知”：其实这甘苦是每一个读者都能体味到的。因此，我们要向主编、作者、编者、出版者表示敬意。而书系每一位作者所显示的学术功底，则使我们有理由对他们寄以更大的期待。

2001年3月10日写毕于燕北园

# 作为左翼作家的端木蕻良

——《端木蕻良小说评论集》序

本书的主编曹革成先生将书稿寄给我，希望我写几句话，这可给我出了一个难题：关于端木蕻良先生的创作，我虽写过一篇文章，却并未真正下过工夫做专门的研究，拥有的发言权是不多的。但我又确实关注这方面的研究，因为我一直认为对端木蕻良的贡献学术界是估计不足的。因此，革成先生让我读读这些年新的研究成果，倒是我所乐意的，而且真的获益匪浅：经过许多相识与不相识的朋友的辛勤耕耘，端木蕻良创作的丰富性逐渐显露出来，我甚至感到惊异：无论从中国现代乡土文学发展的角度，从东北地方文化发展的角度，还是从中国现代长篇小说、短篇小说艺术发展的角度，从现代文学风格学、现代文学语言的发展史的角度，从中国现代文学与中国古代小说的经典《红楼梦》的关系的角度，以及现代文化史、现代知识分子精神史的角度，端木蕻良其人其文都有极大的典型性，都有他的独特的贡献：这是一个不可忽略的存在，一个可以不断发掘的话题，是一个特具魅力、能够引发人的想象力与创造力的阅读与研究对象。因此，我在读朋友们颇富创见的研究文章时，总是能够引起许多联想，并激起某种研究冲动。

好几位朋友都谈到“左翼作家的端木蕻良”，而最近一段时期我对左翼文学正有兴趣，于是不免想到以端木蕻良先生作为个

案，是可以展开左翼文学研究中的许多重要问题的讨论的。

这里不妨举几个例子。本书好几篇论文都谈到端木蕻良先生“几乎从创作的一开始，就非常重视思想性”<sup>[1]</sup>，他一再强调：“文章的深度就是思想的深度”，一个作家如果“没有一个精纯的思想系统，而想写出了不起的作品，是从未发生过的事情”，“没有思想的人绝不会体验身受的生活是什么。过去一般指示者，多说什么从实现生活来体验哪……之类的话，其实没有思想的体验是完全无用的，一个农夫想让他说明自己的生活为不可能，但是一种刻苦的观察，可以得到这些”<sup>[2]</sup>。因此，他可以说是完全自觉地用马克思主义哲学与政治经济学的眼光来烛照他的描写对象的；他这样提示：“我很想让读者在看《科尔沁旗草原》的时候，能注意到它背后的一种特定的经济结构来”<sup>[3]</sup>，如曹革成先生所说，他的这部小说“很明显有马克思的政治思想理论在里面，他是把政治小说做成文学艺术作品很成功的作家之一”<sup>[4]</sup>。这些方面都是很能显示左翼文学创作的特点的，但也正是最容易引起批评的地方：多年来学术界一直盛行着一种似是而非的观点，仿佛明确的理性介入，对现实政治问题的关注，思想性的自觉追求就必然地导致文学性的削弱，这其实是缺乏分析的：理性分析如果不能与“结实的生活血肉统一起来”，确实可能出现“作品的形象不堪承受作者理性思考所赋予的意义”<sup>[5]</sup>的问题，但这并不是一种必然，就端木的创作而言，固然有些作品不同程度存在这方面的缺憾，但理性之光的烛照在更多的方面，使端木的创作得到升华，获得了他所追求的文学的“宽度，深度和强度”，获得了论者所说的特殊价值：他的作品对“特定历史时期原生态的文化形貌”，“对当时政治生活、文化生活、社会世俗生活，家庭生活状态”的极为精细的刻画，“特别是对社会历史和经济活动的细节描绘蕴含着各式各样的物化信息，具有经济文化和历史文化的认识意义，是近代

东北经济生活的形象的切片”<sup>[6]</sup>——这也许是一个更值得重视的文学事实。端木蕻良的创作实践证明了：作家“对原生态社会存在的经验直觉、体悟”和“感性描绘”与“知性分析”是可以统一的；对社会人生、政治、经济的现实关怀与对人的生命存在的超越性关怀是可以统一的；对具体形象刻画的写实主义的“真”与追索形象背后的意蕴与意义的象征主义的“深”是可以统一的；或如作家自己所说，“诗的想象跟哲学的理解以及心理的观察”是可以“有机地结合起来”的<sup>[7]</sup>。在这方面，端木蕻良先生是积累了丰富的艺术经验的，值得认真总结。

这里，实际是包含了某些理论问题与历史的经验教训的。诚然，我们曾片面强调理性、理论的作用和对思想性的追求，而忽视以至根本否认非理性的直觉、感悟与感性描绘、艺术追求，但是否可以反过来不加分析地否认理性、理论的介入，忽视或否认作品的思想力呢？说到底，这是关涉到我们对“文学与文学性”的理解与想象：文学难道真的就是“绝对非理性，纯个人性”的，那种与社会绝缘、将思想逐出的“纯文学”是真实的存在吗？文学的功能难道仅限于审美，而可以忽视或否认文学的认识作用吗？等等。这些看起来都是常识，但如不从理论上加以澄清，在我看来，是很难对包括端木蕻良在内的左翼作家及其文学做出科学的评价的，而且也不可能对其确实存在的历史教训做出真正触及要害的科学的总结。

这里还需要提及一种似是而非的评价：仿佛左翼文学对思想的追求压倒了对艺术的追求，因而在艺术上总是粗糙的。对所谓艺术的“粗糙”，其实也是应该做具体的分析的：有的确是由于急促而缺少艺术的从容运思带来的某种艺术上的缺憾，这种情况即使在端木蕻良的创作中也时有出现，某些左翼作家的创作中则更为严重，这都是无须讳言的；但这也并非左翼作家所专有，被许

多研究者看好的非左翼作家也有粗糙之作，可见艺术的粗糙和左翼作家对思想性与文学社会功能的重视之间并无必然联系。

或许更为重要的是，被一些研究者批评的“粗糙”其实是左翼作家对不同于传统艺术趣味的新的美学风格的一种追求与实验。如一些研究者所注意到的那样，端木蕻良自称“性格的本质上有种繁华的热情”，自己与故乡人民双重的奴隶地位“形成一种心灵的重压和性情的奔流”<sup>[8]</sup>，也就着力追求艺术上的“强度”：人物塑造上的“强动作”、“直立感”，小说意境的阔大、节奏的急促、语言的力度与独特修辞，等等，从而形成了“重，粗，大”的艺术风格<sup>[9]</sup>。许多左翼作家的作品也有类似的风格，如果用传统的审美眼光看，是很难被接受的；因此，鲁迅特意提醒人们：“一切所谓圆熟简炼，静穆幽远之作，都无须来作比方，因为这诗属于别一世界。”<sup>[10]</sup>

这里所显示的，正是左翼文学在艺术上的反叛性、异质性，从另一个角度看，也就是创造性。在我看来，左翼作家（左翼知识分子）的一个最本质的特征就是鲁迅所说的永远“不满足于现状”<sup>[11]</sup>，由此而形成了其永远的批判性（反叛性，异质性，非主流性）。而这样的批判、反叛必然是全面而彻底的：不仅表现为一种激进的思想倾向、政治立场，而且也反映在对既成的艺术秩序的反叛与不循常规的创造。因此，前述“左翼文学不注重艺术形式”的说法完全是一种成见与误解：左翼文学的一个本质特征即是它的艺术上的“实验性”。很多论者都谈到端木蕻良在小说艺术与文学语言上的探索所显示的“野性”即“非正统倾向”<sup>[12]</sup>：在这方面端木蕻良在左翼作家中也是有代表性的。

当然，对代表性也即共性的强调，并非要否定端木蕻良在左翼作家中的个体的存在及其鲜明的个性。左翼作家本是由两部分人组成的：一部分是鲁迅这样的“五四”老将，他们大都有中国



传统士大夫家庭背景与文化遗产（或如鲁迅说的“因袭的重担”）；另一部分年轻的左翼作家，相当多的人是出身于社会的底层，或有着复杂的底层生活经验的，像端木蕻良这样出身于豪门巨族、流淌着“贵族”血液的，并不多见：这或许就是端木蕻良在同辈左翼作家中多少显得有些特殊之处吧。更重要的是，特殊的家庭背景所形成的端木蕻良所特有的精神气质更使得他显得有些异样：正像研究者所分析的那样，一方面，父辈传下来的“莽原子民的奔放、骠悍”之风培育了他“繁华的热情”与堂吉珂德式的拯救天下苍生的英雄梦；另一方面，“大草原的空旷与寂寞、母亲的悒郁、走向没落的士大夫的大家族生活”又赋予他“细腻与善感的本性”，“彻骨的忧郁”与孤傲，哈姆雷特式的优柔寡断，“长于沉思、冥想，迟疑于行动”<sup>[13]</sup>。在《科尔沁旗草原》里，有一个小说主人公丁宁的性格组合公式：“民粹主义（虚无主义）+利己主义（自我中心主义）+感伤主义+布尔什维克主义=丁宁主义”，在某种意义上，也是端木蕻良对自己庞杂的思想体系与多重精神气质的一个概括，在我看来，是相当准确的。正是这样的庞杂的思想与多重气质内在地决定了他既倾向革命，成为一个左翼作家，又与革命格格不入，终于是左翼作家中的另类。应该说左翼作家中也有不少人存在着不同类型的思想与精神气质的矛盾，有的在参加革命的过程中，逐步自觉不自觉地克服（或压抑）了革命所不容的思想与气质，终被革命所接纳，也有的则本性难改，与革命始终处于若即若离的状态，端木蕻良大概就是其中的一位：尽管他也曾努力地调整自己，却始终坚守着固有的自我，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在我看来，就是他无法摆脱自己更为内在的“彻骨”的孤傲的贵族气。这样，端木蕻良在同辈左翼作家中始终处于“不被人理解、不被人认同的孤独”状态，遭遇到“被抛出群体之外的冷落”<sup>[14]</sup>，就是不难理解的：这

正是隐藏在种种人事纠葛背后的更为重要的历史内容。

这样，作家端木蕻良自身的精神历程与境遇就具有了一种“史”的意义；而研究者尤其感到兴趣的是，这样的精神史已经外化为端木蕻良作品中的“丁宁——兰柱——石龙（我觉得也许还要加上曹雪芹）”“自我形象”发展史，这是构成了端木蕻良创作的一个重要底蕴的，这方面的研究也才开始<sup>[15]</sup>。这或许表明，端木蕻良的研究还孕育着新的可能性，现有的研究成果，打开了思路，开拓了广阔的研究前景，我们应该向所有的默默耕耘的作者表示敬意。我的这篇“读后感”，正是由他们的研究引发的，也应该道一声“谢谢”！

2002年1月24日写毕

## 注 释

[1] 逢增玉：《论端木蕻良小说创作的两种追求与风格》。

[2] 端木蕻良：《文学的宽度，深度和强度》，1937年12月16日《七月》5期。

[3] 端木蕻良：《〈科尔沁旗草原〉后记》。

[4] 转引自马伟业：《论端木蕻良文学创作的深度和强度》。

[5] 这是我在《四十年代小说研读札记》一文中对端木创作所提出的批评。现在看来，我也许过分地强调了这一方面，而忽略了理性介入对端木创作的积极意义，这也多少反映了前述流行理论的影响。

[6] 尹建明：《端木蕻良小说的文化视界》，马伟业：《论端木蕻良创作的深度和强度》。

[7] 端木蕻良：《〈曹雪芹〉前言》，可参看尹建明：《端木蕻良小说的文化视界》，马伟业：《论端木蕻良创作的深度和强度》。

[8] 端木蕻良：《我的创作态度》。

[9] 参看逢增玉：《日神文化与东北作家群的创作》，马伟业：《论端木蕻良文学创作的深度和强度》。近年来包括我自己在内的一些研究者都比较注意端木蕻良创作中的“两副笔墨”，这对揭示其创作风格的丰富性是有意义的，但这不应该导致价值判断上的倾斜，应该说无论是“重，粗，大”，还是“轻，细，小”，都是各有其美学意义与价值的，而且端木蕻良创作的主体风格还是偏于“重，粗，大”的。

[10] 鲁迅：《白莽作〈孩儿塔〉序》。

[11] 参看鲁迅：《关于知识阶级》。鲁迅是在界定“真的知识阶级”时提出这一标尺的，同时提出的还有永远“为平民说话”。在我看来，左翼作家（左翼知识分子）就是这样的“真的知识阶级”。而在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为平民说话”就是站在被压迫的工农群众这一边，因此，鲁迅说：“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和革命的劳苦大众是在受一样的压迫，一样的残杀，作一样的战斗，有一样的命运，是革命的劳苦大众的文学。”（《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和前驱的血》）我以为这是对30年代的左翼文学的一个经典性的定义。端木蕻良创作的倾向性表明，他的文学无疑是属于左翼文学的。

[12] 参看孔海立：《端木蕻良和他的小说（1933—1943）中的自我形象》，王本朝：《论端木蕻良小说创作的美学意蕴》，崔勇：《不可靠叙述与非权威批评中的“潜流”——论端木蕻良短篇小说集〈憎恨〉》等。

[13] 参看陈悦：《瑰伟的英雄梦幻和悲抑的生命低语——端木蕻良小说世界的精神透视》。

[14] 参看前文与孔海立：《端木蕻良和他的小说（1933—1943）中的自我形象》。

[15] 参看前引陈悦与孔海立的文章。

# 用现代中国人自己的话真实地描写自己

——《20世纪中国小说大学生读本》序

本书选的是“20世纪中国小说”，编选者都是专家，每一篇都写有阅读提示，要说、该说的话都说了，轮到我就没有什么话好说了。编辑朋友要我“总说”几句，这也很难，这一百年，不说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的变迁，单就是中国文学、小说的发展，就经历了不知多少风风雨雨，真是一言难尽。但仔细想想，多变中也有一以贯之的追求，或者说目标，而且至今也还在实现的过程中，说不定还要延续到已经到来的新世纪。——或许我可以就这个题目略说几句？

说是“20世纪中国小说”，但本书“策划草案”中就规定：“选文时间范围为‘五四’前夕至90年代末，所选作品均为白话小说，20世纪初的文言小说一概不选。”定这样的编选原则我是理解的，并且是赞同的。因为我要说的一以贯之的目标正是“五四”文学革命才明确提出，并成为以后一代一代的现代文学（小说）的作者自觉追求的。对这一目标，有过不同的说法，学术界也有各种各样的概括，不过，我以为说得最清楚、也比较准确的，还是鲁迅《无声的中国》里的一段话。在这篇1927年2月在香港青年会做的演讲里，鲁迅谈到了“‘五四运动’前一年，胡适之先生倡导的‘文学革命’”。鲁迅说，谈起“革命”很多人一听到就害怕，其实“这和文学两字连起来的‘革命’，却没有法

国革命的‘革命’那么可怕”，“改换一个字，就很平和了，我们就称为‘文学革新’罢”。而“文学革新”的意思“也并不可怕，不过说：我们不必再去费尽心机，学说古人的死人的话，要说现代的活人的话；不要将文章看作古董，要做容易懂得的白话的文章”。于是，就有了这样的要求与宣言——

“我们要说现代的，自己的话；用活着的白话，将自己的思想，感情直白地说出来。

“大胆地说话，勇敢地进行，忘掉了一切利害，推开了古人，将自己的真心的话发表出来。……只有真的声音，才能感动中国的人和世界的人；必须有了真的声音，才能和世界的人同在世界上生活。”

这里，有好几个概念值得仔细地剖析。——我们的讨论就从这里开始吧。

首先是“现代的（人）”、“中国的人”。这两个概念又是与另外两个概念“古（代）人”、“世界（外国）的人”相对的。由此形成了两个关系：“现代的人”与“古代的人”的关系，“中国的人”与“世界（外国）的人”的关系。这都是历史发展到“现代中国社会”才会发生的新关系新问题：“现代中国”自然是与“古代中国”相对而言的；而在封闭的中国的传统观念中，中国就是世界的中心，只有在国门打开以后，才知道（更准确地说是才正视）中国之外还有一个“世界”，而且，在面临西方世界的侵略威胁的情况下，才会产生如何“和世界的人同在世界上生活”的问题。

鲁迅在“五四”时期有句著名的话，是可以代表先驱者们处理“现代与古代”、“中国与世界”的关系的基本原则的：“保存我们，的确是第一义”<sup>[1]</sup>。这里的“我们”指的就是“现代中国人”。这就是说，关注的中心是“人”的生存，而且是“现代中国

人”的生存。鲁迅在另一篇文章里，又这样概括了“现代中国人”的“当务之急”：“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sup>[2]</sup>。一切以“现代中国人的生存，温饱，发展”为出发点与指归。——鲁迅说，这是他（和“五四”先驱者）为青年“设计”的20世纪中国的奋斗“目标”<sup>[3]</sup>。

这样的目标落在思想文化（包括文学）上，又提出了怎样的要求呢？鲁迅在前述《无声的中国》这篇文章里，提出了两个概念：“自己”与“真”，即要说出现代中国人的“自己的话”，发出“真的声音”。

这似乎是一个不言而喻的起码的要求。但鲁迅恰恰在这里看到了现代中国的基本的文化（文学）危机：我们完全可能、甚至事实上不能发出自己的声音与真的声音，以致我们已经“不能说话”、“哑了”。

“我们已经不能将我们想说的话说出来。我们受了损害，受了侮辱，总是不能说出些应说的话。……反而在外国，倒常有说起中国的，但那都不是中国人自己的声音，是别人的声音。”<sup>[4]</sup>

我们“不是学韩，便是学苏。韩愈苏轼他们，用他们自己的文章来说当时要说的话，那当然是可以的。我们却并非唐宋时人，怎么做和我们毫无关系的时候的文章呢。即使做得像，也是唐宋时代的声音，韩愈苏轼的声音，而不是我们现代的声音。然而直到现在，中国人却还要耍着这样的旧戏法”。<sup>[5]</sup>

“中国人向来因为不敢正视人生，只好瞒和骗，由此也生出瞒和骗的文艺来；由这文艺，更令中国人更深地陷入瞒和骗的大泽中，甚而至于已经自己不觉得。”<sup>[6]</sup>

显然，在鲁迅看来，现代中国人是很容易失去自己的声音的。因为他面对的是两个强大的文化（文学）：中国古代人所创造的中国传统文化（文学），以及外国人创造的西方文化（文学）。

这就要求有一个更加强大的生命主体，有足够的消化力，使自身变得更加强有力。但如果缺乏自强自力，只“不过敬谨接受”，那就会形成双重“桎梏”，而最终窒息了自己。<sup>[7]</sup>

这些话都说得十分沉痛，而内含的危机感、焦虑感，更给人以震撼。而且这是一种世纪焦虑——直到晚年，鲁迅还向人们发出这样的警告——

“我们要觉悟着被描写，还要觉悟着被描写的光荣还要多起来，还要觉悟着将来会有人以这样的事为有趣。”<sup>[8]</sup>

正如一位研究者所说，“‘被描写’主要说的是自己一方”，是指我们自己缺乏文化（文学）上的自主性，“自己不积极地认识自己，表达自己，不积极发出声音来‘描写自己’”，于是，就只有要别人（古人与外国人，或某个意识形态的权威）来代表自己，或者用别人的话语来描写自己，从而使自己处于“被描写”的地位，也即被主宰与被奴役的地位。而且“积久成习，不仅不以为耻，反而以为‘有趣’，觉得‘光荣’”<sup>[9]</sup>，这恐怕也是鲁迅的焦虑之所在吧。

于是，就有了这位研究者所说的“反抗‘被描写’”的挣扎与努力。<sup>[10]</sup>

而真正具有自信力的现代中国人，是不会拒绝别人来描写自己的，他既要发出自己的声音，当然也就会尊重古人与外国人发出的他们自己的声音，而且他的“反抗‘被描写’”甚至是以向古人与外国人学习如何“描写”（包括如何描写自己）为前提的。鲁迅曾写过一篇文章，说如果拒绝接受“精神的粮食”，那就会由“精神的聋”而“招致了‘哑’来”，同样发不出自己的声音。鲁迅之所以把几乎一半以上的精力放在翻译工作上，耗费心血著述《中国小说史略》，至死也念念不忘《中国文学史》的研究与写作，正是为了使现代中国人不致“由聋而哑，枯涸渺小，成

为‘末人’”。<sup>[11]</sup>

一方面，要向古人与外国人学习描写，同时又要反抗依附于古人与外国人的“被描写”，目标却是“用现代中国人的自己的话真实地描写自己”，以有利于现代中国人的生存与发展。——从“五四”文学革新开始，这近一百年的中国文学（包括我们重点讨论的小说）的发展道路就是这样走过来的。

这里的关键是“创造”。离开了创造，就不会有真正的“拿来”；而“反抗‘被描写’”的本质就是创造出自己的语言、形式、思想，并且自立标准。

首先是语言的创造。鲁迅在《无声的中国》里反复强调的，就是现代中国人要发出自己的声音，必须创造与使用新的语言，即他所说的“现代的活人的话”、“活着的白话”。“五四”文学革新就是以语言的变革——用白话文代替文言文——为核心与突破口的。胡适曾明确地把文学革新的目标归结到“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十个大字：“我们所提的文学革命，只是要替中国创造一种国语的文学。有了国语的文学，方才可以有文学的国语。有了文学的国语，我们的国语才算得真正的国语”<sup>[12]</sup>。这里包含了两个方面的要求：既要以口语为基本，以实现语言与思维、口头语与书面语，即想、说、写的相对统一；又要对口语进行文学的提炼，并在口语的基础上，吸收其他语言成分，创造出适应现代中国人的思维、情感表达、交流要求的，具有思想与艺术表现力的现代文学语言，从而创造现代汉语文学。而这样的现代汉语文学的创造，正是为现代民族国家共同语言的形成与发展奠定基础的：“国语有了文学价值，自然受文人士的欣赏使用，然后可以用来做教育的工具，然后可以用来做统一全国语言工具。”<sup>[13]</sup>从此，创造现代汉语文学语言（包括小说语言），进而创造现代汉语文学（包括现代汉语小说），就成为一代又一代的中国现代作家为



之呕心沥血的事业。它所遇到的阻力也是空前的：林纾当年就曾打上门来，致书蔡元培，断然不许“都下引车卖浆之徒所操之语”进入文学的殿堂，<sup>[14]</sup>并扬言“悠悠百年，自有能辩之者”<sup>[15]</sup>，摆出了要较量一个世纪的架势。中国的现代作家、小说家也就憋着一口气，不断地进行语言与“写法”的实验，做了多方面的尝试，如鲁迅所说，就是为了“表示旧文学之自以为特长者，白话文学也并非做不到”<sup>[16]</sup>。在一定意义上，本书所选的作品，就是这样的持续了一个世纪的实验的实绩。——现在真是作总结的时候了。

我们已经说到，语言的实验之外，还有“写法”的实验，“形式”的实验，用鲁迅的话说，就是要“以新的形，尤其是新的色”来写出“自己的世界，而其中仍有中国向来的魂灵——要字面免得流于玄虚，则就是民族性”<sup>[17]</sup>。要说“自己的话”就必须创造出“自己的形式”，这同样成为许多现代作家（小说家）的共识与努力目标。茅盾下面这段话是人们所熟知的：“在中国文坛上，鲁迅君常常是创造新形式的先锋，《呐喊》里的十多篇小说几乎每一篇有一篇的新形式，而这些新形式又莫不给青年作家以极大的影响，必然有多数人跟上去实验。”<sup>[18]</sup>其实，一个真正的有独立追求的作家（小说家）也都必然是“创造新形式的先锋”。鲁迅的影响并不在他的小说的具体形式，而是进行形式实验的高度自觉性，这在中国现代文学（小说）的发展中，已经形成一个传统，它的价值或许高于实验的实绩。——由于种种主客观条件的限制，中国现代作家（小说家）的形式实验并不都是成功的，总体上并不成熟，其中的经验教训也是应该认真总结的。

我们在强调文学语言、形式的实验的意义时，也不要忘了鲁迅在《无声的中国》里的提醒：“单是文学革新是不够的，因为腐

败思想，能用古文做，也能用白话做。所以后来就有人提倡思想革新。思想革新的结果，是发生社会革新运动。”<sup>[19]</sup>文学革新、思想革新与社会革新的互动，这正是现代中国的历史变革的一个特点，在我看来，也是它的优长之处。

“说自己的话”是有一个前提的：这个“自己”必须是具有“现代思想（包括思维方式，情感方式与心理素质）”的“现代中国人”，有了这样的“人”，才会有这样的“文学”。这应该是常识，这里就不多说了。

最后，还有一个问题：用什么作为标准来衡量我们的创造呢？鲁迅在评价一位中国现代艺术家时有一段话，很值得注意——

“他并非‘之乎者也’，因为用的是新的形和新的色；而又不是‘Yes’‘No’，因为它究竟是中国人。所以，用密达尺来量，是不对的，但也不能用什么汉朝的虑褫尺或清朝的营造尺，因为他又已经是现今的人。我想，必须用存在于现今想要参与世界上的事业的中国人的心里的尺来量，这才懂得他的艺术。”<sup>[20]</sup>

鲁迅从来是主张“以自己为主”、“自己裁判”的。反抗“被描写”，最要紧的就是“自立其则”，自己给自己立标准。一些人甘于“被描写”，就是因为总是拿古人的外国人的标准来衡量自己，就觉得里外都不是，缺乏自我创造的自信力了。有人担心，强调自立其则，会不会走向自我封闭，不会的，因为是现代中国人，如鲁迅所说，是“想要参与世界上的事业”的，并且自然是古代中国的继承人，因此，必然“内外两面，都和世界的时代思潮合流，而又并未桎梏中国的民族性”<sup>[21]</sup>。但自立标准的核心，还是要走出一条现代中国人的、自己的文学之路。这是一条探索者的路，勇敢者的路，充满曲折，每前进一步，都有无数次的失败的陷阱在等待着，但它是真正能焕发出人的创造力的，因而是最具魅力的。本书所记录的，正是这一个世纪的不断探索的足

迹，尽管有些歪歪扭扭，毕竟一路走到了今天。

今天面对新世纪的中国文学，既有着“描写自己”的新的需要与可能，“被描写”的危机或许正在增长。而“创造”新的思想、形式、语言的任务正历史地落在本书的读者——中国的当代青年的身上。当年鲁迅的召唤今天依然有力——

“青年们先可以将中国变成一个有声的中国。大胆地说话，勇敢地进行，忘掉了一切利害，推开了古人，将自己的真心的话发表出来。”<sup>[22]</sup>

2001年2月27日写毕于燕北园

## 注 释

[1] 《热风·随感录·三十五》。

[2] 《华盖集·忽然想到·六》。

[3] 《华盖集·北京通信》。

[4] [5] [19] [22] 《三闲集·无声的中国》。

[6] 《坟·论睁了眼看》。

[7] [17] [20] 《而已集·当陶元庆君的绘画展览时》。

[8] 《花边文学·未来的光荣》。

[9] [10] 郜元宝：《反抗“被描写”——解说鲁迅的一个基点》，文载《鲁迅研究月刊》2000年1期。本文在准备过程中，受到了郜元宝先生此文的不少启示。像鲁迅关于“被描写”的论述就是我原来不曾注意的。特此说明，并向郜元宝先生表示感谢。

[11] 《准风月谈·由聋而哑》。

[12] [13] 胡适：《中国新文学大系·理论卷·导言》。

[14] 林纾：《致蔡鹤卿太史书》。

- [15] 林纾：《论古文白话之相消长》。
- [16] 《南腔北调集·小品文的危机》。
- [18] 沈雁冰（茅盾）：《读〈呐喊〉》，原载1923年《文学周报》91期。
- [21] 参看《华盖集续编·新的蔷薇》、《坟·杂忆》。

## 研究思路的开拓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9年  
第1期编后记

从本期开始，本刊编委会成员做了部分调整：一些曾为本刊的创立与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的老先生退出，又有一些新的相对年轻的学人进入，这一出一进，从一个侧面显示了我们的现代文学研究代代相传的健康发展。在这里，我们要向为培育本刊（与现代文学研究）耗尽心血的老一代学者表示感谢与敬意；同时也对将把本刊（与现代文学研究）推向新的境界的年轻一代的学者寄以厚望。

本期“开拓新领域，打开新局面”专栏集中发表了于1998年7月在山西太原召开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第七届年会的部分发言与学术报告。这届年会，继1994年西安年会主要总结新时期现代文学研究的成就，1996年石家庄学会理事会着重提出研究现状中的问题与困惑以后，对如何开创现代文学研究的新局面，结合最近几年的新的研究实践，提出了一些新的思路。从大会的发言及本期所选登的文章看，大体上包含了这样几个方面：一是研究领域、空间的开拓，这里有向近代与当代两面的追溯与延伸，香港、台湾等地区文学研究的新的发展等等，这实质上是一种“学科边界的开放”，以打破现代文学研究长期局限于“三十年”的格局。其次，是现代文学内部研究对象、范围的新的突破。将通俗

小说纳入现代小说研究的范围，作为与新小说同时并行的另一条发展线索，这已经成为多年来研究的新的趋向，并且有了一批可观的成果（本期所发表的《论鸳蝴小说的无意义特征》一文即是建立通俗小说自身的价值标准的一个新的探索）。这次年会上，又有学者提出“京剧与电影文学研究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学科建构中的价值取向”问题，实际上还可以提出地方戏曲文学与旧体诗词写作是否应纳入现代文学的历史叙述这类问题。这些都确实关系到我们学科的建构，并且涉及现代文学学科的概念、性质、范围这样一些更为根本的问题。在这些方面，学术界存在着不同的认识，一方面有待于理论上的深入探讨与争论，另一方面也有赖于新的研究实践。其三，也是这次年会讨论得最多的，即是对现代文学发展关系最为密切的一些文化要素的研究，提出的有现代文学与地域文化、宗教文化关系的研究，现代文学与政治文化、出版文化、大学文化的关系的研究，等等。其中现代文学与地域文化、宗教文化的研究已进行了多年，并有了系统的成果；现代文学与现代政治、出版、教育关系的研究，尚处于起始阶段，本期开辟的两个有关专栏即是这方面研究的初步成果，读者或许会有兴趣，希望能引出更加成熟的研究。这一方面的研究既是80年代“文化热”的一个发展，更与90年代学术界对“现代性（包括文学的现代性）”问题的关注与思考密切相关，也会有助于对现代文学学科性质问题的思考。其四，这次年会上还有学者提出了在对现代文学的经典著作进行“文本细读与微观研究的基础上，提升出一些诗学范畴，并进而建立起中国现代小说研究的诗学视域”的问题。这可以视为80年代末曾经提出的现代文学“形式研究”的一个继续与再起步。那次倡导引出了康林关于胡适《尝试集》的研究等出色成果，可惜因为种种原因未能坚持下去，这一次问题的再次提出，并且似乎更具有可操作性，而且

出现在人们更热衷于所谓“外部关系”的研究，而相对忽略了“内部关系”的研究、现代文学审美性的研究的学术背景下，也许更会引起人们的注意。一般说来，倡导是相对容易的，更重要的是研究实践，并且长期坚持下去。在某种意义上，这是现代文学研究的攻坚战，要经过持续的努力，并不断地总结经验教训，积以时日，才会稍有成效。以上四个方面，都会涉及到现代文学研究者自身的知识结构的调整问题以及我们的学科的人才培养的问题；在这次年会上，已经有学者提出了这个学科的基本建设问题（参看本期赵园的有关文章）。严家炎先生与陆耀东先生在年会开幕词与闭幕词中也发表了有关学科建设的重要意见，这都是能够给读者与研究者以启发的。

1999年正值为现代文学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的老舍先生诞辰一百周年，本期特辟研究专栏，以示纪念。老舍研究是现代文学研究中比较成熟的一个领域，本期发表的两篇论文的作者，从各自的角度，提出了一些新的见解，这是难能可贵的。

本期“文学史研究”专栏里发表的余凌与孟繁华两位先生的文章，也可以视为对“书评”写作的一个新的尝试：不是一般的评论某本书的贡献与不足，而是以所评论的著作“为中心”，来讨论有关的学术（文学史）研究的一个问题。本刊一直期待着这样的带有研究性的书评，欢迎读者赐稿。

1998年11月1日写毕

# 面对新世纪的期待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1年  
第1期编后记

也许是因为从事的是史的研究，因此，对“世纪”的交替有着特殊的敏感与兴趣：想到在20世纪最后一个冬天编这期《丛刊》，而刊物送到读者手中时，正是21世纪的开端，心中竟涌起阵阵莫名的感动。

一个强烈的期待也油然而生：但愿我们的《丛刊》，以至整个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也会有一个新的开端。

于是，就请来了几位刚毕业的博士生，组织了这一期的“笔谈”：谈他们对现有的文学史研究的反思，对文学史观念、方法的新探索，对未来研究路向的设想。这一期同时编发的《1998—1999年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述评》的年轻作者也通过对研究现状的考察，提供了他对如何寻求现代文学研究的新突破的思考。——这些，都可以看作是“新人新思路”，相信会引起学术界同人的关注：我们对这些年陆续培养出来的学术后备力量寄以厚望，他们有相对开阔的视野，更为合理的知识结构，只要“沉”得下来，经过踏实、持续的努力，定能为新世纪现代文学研究做出超越前人的贡献。

本期的其他几组文章也有不同程度的探索性。

本刊1999年第一期“编后记”中，在谈到如何“开拓新领



域，打开新局面”时，曾提到“有学者提出了在对现代文学的经典著作进行‘文本细读与微观研究的基础上，提升出一些诗学范畴，并进而建立起中国现代小说的诗学视域’的问题。这可以视为80年代末曾经提出的现代文学‘形式研究’的一个继续与再起步。……（它）出现在人们热衷于所谓‘外部关系’的研究，而相对忽略了‘内部关系’的研究、现代文学审美性研究的学术背景下，也许会更引起人们的注意”。现在，这一倡导已经有了初步的成果：本期“诗化小说研究”专栏推出了三位作者关于废名的《桥》、沈从文的《边城》以及鲁迅的《伤逝》、《孤独者》、《在酒楼上》等小说的诗学解读的论文，尽管这都是从作者的专著中节选出的片断，未能显示全貌，但仍可看出，这类诗学研究确实可以为现代文学研究打开新的视域；而这些论文所存在的明显不足也正说明“现代文学的审美性研究”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无论如何，已经有了开端：这或许是更为重要的。

在前述“编后记”里，还提到了“学科边界的开放”、“向近代与当代两面追溯与延伸”的问题，而本刊从2000年第3期开始，即已将20世纪50—80年代的文学史研究列入发稿范围内。本期所载《密语写作与新政治构建的日常生活的冲撞》等三篇论文，即是对这一时段的重要思想、文化、文学现象的历史考察，无论是史料的发掘，还是研究思路的开拓上都有新的尝试。

本刊1998年第一期“编后记”中曾发出过“要重视民国时期与40年代中后期文学的研究”的呼吁：“按传统的‘近代、现代、当代文学’的三分法，两个历史转折点——从近代向现代转折的1912—1917年、从现代向当代转折的1945—1949年——文学的研究都成为研究的薄弱环节：这一点似乎没有引起现代文学研究界的足够重视”。我们感到欣慰的是，两年以后，这一呼吁有了回应：本期所发表的《论1946—1948年平津文坛“新写作”的形

成》，用大量新发掘的史料有说服力地论证了在“1946—1948年间，平津文坛出现了一个以‘新写作’为标帜的文学试验潮流和试图建立新的文学传统的倾向”，而西方现代文学观念的自觉引入，使“1946—1948年平津文坛试验与世界文学思潮同步发展，有了一次短暂的接轨”。这一重要文学现象的重新发现与梳理，不仅使“30年代的京派文学——40年代中期以西南联大为主的校园文学”这一条文学发展线索得以延伸，而且为1949年以后的文学的发展路线提供了一个重要的文学背景。这也说明，历史转折时期的文学现象还有相当广阔的研究空间，有待我们继续开垦。

仍然是1999年第一期的“编后记”里，还提到了“现代文学与现代教育的关系”的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现在也已有了进一步的成果：一套“20世纪中国文学与大学文化丛书”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陆续推出，已经出版的王培元的《抗战时期的延安鲁艺》、黄延复的《二三十年代清华校园文化》与姚丹的《西南联大历史情境中的文学活动》，显示了这一研究领域的广阔前景。本期发表了对姚丹一书的书评，试图从作者的写作试验中引出对历史观念与研究方法的讨论：这样的研究实践与理论总结、探讨的互动，也是我们所想要提倡的。

本期所发表的《论“五四”时期对俄国文学的接受》也颇有新意：作者不满足于对历史事实的简单描述，而试图进一步讨论：“当时中国究竟选择了哪些俄国文化以及如何选择的，同时意味着当时中国拒绝了什么样的俄国文化及如何拒绝的，‘五四’时期知识分子是以何种心态对待俄国文化的，这种选择与俄国文化事实的差距如何，这种做法对以后中国文学与社会的变革产生了怎样的影响。”正如作者所说，在20世纪末这样来反观世纪初的选择，是格外有意义，在“文学接受”的研究上，也是能够给人以启示的。

细心的读者会发现，本期好几篇文章都比较长，这也是反映了编辑意图的：我们愿意为经过长期的扎实的研究写出的有分量的论文提供篇幅。本期也有意地发了一组三四千字的短论文，为“一得之见”提供发表的机会。在我们看来，文章不在长短，重要的是否“言之有物”——这是当年“五四”文学革命的先驱者对新文学提出的要求，当然适用于现代文学的研究者，这本应是不言而喻的，但在“假大空”的泡沫学术充斥的当下，却别有意义在，这也是令人感慨不已的。

于是，当我们面对新世纪时，不仅有新的期待，也有了新的责任——我们总要努力向前。

2000年10月23日

# 文学研究与当代生活的对话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2年

第1期编后记

本期刊物编得颇为吃力，大概是因为有太多的编辑意图。

“左翼文学与现代中国”里的一组笔谈，是各位作者根据在中国社科院文研所现代室与现代文学馆联合召开的座谈会上的发言整理而成的。我们特意作为本期的重点栏目郑重推出。这不仅是因为左翼文学研究由于种种原因，已经成为现代文学研究的一个薄弱环节，而对左翼文学的认识又确实关系着我们对中国现代文学的一些基本特质的把握，本应属于这门学科的基础性的研究；而且还如“左翼文学与现代中国”这一题目所标示的，左翼文学以及相应的社会、文化（含文学）思潮是现代中国史，特别是思想文化史、文学史上无法绕过（不管人们如何评价它）的存在，对左翼文学及左翼思潮的认识，实际上与人们对“现代中国”的历史、现状以至未来的认识、想象与选择是有一种内在的联系。这次讨论在与会者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一些学者特别关注于“左翼文学与当下中国文学”、“左翼文学资源对当代中国的意义”这类话题，大概不是偶然的。记得在80年代，我们曾有过“现代文学研究的当代性”的讨论，强调现代文学研究与当代的对话，对当代思想文化建设的积极参与，事实上现代文学研究界曾经是80年代思想文化界十分活跃的一支力量。在这以后，曾

有过对参与过程中曾经出现或可能出现的历史实用主义的反省——这样的反省自有其必要性，我们在任何时候都要对实用主义保持必要的警惕：它在现代中国也是一个传统，正如一些发言者所指出的，90年代曾发生过的将左翼文学与左翼思潮妖魔化的倾向，其实也是一种实用主义。但这样的反省与警惕不应该导致对现代文学研究与当代现实生活的有机联系的削弱与否定。任何时候都不能忘记，作为生活在当代中国的学者，我们的学术研究的问题，只能来自（或立足于）中国本土的现实；而对问题的学术性的解决，又必须是学理性的，有距离的，更带根本性的思考与研究：应努力在这二者之间保持必要的张力。这正是我们学科的生命力所在。在这方面，我们是有许多经验与教训的。具体到对左翼文学的研究，除将其妖魔化以外，也曾有过独尊左翼的时代，今天我们重提左翼文学的话题，自然不是又要来翻烙饼。一位作者说得很好：关键是要改变那种“整体主义的肯定或否定”的简单模式，用一种更为复杂的态度来对待我们的研究对象，尽可能地揭示其矛盾的各个侧面。这一期的“笔谈”就已经涉及了左翼文学及其研究的许多方面的问题，尽管未能充分展开，相信仍能给读者与同行以有益的启示。可以看出，每一位作者都是经过严肃的思考，采取认真的学术探讨的态度，同时又保持了思想的锐利与创造活力——这本是我们这个学科的优势；在当今学术研究面临体制化与商业化的危机，越来越平庸化的情况下，如何发挥这样的优势，还需要我们做出更大的努力。

这里，还想向读者与同行推荐解志熙对支克坚先生的论著《中国现代文艺思潮论》的评论。这不仅是因为支先生是通常所说的第二代学者中的代表人物之一，他和他们那一代人的研究成果理应受到尊重——几代学者的团结合作本也是现代文学研究界的一个值得珍惜的传统；而且如这篇评论所说，支先生是近二

十年始终坚持不懈地研究“新文学史上的革命文学运动和革命现实主义文学思潮”（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左翼文艺运动及其文学思潮”）贡献最多的专家，他的学术成果与经验，就特别值得重视。例如，评论者一再强调，支先生的研究之所以能够达到“历史反思的深刻”，同时始终把握住历史研究的分寸感，具有较强的科学性，是与他始终坚守学术的良知和不为时尚所动的冷静、独立的科学精神，坚持“深入体察当时的历史处境”、“对问题作具体分析”的“历史主义的立场”分不开的。这些方面对我们今天的研究都是具有启示意义的。还要提及的是，这篇评论的写法，突破了一般性的评介模式，而“从学科史的角度着眼”，讨论所评论的论著“对一个学科的发展及这个学科的学术思想的进步有什么新的推动又带来什么新的问题”。作者抓住了支先生的研究的“反思性”特质，不仅充分论证了支先生“历史反思的深刻”，同时，又以支先生的研究为个案，对在现代文学近二十年研究中有深刻影响的“反思思维”的“矛盾”做出了自己的分析：这就使这篇评论不局限于支先生个人研究的得失，而具有更普遍的意义。我们特意将它安排在“书评”这一栏目中，并且破例地分两期连载，意在提倡一种研究性的书评，以提高书评的质量与品位：这其实也是我们多年来一直追求的。

这一期的《文学期刊研究》专栏也是特意组织的。这是近年来我们提倡的“现代出版文化、传播媒体与现代文学的关系研究”的一个具体实践。几位年轻的研究者或通过对“‘五四’时期的北大学生刊物比较”，“窥见‘五四’时期‘众声喧哗’的思想状况和‘学生一代’在‘先生一代’的指导和帮助下走向思想成熟的历程，也预示着‘五四’后中国思想界的分裂和演变”；或通过被人们所忽略了以文言为主的刊物《青鹤》的重新爬梳，揭示了“三十年代上海旧式文人的生存与创作空间”；或在《现代》

等杂志所造成的“文学生态环境”中，发现了“新感觉派小说与现代派诗歌的互动与共生”。也许更为重要的是，人们可以从中发现文学期刊研究所内含的广阔的研究空间；而如何进行文学期刊的研究，也还有许多尚待探讨的问题：或许这两个方面，都会引起更多的研究同行的关注，这也是我们所期待的。

建国以后“十七年文学的研究”，也是本刊扩大研究范围以后特别关注的。本期所发表的《论〈秦香莲〉的改编》（这是作者关于“五六十年代戏曲改革”的系列研究的一个个案）、《中学语文教材（1950—1977）中鲁迅作品的选录和解读》，都具有很大的开创性，不仅有新的史料的梳理，也包含了一些理论性的思考（例如重塑国家意识形态与对民间艺术和以鲁迅为代表的“五四”新文化传统进行改造二者间的复杂关系）。而《为农民的写作与农民的“拒绝”》一文则对人们关注的“赵树理模式的当代境遇”做出了自己的富有独创性的阐释。这几篇论文都给我们带来了一种新鲜感，同时也展示了“十七年文学研究”的广阔前景。

此外，本期所发表的《〈伍子胥〉的西方资源与创变》等论文，在研究思路与方法上也都有新的探索，也同样显示了一种创造的活力。

尽管还没有出现重量级的“大作”，但我们现代文学研究毕竟还在坚守并不断有所推进：在21世纪伊始能有这样的开局，还是令人高兴的。

2001年11月4日

# 学术研究要言之有物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3年

第1期编后记

这期刊物的文章，如果说有什么特色的话，或许可以用“言之有物”四个字来概括，即是说，每一篇文章的质量或许有所不同，但每一个作者都是以严肃认真的态度去进行探索，力图说出自己的新意，在某一方面对研究的课题有所开拓或有所推进，而力戒说大话、空话、套话，或重复别人、甚至自己说过的话。坚持这样的平实的学风，在当今的中国学术界是难能可贵的。在这里，可以举出几篇文章来证实我们编完这刊物后所获得的上述印象：《胡风的理论问题解析》所要讨论的是“胡风的文艺理论如何上升为政治问题的复杂过程”，这是众多的研究者所感到兴趣，并已经做了许多探讨的；而作者却从“现实主义与意识形态功能转换”，胡风和他的批判者在对政治理解上的分歧，胡风的“艺术与政治一元论”如何导致意识形态的美学还原等方面做出了新的分析，这里确实有作者自己的理论发现。

“四十年代文学”也是近年研究的热门课题，本期的三篇却都有新的开拓：《四十年代的诗人节及其争论》，从一个看起来很小的口子切入，却开掘出“现代中国政治文化与文学的关系”、“近代中国对民族文化英雄的呼唤”、“现代民族战争对诗人（作家）的期许及对文学的影响”这样一些重大问题，而作者最终想探讨



的是民族传统文化在40年代（甚至是现代中国）的历史命运，也许作者的这篇文章并没有完全达到自己的目的，但这样一种“以小见大”，开口小而开掘深的自觉追求是很有意义的。关于香港文学的研究一直是本刊较少关注的领域，本期所发表的关于“战时香港文学”的研究文章多少弥补了这一缺失，而作者从“‘中原’心态和本地化进程的纠结”这一角度去把握这一时期的香港文学，是能够给人以启发的。“大东亚文学”是沦陷区文学研究的一个难点，但却又是不能回避的，年轻作者张曦选择这一课题本身就显示了一种学术勇气，而更为难得的是，作者能够从学理的层面，抓住“大东亚文学”如何背离“现代文学传统”，对相关的文学现象做了有解释力的分析，从而给这一课题的研究打开了一个新的思路。

报刊研究是近年本刊关注的一个重点。本期发表的《现代报纸文艺副刊的原生态文学史图景》又有了新的尝试，作者宣称：“由现代报纸文艺副刊，我们想进入的是一个原生态的新文学生成过程，并试图回到后设文学史话语里已经消失的‘文学现场’，体贴活着的文学历史”，“这是我们研究现代报纸文艺副刊所采取的文学史立场”，这样一种“文学史立场”是别开生面的。

周氏兄弟一直吸引了众多的研究目光，在这一领域要有新的开拓有相当的难度，也极具挑战性；本期所发表的《周作人与尼采》，可以说是第一次全面论述了“周作人思想中与尼采有直接联系的几个命题”，而在此之前，大多数研究者所关注的只是尼采对鲁迅的影响，因此，本文的讨论不仅对周作人研究是一个新的发现，而且也会对鲁迅与尼采关系的研究有所启示。本文的作者也是一位年轻人，他对周作人的研究，能有这样的起点，使我们不能不对他有更多的期待。

如果说年轻一代的研究成果显示了新鲜的活力，本期所发表

的支克坚先生、范伯群先生的新作，则有力地说明我们的老一辈学者也依然没有停止自己的探索和思考。或许我们这个学科的生命力正在于此。本刊愿意为老中青三代人的富有创造性的研究提供园地，为老中青三代人的团结合作竭尽绵力。

2002年10月20日晨

## 理科文学教育的意义与困惑

——《北大理科学生作文选》序

我以极大的兴趣读了这些北大理科学生的作文。

吸引我的，有两个方面。

首先，这是大学生的作文，而不是中学生的作文。同时，这又是大学里的非中文系、非文科的学生写的作文。这正是这些作文的特殊性所在，于是也就似乎具有了某种特点与价值。这主要是，它既摆脱了中学作文的应试目的，又有别于大学中文系的职业训练，这样，学生执笔写作时，就有可能（当然不是绝对如此）较少考虑“他者（考官、老师、社会……）要求我写什么”，而是从“自己想写什么”出发，相对进入主体性的自主、自由写作的状态——在我看来，这正是写好文章的根本。而从收入本集中的作文来看，引发学生写作的内在欲望的，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作为独立的生命个体的自我表达的欲求，另一则是作为一个具有自觉的权利与责任意识 的公民对社会发言的需求。这两个方面的欲求是源于人的个体性与社会性的，因而不是不可或缺的。或许现有的作文后一方面相对显得薄弱一些，这可能是反映了当代大学生精神面貌中，更深层次的某些问题的。这也就说明，写作的问题，说到底还是一个做人的问题。我们越是强调学生写作的主体自主性，就越要注意丰富与提高学生作为健全发展的人的生命质量。只有真的人才能写出真的文章，只有大写的人，才会有

大气的文章：这虽看似老生常谈，其实是涉及我们的教育的根本的。

我们这里谈到了使学生成为健全发展的人的问题；这涉及我关心与感兴趣的另一方面的问题：为什么要在大学理科学生中进行文学阅读与写作的教育？记得几年前，我和蒋绍愚先生接受校与系领导布置的为北大理科各系开设“大一语文”课程任务时，所面临的也就是这个问题。经过这几年各位任课老师的努力，对这一问题的认识逐渐明确起来，但也仍然有疑惑之处。这在学生中的作文中也有所反映。于是，我们读到了这样的文字——

在一个温暖冬日的下午，我从各种化学元素中解脱出来，翻起一本文学作品集，看到萧红的《呼兰河传》第三章节选，就再也放不下去了。我浅浅地读着它，一种轻松，无忧无虑的感觉包围着我，陷在其中不愿脱身，直到翻到最后一页，才惊觉深夜已经来临，于是走在满天繁星下，一点凉风中，回忆那愉悦的感觉，……那一份快乐和自在，那一份童真与稚趣。

——化学系 吁晓萌

每天穿梭在寝室，图书馆，教室的“新三点一线”上，厌倦？退出？路上一瞥行路人匆匆的身影，“哦，每个人都很忙碌”，深感时间“逝者如斯夫”。少壮不努力，何颜对父母？然时光隐忍的代价换来的是什么？不是当初幻想的“科学素养”和“人文气质”，却依然是成绩单上的所谓“高分”云云。我确实厌倦了，十年的应试，接下来依然是……我敢说考试是我们这一代人鲜明的特征之一。内心真实的宁静，真正的超凡，只能在短短的语文课，几页单薄的课文和贝多芬

音乐的断章中略品一二了。

难道我厌恶理科，厌恶化学吗？当然不。只是在这里找寻不到“由加利树”，冯至描绘的月夜中那崇高的严峻的圣者般的由加利树，那每一瞬间都在生长的由加利树啊，为什么我不能望见你？是不是我矮小得被高木遮蔽了视线？还是从未抬起头，把视线从手中移向你？……

——化学系 宋 靖

这学期上得最高兴的两门课便是伊斯兰文化和现代文学。每逢周一、周三下午，我总是欣然前往，每次收获也是颇丰的，总以为一时间了解了许多东西。可到头来似乎修行自己的逸趣外并不对现实学习有什么帮助，因为热学还是那么难懂……难怪每次上完语文课我都总有种罪恶感，因为有人在努力地学着热学，计算机抑或其他，而我却迷恋距我很远的文学，有种堕落感。

——天文系 张 博

这既向往又不免有种堕落感的矛盾心理，恐怕是今天的理科学生接触文学时所共有的吧。这正是多年来我们的教育将文科与理科人为的隔绝开来的结果：学生们既从自己的实际体验中感到了这种隔绝的弊端，从而引发了文理交融的欲求，但又不能彻底摆脱长期形成的“学文就是不务正业”的观念的束缚。这使我想起了在“理科大一语文”课开场白里所说的一段话——

同学们进入大学就是要学习现代科学，掌握专业知识的，但不知道同学们是否考虑过，所谓“现代科学”在具有无可怀疑的价值的同时，也还存在着某些负面的因素。随着

现代科学的发展，专业分工越来越精密，这就导致了学科的专业化与技术化。这种专业化、技术化的学习是完全必要的，对于一个理科的学生尤其是如此：你首先得进入专业，而且专业本身就会把你带入一个你所不熟悉的新的世界。但是，如果把眼光完全局限在专业范围内，发展到极端，就会把专业的、技术的世界看作是唯一的世界、全部的世界，唯知专业不知其他，这就把自我精神天地压缩在极小的空间，知识面越来越窄，兴趣越来越单调，生活越来越枯燥，最终导致精神的平庸化与冷漠化。这种情况也最容易产生“靠技术吃饭”的观念，把专业知识和技术“功利化”了，实际上也就是将自己（掌握了专业知识的人）工具化了。人的这种精神狭窄化与自我的工具化，正是意味着人最终成了科学技术、专业知识的奴隶，这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现代科学技术病”。……看到了这样的可能出现的危险，（同学们）在初进大学、设定自己的目标时，就应该给自己提出双重的任务：既要“进入”自己选定的专业，认真学好专业知识，打下坚实的专业基础，并且以精通专业技术、做本专业的第一流的专家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另一面，又要“走出来”，不局限于自己的专业，看到专业技术世界之外，还有更广大的人生世界，在丰富、充实自己的专业知识的同时，还要丰富与充实自己的精神世界，追求自我精神的超越与自由，关心他人，特别是社会底层人民的生存与发展，从而确立更高层面的目标，也可以说是终极的目标，做一个健全发展的自由的“人”。……刚才我们曾说到现代科学技术发展的专业分工细密化的趋向，其实同时发展的是与之相反的突破专业分工的趋向，而且在下一个世纪还会有进一步的发展，人类所面临的问题将会越来越复杂，必然要求知识的综合化，各门学

科之间的贯通。因此，我们强调既“走进”又“走出”专业，这也是代表了科学技术、人类知识发展的客观要求的。

当然，要真正实现“文理交融”，是需要多方面的努力的，但可以肯定，通过“大一语文”课程，提高理科学生对文学作品的鉴赏能力与写作能力，寓人文教育于语文教育之中，是一个确实有效的措施，经过几年的实践，已经取得了初步的成果，这本《理科学生作文选》的编选与出版，也算是一个总结与检阅吧。

我们已经迈出了第一步，要做的工作还很多。首先要将“理科大一语文”课程进一步完善、提高，这是自不待言的；但真正实现文理交融的教育理想，还有另一半路要走：这就是如何对文科的学生进行现代科学教育，至今还没有找到具体可行的途径，这是我始终耿耿于怀的心事，或者说我的另一个梦。借为本书写序的机会，姑且在这里作一番呼吁：愿有志者共同为此做出新的探索与努力。

2002年5月8日夜写毕

# 追求工、理、文科的融合

## ——钱宁学术思想与教育思想概述

钱宁作为享有世界声誉的我国泥沙科学研究的先驱者、中国科学院院士、清华大学的著名教授，是一位具有深湛理论修养与开拓精神的科学家，同时也是一位有着自己的追求与丰富经验的教育家。他的学术思想与教育思想是留给后人的重要的思想资源与精神财富，亟待深入总结与研究。本文仅根据先生的部分论述与他的同行、学生的回忆，作一个简要的概述。

### 一、注重理论、试验和现场查勘三结合的治学道路

国际泥沙研究培训中心顾问委员会主席、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前院长、钱宁的挚友林秉南教授在《学者、工程师、组织者的钱宁》一文中指出：“他治学注重理论、试验和现场查勘三结合”，这是对钱宁治学道路与学术、教育思想的一个重要概括。

钱宁这一治学道路的形成，自有一个过程。首先是受到了他的导师、国际泥沙研究的权威 H. A. 爱因斯坦教授的影响。钱宁的同学、黄河水利委员会前总工程师龙毓骞先生在《爱因斯坦和钱宁》一文中，这样回忆说：“五十年代初期爱因斯坦教授在从事教学之余，还经常受聘担任一些实际工程的咨询工作。其中加利福尼亚州、工程师兵团密苏里分团的一些咨询活动，钱宁都曾参与。……1971 年在美国举行的纪念爱因斯坦教授退休的一次集会



的论文集中，有一篇爱因斯坦教授发表的即席讲话。在这个谈话中，他指出应注意实验室工作和野外研究的结合，应注意将河流作为一个整体来考虑，以研究各种工程和措施对环境的影响。这一席谈话反映了爱因斯坦教授的学术思想作风和独特研究道路。钱宁不仅在学业上师承爱因斯坦，而且在学术思想、作风、道路上深受爱因斯坦的影响。他十分重视对自然现象物理图形的理解和描述，认为这是任何一个理论的必不可少的基础；他十分重视原型观测和调查研究，善于从实测资料进行去伪存真，由表及里，由此及彼的分析；他十分重视理论联系实际，为解决我国不少河流如黄河、长江、钱塘江、永定河、辽河、山西省河流的泥沙问题付出了辛勤的劳动；他十分重视与各部门协作，从规划设计到水文、地理、水土保持等实验研究部门都有他亲密的战友。到野外去，到实际工程去，这是爱因斯坦教授的名言，也是钱宁的座右铭。”爱因斯坦教授将钱宁视为自己最好的学生，这绝不是偶然的。

钱宁于1955年告别爱因斯坦回到了祖国，从1958年开始，亲自参加了治理黄河的实践。他走出书斋，和成千上万的人一起奋战在黄河这个大实验场上，对于他来说，这是一个新的尝试，新的世界，对他的老师爱因斯坦所提出的“实验室工作和野外研究结合”的道路也就有了新的认识。他经常对身边的年轻人说：“中国有那么多的泥沙问题，为我们提供了广阔的用武之地；中国有那么多众多的、各种类型的河流，而且在不少的多沙河流上修建了水库，发生着剧烈而迅速的河床演变，为我们更快、更全面地掌握河床演变规律提供了客观基础；中国重视野外观测，像中国这样积累丰富、完整的泥沙观测资料在世界上还没有。”（参看万兆惠：《他把自己的一生献给了泥沙事业》）因此，在他看来，泥沙理论研究与治河实践相结合，是从中国的国情出发，发

展中国自己的泥沙研究的一条重要的途径。

钱宁在他的长期研究与实践中形成的这一治学之路，主要包括以下要点：

1. 钱宁在他晚年所写的《我与黄河泥沙研究》一文中，在“回顾四十走过的道路”、总结经验时，首先提出的是：“重大生产任务是推动科学研究的强大动力，我们一定要自觉地引导科学研究更好地与当前的治黄实践相结合”。仔细考察钱宁自身研究的发展，就可以发现，他的早期著作都是为解决治理黄河中所提出的问题，对实践经验进行总结，如《黄河下游冲淤特性的总结》、《黄河下游游荡特性及成因的分析》、《黄河下游险情分析》、《三门峡水库修建以后黄河下游河床演变及河道整治》等，这些研究不但对治黄实践直接提供理论指导，而且使钱宁积累了大量的对黄河的感性与理性认识。于是，钱宁又不失时机地进行理论的总结与提升，写出了《黄河下游河床演变》一书，进一步提供了黄河下游河道自然演变的规律性的认识，从而在更高的层次上，为防洪治河提供了理论的依据与指导，提高了广大治黄人员的理论素质，培养了一支队伍；而钱宁则从中不断深化自己的认识，在理论上有了新的发现和创造，于是又有了《泥沙动力学》、《河床演变学》的研究与写作。这两部著作不但吸取与升华了前述治黄工作的理论成果，而且继承与发展了爱因斯坦的泥沙运动力学的理论体系，在河流动力学与地貌学的结合上进行了新的探讨，并广泛吸纳了国际学术研究的最新成果，从而达到了一个新的理论高度，并成为国际泥沙研究中具有一定权威性的著作。而在他亲自指导下所进行的由研究黄河泥沙运动的特殊规律引发出来的高含沙水流运动规律的研究，更是在国际上取得领先地位，为世界泥沙研究做出了特殊的贡献。可以看出，钱宁作为一位立志“为祖国服务，为人类服务”的具有使命感的科学家，关注与

解决本国河流的泥沙问题，是他天生的职责，他经常对身边的同志们说：“作为一个科学家，不仅要能提出问题，还要能解决问题、要学会用现有的知识去解决实践中的问题，这是我们的责任。”（张仁等：《钱宁同志指导我们进行科学研究》）因此，他的研究必然是从本国的河流（例如黄河）的治理实践中所提出的问题出发的，也即是有明确的“问题意识”的，这构成了他的研究的基本动力；他的目的不仅是要为本国的治河实践提供理论指导与依据，而且要由对中国河流泥沙运动的规律的认识，引发与升华出对泥沙运动的普遍规律的认识，从而对全球治河工作提供理论依据，人们因此赞扬“他的贡献将永远是人类致力于处理复杂的自然现象的业绩记录的一部分”（美国地理学教授华尔曼）。钱宁在他的研究中，正确地处理了理论研究与生产实践的关系、特殊规律与普遍规律的关系、学术研究的民族性与人类性（全球性）的关系，是能够给后人以启发的。同时，钱宁身上所体现出的工程师与学者的完美结合，更是令人称羨——这不仅显示了一种更为合理的知识结构，同时也是一种精神的境界。

2. 注重实测资料分析，物理模型试验与理论计算三者的结合。钱宁在前述《我与黄河泥沙研究》一文里，这样指出：“应该继续坚持主要依靠实测资料进行分析，作出结论的道路，这是我们多年来摸索出来的一条重要经验。”他的学生们也是这样回忆钱宁的多年教诲的：“他一再强调不要把理论看成是纯粹的数学推导，从客观事物得出的规律，即使没有什么公式也是理论。他要求我们在实验中要注意观察，善于抓住一些有启迪性的现象，进而追索事物的本质。他一再鼓励我们做一些经过深思熟虑、仔细安排的小试验，通过一个试验，弄清一个问题。不要不了解前人的工作、不明确试验的目的，就去兴师动众地做一些大规模的试验，甚至重复前人的工作。他强调在试验安排中，要把所研究的

因素突出出来，甚至加以必要的夸张。他经常教育大家不要轻视实际工作中的一些经验和方法，虽然不应对此满足，但对待复杂的泥沙问题，包括一些实际工程问题，目前还不能不用这种方法去处理。”（万兆惠：《他把自己的一生献给了泥沙事业》）他的同事也这样回忆说：“在指导同志们进行模型试验时，他总是要求大家首先要对试验河段的天然情况有一个透彻的了解。他认为只有认真进行现场踏勘，对河流的天然演变有了清楚的了解，才能正确地判断修建水库后可能发生的变化，使模型试验研究具有一个良好的基础”；他强调，“通过实验的方法，把自然界的物理本质解释清楚，也是理论。在工程实际问题中，影响因素是很多的，如果全部考虑，则数学推导将会过分繁琐，以致无法求解和应用。此时，就必须正确判断其中起重要作用的因素，而忽略次要的因素，这是解决问题的前提。在这一过程中，清晰的物理概念是正确判断的基础”（张仁等：《钱宁同志指导我们进行科学研究》）。

钱宁在《黄河中游粗沙来源区的研究》一文中，生动地回忆了这一被认为是“治黄研究的重要突破”的研究工作的全过程。首先，课题产生的最初“灵感”就来自一次多少有些偶然的野外观察：1959年底有人邀请钱宁去看看花园口枢纽施工中挖掘出来的唐墓，无意中发现历史上淤积下来的泥沙比黄河河床床面的泥沙粗得多。这一现象引起了钱宁的极大注意，随即广泛搜集各处河床钻孔的资料，证实了他的这一观察，进而产生了“粗泥沙”的概念，并通过50年代的水文资料的初步统计分析，提出了“在黄河中游黄土高原是否存在比较集中的粗泥沙产区，可作为水土保持工作重点”的最初设想（假设）。这一设想为揭示黄河下游泥沙淤积的根源，从而寻找治理办法提供了新的可能性。钱宁敏感意识到这将有可能是决定治黄全局的一次攻坚战，立即向

有关部门建议，调集了水文站网工作人员重新分析了以往的测流取沙资料，绘制出黄河中游的全沙和粗泥沙输沙模数等值线图。他自己又带领一批年轻人亲自查勘黄河中游黄土地地区粗沙来源区，行程约2200里。通过资料分析和现场调查，明确了为害黄河下游的主要是粗泥沙，查清了黄河中游确实存在粗泥沙比较集中的产沙区。在取得这一初步成果后，钱宁立即提出“整个研究工作的链条还有一个中间环节没有扣起来”，即“淤积在黄河下游的泥沙，是否确乎来自粗泥沙的产沙区？”并以此作为研究工作的新的主攻方向。于是，又组织力量对三门峡建库十九年内黄河下游洪峰资料与黄河中游水文站网大量资料进行分析，最终证实黄河下游的淤泥确实来自中游的粗泥沙的集中产区。钱宁又不失时机地亲自查勘黄土高原的水土流失区，并得出结论：在黄土高原43万平方公里的水土流失区中，有百分之八十的粗泥沙来自10万平方公里，其中5平方公里的产沙量就占到粗泥沙总量的百分之五十。这5至10平方公里，应作为黄河水土保持工作的重点。——钱宁亲自领导的持续二十年的《黄河中游粗沙来源区的研究》，是能够集中体现钱宁研究工作的特点与风格的。有些问题我们将在下文展开论述，这里所要强调的是，他在整个研究工作中，无论是问题的发现、课题的提出、研究逐步深入的每一个阶段，都始终抓住实地查勘与实测资料分析的环节。这表现了一种尊重实际，尊重基层工作者的劳动，重视第一手原始资料，一切从实际出发的科学求实精神。

即使是高含沙水流研究这样的基础性研究，钱宁也十分重视野外观测与实测资料的分析。早在60年代，这一研究的起始阶段，钱宁即组织力量在渭河南河川水文站、无定河丁家沟水文站进行连续两年的观测，取得了被钱宁称作是“迄今为止最完备的一套野外河道资料”，与此同时，黄科所也进行了高含沙水流水槽

试验。通过对实测资料与模型试验结果的分析，产生了关于高含沙水流研究的最初认识与基本思路。以后的研究虽然主要在试验室内进行，但钱宁仍始终强调尽可能用野外资料验证实验室研究成果。

钱宁这一重视实践基础的思想也贯穿于他的教育工作中。他在清华的第一个研究生的论文就是结合生产实际的“黄土丘陵沟壑区产流产沙过程的研究”。这是他的学生终生难忘的记忆：“在搜集、分析、整理资料的基础上，他又安排我到西北黄土高原实地勘察，增加感性认识，掌握第一手资料。当时他已重病在身，不能亲赴现场考察，但他指导我制定了详细的计划，从踏勘路线、搜集资料的范围到具体时间安排都作了认真的考虑。并逐一介绍了我所去的地方的详细情况，甚至在哪个径流场的哪个部位取土样，在哪个单位可作分析等都作了具体指导。他还告诫我一定要向具体工作的同志虚心学习，是他们为了真实可靠的原始资料，长年生活在荒僻的深山峡谷之中，经常顶风冒雪地工作，正是他们的艰苦劳动为我们积累了大量的宝贵资料。他还要我向曾和他一起工作过的同志问好。语重心长的话语，表达了他对基层工作的同志的一片深情。临行前，他又再次嘱咐我要带上雨伞，管好钱粮衣物，路上注意安全。此情此景，犹如当年父母送我离家远行。”（王兴奎的回忆）——从这朴实而感人的叙述里可以看到，钱宁对学生不仅是进行研究方法的指导，更是言传身教着一种精神，引导学生进入一种境界：这正是钱宁教育思想的本质。

而钱宁对基层实际工作者的尊重，也许还包含着另一种深意。1985年夏天，重病中的钱宁与黄委会水文局的同志讨论有关研究课题时，黄委会的同志谈到“我们的做法很粗，只能勾画出黄河减沙的轮廓”。钱宁说：“在科学研究中，会用细的方法难得，会用粗的方法也难得。在工程规划中，用粗的方法分析，能

够较好的概括全貌，从宏观方面看出问题，这对你们工程技术人员是可贵的；用细的方法分析，能够较好地揭示事物的机理，这是博士生干的事，不是你们的优势。”钱宁关于科学研究中的“粗”与“细”的这一番议论是意味深长的；照我们的理解，可能包含这样一层意思：面对复杂的自然现象，既应该有一种“概括全貌”的宏观的整体把握，也要有“揭示事物机理”精细分析，在两者的互动中逐渐深化我们的认识。钱宁显然期待着在实际工作者与学院里的学者、学生的优势互补中，达到“粗细结合互动”的理想研究境界，而他本人前述“集工程师与学者于一身”的特质，正体现了两者的完美结合，这是钱宁“人才难得”之处。

3. 钱宁在《我与黄河泥沙研究》一文中，强调“一定的基础研究是必不可少的，不然我们就会缺乏理论上的储备，不能使工作向更高层次发展。在这里，领导的高瞻远瞩和必要的支持是至关重要的”。重视基本理论的基础研究与教学，这是钱宁学术、教育思想中的又一个要点。

人们在回顾我国高含沙水流研究的发展历史时，都会提到在研究的启动阶段，钱宁即在水科院河渠所成立的理论组中，专门安排一位化学系毕业的研究人员研究浑水流变性质，为开展高含沙水流研究进行理论与技术准备：这一前瞻性的科研部署，是充分显示了钱宁作为科研组织者的战略眼光的，但却不能为人们所理解，在“批判理论风”的实用主义思潮影响下，理论组竟被解散，“浑水流变性质”的课题也被强行“下马”，钱宁怒不可遏，激动中将一盏台灯碰倒，这件事给有关人员留下了终生难忘的印象（参看周永洽：《难忘的三年》）。在钱宁晚年，当发现又出现了“片面强调实用，而忽略与削弱了基本理论”的倾向时，他忧心如焚，在所写的《教育改革建议书》中，竭力呼吁“加强学生

的基础理论教学”（见《钱宁同志生平》）。

在钱宁的研究图景中，理论储备是一个重要的环节，他总是能够敏锐地抓住理论研究的新的生长点，进行基本理论的开拓，反过来指导、推动实践的发展。一位研究者这样深情地回忆：“在1964年，我初次提出用概率论和力学相结合的途径研究泥沙运动的设想时，就得到了钱先生的充分肯定。1974年，我们在泥沙运动统计理论研究方面的主要成果已经基本完成，但学术界还有不同意见，钱先生在听取了我的口头汇报以后，立即敏锐地抓住此项研究已经显示的好的苗头予以赞扬”，“我深知，在尚处于动乱中的1974年，钱先生以当时的身份支持这样一项单纯的理论研究，是需要一种彻底的唯物主义精神的。我对钱先生油然而生敬意”。在以后的十数年中，钱宁一直关怀着这方面的研究，总在关键时刻及时给予帮助。直到1985年重病缠身，还提出开展三峡水库二维数学模型的研究的建议。

钱宁在对研究生的教育中，也十分注意基本理论素质的培养与提高。学生回忆中，特别提到他“在传授理论知识的同时，还要讲到创立者的思维方式，所采用的方法及理论上存在的问题。这对于一个从学习为主转到以研究为主的研究生来说，无疑是最需要培养的素质”（见王兆印的回忆）。这里提到了思维方式的训练，而钱宁本人给他的学生与年轻同事印象最深的也正是他的理论思维的能力。很多人都在回忆文章里谈到“大家都很佩服他综合、对比的能力。泥沙问题由于本身复杂，有许多问题上都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钱先生十分善于从中抓住问题的关键，从众多的不同形式中找到其本质的共同点”（万兆惠：《他把自己的一生献给了泥沙事业》）。在这些地方，确实是能显示钱宁理论家的特色的。



## 二、走跨学科的道路发展泥沙科学的思想

林秉南教授在《学者、工程师、组织者的钱宁》一文中，谈到“约在1950年他还未念完博士学位便在给我的信中表达了要走跨学科道路发展泥沙科学的思想。他提出不应只从水利学或流体力学的观点出发去研究泥沙，而应结合水文、地理、地质、地貌等学科去研究泥沙和河流”。钱宁早在50年代，在他的研究生涯的起点上，即已做出“推动边缘学科研究”这一战略选择，确实显示了他的非凡的学术眼光；这样的跨学科研究的努力贯彻始终，就形成了钱宁学术、教育思想和他的研究工作的一个鲜明特色。

人们将永远记住这位开拓者与先驱者的历史贡献。在一篇由中科院、国家计委地理研究所沈玉昌等研究员撰写的题为《走地理水利共同协作的道路》的文章里这样写道：“钱先生以其学术上敏锐的洞察力和远见，多次向我们指出，研究河床演变应当把水力学、河流动力学和河流地貌学三方面互相结合起来，同时发挥不同学科的长处，彼此尊重各学科自身的特点。他认为，地理学是一门综合性、系统性、逻辑性都很强的学科，在水利界有许多公式不能讲清的问题，地理学家以其完整的系统逻辑性就可以阐释清楚。因此，他一再强调，在协作中地理工作者应该发挥自己的优势，不要简单地重复水利科学的一套，否则会适得其反。钱先生的这些谈话为河流地貌学的研究指明了方向。应该说，河流地貌学之所以能从过去比较侧重研究河谷发展到也研究河床；从侧重研究形态到研究它的成因与过程；从侧重研究河流的历史发展过程到结合研究现代动力过程，总之，能发展成为地貌学中一个独立的分支，是和钱先生的教导与帮助分不开的”；“水利界对河流地貌这门学科原来比较陌生，为了改变这种状态，钱先生不

遗余力地做了大量介绍和推广工作”，“水利工作者要学一点地理知识这一思想始终贯穿于钱先生的言行之中，就是到了自己生命最危险的时刻，他仍不忘告诉他身边的年轻同志要设法读一点有关河流地貌的书籍”。

当然，最能体现钱宁这一学术追求的，是他的皇皇巨作《河床演变学》，学术界公认，它“为我国的河流动力学与地貌学结合研究河床演变的开拓起了重要作用”，已经成为水利学界与地貌学界的经典著作。

钱宁已经完成的著作，正如一位同行专家所说，“恐怕只是部分地实现了他的愿望，有些甚至已经成熟的构思，都还没有来得及写成文字，可能还有更多的东西仍处于构思阶段”。他的一位学生就谈到，钱宁在一次演讲中，曾提出他的新的设想，将泥沙运动力学的理论与地质学中的沉积学相结合，发展一个新的学科——动力沉积学，并表示自己今后将致力于这一学科的研究：这显然是钱宁开拓科学发展增长点、推动边缘学科研究的又一个新的战略目标。而这样目标，在钱宁胸中的研究蓝图里很可能不止一两个：这是一个极富创造力与想象力的科学家，他的过早去世，留下了永远的遗憾。

### 三、追求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人文科学的结合，工、理、文科的交融

林秉南教授在回忆钱宁的文章中说：“他不但在工程技术方面有很高的造诣，还喜爱文学，他文笔非常流畅，表达能力很强，构思敏捷而逻辑严密。他讲课时口若悬河，出口成章。听他演讲，可以说是一种享受。”他的同事也这样回忆：“我们很快就发现了有共同的爱好——都热爱古典严肃音乐。他的趣味很高，理

解也深。在言语中我还发现他热爱祖国的河山，常说立志登五岳。”由此引发出了这样一番议论：“我常想，一个科学家，同时也是一个人，不仅应该有严肃认真、孜孜不倦的探索精神，而且也要懂得生活，热爱生活，能够享受人类创造的精神果实，充实自己的内心世界，造就高尚的道德和情操。钱宁就是这样的科学家，他在为实现自己的理想刻苦钻研时，也充分地享受着生命的欢乐。他对祖国高山流水，对大自然的一草一木，都怀有无限深情。他研究泥沙，一生与浑水打交道，但作为一个人却如清澈的泉水，涓涓不息，而又一泻千里，洗涤着人们的心灵。”（沈崇刚：《清澈如泉水的人》）

这里，所讨论的，不仅是钱宁的知识结构——他早年是立志并准备做一个文学家的，以后他又走上了科学研究的道路，但他对文学与音乐的终生爱好，他的人文科学的修养，也成为他作为科学家的一个独特优势；更重要的是钱宁的精神素质：这是一位具有人文关怀，充满内在浪漫激情的自然科学家。

其实，在我们前文中引述的钱宁关于“黄河中游粗沙来源区的研究”的回顾里，已经不难发现，课题的触发本身即有灵感、顿悟的因素；最初设想，也即科学假设的提出，不仅仰赖逻辑推理的作用，也要借助一定程度的想象。而那些发展边缘学科的设计，那些前人不曾想过的开拓性课题、研究思路提出，不仅需要丰厚、广阔的知识积累，也同样显示了一种想象力。读着他的同事、学生写的回忆文章，展现在人们面前的钱宁，既具有大将风度，高瞻远瞩，指挥若定，思维敏捷，富于想象力，擅长宏观把握，又有精细的工作作风，事必躬亲，周密细致，善作准确的微观分析，他的学术风格完全可以用一个文学术语来概括：达到了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的结合。他在科学领域里，进入了一种自由驰骋，充裕自如的境地；他的治学与为人，都充满了一股大气。

这使人感到，钱宁的具体学术工作后人可以继承与超越，而他的学术境界与精神境界却很难企及，这里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钱宁身上所体现的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的交融，正是今天的许多研究者所欠缺的。

对于钱宁来说，工、理、文科的交融，不仅是一个现代科学家应有的素质，而且也是泥沙研究学科发展的内在要求。人们如果有机会读到钱宁在实地考察中所写的日记，就不难发现，钱宁所记录的不仅是河床地貌，更包括了自然风光，历史社会的人文环境，也就是说，他关注的不仅是水情、沙情，更是民情与国情。这乃是因为单纯的泥沙问题固然只是一种自然现象，但如果要进一步追溯泥沙淤积的原因与历史，就不能不考虑人的因素与社会的因素；而泥沙、河流的整治，就不仅是水利工程，更是一个社会工程。因此，当他在生命的最后一刻，以更长远的眼光，更根本地来思虑他一生所从事的治黄和泥沙研究事业时，他的思考就必然要超出纯自然科学的范围。他参与起草了《关于加速根治黄河的意见》，强调“对水土保持和支流治理的减沙作用不能期望短期见效，在估计上要留有余地”。在钱宁最后几年所发表的文章、内部通信、意见书里，他一再表达了要因地制宜、因势利导地开展水土保持工作，否则就会造成盲目性的思想。他留给后人的最后一个告诫是：“我是一个水土保持工作的积极支持者，但在战略决策上，我认为对困难要有足够的估计。至于根据一时一地的资料，推断黄河泥沙可以通过水土保持在较短时间内大幅度减少的结论，更是应该慎重为好。”这是钱宁那一代人用生命与血汗换来的历史经验：几十年来因对黄河泥沙问题的严重性估计不足，盲目乐观，付出的代价实在是太大了。而这些问题显然不是在纯自然科学范围内所能解决的。

因此，钱宁晚年在思考治黄研究道路的未来发展时，就必然

要寻求某种新的突破。在他的一篇文章和写给一个同志的信中透露了部分消息。他写道：“过去，在水土保持工作中长期存在治坡与治沟之争。现在表面上虽统一为‘坡沟兼治’，但据我多次在黄河中游查勘所见，甘肃和陕西的做法显然是不一样的。前者以治坡为主，后者以治沟为主，这和两个地区自然及社会经济条件的不同有很大关系。水土保持工作究竟在多大程度上要受自然地理条件和社会经济条件的制约，在这些制约不可避免的情况下，我们又应如何因势利导地开展工作的，这些都是亟待探明的问题。不然，我们的水土保持规划就会有一定的盲目性。”他表示：“我对这个问题有很大的兴趣，也有志于从事这项工作，可惜因为身体关系，我已经力不从心了。”这里，“社会经济条件”和“自然地理条件”一起引人注目进入了钱宁的研究视野；可以想见，在钱宁选定的下一个研究目标中，将出现社会科学向自然科学的渗透，出现“认识世界（黄河及黄河流域）”与“改造世界（黄河与黄河流域）”之间更高层次的统一与结合。

1985年，钱宁用颤抖的手写下了《“黄学”研究前景广阔》一文。他写道：“黄河流域是中华民族的摇篮，在这里，孕育形成了世界上最光辉灿烂的文化”，“长期以来黄河又成了中国人民的灾难”，“世界上任何一条河流也没有像黄河那样保存有如此浩瀚的历史背景材料，这是列祖列宗传给我们的一份珍贵的遗产”，“要充分利用近代科学的知识”来进行总结，并把它“提高到哲学的高度”。他由此提出了创立“黄河学”的理想——

在人文科学的领域里，由于曹雪芹的不朽名著《红楼梦》，激起了几代人的兴趣，出现了大量有关作者生平考据及艺术价值剖析的论著，形成了一门脍炙人口的“红学”。如果在自然科学领域里，大家都来研究黄河，形成一门“黄学”，

从此“红学”“黄学”互相媲美。今天提出这样的希望，也许还不是没有一点基础吧。

这是钱宁心中为黄河研究绘制的蓝图里的神来之笔。他在黄河及黄河研究里，发现了浓郁的诗意、深厚的文化；他所设想的“黄学”研究，必定是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人文科学的融合。而他的“‘红学’与‘黄学’互相媲美”的构想，更是把他内在的诗情与想象力发挥到了极致。钱宁一生酷爱自然科学与文学，尤其视黄河为生命，他对《红楼梦》的迷恋也是少有的。在他生命垂危之际，终将“黄学”与“红学”沟通，表现了对人生的与学术的更高境界的追求。他的学术与生命都得到了升华。

钱宁也因此为后来者提出了一个很高的前瞻性目标——这文、理、工科的融通与综合，将是新世纪学术发展的一个趋势。

#### 四、博采众长，创造有中国特色的泥沙学派

钱宁的学生在回忆他时，总要提到“钱先生是一位学贯中西、胸中有一幅完整的世界范围泥沙研究工作图景的科学家。他自始即认识到必须博采众长，尔后才能创造有中国特色的泥沙学派，这样既能解决中国的泥沙问题（在他心目中首先是黄河问题），又能使中国的泥沙研究跻身于世界先进行列”（周志德：《钱宁与国际泥沙研究》）。——这是对钱宁学术思想的又一个重要概括。

众所周知，钱宁是 H. A. 爱因斯坦的学生，是公认的爱因斯坦学派的继承人之一。但正如丁联臻教授所说，他“师承爱因斯坦”，又“十分重视博采众长，融会贯通”（《忆钱宁学术研究二三事》）。人们回忆说，前苏联维列堪诺夫、英国拜格诺、丹麦英格隆、加拿大雅林等世界著名的泥沙研究的专家的理论都曾引起钱

宁的强烈兴趣，并有所吸取；他对各国学者的研究成果无不悉心收集，所藏泥沙文献卡片之丰为国内所少有；他更注意及时阅读刚出版的国内外期刊，从中获取最新的学术成果与信息，不管是泥沙领域里的哪一个问题，只要请教他，他总能向你提供一整套完整的文献目录。这是日积月累、长期努力的结果。也正如丁联臻先生所说，“由于他汇集各家所长，在学术成就上达到了新的高度，受到了各国学者的普遍尊敬。钱先生在《泥沙运动力学》一书中，既肯定了爱因斯坦理论体系的优点，又明确指出哪些有待进一步完善的地方”。人们因此认为，钱宁这部巨著“荟萃了当今世界具有代表性的名家理论”，“反映了他不囿于一家理论、博采众长的学术风格”（周志德：《钱宁与国家泥沙研究》）。

但钱宁本人也许更为关注如何把爱因斯坦的泥沙运动理论与中国的实际的泥沙问题（首先是黄河的泥沙问题）结合起来；如一位同行所说：“（他）深深感到，作为一个泥沙工作者，不仅有将国外先进的泥沙运动理论介绍到国内的义务，更有根据我国的特点和需要发展具有我国特色的自己的泥沙理论的责任”（费祥瑞等：《高含沙水流研究的先驱》）。他一再地对周围的年轻人说，“有着黄河这样河流的中国，理应在泥沙研究领域里走在世界的前列”（万兆惠：《他把自己的一生献给了泥沙事业》）。他因此告诫人们，既不要盲目自大，也不必妄自菲薄，“国际学术舞台一方面是交流讨论，一方面也是实力显示与竞争。中国要提高国际声望，不受人鄙视，必须要靠自己的实力。实力不是抽象的，是要别人承认的，是各个学科顽强努力的结果”。只要联系充满屈辱记载的中国近代科学史，就不难理解钱宁这番肺腑之言的分量；人们可以从中感受到钱宁那一代老知识分子身上的民族正气和自尊自重的精神力量。钱宁当然不是狭隘的民族主义者，“为人类服务”是他的基本信念；但他坚信，只有充分利用中国得天独厚的

自然条件，进行独立的理论创造，才能对国际泥沙研究，对人类科学的发展做出自己的贡献。高含沙水流研究即是完整地体现了他的“走自己的路，发展自己的理论”的战略思想。黄河上的高含沙水流是其他国家与地区所没有的，因而也是未曾被研究过的；钱宁和他的学生、同事，正是通过研究黄河泥沙的特殊规律进一步阐明了泥沙运动的一般规律，通过研究黄河典型游荡性河道特性，推动了一般性河道演变规律的研究。在中国召开的第一次高含沙水流国际研讨会上，与会者一致认为，中国学者的研究，在这一领域居于领先地位，对国际泥沙研究是一个重要的贡献。

为了不失时机地将中国的泥沙研究推向国际学术舞台，钱宁在中国改革开放伊始，即积极倡导在中国成立国际泥沙研究培训中心。他激励中国的研究者：“中国有个大的黄土高原，有世界泥沙最多的黄河，更重要的是中国有这样一支有作为的泥沙研究队伍和一大批研究成果，在中国成立国际泥沙研究、培训中心，我们是当之无愧的。”中国泥沙研究界和他的杰出代表钱宁，就这样从黄河走向了世界。国家学术界把钱宁看作是“世界泥沙研究领域内一位有声望的科学家和伟大的指导者”（日本中央大学水利实验室主任林泰造教授）。这荣誉也是属于中国泥沙界的。而这一事实给予人们的启示也许是更为重要的。

## 五、培养一支队伍

1955年，钱宁冲破重重阻力回到祖国时，即立下两个宏愿：要建设世界第一流的泥沙研究室，要培养一支高水平的泥沙研究队伍。如林秉南先生在回忆中所说，钱宁是十分强调人才在研究单位中的重要性的。对于钱宁来说，培养泥沙研究人才是他的天职——人们永远记得，1964、1978、1984年钱宁三次组织全国泥



沙培训班，为水利部门培养了大批从事泥沙工作的骨干，钱宁为培训班编写的讲义，即使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也在科技人员和工程技术人员中广泛流传；在调入清华大学任教后，钱宁更是为培养高级研究人员耗尽心血。通过不同途径受过钱宁影响的“学生”几乎遍布各水利部门。这也许是更能体现钱宁的思想与事业的生命力的。在钱宁身上，体现了教育家与科学家的完美统一。这同样也是显示了一种战略的眼光。一位中年研究者这样回忆钱宁对他的“最后教诲”：“要从长远考虑，要重视对青年同志的培养，这样已经开展的工作才能持续不断地发展下去，才能后继有人。”（韩其为：《钱先生关心中青年成长》）

后来者将永远记住，也绝不会辜负钱宁的瞩望。

2000年4月17日写毕



## 第二辑

### 精神散步

最近我也在反省自己的鲁迅观：或许我们在强调鲁迅的怀疑主义，他的精神上的沉重面的时候，对他的理想主义的生命的亮色注意得不够；我们在突出他的批判的尖锐、激烈、不留情面的时候，对他精神气质中的宽厚的一面有所忽略。而这种亮色与宽厚更可能是构成他的生命的底气的东西。



## 岁末谈读书（二章）

### 一、我想读……

1998年年末，北大中文系学生会组织新年联欢活动，其中一个节目是老师向学生推荐好书。我因此写了以下一段话——

我不知道该向同学们推荐什么书；我只能告诉大家自己想读什么——说“想读”，是因为我现在竟没有时间读书。

我想读童话，比如将少年时代最为迷恋的安徒生童话重读一遍。

因为在这假冒伪劣充斥一切的时代，我想到《人鱼姑娘》、《坚定的锡兵》那里去寻找真、善、美。

在这越来越复杂的世界，我想读一些简单的文字。

我还想读法布尔的《昆虫记》，这是鲁迅、周作人当年喜欢的书。

处于世纪之交的我，在看够了人间的悲喜剧以后，想知道人类的“远亲”——昆虫界的消息。

而且我预感到，或者说我希望，在下一个世纪，人与人将和睦相处，人与自然之间也要进行亲切的对话。

1998年12月27日晨写

## 二、留下柔软的感觉

今天早晨，格外安静。

老伴进城去了，我一人在家。

刚打扫完房间，心里舒畅得很。

突然想写点什么。

坐在电脑面前，却又停下来：写什么呢？

心里有一种难以述说的柔软的感觉。想起读过的那本书，这种感觉就是那以后留下的，已经多日了，像潜伏在地下的泉水，缓缓流泻……

这是陈琼芝写的《生命之华：巴金》，一本朴素的书，一如它的传主一样朴素。作者也以平常心，写着她知道的巴金，她看到的巴金，她感觉到的巴金。

于是我们读者也知道了、看到了，特别是感觉到了巴金。

在书的结尾，作者写了她的评价——全书也仅有这一句：“这位世纪老人，用他的全部作品塑造了一个自我形象，那是一株挺拔的春意盎然的生命之树，枝头缀满了他矢志求索的，用道德、无私心开出的生命之花。多么美丽灿烂的生命之花！”

合上书，所讲述的一切都忘记了；朦胧的感觉中，一朵蓝色的小花在风中摇曳……

这生命是单纯的——在污泥里滚过、血水中泡过以后，依然明净如赤子。

这生命是宁静的——在被命运搓揉、玩弄，历了戏剧性的大起大落以后，终于趋归于此。

这生命是坚韧的——无论有过怎样的磨难与曲折，仍然坚守着自己的理想与追求：“我愿意每张嘴都有面包，每个家都有住宅，每个小孩都受教育，每个人的智慧都有机会发展。”

我们曾有过鲁迅那样的“灵魂的荒凉与粗糙”，这是“转辗于风沙中的瘢痕”——是这个多灾多难的世纪留给我们的遗产，我们因此而珍爱它们。

现在，我们在巴金这里又看到了，尽管瘢痕依在，但灵魂的硬壳下，完整地保留着柔软的心。——这也是世纪遗产。我们因此而被感动了。

1998年12月30日写于燕北园

## 回到常识

我们已经是过来人了：年轻时也是把秃头的老人看作是“智者”，希望从他们的口里、笔下听到、看到充满智慧的格言，抄录在小本本上，自我欣赏或炫耀于小伙伴。想不到如今自己毛发稀落、两鬓斑白，黄伟经先生来信要求为读者写点“智言”时，却只能交白卷了。但黄先生仍不肯放过，再三吩咐，非完卷不可。无奈之中，就想到姑且发一点议论：对于“智言”，不可全信，也不可全不信。

这其实也是人生经验之谈：我们这代人一辈子做了很多蠢事，吃了不少亏，原因之一就是太热衷于豪言壮语，而忘记了常识。比如说，“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没有做不到的事，只有想不到的事”——这话说得多有气魄，而且似乎颇富哲理，也应算是“智言”吧。但我们——当时（1958年）的年轻人相信了，全国的知识分子、工人、农民都相信了，并且照着去办，搞什么“大跃进”，要“向地球开战”——这是大诗人郭沫若的名句，大概也是“智言”。结果呢，就因为违背了常识，终于受到了惩罚，而且是全民族的：整个国家弄到没有饭吃的地步，死了上千万人。妄信“智言”会家破人亡，这在今天的年轻人是不可想象、无法理解的；但却是20世纪中国的历史真实。

当然也有真正的“至理名言”。我始终牢记而不敢忘的，是鲁迅的一句话：“我们目下的当务之急，是：一要生存，二要温饱，



三要发展。”（《华盖集·忽然想到之六》）这里说的都是常识：“一要生存”——人的生命最宝贵、最重要，我们搞改革、搞建设，都是“要人活”的；因此不要因为中国人多，就不把中国人的生命当回事儿，甚至打着某种“大义”的旗帜号召人们去死。“二要温饱”——物质第一，民以食为天，吃饭最重要，搞改革、搞建设的目的就是要让“每张嘴（而不是少数人的嘴）都有面包，每个家（而不是少数人的家）都有住宅”；因此不要自己吃饱了（甚至是过度的饱了），却要求别人（例如年轻人、知识分子）“安贫乐道”。“三要发展”——人既是又不是动物，温饱之外还要有精神的发展，先驱者的理想除了面包与住宅，还希望“每个小孩都受教育，每个人的智慧都有机会发展”；因此不要以为“物质的发展就是一切”，如果以精神的沦丧为代价去获得富裕，那将造成新的民族大悲剧。鲁迅说的全是大实话，没有什么深奥的、故弄玄虚的东西；但在我看来，我们这一个世纪的奋斗目标都包括在里头了，恐怕到下一个世纪也还是我们民族的当务之急。我所担心的正是人们老喜欢追求什么宏伟目标，而忘记了常识。忘记常识是要受到惩罚的：这也是快要过去的这个世纪给我们的最大教训。此时正是1998年最后一个早晨，距离世纪之交的那一刻又近了一步；人们对于下一个世纪的中国说了无数的“智言”，而我却只有一个愿望：回到常识中来。

1998年12月31日晨写毕于燕北园

## 经典的意义

两次观看林洪桐教授执导的话剧——前几年北京电影学院短训班学员演出的曹禺的《北京人》以及最近北京电影学院95级学生排演的奥尼尔的《悲悼》，都受到了心灵的震动。以至于我和我的研究生看完演出以后的这几个星期里，竟成了奥尼尔戏剧迷：我开了一大堆书单让她去读，她呢，一次又一次地打电话给我汇报种种新发现；前两天，因为有别的事，我们见面了，但一坐下来就谈奥尼尔的剧本，回味这次演出，并且引出了很多联想。我们由奥尼尔对希腊悲剧的现代改写，谈到曹禺《雷雨》中所受到的启示以及他的新创造；又谈到林洪桐教授对奥尼尔的改写的理解与重新阐释，以及作为90年代的中国年轻一代的演员们的再创造，等等。说着说着，就沉默了，因为我们突然意识到这里正内含着一种精神的传递，人类文明（从西方希腊文明、现代文明到作为东方大国的中国的现代文明）的交融，一种戏剧传统的传扬，于是产生了说不出的神圣感——这样的感觉这些年似乎早已淡漠了，我们因此而狂喜不已。

于是我们谈到了经典的意义。这又是一个不合时宜的话题。早已有人宣布，我们正生活在一个“拒绝经典”的时代。而且已经出现了骂倒在他以前的一切作家作品的天才。作为个人，怎么拒绝都是他的权利，但如果以一代人的代表自居，要一个时代、整个民族都来“拒绝经典”，就有了问题。各类学科的经典，包括

我们所要讨论的文学、戏剧的经典，是民族与人类文明的结晶，是历代前人智慧与创造的积淀，而真正的经典又总是超越民族、超越时代的，具有超前性。像文学（戏剧）的经典关注的是人性的根本，不懈地挖掘着人的灵魂的深，因而具有永远的艺术魅力，开掘不尽的生命活力。这就是古希腊悲剧能够不断地被改写、重新阐释、创造的原因。

经典的不断排演，不仅是对经典本身的内在生命的激活，也是对今人（导演与演员，以至观众）的想象力、创造力的开发，而且是站在巨人的肩上，这样的精神开拓从起点上，就占据了一个制高点，尽管在攀登的过程中，会格外的艰难，但一旦战胜困难（这首先是一个战胜自己的过程），就会将每一个参与者的自我精神境界与艺术生命提高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这一次林洪桐教授执导的电影学院95级排演的成功，就是一个有力的证明。我们看到，导演把他的全部生命投入其中，演员也把他们的生命投掷进去，我们观众因此受到感动与震撼，也不由自主地参与其内，在短短三个多小时里，同处于“黑匣子”中的我们（导演、演员、观众），共同经历了怎样的精神的磨难、生命的挣扎啊。这是一种几乎让人喘不过气来的沉重；但所有的人都收获了丰富的痛苦，在对人生痛苦的逼视与反抗中，人的生命（自我生命与艺术生命）获得了升华，达到一种酣畅淋漓的状态，我们平常说的“过瘾”就是这种状态的质朴的描述。但每个导演、演员与观众，不可能（也没有必要）总是遇到这样的过瘾的机会的，有的人甚至一辈子就有这样的有数的几次，或者可以把它称之为生命的瞬间爆发与闪光。但只要有了这样的瞬间，你的生命（自我生命与艺术生命）就有了一种底气；如同李玉和所说的“有了妈的这碗酒垫底什么也能对付”一样，底气足了，以后无论怎样发展变化（每个导演、演员总是要不断地开拓自己的戏路的），都

不会发生变形与摇摆。在这个意义上，这是一个永恒的瞬间；于是，就在1998年那个北京的冬天的早晨，我们一起度过了一段难忘的美好的时光，留下了一个生命的闪光点。——这真要感谢林洪桐教授、他的同事以及他的年轻的学生们，同时要祝贺他们赢得了这场挑战。

说到挑战，我们忍不住还要再说几句。林教授选用经典戏剧作品来培养他的学生，这显然是他的一个自觉的追求——从排演《北京人》到《悲悼》都是如此；但这却是一个具有挑战性的尝试。因为在这个一切都商业化了的社会里，在一般人的眼光中，演员的外表与能否适应世俗欣赏要求的表演模式，成为能否成为电影明星的关键，而演员的培养也局限在一种表演技能的训练；但林教授却要以学院派的严谨态度，用戏剧经典来磨炼他的学生，向他们灌输多少有些贵族化的生命的与文学的底气，把对人的培育与演员的培养统一起来。这是一个大胆的，然而又是具有远见卓识的选择。如前文所说，实际上只要（只有）有了这样的贵族气做底，以后就会（才会）有更广大的发展，其中也包括对世俗欣赏要求的适应与满足，同时又不会陷入轻佻，而显出气蕴的厚实与大度。这是一条培养真正的大演员、大明星之路。中国的电影要真正复兴，必须以培养真正的演员作为基础；在这个意义上，林洪桐教授与电影学院的领导、同事也是在为中国未来的电影的发展垫底，真应该向他们表示感谢与敬意。

1998年12月20日写于燕北园

## 北大校园里的“兔子”

做学生的最大乐事，莫过于同寝室的同学晚上熄灯以后，躺在床上，议论老师们的种种逸闻趣事。于是，校园里就有了许多故事，有些甚至是代代相传的。

北大校园里，流传最广的是几只“兔子”的故事。周作人在《知堂回想录》里，谈到了“五四”前后的“两个老兔子和三个小兔子”。据他说，当时文科教授中“陈独秀与朱希祖是己卯年（1879）生的，又有三人则是辛卯年（1892）生，那是胡适之、刘半农和刘文典，在民六（1918年）才只二十七岁”。周作人有一个重要的遗漏：当时的北大校长蔡元培是丁卯年十二月十七日（1868年1月11日）出生，也是一只老兔子。这几只兔子，除专攻古典文学的朱希祖、刘文典，专业之外的人知之不多外，其余几位都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将与骨干，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新文化运动就是被这几只兔子闹腾起来的。今年正好是“五四”八十周年，讲讲他们的故事，是格外有趣的吧。

兔子是聪明、漂亮、爱美的，于是就有了刘半农的风流倜傥。周作人说他“状貌英特，头大，眼有芒角”，且多才多艺，“专治语音学，多所发明。又爱好文学美术，以余力照相，写字，作诗文，皆精妙”。他还爱打扮，第一次与周作人见面时，就脚着灰蓝细花缎帮鞋，“独存上海少年滑头气”。鲁迅回忆说，他初来北京当教授，却“没有消失掉从上海带来的才子必有‘红袖

添香夜读书’的艳福的思想，好容易才给我们骂掉了”。但他仍然留下了缠绵的情诗《教我如何不想她》，经赵元任谱曲，至今还在为少男少女们所传唱。

兔子是温和的，但逼急了，或也有发威的时候？后来也是北大校长的蒋梦麟就曾为蔡校长写了这样“一笔简照”：“先生日常性情温和，如冬日之可爱，无疾言厉色”，“但一遇大事，则奇气立见”。于是有了这样的传闻：某年，“学生因为不肯交讲义费，聚了几百人，要求免费，其势汹汹。秩序大乱。先生在红楼门口挥拳作势，怒目大声说：‘我给你们决斗。’包围先生的学生纷纷后退”。有人因此说先生“是真虎乃有风”：这样的兔中的虎风是别有魅力的。

兔子当然是骄傲的。刘文典当年在北大即以好出狂言而著称，后来到了西南联大，也旧习不改，并且因为自己讲庄子而特别瞧不起新文学作者与研究者。据说有一次跑警报，大概是沈从文先生在急着向某个方向走。他看见了，就正颜厉色地说：“你跑做什么。我跑，因为我炸死了，就不再有人讲庄子了。”面对这样的怒斥，沈先生也只有苦笑而已。

“五四”那几代兔子的故事是讲不完的。后来呢？到了我们这些晚生的校园里的兔子，就没有故事了，因为早已经被彻底地驯服了。还有当年的风流与狂傲，还有拍案而起的威风吗？没有了，也不敢了。校园里只剩下一批没有个性，从外表的衣着、语言到内在的思想、精神都被格式化的灰色的“动物”（因为分不清十二生肖，故只能统称为“动物”）。当然，近二十年，已经和正在发生变化，但精神的元气的真正恢复也还需要时间。

于是，到了我的本命年，仍然讲不出自己的故事，只能话当年。

1999年1月28日写于燕北园

## 谈谈先父天鹤先生的事

这是《钱江晚报》编辑朋友出的题目，要我在春节“台湾专版”上谈谈先父天鹤先生。这在我是义不容辞的：杭州本是先父的故乡，先父生前于浙江、台湾农业的发展都有过重要的贡献；但本世纪历史的曲折演变，却将一代代先驱者遗忘，先父也不能幸免，今天的故乡人恐怕已很少有人知道“钱天鹤”其人，浙江现代农业发展史、教育史上他本应占有的那一页，大概也被忽略了吧。以至于在我编选出版了《钱天鹤文集》之后，竟不知家乡的何处能够与愿意收藏。那么，现在正是一个机会：是该向乡亲们谈谈一位为祖国与家乡的农业现代化奋斗一生的老人的事了。

先父于1893年2月27日（农历正月十一日）诞生在一个并不富裕的家庭。1910年毕业于杭县国民学校，经浙江省选送并考入北京清华学堂高等科。1913年毕业后，公费赴美国深造，在康乃尔大学攻读植物育种。1918年毕业，获农学硕士，成为我国第一代现代农业科学家。1919年归国，受聘为南京金陵大学农林科教授，兼蚕桑系主任。当时江浙一带蚕业生产深受蚕种病毒之害，天鹤先生遂主持无毒蚕种制种技术研究，并克服土法养蚕习惯势力的阻拦，广为推广，取得显著效益。1925年，先生应聘出任浙江公立农业专门学校（浙江大学农学院的前身）校长。1930年初，浙江省政府主席张静江为改进浙江农

业聘请天鹤先生为省建设厅农林局局长。先生在杭州拱宸桥购置原英国领事馆馆址为场址和数百亩稻田为试验地，建立农林总场，以后又改组为农业改良总场，为浙江现代农业科学研究事业奠定了基础。《钱天鹤文集》里，收有先生于1931年在浙江大学农学院园艺学会的演讲词：《浙省园艺事业之前途》，着重谈到了现代园艺业商品化的问题，强调“凡一种产品，其品质任其若何佳良，而无外地之市场者，终难图发展之希望”，而“每年产量不一致，实大有害于固有之销路”，并具体分析说，“幸有一邻近之大市场上海，可为浙园艺事业之尾闾”，“沿杭沪路之两侧，倘能应所需而谋生产，实不患无销售之地”。先生在演讲中还提出农民要自己组织起来，“分级定价”，进行“生产物之贩卖”，以免受中间商人之剥削。先生并谆谆告诫：发展农业既“不可固步自封”，又“当步步为营，着着为寨，从脚踏实地做去”。这些意见直到今天都还未失去其意义，可见是有超前性的。人们更可以从中看到天鹤先生对故乡农业发展的殷切期待，那拳拳爱乡之情是十分动人的。

先生于1931年离开浙江省，到南京创建中央农业实验所，在抗战时期，又出任国民政府经济部农林司长、农林部常务次长，襄理全国农政大计，保证军粮、民食和衣着原料的供应，对坚持抗战起了不可磨灭的作用。1948年先生参加新成立的中国农村复兴联合委员会工作，担任农业组组长，并随机关由广州迁往台湾。以后又升任农复会委员。人们知道，台湾是先由农业的复兴，而达到全岛经济的繁荣的。先生为此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他曾参与制定台湾农业政策与实施纲要，主持台湾农会的改造，并引种南非甘蔗新品种，成功地解除了台湾糖业的危机。从收入《钱天鹤文集》中的写于1949—1958年间的著述中可以看出，先生对台湾农业的发展，大至战略方针、指导思



想，具体到品种的改进、病虫害的防治、原子能的利用、农村金融制度的建立，等等，都有周密的思考，提出了许多具有指导性的精辟意见。他对金门农业建设更是不遗余力，“举凡农作，造林，水利，渔业，畜牧，卫生设施，无不坚毅以赴”，十年有成，功不可没。金门百姓特为先生建立铜像，“以志盛德，而垂久远”。1961年先生患轻度中风而退休，于1972年8月20日因心脏病仙逝于台北。

先父离世时，母亲与大部分子女都不在身边：从1949年起，我们一家人就分割在海峡两岸。我们父子离别时，我才十岁，在记忆里，只留下父亲模糊的身影；但以后的几十年，却没完没了地被强制“划清界限”，这其中的辛酸，还是不说了吧。直到四十六年后，1995年7月11日，我才踏上海峡那一边，在阳明山上的一个面对观音山的小山峰上，找到了先父的陵墓。焚香礼拜之后，几十年骨肉分离的历史，全化作了悲切、凄厉、哀怨、苍凉的一声长嚎。在终于平静下来以后，我默默祈祷：愿下一世纪，再也不要再有分离和破裂，多一些宽容与理解。

1999年1月28日写于燕北园

## 翠鸟远飞了

1990年6月16日之晨，九十岁的冰心老人写了一篇散文：《我梦中的小翠鸟》——

我梦见：我仿佛是坐在一辆飞驰着的车里……坐垫和四壁都是深红色的。我伸着左掌，掌上立着一只极其纤小的翠鸟。

这只小翠鸟绿得夺目，绿得醉人！它在我掌上清脆吟唱着极其动听的调子。……

一个静静的夜里，读到这篇文章，眼前突然闪现一片绿光，我感到了老人的生命的融入，心微微颤动着，信笔写了几句话——

“历经万般磨难，还能有如此绚丽的梦境，这般宁静的心境，实在令人羡慕。

“不仅是美的文字，更是美的心灵；不仅是文字的凝炼，更是精神的凝炼——老人追求一生，终于有了这美的结晶。

“‘五四’时代激动了一代青年的爱的哲学，经过几十年的风风雨雨，如今已经升华为一种更为博大、深邃的精神境界。

“冰心实际上已成为当今中国知识分子精神、良知的象征。”

这些文字没有发表，深深地印在心里了。

世纪之交的这个早晨，翠鸟远飞了。

但我仍在遥望，倾听。

天际间，仿佛还闪烁着“那不可逼视、翠绿的光”，仿佛还飘洒着“那动人的吟唱”……

我的心格外的柔和，又有几分惆怅。

1999年3月10日深夜写于燕北园

# 王瑶的意义

——《王瑶和他的世界》编后记

已经十年了！

十年前，王瑶先生的逝世引起的心灵震荡，至今也还没有停息。在这十年间，每当中国与世界发生了重大的事件，每当面对思想、学术，以至生活中的种种问题与困惑，我们都会想起：先生如果健在，他将如何应对？真的，先生留下的空白是无法填补的。

时间的流逝并没有将先生的足迹淹没，“王瑶的意义”已经成为现代思想、文化、学术史上的一个课题，引发了后来者的不断追念、思考与论说。于是，有了《王瑶先生纪念集》（1990，天津人民出版社）、《先驱者的足迹——王瑶学术思想研究论文集》（1996，河南大学出版社）的编撰出版，1995年、1997年两次学术讨论会的召开；以及《润华集》（1992，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中国文学纵横论》（1993，台湾长安出版社）、《王瑶文集》（七卷本）（1995，北岳文艺出版社）、《中国现代文学史论集》（1998，北京大学出版社）、《中古文学史论》（1998，北京大学出版社）的整理出版与重刊。在王瑶先生逝世十周年之际，河北教育出版社重又出版《王瑶文集》（八卷本），并在《王瑶先生纪念集》与《先驱者的足迹》二书的基础上，将有关王瑶先生的回忆与研究文章汇集成《王瑶和他的世界》一书，这自有一种学术基本建

设的重要意义。我们这些深受先生教泽的学生，则以此书祭奠先生的在天之灵；这自然要感谢河北教育出版社的朋友们，而我们的浩茫心事，却是难以言说的。

本书还是为更年轻一代的学生与学人编写的。记得去年北京大学举行百周年校庆的时候，人们都深深感到，这些年真正体现了北大精神的大师级教授纷纷离世，对北大（以及中国的教育与学术）造成的损害。于是，有了这样的呼唤：那口衔烟斗，骑着单车，在未名湖畔横冲直撞的王瑶先生到哪里去了？……不止一次地听到许多校内外的学子，为自己未能被先生著名的客厅里的烟熏过，而感到永远的遗憾。北大中文系学生因此举办了“追踪王瑶”的座谈与访问活动，并引起了广泛的社会反响。先生仍然活在他所寄以希望的青年学生中，这是令人欣慰与感动的。这本《王瑶和他的世界》的出版，或许能够帮助年轻的朋友了解王瑶的人与学术，走近他的世界。这大概也是一种精神的传递吧：我们确实是这样期待着的。

1999年6月21日

## 我与 20 世纪中国文化研究

已经有很长一段时间，我的脑子里，老是盘旋着一个数字：“1999”。这意味着在人类的发展史上，一个世纪就要结束了；同时意味着我自己的人生道路，走过了六十个年头，步入最后的旅程。这两件事之间，似乎是存在着某种联系的：回顾个人的历史是离不开 20 世纪中国与世界社会、文化发展的大背景的；而我作为 20 世纪历史的当事人，至少对自己亲历的那一段（约占整个世纪的三分之二）是有特殊的发言权的。

我因此而愿意把自己最后一程的学术生命献给 20 世纪中国文化的研究。

这首先是出于个人的动机：把自己的一生理理清楚，特别是要把自己吃过的亏、上过的当、犯过的错误、付出过的代价（人们常称之为“学费”），理出个来龙去脉、前因后果，说出个道道，总结出经验教训来——我不愿意不明不白、稀里糊涂地去见马克思。这样的清理，说大一点，对我们民族大概是有好处的，至少没有坏处。20 世纪对生活在下一个世纪的中国人，无论如何是一个无法回避的世纪遗产。而我们至今对这份遗产还是不（或不甚）清楚的，我总是觉得有许多东西，包括一些令人悚然而思的历史事实，一些可歌可泣的人与事，仍然是被遮掩着，或者被有意无意地忽略了，我想尽我所能，把其中的一小部分弄弄清楚，好对后代子孙有一个交代。——我不想否认，这确实是出于

一种历史责任感，尽管今天谈责任感显得有些不合时宜。

这样的工作是可以多种方式去进行的：我曾经写过《六十劫语》这样的思想随笔，也写过一点个人家世、经历的回忆文章，今后也还要继续写下去；而更能激发我的创造力、因而使我更为倾心的，则是写《1948：天地玄黄》这样的学术著作，这也是我乐于参加“北京大学20世纪中国文化研究中心”的工作的原因。总之，我想写20世纪“中国的故事”与“我的故事”，两者互为参照，互为补充，或许能构成一个体系。完成这样的工作，我的年龄大概是有一点优势的：比起年轻的朋友，我已步入老年，却有了他们所没有的阅历与体验；在老年社群中，我还是一个“小弟弟”，因此尚有精力做一点研究工作。我当然明白，这样的优势也是稍纵即逝的，我得抓紧努力。

更不必回避的是，这些工作即使如愿完成了，也不过是当代人写当代史，这自然会有后人研究所不能替代的特殊价值，但其局限性也是明显的。——人大概只能在外在与内在的限制中做有缺憾的工作。

1999年7月19日写于燕北园

## 沟通心灵的桥梁

——《彩色插图中国文学史》韩文本序

在金泰万君与出版社诸先生的努力下,《彩色插图中国文学史》终于与韩国的读者见面,这是一件令人高兴的事。遗憾的是,本书的主编、作为世纪同龄人的中国现代文学大师冰心女士已经仙逝,只能由我来对关心本书的韩国朋友们说几句话。

这是一本用文字与图片绘制的文学长卷,其间浓缩了从远古到20世纪末中国文学发展的历史。中国伟大的现代作家鲁迅的家乡绍兴,有一条风景优美的“山阴道”,古人曾有“从山阴道上行,山川自相映发,使人应接不暇”之说。但愿本书也能成为这样的文学通道,诸位读者穿行其间,在尽情领略文学的无限风光时,或许能因此触摸中国人的心灵世界;如果进一步引发出对韩国文学、历史的联想,触动您自己心灵的某一角落,那真是不亦快哉了。——中韩文学交流的本质,正是要促进两个伟大民族人民之间的心灵的沟通:这也是我们所期待的。

而这样的交流与沟通,发生在这世纪之交,也许是格外有意义的。面对新的世纪,所有善良的人们,都在祈祷着人类的和平、各民族之间的和睦、人与自然的和谐。在这世界大家庭的新秩序的建构中,各国文学的创造与彼此间文学的交流,应该、而且能够起到某种特殊的作用。作为东方近邻的中、韩两国,更是可以企望,在即将到来的21世纪里,将铺架起更多的文学桥梁,



这对相互间的理解、合作与共同发展都是至关重要的。本书的出版，或许能为此增添一砖一瓦，这是我们感到万分荣幸的。

我个人曾有幸在韩国任教一年，亲身感受到了韩国知识分子、青年学生与普通百姓对于中国人民与中国文化的深情厚爱，每每感动得不能自己。现在终于有了机会，将我和我的同事对中国文化的研究心得，回报韩国的学界、读书界的朋友。设想当新世纪的曙光初照，这一本装帧精美的图史，奉献于诸位的案前窗下，那将是怎样一个美好的情景！……

我感到了真正的幸福，并愿意与本书的作者、译者、出版者与读者共享。

1999年10月27日写于北京大学

## 《散文选刊》卷首语

我很少写散文，也不做散文评论，只能谈文学史上的散文。手头正有一套刚刚由广西教育出版社出版的、我主编的《中国沦陷区文学大系》，其中有一本《散文卷》，收入了许多鲜为人知的，质量相当不错的散文——看来现代文学史上的散文资源可开掘的余地还相当大。在考察沦陷区散文时，我发现有显示着不同的生命体验的两类散文。一类是着眼于身边凡俗生活的随笔，是“散文”的，即所谓“散文家的散文”；而精心构制远方的梦的，则更是“诗”的，是“诗人的散文”。做这样的散文体式的区分，并非要分出价值的高低，所强调的恰恰是它们各自有着自己的特殊要求、规则，因而显示出某种为其他体式不能代替的特殊功能与价值，同时又存在着某种可能出现的危险、陷阱。借用一位沦陷区作者的说法，“散文家的散文”的价值在于用“人的感情润泽人的日常生活”，因此，如果以“没有表现时代重大题材”去要求与批评它，至少也是隔膜的。那么，这类“散文家的散文”是不是也有高低之分呢？有的，这就要看在日常生活的描述中，内在的生命质量（底蕴）如何，是否丰厚与深刻，充溢着生命的元气，包蕴着对生命存在的开掘与思考。否则，日常生活的描述就会变成琐事的无谓咀嚼和孤芳自赏，显示出生命的苍白、平庸，以至无聊。而“诗人的散文”，则是想象的，有意组织、结构的，如何其芳所说，是“惊讶，玩味，而且沉湎于文字的彩色

图案，典故的组织，含意的幽深与丰富的”。如果指责“诗人的散文”雕琢、精致，要求自然、简单、安详、坦白，这也是用“散文家的散文”去要求“诗人的散文”的隔膜之论。“诗人的散文”的危险不仅在内在生命的贫困，更在于想象力的缺乏，语言文字能力的不足，形式追求的不力，从而反映了艺术创造力的匮乏。这样，无论是“散文家的散文”，还是“诗人的散文”，由于自身存在的陷阱，都可能出现危机，其主要表现即是生命力与艺术力的不足。沦陷区的散文终不免由盛而衰，并在总体成就上受到限制，这恐怕是更为内在的原因。今天重温这段历史，大概是有意

1999年4月9日

## 喜读《新青年文丛》

——在一个座谈会上的发言

拿到这套《新青年文丛》，首先想起的是我的导师王瑶先生逝世之前为纪念“五四”七十周年写的《“五四”精神漫笔》。文章强调“现在我们规定‘五四’为青年节，特别重视青年的创造性和历史使命，这确实是‘五四’精神的一项重要内容”，“事实上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的前驱者，当时也都是四十岁以下的人”。王瑶先生如数家珍般地举出一连串的数字：“以‘五四’这一年为例，当时年龄最大的陈独秀和鲁迅，也只有39岁和38岁，其余的如周作人为34岁，李大钊为31岁，胡适28岁，郭沫若27岁，毛泽东26岁，叶圣陶25岁，茅盾23岁，冰心只有19岁。”今天重新面对这些数字，不能不引起我们的许多感慨。为准备发言，昨晚我也做了一个统计，发现《新青年文丛》的这几位作者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先驱者正处于同一年龄层次，但他们却不可能完成当年那样的历史伟绩，这自然是历史条件的不同，无法做简单的对比；但有一个问题是必须提出并引起反省的：我们这个时代是不是自觉、不自觉地压抑了青年的创造力？在谈到中小学语文教育改革时，我曾经提出了一个看法，即我们对中小学学生学习语言（特别是母语）的潜力严重估计不足？对中小学生的创造力严重估计不足；现在是不是可以说，我们对青年的创造才能同样是严重的估计不足？事实上，一个人出成果，特别是

在文学上出成果，主要是年轻时代。此时不出，更待何时？余杰、孔庆东等人的出山引起的轰动，我既感到意外，细想起来，又觉得悲哀：孔庆东都已经三十五岁了，余杰也有二十六岁了，他们早就应该有更大的成就与影响，现在出来其实已经晚了，但人们还为之惊异不已，这本身就是让人感慨不已的。——当然不是感慨“一代不如一代”，而是说，我们的体制与社会机制不利于青年的发展：问题的严重性大概也正在这里。《新青年文丛》的作者与其他年轻朋友当然也不必妄自菲薄；我从来相信：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特点，有其他时代不能替代的价值与特殊优长之处；每代人也都会有自己的弱点与问题；而每代人都会找到自己的方式，自己来解决自己的问题，用不着别代人来越俎代庖，年长一代的责任不过是需要扶持的时候扶一把，需要提醒的时候提一句，以后就是年轻人自己的事了。莲子的书中，开头有一个标题：“该出门了”，这很有诗意，可以引发许多遐想：年轻的朋友应该走向大千世界，不管前方有什么在等待着你们：“你们所多的是生力，遇见深林，可以辟成平地的，遇见旷野，可以栽种树木的，遇见沙漠，可以开掘井泉的……”（鲁迅：《华盖集·导师》）

也许是出于专业的习惯，我在阅读《新青年文丛》里的文章时，更注意这一代“新青年”与“五四”“新青年”的精神联系，区别与发展；同时不断联想起我自己这一代人：希望从在我之前与之后的两代“新青年”中吸取我所缺乏的精神养料。

首先注意到的自然是将两代人联系在一起的批判、怀疑的精神与独立、自由的思想，强烈的个体意识与人类意识。在《文丛》作者身上，这一切更表现为一种“精神流浪汉”的气质。莲子认定“独自旅行是我命定的意象。似乎是为了诠释这个意象，我才来世上的。上路、在路上的姿态无可选择的逮住了我”（《自序·啊——》）。豆豆为杨竞的书写的序言更是把那“抱着砖无助

地穿行在风中”的永远的“行者”的形象定格在我们每一个读者的心上。王开岭的写作尽管如摩罗所说，是一种“地下室”的漫漫遐想与沉思，但也如摩罗所描述的那样，他的作品里的“被自由的渴望、失败的创伤、绝望的宿命、挣扎的冲动所牢牢攫住的颤栗与疼痛”，却也是属于这块土地上的流浪者的。莲子与杨竞都是近十多年才在共和国出现的“自由撰稿人”，处于体制外（或边缘）的身份使他们的写作更能摆脱意识形态的有形无形的束缚，更为自由无羁；他们浪迹天涯的生活，使他们的作品能够更丰富地“呈现一个现代人面朝江湖的多重机遇”，而与这块土地共同承受的苦难以及“将深重的苦难体现为一种文体、一种风格、一种艺术精神和一种现实态度”的努力，更使他们的作品具有一种沉重、厚实的力量。而正是这自由与厚重显示出一种大气，却是当代流行的许多作品所欠缺的，而又是与“五四”文学真正沟通的。对于我，这样的作品，是格外具有一种魅力的。当我看到莲子《西域的忧伤》的封底写着的这句话：“它属于向往天马行空，渴望人生醉意，追求心灵自由的朋友”，不禁怦然心动，因为我早已有这样的渴望：冲出宁静的院墙，“站在沙漠上，看看飞沙走石，乐则大笑，悲则大叫，愤则大骂，即使被沙砾打得遍身粗糙，头破血流，也在所不惜”。可以说，我是怀着羡慕的心情来看这些年轻朋友的生存方式、生命形态以及他们的精神结晶的。当然，我也不想把它理想化：我知道这样的精神流浪汉的生活与创作在现实层面上，也未必总是充满诗意的。而且，坦白地说，我固然“憎恶寂寞”，渴望走到人群之中，却又“喜欢寂寞”，不免留恋独自索居的书斋生活——这几乎是人性内在追求的一个悖论，这几位年轻的朋友大概也是会有的吧。

而尤其让我感动的是，虽然生活在社会的底层，经常接触到近乎赤裸裸的丑恶与无耻，自身也时刻经受着苦难与屈辱的磨

炼；在如此恶劣的生存环境与精神污染中，他们还保留着一颗完整的心，坚守着对人、对人生、对一切生命的神圣的爱。这是杨竞的信念：“研究一个国家的文明程度，只需研究三件事。第一，看这个国家的人对妇女是什么态度；第二，看他们对待孩子是什么脸色；第三，看他们对动物是什么表情。”莲子更是明确意识到“人类是一体的，世界上只要有一个人还在杀人，就是我们自己还在杀人，世界上只要还有一个人被杀，就是我们自己被杀”，这使我想起了鲁迅所引述的爱罗先珂的话：“看见别个抓去被杀的事，在我，是比自己被杀更苦恼”，鲁迅以为这是一种“伟大的精神”，其实也是“五四”精神的一个重要的方面，鲁迅自己当年就写过《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提倡超越了利害关系和交换关系的、纯属于人的天性的爱。但这样的爱的传统却被强制中断，以致今天莲子们痛切地感到“在爱的面前，我们都是雇农，一点家底也没有”，因此，他们庄严宣布：“我言说的前提是爱（试着去爱）”，对一切亲人，“及整个人类、动物、植物、非生物，我都恭敬地说一声：我爱”。生活在苦难中而能坚持发自内心的爱，这是一个很不容易达到的精神境界。记得张中晓在他的《无梦楼随笔》中曾经提到，苦难可以把人引向天堂，也可能引向地狱。即使是由受难而引发的反抗，也是一把双刃剑：批判的锋芒在杀伤恶势力的同时，也会伤害自己，导致自我心灵的硬化与冷化，在我看来，鲁迅一再说自己灵魂中的“鬼气与毒气”即是指此。因此，在我们发出反抗的呐喊时，必须唤起内心更为强大的光明，在抵御外在的黑暗的同时，也抵御自己内心的黑暗。这个问题可以说是本世纪好几代知识分子都没有很好解决的，也正因为如此，我在《新青年文丛》作者这里发现了爱的火焰，就感到了格外的振奋。这其中似乎还包含着某种宗教情怀，在王开岭与莲子的作品中就处处可以感受到一种悲悯心。近年来，我在与一些

青年，特别是喜欢思考问题的青年的接触中，发现他们在对现实与自我生命存在进行超越性的根本思考时，都不约而同地关注到宗教问题。这或许是显示了某种思想趋向，它在21世纪中国将会有怎样的发展，产生怎样的影响，现在都无法说清楚，这里只是把问题提出来，希望引起注意而已。

从另一个角度说，《新青年文丛》的作者所要做的，无非是“回到常识”。如王开岭自己所说，他要坚持的只有一点，就是“生命要有尊严，再卑微也要有尊严，再贫贱也要自由地表达意志，再伶弱也要拒绝那些强加于己的东西”。这本是“五四”的基本理念，也是人类文明的起码共识，但今天年轻人以其特有的青春激情重说常识时，却被看作是耸人听闻（甚至是大逆不道）的“偏激”之言，这是不能不让人感到悲哀的。而莲子所要恢复的是人的正常感觉与体认，比如以朋友的心态去感受自然，以爱心待人，以平常心看待人自身；不要以自然的征服者自居，不要将人与人的关系邪恶化，不要把人神圣化等等。多少年了，我们一直习惯于高呼政治、经济、文化的豪言壮语，却在昏热的呓语中，悄悄丧失了人的最基本的感觉与良知。现在年轻人发言了，他们不但戳穿了“皇帝的新衣”的神话，而且把他们自身的思考与行为还原到人类文明的常识上来。这对当今和未来中国的发展，至少是有一种积极的意义的。

我当然不想夸大这几位年轻朋友的作品价值；相反，我倒时时有一种危机意识的。而且我十分高兴地看到，他们自身已经有了清醒的自省与警惕。杨竞在他的一篇文章中说得很好：作为“泛消费时代的消费者”，在选择上就面临着一个两难的悖论：“他们沉默，则使火光归于黑暗，使自身陷于清贫；他们发言，却极可能引起传媒的炒作，经历轰动和轰动后的寂寞”，“当文化的商品属性被传媒炒作得超过它的文化属性之时，我们更应



防止思想本身的热寂”。这又使我想起了鲁迅所说的“无物之阵”，它对人的压抑是有三部曲的：首先是不让你出来；压不住了，就捧你，你就被同化了，或者既捧又骂，竭力使你就范；到了适当时机，又会反攻倒算，无情地将你置之于死地。对这样的“骂杀”与“捧杀”，应该保持高度的警惕。希望年轻的朋友无论如何也要坚守住“独立的自由的写作”的基本立场，不要受任何“他者（包括读者以及我们这样的评论者）”有形无形的支配。同时，也要以平常心来对待自己的写作，心态上超脱一点，可能会更好一些。

我之所以喜欢读《新青年文丛》里的文章，除了思想的共鸣与互补之外，还有他们的语言文字给我的莫名的感动。相对来说，杨竞的语言不太讲究，他只是用直白、坚硬的语言来表达自己的思想，这一点与我倒有些相近。王开岭与莲子的语言都很美，风格却迥然相异：王开岭的文章是以生命体验的深刻与思想的锐利取胜的，而他的表达却是文学的，充满了诗意，这两者的结合产生了一种震撼力；而莲子的感觉非常的好，想象丰富而独到，文字清纯又内含着哲理与玄思，显出一种厚度。我不想掩饰对莲子文字的偏爱，这或许是因为人总是自己缺什么就特别喜欢什么：这次《新青年文丛》推出的三位新人中，杨竞与王开岭的思想与文字，是我所熟悉的；莲子所提供的是另一个思想与艺术的世界，是我熟悉（更确切地说是向往）而又陌生的，对它也就有了特别的关注。而这些年轻人当他们用现代白话写出这样的美文时，其实也是在为新文学的发展做出自己的贡献。“五四”先驱者们当年以“提倡白话文”作为新文化运动的突破口，不仅在当时，就是在世纪末的今天，都遭到了很多人的非议。而年轻作者的写作实践却有力地证明了，现代白话文在表达现代人（特别是年轻人）的思想、情感、心理……上的无可怀疑的生命力及其不

可替代的美学价值。当然，年轻的作者也感到了自身言说的困惑，莲子在他的《自序·啊——》里就谈到了这一点；但这是另一个性质的问题——它是关乎人的存在与表达的根本性困惑。

最后，我还要说一点：《新青年文丛》里的作者只是当代“新青年”中的一部分。他们之间的选择（例如已经说到的莲子与其他几位的选择）已经显示出极大的差异性；还有更多年轻人做出了自己的另外的选择。相对说来，《新青年文丛》中莲子之外的作者都有较强的现实介入意识，显示出一种批判的锋芒与独立意志，容易在同样不满于现状的读者中引起情感的共鸣。据我所知，还有另外一些青年，他们更关注于新的文化建设，追求更具有原创性的创造，从表面上看，他们目前并未发言，似乎也不急于发言，与现实政治也保持一定的距离，但他们确实是着眼于长远的发展，并且做着扎实的准备的。因此，我曾对一些来访者说，不仅要注意这些已经发出声音的青年，也还要关注那些还没有公开发言的年轻人。而我的接触实际上又是极为有限的，但我相信，愿意思考、愿意做事情的青年是很多的，他们各自不同的选择，都自有其价值，同时也会存在某种缺憾，因而是可以、而且必须互补的。正是这多元化的，多方面的努力，作为一种合力，将对青年自身的发展与中国社会的进步，产生积极的影响。我正是从这里看到了新世纪的某种希望。这也是《新青年文丛》给我带来了这么大的喜悦的原因所在。

2000年2月26日写毕于燕北园

## 评《文艺争鸣》的几篇文章

### 一、90年代散文：世纪末的狂欢（林贤治）

本文打破了“你好我好大家好”的文艺批评中的平庸之风与市侩习气，以及弥漫中国社会、思想、文化界的“歌舞升平”的“瞒和骗”的迷雾，以敢于正视现实的胆识，直逼90年代散文创作，以至整个文学创作的根本性的病症：“表面上看来，单调的颂歌模式已为众声喧哗所取代；其实，大量的散文仍然沿袭了无视社会现状而从众言说的写作态度，从思想上的顺从滑落到形式上的仿制，甚至不惜迎合霸权和市场的需要而改变自己”；“权力与金钱的合力，共同禁锢个性，奴役个性，而与精神为敌”，另一方面，“消费的、愉悦的、催眠的、逃逸的”的读者需求与作家“以‘多元主义’为借口，为取悦读者的行为辩护”，话语接受者和传播者之间“彼此致意，互相抚摸，构成了中心权力之外的边缘权力系统”，“后者正是前者的一个不可或缺的补充”，二者的合力使文学“陷入了困境”。

本文的另一贡献是对这些年被弄得十分混乱的所谓“个性”与“个性化写作”进行了理论上的澄清，指出：“个性思想具有贵族性，但这仅仅是指它对于质的纯洁性的要求，而不像我们的一些文学院里的老牌作家，或是新近崛起的青年才子的那种贵族化态度，处处自以为高贵。个性否定既定的关于个体的自然秩序的要求，并不意味着否定个体间的权利和人格上的平等；唯有这种贵族因素同

民主因素结合起来的个性，才是完整的、健全的、强大有力的。”

本文会引起争议，会使一些人感到不快：这大概也是它的价值所在。

## 二、走近鲁迅的尴尬（赵歌东）

围绕着“走近鲁迅”的话题所展开的争论，是本世纪伊始的一个重要文化现象。本文作者没有纠缠于具体问题的烦琐讨论，而是从当代中国文学与中国作家、知识分子的病症的现实考察中来揭示“走近鲁迅”的症结所在，从而得出了自己的结论：“当前的文艺理论界以一种表面的多元化掩盖着一种极度的精神贫困。这种精神贫困的重要标志就是缺乏鲁迅那种严峻而深刻的自审意识和忏悔意识”，如果“走不出‘文革’式的自大狂与受虐狂的双重人格冲突”，“最终将导致陷入这样一种思想或人格的尴尬——从走近鲁迅的愿望出发最终走向拥抱阿Q”。——这确是振聋发聩之言，但那些自我感觉过于良好的作家与知识分子会因此感到几分尴尬吗？我表示怀疑。

## 三、向“创新”泼一瓢冷水——一个保守主义者的自言自语（傅谨）

坦白地说，读这篇文章，我自己就出了一身冷汗：因为我也“创新”的热心鼓吹者。当然，“创新”自有其不可忽视的意义在——本文的作者也无意根本否认创新，但他确实看到并揭示了将“创新”绝对化、极端化，忽视（以至根本否定）模仿、重复与积累的意义所带来的弊端：“在一个不惜用最美好的词汇赞美创新，用最不屑的口气谈论重复与模仿的语境里”，“所有作品所有手法所有风格都有如过眼烟云，等不到成熟就被淘汰”，尽管外来新潮不断

地涌入，却“没有真正培育出我们自己的、成熟的艺术流派，积淀成为一种新的传统，几乎是无一例外地、不幸地成为一些匆匆的过客”。——这是一个我们必须面对的事实，却是我们这些创新的鼓吹者过去有意无意忽视或遮蔽了的。本文使我们清醒，这是应该感谢作者的。作者由此引出的对发展规律的体认则更值得注意：“发展不仅仅由行为的创新决定，从生物到人类文化的发展，还需要某种积累，发展的过程，也就是将创新转化为传统的过程”，作者因此而肯定了真正的学院派的意义与价值，这同样给我们以启示。

作者将本文定位为“一个保守主义者的自言自语”是自有深意的。我们已经习惯于将所谓“保守主义者”与“激进主义者”绝对对立起来，要肯定激进主义，就否定保守主义；要肯定保守主义，就否定激进主义：这些年思想文化学术界就这样不断地翻烙饼。而事实上，保守主义与激进主义不但有互相对立的一面，更有相互渗透、影响与制约的一面，而思想、文化、学术的发展与生态平衡正是实现于二者的张力之中的。因此，任何一个学者只要是真诚地坚守自己的立场（无论是保守主义的还是激进主义的），都会有自己的价值。而这样的真诚地坚守并不容易，需要有学术的自信，更要有不为时尚所动的定力与甘于寂寞的健康心态：本文在这方面也能给我们以启示。——最后还要补充一点：在我看来，坚守和自我质疑与调整也是不矛盾的；而任何价值也同时意味着某种局限。

#### 四、尘埃落定后的思省——再谈卫慧写作与中国当下的大众文化（陆彦）

本文的价值大概就在“尘埃落定后的思省”。90年代以来，文坛上充满了炒作起来的热闹非凡的“尘埃”，却少有“尘埃落定后”的“思省”：这本不是一个思考与反省的时代。但本文的作者却偏要

追问“卫慧写作”这一“尘埃”的背后所隐含的意义。于是，他从“女性叙说的‘中产阶级’话语”中看到了“大众文化与统治阶层同流合污”这一“沉重的现实”；从引起轰动的性爱描写中看到了“性的确已被资本权力转化为商品”以及“大众文化市场对女性写作的左右、控制”；从“女性话语被压抑后的退路——跨国情缘背后”看到了一个“古老民族的悲哀寓言”。或许更有意思的是，作者还从对“卫慧写作”的批判中看到了“批评家们不知不觉的父权主义与民族主义心态”，而本文最后的警示则更值得注意：“我们需要警惕那些思省缺席、反复无常、缺乏信用的文学批评。”

## 五、许广平在改写鲁迅中的作用与苦衷（王彬彬）

林贤治先生在他的文章中提醒我们：“今天生活的最大危险是，随着资本、物质、市场的扩大与增殖，耽于幻想的未来，而放弃了对过去的错误、罪恶、缺陷，以及产生这一切的责任的追究”，“我们的作家和读者，众多的人们，在文学最需要真实的时候，却把它连同痛苦一起抛弃了”。本文正是正视历史的黑暗，直面真实中的痛苦之作：作者所要揭示的是“文革”历史中与鲁迅接受史中最悲凉、最令人难堪的一页，而当事人又是最应该予以“同情的了解”的；但作者又意识到“长久地掩盖”历史的过失“是不应该的”，因此，明知“会招致许多人的反感”，还是写了这篇文章。这期间也有真实的痛苦，作者“不回避一切”的写作态度，也就有了一种动人的力量。

## 六、捍卫人的权利、价值和尊严——谈胡平的《战争状态》和《中国的眸子》（李建军）

作家胡平在考察“相当长时间里中国人的生存状况”时，做

了一个重要的概括：“战争状态”。本文对此做出了有力的阐释：“‘战争状态’是野蛮的施暴行为被合法化的状态，是死亡和流血被诗意化的状态”，于是，“剥夺人的生命成为随意而合法的行为，施暴者不仅不会产生负罪感，反而会有做英雄的价值感与荣耀感”。——这里所做的“对集权政治的意识形态批判”，“把文学与政治等重大问题关联起来”的努力，其意义不可低估。

但作者在反对简单否定地主阶级的历史作用的倾向时，却强调“他们往往是通过省吃俭用来积累财富的。他们与他们的合作者贫雇农的关系，也充满和谐而温馨感人的色彩”。

这其实正是用“和谐而温馨的感人色彩”来掩饰血淋淋的压迫与奴役，这不仅与作者所称道的“直面淋漓的鲜血”的立场相矛盾，而且如果以此观点来观察当下中国社会，作者就只会看到处处充满“和谐与温馨”的“合作”——这是作者立论逻辑的必然，却与集权政治对当下中国现实的描述取得惊人的一致，这或许是作者所不曾料及，也是作者主观上不愿意的。

以上两个方面，构成了本文写作的基本矛盾：这里或许包含了某种思想文化上的教训，值得深思，这本身也构成了本文的一种特殊价值。

## 《文艺争鸣》百期诞辰赠言

我是把《文艺争鸣》看作是自己的刊物的，我与它特别有缘：我从未得过任何国家奖，按照现在的标准，是评不上教授的；但却两次获得《文艺争鸣》奖，我颇以此为荣。因此，《文艺争鸣》百期诞辰，也是我的一个节日，我只有一句话：“真不容易呀！”

我还想以鲁迅的一段话作为赠言：“中国人向来因为不敢正视人生，只好瞒和骗，由此也生出瞒和骗的文艺来，由这文艺，更令中国人更深地陷入瞒和骗的大泽中，甚而至于已经自己不觉得。世界日日在改变，我们的作家取下假面，真诚地，深入地，大胆地看取人生并且写出他的血和肉来的时候早到了；早就应该有一片崭新的文场，早就应该有几个凶猛的闯将！”

《文艺争鸣》总是在“瞒和骗”的喧嚣中大胆地发出自己的独立的清醒的声音，真诚的声音——过去十年的路就是这样走过来的，希望它永远这样走下去，不管前面等待着自己的是什么。



# 当代四作家论

## ——一句话评语

**王安忆：**她始终处在发现的状态，对人类、社会、文学与自我都不断有新的发现，因而不断有令人惊喜的探索。——这对一切从事创造性工作的人，都是一个值得羡慕的状态。

**张承志：**他有信仰，并且坚守如一。——而中国许多作家与知识分子都因为缺少精神的支撑，而直不起腰，或者东倒西歪。

**韩少功：**他一直在关注并紧张地思考中国这块土地上发生的许多事情，而不像鲁迅批评的某类作家，总是“咀嚼着身边的小小的悲欢，而且就看这小悲欢为全世界”。

**史铁生：**多年来，我都期待着在中国作家的创作中，看到现实的关怀与超越的、形而上关怀的统一；他的出现，让我多少感到了某种满足。

2002年2月24日

## 要有自己的想法和发现

——评袁筱芬《何处是家园——诗学  
视域中的〈憩园〉》

这是一篇有自己的想法与发现而又不尽完善的研究生论文作业，正好拿来作评讲。

说“有自己的想法”，这其实是一个不低的评价，但也是一个最基本的要求。可是现在许多论文的问题恰恰就出在这里：东抄西凑、应付了事的且不说，有的人把写论文当作学术操练，玩智力游戏，或者玩理论，即用中国的材料来证明西方某种理论的有效性，看起来像模像样，俨然一篇规范的学术论文，但却有一个致命的毛病：没有自己的想法。

“有自己的发现”，也就意味着，对自己研究、讨论的对象能够说出一些别人没有说过的新的东西，能够对所研究的课题，有所推进。——在我看来，学术研究的本质就是发现，有几分发现，就有了几分贡献。记得当年王瑶先生指导我们写论文，一开始就提出这样的要求：凡是您下了工夫写的重要的论文，一定要达到这样的水平：今后别人再研究这个对象与课题，他可能而且应该超过您，但一定要先看您的研究成果，不能无视您的研究贡献。这当然是一个很高的要求，一般论文达不到这样的分量，但至少要有自己的发现，即所谓一得之见，不说大的贡献，要有所推进，哪怕推进一点点，总是应该、而且可以做到的。——写

到这里，突然想起我做研究生时，听吴组缃先生的课，他一上来就提出了一个让我们瞠目结舌的问题：你们说，“吴组缃是人”与“吴组缃是车夫”这两个判断，哪一个更有价值？在我们惶惶然不知如何回答时，吴先生发表了一番惊人之论：说“吴某人是人”，这话的正确性谁也不能否认，却不能提供对吴组缃的任何新认识，属于废话；说“吴某人是车夫”，这显然不正确，但却能启发人们对“吴组缃究竟是什么”的思考，逼着人动脑筋想一想，因而后者比前者更有价值。这当然是句笑话，却相当生动地反映了吴组缃先生做人做文的追求：务去陈言滥调，绝不人云亦云，无论如何要有自己的东西，凡有言说，必是自己思考的结果，尽管不一定都正确，但至少要能启发别人思考。

因此，我评论一篇论文，常常有一个标准，就是看是否对我有所启发，让我动脑筋想一想。据说在我的学生中，流传着一种说法：对钱老师谈论文构想或其他学术问题，非得有自己的东西，如果说的都是别人说过的话，他听着听着就睡着了；但如果你说出一个独立的新鲜的见解，他会眼睛突然发亮，甚至跳起来，接着你的思路，滔滔不绝地做尽兴的发挥。这种说法自然有点夸张，有戏剧化的成分，但据说还吓退了一些学生：没有自己的想法时，就不敢来和我谈学术问题，这倒是我始料未及的。但有一点是说对了的，就是我从来认为师生之间是应该相互启发的，绝不只是老师启发学生；因学生某一句有意无意的话的启发，突然打开老师的思路，老师利用自己的经验与知识储备，把话题引向深入，学生也因此从中受到启发：在我看来，这样的师生之间思想的撞击与互动，是一个最理想的教学境界，这样的场合是最容易萌生新的学术思路的，在自由的无拘无束的交流中培育的是一种创造性的思维，而这正是一个研究生最应具备的基本素质。

当然，强调创造，并不是忽视学习、借鉴与积累。我曾在一篇短文中谈到也要“防止将‘创新’绝对化、极端化，忽视（以至根本否定）模仿、重复与积累的意义”，这看来似乎和前面的说法有矛盾，其实是一个必要的补充：研究的最终目的确实是要有自己的发现与创造，但在学习研究的过程中，却不能没有模仿、重复，更不能没有积累。我曾对我的学生谈到导师与研究生的关系，我说应该是三部曲：首先是老老实实向导师学，就像小学生描红那样，模仿、重复导师的研究思路、方法，引述导师的观点，等等。——比如，这篇《何处是家园》，就处处可以看到作者导师吴晓东先生的影响，“从形式诗学入手……从而通向一种文化诗学的研究，揭示出文本与历史之间复杂性的更多可能性途径”就是吴晓东的研究思路，这是正常的，甚至是必经之路。但到了一定阶段，就应该努力摆脱导师的影响，走出自己的路：如果永远处在导师的阴影下，走不出来，那是最可悲的。而且导师越强，学生就越应该努力走出去，在某种程度上，这是对学生最大的考验。走出了自己的独立的研究之路以后，在某一阶段又会和导师在更高层次上相遇：学生已经将导师的影响内化，即所谓得其真传，并加以发展了。这应该是导师与学生关系的最佳状态。我这里所说的三部曲所内含的正是“学习（模仿）与创造”的关系。我还要说一点：创造过程中，是不能离开对前人创造成果的借鉴的；或者说，每一个人都只能在别人研究的基础上进行新的创造，这是一个学术研究的积累与传递过程。所谓“别人研究的基础”，不仅是指研究的积极成果，可以启发思考，成为新的研究的起点；也包括研究中的失误、不足与盲点，也同样能成为新的发现的契机。我曾这样谈到自己研究鲁迅的“办法”：“什么参考书也不看，只读鲁迅原著，反复阅读，不断琢磨，读熟了，想透了，有了自己的感受、见解，这时候或许可以看看别人的研究成

果，以启发思路，但也要有自己的判断”。（《谨防上当》，文收《走进当代的鲁迅》）这就是先“不看”再“看”，这里也包含了“独立创造与借鉴”的关系。借鉴也“要有自己的判断”，看参考文献（也即前人的研究成果），能够看出其价值所在及其不足之处，这本身即是一种能力，甚至是研究的基本功。

就以这篇《何处是家园》为例，作者在研究巴金的《憩园》之前，显然读了很多前人的研究成果，并且对其中两种最有影响的阐述模式做出了自己的判断，指出其或存在着“潜在的进化论表达”的倾向，或陷入“思想意义与艺术特色二分法的价值评判”，都有可能“忽略掉一些居于叙述缝隙中难以被整合的文本事实”，作者也正是在他所看到的前人研究的不足或缝隙中，找到了自己新的研究视角、思路与方法，于是，他也就有了自己的发现与想法。比如，他从《憩园》是巴金作品中“唯一的叙事者以作家身份介入故事”的这一现象入手，细致深入地分析了作为叙事者的作家与作者的关系，叙事者与他讲述的故事的关系中所显示的憩园故事与作家自我生命回忆的“重叠与纠缠”，以及憩园新旧两代主人公的故事之间同构而又参差对照的复杂关系，从而做出了自己对《憩园》的阐释：“其所蕴涵的，不仅仅是对封建家族的崩溃与衰败的抨击，更有对古老的家族文明的缅怀与追问”，“寻找与失落，回忆和遗忘，这两对彼此纠结互为前提的命题”，“作为结构性的元素参与到小说叙事话语的编织当中，从而升华为小说的生命主题”。这应该说是作者自己的发现，我读了以后也受到了启发，至少是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我过去认为《憩园》“底蕴不深”的成见，并产生了重读这部作品的欲望。我想，在加深人们对《憩园》的认识，提供一个新的视角方面，作者已经对巴金研究做出了自己的贡献。作为一个还在学习中的研究生，就算是不容易的了。当然，不足也是存在的。这篇文章我读了好几遍，总

觉得作者没有把他想讲的问题说清楚，说充分，这可能还是他自己就没有完全想清楚的缘故。还有作者似乎并没有否定前人强调的小说的启蒙主题，那么，这样的启蒙主题与作者所要强调的生命主题之间，存在着怎样一种相互纠缠的关系，而这样的相互纠缠与巴金的主体精神又有什么关系呢？把这些问题想清楚，讲透彻，可能对《憩园》的阐释就会更复杂，也更有意思。

2002年10月19日

## 自然科学与文化重建

这是一个大题目，不是我所能讲清楚的。这里只是想把问题提出来，希望能引起重视，并期待着有关的专家的发言。——我这是名副其实的抛砖引玉。

而且我对自然科学几乎一窍不通——如鲁迅所说，人是因为缺少什么才谈什么的；因此无法从自然科学本身来立论，只能从自己的专业出发，来谈一点门外的意见。

我想回顾新文化发展的一段历史。

1908年，鲁迅在他的一篇带有纲领性的文章《文化偏至论》里，提出了“别立新宗”的命题。“宗”即“宗旨”、“宗极”，是主要的，终极性的东西；这就是说，鲁迅在本世纪一开始，就给包括自己在内的中国知识分子，也给中国的思想文化界，提出了一个战略性的目标：要为20世纪中国的发展，提供一种全新的价值，一个终极性的理想与信仰——这也就是我们文题中所说的文化重建。这一任务提出的意义，是不用多说的；我们要讨论的是，鲁迅如何着手文化的重建。他当时写了几篇文章：一篇《文化偏至论》考察了中国与西方文化发展的历史与现状；另一篇《摩罗诗力说》专门讨论了文学的理想与发展问题。除此之外，他又写了《人之历史》，着重考察了人类研究的科学成果，例如康德的关于宇宙起源的“星云学说”，特别是黑格尔的“人类种族的起源和系统论”；还有一篇《科学史教篇》则详尽研究了西方

自然科学发展的历史；鲁迅对自然科学的最新成就，更是给予了特殊的关注：居里夫妇刚刚发现了镭，鲁迅在1903年就写了《说钋》，介绍、阐释这一最新发现的意义。从以上几篇文章看，鲁迅显然是自觉地从社会科学、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的综合研究与考察中来进行他的文化重建的，这样的思路与眼光和我们今天在这里讨论与提倡的学科交叉是非常接近的。而我们特别感兴趣的，是他对自然科学的关注。他强调的是自然科学的发展对人类思维发生的影响。因此他从黑格尔人类学研究中引发出的是关于“有生无生二界，且日益近接，终不可分，无生物之转有生，是成不易之真理”的思想（《人之历史》）；他认为镭的发现的伟大意义在于打破了物质可以穷尽的说法，“由是而关于物质的观念，倏一震动，生大变象”（《说钋》），并进而预言：以镭的发现为标志的自然科学的发展将“辉新世纪之曙光，破旧学者的迷梦”，“由是而思想界大革命之风潮，得日益磅礴，未可知也”（《说钋》）。鲁迅把自然科学的发展看作是思想革命的引发力，这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思想；这与他对科学的认识是直接相关的：他在《科学史教篇》里，反复强调，科学并不只是纯粹的知识，也不能仅以“实利”为目的；在他看来，“科学者，神圣之光，照世界者也”，这是一种“人性之光”，“洪波浩然，精神亦以振，国民风气，因而一新”。也正因为如此，他反对“惟知识之崇”，因为这会导致人生的“枯寂”，“如是既久，则美上之感情漓，明敏之思想失，所谓科学，也同趣于无有也”；并进而指出：“科学发见，常受超科学之力”，认为真正的“科学者”，必“有理想，有圣觉”，强调理想等人文精神，灵感、顿悟等非理性因素在科学发展中的作用。他由此提出了文学家与科学家（人文精神与科学精神）的互补，认为唯有如此，才会“致人性于全，不使之偏倚”：鲁迅最后的立足点与归结点依然是“立人”，人自身的健全发展。



如果说鲁迅在世纪初的上述论述，尚属理论上的探讨，在以后的发展中，就成为许多知识分子的自觉努力。今年正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八十周年纪念。在许多人的心目中，甚至在众多的有关研究与著述中，“五四”新文化运动似乎仅是一批人文科学与社会科学的知识分子发动的，新文化的创造与自然科学家无关，至少是关系不大。但这却是一个并不符合实际的误解。这里仅举一个被人们有意无意地忽略了的事实：陈独秀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的同一年，一批自然科学家也在美国成立了中国科学社，并创办了《科学》杂志，在其发刊词中即开宗明义地指出：“世界强国，其民权国力之发展，必与其学术思想之进步为平行线”，这与陈独秀在《青年杂志》创刊号上的主张：“近代欧洲之所以优越他族者，科学之兴，其功不在人权说下，若舟车之有两轮焉”，几乎同出一辙，都是提倡“科学”与“民主”以为救国之策。而《科学》在排版方面首次采用汉字横排法和全面采用西文标点符号，尽管其动因在便于“插写算术及物理化学诸程式”，实际上却是中国出版文化上的巨大变革，并直接推动了“五四”白话文运动。讲这些现代科学史上的常识，意在说明，终于在“五四”重建起来的新文化，是由社会科学、人文科学知识分子与自然科学家共同创造的。

问题是在以后的历史叙述中，自然科学家的作用逐渐被淡化与遗忘，以至于时至今日，我们（至少是我自己）在研究中国现代知识分子问题时，竟然把自然科学家排除在视野之外。更为严重的是，这种淡化、遗忘与排除背后，是一种观念上的倒退：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把自然科学理解为一种纯粹的实用知识，而这正是当年鲁迅等先驱者所竭力反对的。由此产生的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社会科学之间的分离，引发出了更为严重的后果：一方面是自然科学中的精神的失落，从事自然科学研究与开

发的知识分子与青年学生越来越远离社会思想文化的创造，导致了自身的工具化；另一方面，从事人文科学与社会科学研究的知识分子与青年学生，逐渐成为科盲，对自然科学的最新发展不仅一无所知，而且根本不感兴趣，我自己就是这方面的一个典型代表；而自然科学资源的缺失，就决定了我们所进行的人文科学与社会科学的研究，先天的就是跛足的。

今天，处于世纪末的中国思想文化界，又面临着一个文化重建的历史课题；而应该承认，为实现这一目标，我们的外部条件与内在基础都是不好的，其中一个重要方面，就是这里所说的自然科学的缺席。因此，有必要呼吁自然科学家对文化重建的更多、更自觉的参与，对我这样的从事人文科学研究与社会科学研究的知识分子也应该进行自然科学知识的补课，在这些方面，《方法》杂志是大有可为的。当然，最根本的，还是要从教育抓起，特别是大学生与研究生的培养，更要强调文理的交融，对此我另写有文章，这里就不多说了。

1999年1月27日根据座谈会上的发言整理而成

# 文学与科学原本是一家

——《民族植物学论文集》序

我，一个文学研究者，竟是毫不困难地就读完了这本植物学的论文集，甚至有一种古人所说的“夫子言之，于我心有戚戚焉”的感觉。——这真是一个奇妙的阅读体验。

其实这更是一种生命体验：唤起的是古老的原始的记忆。我们的鲁（迅）老夫子曾这样谈到文学之起源：“古民神思，接天然之闾宫，冥契万物，与之灵会，道其能道，爰为诗歌。”（《摩罗诗力说》）而本书的作者又告诉我们：先民在追求人自身与自然环境的和谐一致，所产生的植物崇拜中蕴含着“深刻的早期人类生态学观念”，这也正是植物学研究的起源（裴盛基：《民族植物学》）。我们或许可以由此得到一个启示：文学、宗教与科学（植物学、医学）在源头上，本是一家：都是人类对人自身、人与生存环境的关系以及未知世界的认知、想象与超越性追求。本书许多文章一再提及的，在中国古代典籍中所出现的交叉叙述：在有关“本草”的著作中有许多相关民俗、传说的记载，在宗教与文学著作中更有大量的关于植物及相关民俗、传说的描述，这都说明在中国传统中，文学、宗教学、民俗学与植物学、医学之间的交融。近代以来学科界限的逐渐明晰化，固然带来了研究的专门化与精细化的积极效果，但也出现了新的问题。鲁迅在上一世纪初即已提出，如果将科学与宗教、文学，理性与非理性截然对立

起来，甚至发展到“奉科学为主臬”，“别立理性之神祠”，“不思事理神必变化，决不为理科一册之所范围”，进而将宗教、民俗、文学（包括神话、传说）中的想象与形而上追求一律斥为“迷信”，这不仅使“人生必大归于枯疾”，而且也会影响科学本身的发展，因为在鲁迅看来，科学的发现“本于圣觉”，“常受超科学之力”。鲁迅由此发出了“迷信可存”的呼声，足以振聋发聩；同时强调“科学”本质上是一种“人性之光”，更是发人深省。鲁迅因此呼吁文学家与科学家的合一，以“致人性于全，不使之偏倚”（参看《破恶声论》、《科学史教篇》）。可惜的是，鲁迅的远见卓识，并未成为学界的共识，以致一个世纪以来，他的呼唤始终不免是空谷足音。正因为如此，当我看到植物学研究者致力于“民族植物学”的开拓，提出了“植物文化”等概念以及“将民族植物学与中国传统的本草学结合”的具体设想，以“探讨人类与植物的全面关系”为中心，将植物学与人类学、民俗学、宗教学、文学等融为一体，并且已经取得了一批可观的成果，我所感到的欣喜、共鸣，以至震动，是可以想见的：这关乎鲁迅等先驱人性全面发展的理想的实现，也是学术研究的一种正本清源，并且显示了新世纪“文理交融、多学科综合发展”的方向。而我从中感受到的植物学研究界的“同行们”的想象力与创造力，更是让我感佩不已：尽管我对植物学几乎是一无所知，却欣然应允作“序”，正是为了表达我的发自内心的敬意。

本书的主编与主要作者之一陈重明君是我的小学与中学同窗，当年我们情同手足，又有文学的共同爱好；以后我历经种种曲折终于走向了文学研究之路，重明却成了植物学者，在本草学研究上取得了瞩目的成就，又继续开拓“民族植物学”，于是我们就有了一次学术的与心灵的相遇——这样的殊途同归是命运的巧

妙安排，本身就具有某种象征性，也是人生一大快事：不亦乐乎，不亦乐乎！

2002年1月22日

## 为学生的网站写几句话

即将过去的这一年发生的一切，逼得我们重新思考一切。

但我时时感到做一个思想者的艰难。

我没有充分的知情权：我只知道别人希望、允许我知道的信息，我的独立思考与判断就失去了基本的前提条件。

我想交流，却受到了学者生活的狭窄空间的限制。

当我企图表达，却多所顾忌而过度自律：自己先就拔去了几根“骨头”，编辑、主编……再逐层抽筋，真正与读者见面时，只剩下思想的残体……

或许可以借助科学技术的力量获得相对自由而广阔的精神空间？

但历史经验又告诉我们：科学技术的每一个进步，在造福人类的同时，也会带来新的灾难，以至新的奴役。

“希望之为虚妄，正与绝望相同”。

但人总要抓住什么；因此，我还是写了以上这番话，在这世纪之交。

1999年12月18日写于燕北园

# 新世纪寄语青年

——应北京大学学生会之约而写

## 一

不想预测新世纪将给这个世界，给中国，给我们带来什么。只是希望北大学子，也希望我自己，目光永远向前——要听得见“前面的声音”的呼唤，不停地往前走；同时又目光向下——要立足于中国的大地，沉入民间，更关注人民的真实的生活，自己也做一个真实的普通人。

## 二

新世纪呼唤着新的思维，新的批判力、想象力与创造力，呼唤着更加自由的精神空间，我们每一个人都应为之做出贡献。

1999年12月18日写于燕北园

# 我存在着，我努力着，我们彼此搀扶着

## ——在长江读书奖颁奖会上的讲话

当走上领奖台时，我想起了中国古代哲人的一句话：“泉涸，鱼相与处于陆，相响以湿，相濡以沫，不若相忘于江湖。”

我们确实活得艰难，写得艰难。——要承受种种外部的压力，更要面对自己内心的困惑。

在苦苦挣扎中，如果有人向你投以理解的目光，你会感到一种生命的暖意。

现在，我正是从参与文章奖评奖的读者、推委、评委，以及今天到会的朋友们这里，感受到了这样的温馨，或许仅有短暂的一瞥，就足以使我感奋不已。

是的，我存在着。我努力着。我们又这样彼此搀扶着。——这就够了。

但我又是怎样地神往于那“相忘于江湖”的境界！——那将是一个永远的梦。

我的讲话完了。谢谢大家。

2000年10月28日



## 第三辑

# 运交华盖

我在向社会的黑暗宣战的同时，也必须向自身精神的黑暗宣战。或者说，外在的黑暗愈浓，我愈要唤起我内心的光明；外在的敌意愈多，我愈要激发出内心的爱。



## 1999 年总结

今年是我的本命年，又是 20 世纪最后一年。

这一年的事儿真多。——无论世界，还是中国。

我曾在一篇文章里这样写道：“这一年所发生的一切，逼得人们重新思考一切。”

但不知从何说起……

这一年我自己的事儿也真多。

仿佛是为了纪念我的六十岁生日，今年出的书特别多：先后出版了《学魂重铸》（1 月）、《拒绝遗忘：钱理群文选》（5 月）、《对话与漫游：四十年代小说研究》（8 月）、《话说周氏兄弟——北大演讲录》（9 月）、《走进当代的鲁迅》（11 月）等五本书；《心灵的探寻》也获重版，合作的《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更是一再重印。去年未出版的我主编的《中国沦陷区文学大系》（8 卷本）与《20 世纪中国文学名作中学生导读本》（全 10 册）在今年也引起了强烈反响，我还为《导读本》在中央电视台《读书时间》作了专题节目。

如此密集的出版“轰炸”，是我未曾料及的。其实，这里有一定的偶然性：许多书都是积压多年，历经坎坷（如《对话与漫游》、《走进当代的鲁迅》），挤到今年才出版的。

另一方面，继去年之后，我对中国的教育投入了更大的精力：除继续在北大开设“理科大一语文”，还先后受聘为教育

部“九年制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工作小组”顾问、清华大学“基于网络的过程性创新素质评价”项目的语文组研究顾问以及《中国青年报》举办的中学生作文大赛评委。而这些顾问、评委都并非挂名，而是有极大的投入的。以后又主持《新语文读本》的编写工作，更几乎是全力以赴。这对我来说，是一个重大的转移，自然是出于我的理想主义。而我也因此不得不重新学习，作为学习的心得，写了一批文章。

我突然发现自己成了“公众人物”。这不仅引来了许多有意义、无意义的额外工作，极大地分散了我的精力；而且在众目睽睽之下，就引出了许多意想不到的麻烦。

首先是我的一些观点、我的工作，触犯了一些人、一些利益集团的利益；但他们又不敢公开站出来与我论战，就只有借助政治之力，以济自己的思想之穷了。

今年4月与8月，北大有两次出面禁止我在全校学生中作公开的学术演讲，参加学生的活动。我写信向校长报告了此事，居然不作任何回答。

接着，有人打小报告，控告我在“大一国文”教材中选了“汉奸周作人”两篇写于“五四”时期的散文，选了“汉奸的老婆”张爱玲的小说与散文、“逃亡分子”北岛的一首诗，试图“毒害”青年。

几位年轻人编选了一本《审视中学语文教育》，将对我的一个访谈作为“代序”。中学语文界的某些自认为利益受到了威胁的“权威人士”，立刻迅速行动起来，到处打小报告。打小报告是有效的：我终于不再担任顾问。《中国青年报》作文大赛颁奖大会也不让我这个评委出席了。

不过，当意识到自己已经处于“众矢之的”的地位，被不同的人从政治与学术两个方面判定罪不可赦时，我反而平静了。细

细想来，当我选定自己的位置：要站在边缘说自己想说的话，坚持独立、自由、批判、创造的知识分子立场，我今天的命运几乎是已经注定了的。

当然，面对别有用心的诬陷与迫害，我不想掩饰自己的愤怒及对打小报告者的痛恨与蔑视；我不愿意辩诬，因为如鲁迅所说，这本身就是一种屈辱，我只能保持我的庄严的沉默。而作为一个学者，我的态度在本年出版的《拒绝遗忘：钱理群文选》“序言”里是早已表明了：我有我的“自尊”与“自重”，“清楚自己的价值”；同时对自己的研究的“局限”与“可能存在的陷阱”，更有清醒的认识，并“公开宣布自己的不足”。书写出来了，并且出版了，就成了一种社会的存在。有人喜欢读，说好话，自然是高兴的；有人批评，说三道四，也是欢迎的；如果说到痛处，更是感激的。但如果说过头了，无论好话、坏话，就得注意，其实心里是有数的：自己的书大概没有那么好，也不至于那么坏，既不深刻，也不平庸，说的是常识，是经过自己思考、研究，自己想说的话，如此而已。如有人一定要在我的身上做文章，也只有“由他去吧”，我有自己的事要做，实在没有精力纠缠。还是那句老话：我行我素，走自己的路。

这些外部的压力自然对我形成了一种伤害，但造成内心的痛苦与彷徨的原因，还要复杂得多。

今年发生的国内外的大事，都引发了我的许多思考。作为一个思想者，我无法、也不愿回避这些现实的尖锐问题，我必须保持与我的时代的密切联系。但我同时感到了言说的困难与困惑。

首先我没有充分的知情权，我的独立思考、判断与自由交流就失去了基本的依据。

更重要的是，当坚持自己的独立的批判的立场时，我发现自己必须“横战”，也即四面作战：不仅要对抗强权，更要面对“民

意”、“公义”。无论是爱护我的长者，互为声援的朋友，还是寄以希望的青年与学生，我都发现了自己与他们的深刻分歧。如果真的把心里的话都说出来，我就得准备充当“公敌”。

真正致命的，是我自身的矛盾与困惑。我的“追求所有的人的个体精神自由，反对一切对人的奴役与压迫”的价值理想，决定了我的批判的彻底性与广泛性以及“绝不妥协”的立场与态度，作为一个纯粹的思想者是可以如此的，我之提出“还思想于思想者”的主张就是为自己的这种选择提供一种说法。但作为现实生活中的一个知识分子，特别是当我的思想通过各种途径公之于众，它就必然要符合或触犯某些人或集团的利益，从而引起各种反应：或赞成，甚至寄以某种期待；或反对，甚至加以迫害。这都会形成对我的伤害。

迫害自不消说，期待本身对我所追求的个体精神自由也是一种侵犯。我真的经常这样想：我就是我，我是为自己而说话的，为什么要成为某种“代言人”，说人们希望我说的话呢？

我之所以对自己越来越成为“公众人物”感到不安、烦躁，就是日益感到了失去自我的自由的危险。但除非成为一个不问世事或述而不作的隐士，我事实上是不可能摆脱这种“公众”的“侵犯”的；而做隐士又是根本违背我的信念与追求的。矛盾的另一面是，理想的思想的选择可以不考虑利弊，不做妥协；但现实却必须讲利弊，在所谓“好与更好、坏与更坏”之间做出某种选择，同时也必须有妥协。这样，我的在理念中具有自足性与极大合理性的选择，在现实中却每每陷入了困境，显示出不可操作性，有时就显得特别的激烈而不可接受。我自己也明确意识到，并且一再声明：我主要是从我的理念出发，说“不应该如何”，而不回答“应该怎样做”，因此并不奢望用我的思想、理念去“指导”实践，而只是希望对可能做出的现实的选择起到某种

制约作用。这是一个低调的自我期待，局限性是明显的，但我却坚信局限与价值同在。人们一般都对现实操作更感兴趣，对我的不具（也不考虑）操作性的、因而是妥协的思想立论，常常感到过分脱离实际，这一点我是承认的，但是否因此就毫无价值呢？

我确实常常感到自己的不合时宜，并且常常处于失语状态——刚过去的这一年尤其如此。

写到这里，突然想起一件小事：在中文系团委与学生会组织的“迎接新世纪”的联欢会上，主持会议的学生突然要我对学生们说一句话，这本是晚会中应有的节目，我却想了鲁迅的《立论》，我知道应该说（也是人们期待我说）“万事如意、心想事成”之类的祝词，但新的世纪真的就能够一切如愿以偿吗？……但在这样的场合，我能对学生直言我的悲观与怀疑吗？……一时间我什么话也说不出，同学们惊讶地望着我，我为自己的失语狼狈不堪，事后又感到惴惴不安：我为什么如此的认真，让同学们失望呢？……

行文至此，我又有了新的怀疑：我是否自觉、不自觉地夸大了这一年的种种不快乐了呢？别的不说，1999年，我的旅游史上的记录就颇可观：不仅与老伴同游俄罗斯，实现了青少年时代的梦想，而且平生第一次领悟了蒙古大草原特有的魅力，还两次南下讲学，并有了数百张摄影作品，其中不少堪称“杰作”：那是揭示了我的心灵深处最柔美、欢乐的，也许是更为根本的方面的，是我的文字里很少流露的。我的自我表达，其实是有两种方式，而且是互为补充的；我常说，自己更重视摄影作品的“成就”：这并非只是戏语。

而且，我也并不总是孤独的。今年，我得到了两个意味深长、意义重大的奖，都是北大给我的。一是学校授予我“一九九八年至一九九九年度教学优秀奖”，这是对我这一学年为理科学生

开设“大一语文”课鼓励。而如前所说，我的“大一语文”教材是被人上告了的；在这种情况下，中文系的学术委员会与有关校领导通过这种方式对我表示支持，是很不容易，令人感动的。年底，北大学生又将我评选为“最受学生爱戴的十佳教师”之一，据说，我的得票是最多的。一位自称是“一个没有听过您的课的，您不认识的您的学生”给我写了一封信。信中说：“这次评选是民主提名，民主选举，其结果还是相当公允的。由此可见，同学们对您还是很认同与尊敬的。我对您的情况（如在学校‘挂名’等）只是略有所知，来自‘上面’的压制是令人厌憎的，有时也会让人心灰意冷。我听了您‘五四’时作的讲座。您说您爱北大，却已经很少到校园里来了。听得出您的真诚，也听得出您的无奈。但我想，作为一名教师，得到学生的认可和爱戴是最值得欣慰的事，您的当选，也是我们的安慰。”信的最后，还写了这样一段话：“想告诉您，很喜欢您的笑，笑得天真，爽朗，没有机心，灿烂极了。我想，一个可以那样笑的人，绝不会不可爱（请原谅我的‘童言无忌’）。喜欢您，为了您的真诚，为了您的赤子之心；希望您经常到北大来，为了您挚爱的这片园子，为了这片园子里的您的学生们。”读了这番肺腑之言，我真有若获知音之感。已经不只一次听见学生说我“可爱”了——坦白地说，在我的各种评价中，这是我最喜欢、最珍视的，我甚至希望将来在我的墓碑上就写上这几个字：“这是一个可爱的人。”这正是我的终生最大追求。而这位学生对我对北大的情感的理解，也让我感动。我确实经常尖锐地批评北大，也不想否认对今日的北大的深刻的失望，我也因此被北大的某些人所厌恶，但真正懂得我对北大刻骨铭心的爱，并且支持我的，也是北大人：北大永远是我的精神圣地。现在，岁末有了北大人对我的这番奖励，这一年所有的烦恼都烟消云散了。



此刻，我的心里突然充满了柔情。一年前，我曾写过这样一段文字：“尽管瘢痕依在，但灵魂的硬壳下，完整地保留着柔软的心”——以此来结束这篇“世纪末的总结”，大概是最合适的。

昨天——2000年的第一个早晨，我接到了一位新结识的在海口中学任教的友人的电话，告诉我，她和学生一起，到海边迎接了新世纪的第一片曙光。她说：“太阳美极了。”

这我是相信的。尽管新的千年，会有新的灾难，新的困惑：这也是我深信不疑的。但新的太阳已经升起，我们就应该毫不犹豫地迎着她向前走去，而且不要停息。

1999年12月30日夜——2000年1月1日至2日

## 2000 年伊始

### 一、读的第一套书

这是《郭小川全集》，读着它，又回到了已经成为历史的那个时代。

可以说，我是读郭小川的诗长大的。高中时读他的《投入火热的斗争》，以后还有《向困难进军》等等，都有着同一个副题：“致青年公民”。我和我的同学理所当然地认为这是为我们写的，而马雅可夫斯基式的楼梯体的诗歌形式颇便于朗诵，也很对我们的胃口。在大学时喜欢读的是他的《县委书记的浪漫主义》、《雪兆丰年》、《月下》，也许是诗中的浪漫激情引起了共鸣，感兴趣的还有诗人在诗歌节奏感上做的尝试。同时期的《深深的山谷》、《白雪的赞歌》，注意的是叙事诗的写作，当时还未经世事，似乎进入不了这些诗的境界，是以后才逐渐读懂的。后来从《文艺报》上看到对《望星空》的批判，知道来头很大（经过“反右”，以及以后的批判运动，这一点“世故”我是懂得的），就努力去理解，却也还是不甚了然，倒是心里涌上一丝“惆怅”——莫非这也是一种“共鸣”？我有点害怕，就不再去深想了。大学毕业后，我被分配到了边地的一座山城，尽管处在相对封闭的文化环境里，仍然努力追寻我所喜欢的作家、诗人的踪迹。当连续读到了诗人 60 年代写大工业城市、写南中国海、写北大荒的诗：《煤都夜景》、《厦门风姿》、《乡村大道》、《甘蔗林—青纱

帐》、《秋歌》、《祝酒歌》……真有欣喜若狂之感：诗人终于没有辜负我这样的忠实的读者的期望，写出了这么多的好诗：不仅依然充满激情，而且在新诗的形式与艺术上做了更为广泛而大胆的探索。我是这样的珍爱这些给我多少有点孤寂的心带来温馨与力量的诗，在“文革”的烈火中，把好些藏书都付之一炬时，却小心地将《甘蔗林—青纱帐》这本诗集保留了下来。到“文革”中后期，当我周围逐渐聚集起一群年轻人，组成所谓“民间思想村落”时，在热烈地讨论“中国向何处去，世界向何处去”这类大问题之余，我也经常给同是文学的爱好者的青年朋友朗读作品，除鲁迅的《野草》、曹禺的《日出》之外，就是郭小川的诗。这当然也有一定的偶然性：我们当时手头就只有这些作品（这在今天的年轻人恐怕是难以想象的）。但不管怎样，诗人郭小川正是在中国的年轻一代处于精神的饥渴与思想的迷茫的时刻，走到了我们中间；他的诗在这不寻常的时代显示出了自己的真正价值。这可以说是一种精神的结缘吧。——写到这里，突然想起，以后我走上了学术岗位，很自然地就把当年结下缘分的鲁迅、曹禺作为研究对象，写下了相应的著作；而对郭小川，却因为不在我的研究领域之内，没有写任何文字，这是一笔精神的“欠账”，今天在这里发言，就算是一个补偿吧。

回顾这段“郭小川诗歌的接受史”，我想说的是，无论是精神的影响，还是诗歌艺术的探讨，郭小川都无愧为我们那个时代——20世纪五六十年代最具有代表性的诗人，他将作为一个“时代诗人”存在于中国20世纪诗歌史中，也存在于我们这些同时代人的永远的记忆中。

今天早上，窗外下着2000年第一场大雪；我坐在书桌前，大声朗读郭小川写在四十一年前，也即1959年1月4日的《雪兆丰年》——

天更冷，

风更寒，

……

街上的人儿，

谁也不回还。

好兴致，

让我惊羨！

……

整好衣襟，

且直直地立在风前。

好朋友，

与你们一同收览。

一切。

一切！

果然。

果然！

真是。

真是！

这般。

这般！

千里平地，

万里江山，

在风雪中，

显得如此庄严！

……

或许有人会认为这些诗句过于平实，但不仅当年让我陶醉，就是今天读起来也依然怦然心动。我不想对此做理论的分析，只愿如实记下我的感动。——一首诗，能够长久地让人（哪怕只是一部分人）感动，这就够了。

2000年1月11日写于燕北园

## 二、第一次聚会

1月6日，进城参加一次讨论会，很多朋友都来了。难得有这样的机会，大家都很高兴，会上、会下谈得很多，气氛很热烈。谈到新的千年，似乎特别乐观，做了种种美好的预言，对实现各自的理想充满了信心。轮到我发言，却突然失语，就像那天在中文系学生组织的新年联欢会上一样。我再一次感到了热闹中的寂寞与孤独，真有点害怕。2000年伊始，就一再说不出口，这是不是也是一种预兆？

后来，一位朋友发言，说到知识分子的分化，说到要准备过一段最艰难的日子，说到我的心里去了。

2000年1月11日补记

## 三、读一本新杂志

这是一本熟悉的老杂志，如今全面更新：在更为豪华的包装下，却看到了如下宣言——

我们认为，在眼下，文学与社会与大众，就像克林顿与莱温斯基一样，是一种不恰当的关系。许多作品都可能是优秀的，但他们同样也是冷漠的：在作家与社会之间，在作品

与大众之间，可能会有一些甜言蜜语，但更多的时候却是剑拔弩张，至少也是形同陌路。我们认为，这不正常，人民也不答应。我们想代表人民向作家提出要求：请你们像李白一样赞美金陵的美酒，请你们像白居易一样把写好的作品先念给白发老太们听一听，人民已经不希望再从如此多的作品中读到沙滩上的玫瑰，雨中的教堂和布拉格的鸽子。

本来，这也不失为一种文学主张：强调文学应更接近社会与大众——坦白说，近来我也在思考这个问题，并且是同意这样的观点的。但我不能理解的是，径直说“我们认为”就可以了，为什么偏要拉上“人民”做一面大旗呢？口口声声“人民也不答应”这样的话，我们在20世纪听得多了：反胡风时，就说“人民不答应”；以后，从“反右”到“文革”，一路高喊“人民不答应”，其实是“人民代言人”不答应，凡“不答应”的作品通通铲除，最后只剩下八部“样板戏”。这样的“历史遗产”难道到了新千年还要继承下去吗？什么“我们想代表人民向作家提出要求”，究竟谁给你们这样的权力？——现在，我们不是在官方，而是在民间听到了这样的霸权的命令，这将预示着什么，难道不应该好好想一想吗？

#### 四、一本新书

今天，一位朋友送来一本新出的书，据说刚刚举行过讨论会。封面的广告词就让我吓了一跳：“对当下中国文学的一次暴动与颠覆，把获得了不当声名的‘经典’作家拉下神坛。”本来，前一段时间，确实存在着对一些作家、作品评论过高，甚至胡乱吹捧的现象，对此提出批评（哪怕是尖锐，甚至尖刻的批评），进行“降温”，是有助于文学批评与文学的健康发展的。但我同样

不能理解的是，为什么要使用“暴动”、“颠覆”这样的暴力语言呢？至于“把某某拉下（马）”这样的口号我们在20世纪也是听得太多了。也许有人会辩解说，这不过是一种意在引起轰动效应的商业行为。但人们不能忘记，语言的暴力背后是一种“动不动要人死”的观念与思维方式，而且是很容易转换为暴力行动的。20世纪这方面的教训实在是太多了：“文革”就是从暴力语言的批判迅速转化为血腥屠戮的。人们为什么总是这样健忘呢？

我不怀疑开始的动机可能是好的，却一再看到了猖獗了一个世纪的专制主义的“故鬼重来”的危险：这是我在2000年伊始就产生的忧虑。

2000年1月11日

## 五、第一个“奖”——在席殊书屋新闻发布会上的讲话

非常感谢席殊书屋和评奖委员会的朋友，将我的《话说周氏兄弟》评为1999年“十佳文学图书”之一，这是我第二次获得这样的民间奖了：去年我的《1948：天地玄黄》也得了奖。看来，我与席殊书屋是很有点缘分的。但我却与国家奖无缘。只是《丰富的痛苦》那本书得过吉林省的一个奖，还有两篇散文、一篇论文得过贵州省的两个奖——贵州是我的第二故乡，在那里得奖，我也是很高兴的。我曾开玩笑说，如果我在地方院校，恐怕连教授也评不上。“评奖”当然是有倾向性与导向性的，我也由此更清醒于自己的边缘位置，并因此十分珍视这个“席殊奖”，这是来自民间的对我的肯定与支持，是含有一种特殊的分量的。我将继续坚持自己的选择：自觉地站在边缘位置上“自言自语”，说自己想说、愿意说的话，尽可能地多说真话。就以此作为对朋友们的支

持、鼓励的一个回报吧。

2000年1月15日补记

## 六、第一个“判决”

意外收到了寄来的《文艺报》，是1月11日这一天的。翻开一看，第三版登了一篇《关于沦陷区文学评价中的几个问题》，是针对我为《中国沦陷区文学大系》所写的“序言”而写的。明说是“商榷”，结论却非常可怕：“混淆是非，错树样板，把沦陷区文学搞得更加面目全非，混乱不清”，并且扬言“民族大义要明，大是大非要分”。那么，我又是罪莫大焉了。

这又是一个开始，一个预兆。

1月15日补记

## 七、第一个反省

连日都在读张中晓的《无梦楼随笔》：这是为写“文革”那本书做准备。不知不觉之间，又把自己摆了进去，并为下面几段话所震动——

在这多难的人间，人成为畜生的机会太多了，人堕落为畜生的可能、遭遇也太多了。举凡贫困、监禁、苦役等等，都能使人堕落为兽，使人性情粗暴，脾气乖戾，不尽人情。

在孤独中，人的内心生长着兽性；在孤独中，人失掉了爱、温暖与友情；在孤独中，人经历着向兽的演变……

孤独是人生向神和兽的十字路口，是天国与地狱的分界线。人在这里经历着最严酷的锤炼，上升或堕落，升华与毁



灭。……孤独属于智慧者，哲人在孤独中沉思了人类的力量和软弱，但无知的庸人在孤独中只是一副死相和挣扎。

人生事务之中，切忌与人有敌意情绪，……人都有缺点，本来可以马虎过去的事在敌意的环境之中变成了致命伤。

落魄时所能受到的种种奚落与欺侮，如果用往日同样的自尊心来对待，因而生气和伤心，那么也未免过于认真与严肃了。就事论事，而又能超越于事，宠辱不以为怪，非礼之加不以为异，合适地对待，但又统驭于上面不致受其腐蚀，才是清明的理智，才是心灵的自由。

这里的每一句话都可以看作是张中晓身处逆境中的自我警戒，自我坚守。他深刻地意识到，专制主义的压迫，由此形成的人的孤独感、受压抑感、屈辱感等等，不仅会激发起人的正当的愤怒与反抗，同时也会造成精神的伤害，甚至反抗本身也都是把双刃剑：在刺伤对手的同时，也会伤害自身。这种伤害突出地表现为一种“怨毒”，对他人、世界的敌意，对爱与光明这些人性中最柔和的部分的有意、无意地排除，这种人性的硬化，粗暴与怪戾，构成了自我的精神的黑暗，鲁迅所说的他痛恨而又除不去的内心的“鬼气与毒气”，说的就是这种在反抗外在的黑暗中伤害自身的精神的黑暗。张中晓在这里称之为一种精神“腐蚀”，是一个深刻的观察：专制主义不仅造成了人的“奴化”，也“毒化”了受害者的心灵，这不仅是在更深的意义上剥夺了人的精神自由，而且也会使被压迫者在“以恶对恶”中自身由人变成兽。张中晓这里提出的“孤独是人生向兽和神的十字路口”的命题就有着极其深刻的意义：面对严酷的外在压迫，人应该以更为强大的心灵力量，充分地发扬自我人性中的“神性”，压抑“兽性”，

达到精神的超越与升华，显示出清明的理性，从而进入真正的自由境界。

张中晓的这些话，对于我，同样是一个警示。我现在的处境当然比当年的张中晓要好得多，但也经常由于外在的种种压迫而感到精神的压抑、屈辱与孤独。特别是最近一段时间，更是在多方挤压下陷于极度的烦闷、烦躁之中，内心郁积着一股股无名之火，似乎随时都会爆发——前两天，就因为一件小事，向一个学生大发脾气，这是我多年所未曾有过的。我越来越发觉自己与周围的世界的不和谐，从而产生某种敌意；越来越自觉意识到自己的思想与他人的分歧，从而产生深刻的孤独感。我变得格外的敏感与脆弱，也格外的愤激。我已经无法平静下来，安心做我的学术研究。而且已经有了倦怠之感，这也是我从未有过的。张中晓的思考让我看清了自己的“病灶”所在：我同样被自己对专制强权的反抗刺伤了，同样处在向神向兽的十字路口。我在向社会的黑暗宣战的同时，也必须向自身精神的黑暗宣战。或者说，外在的黑暗愈浓，我愈要唤起我内心的光明；外在的敌意愈多，我愈要激发出内心的爱。张中晓的这段自励也是应该是我的——

处事贵己心自由，能超越事上，而不为事所限制，……于是能从容，能主动，能无私，能达权（将事能弥，遇事能救，既事能挽）；能长虑（未事知来，始事知终，定事知变）；能提得起，放得下，算得到，做得完，看得破，抛得开；能耐烦，能镇定。己心清醒警惕，能应变。

这是一个更高的境界，应努力追求。

1月18日记

## 八、网上传来的新的鲁迅观

这个信息早已传来，当即引起了我的兴趣，今天整理书桌，又翻了出来，仍觉得有意思，姑且抄录如下，聊以备忘——

在20世纪即将过去，21世纪即将来临的今天，我们不得不承认，新中国是按照鲁迅的蓝图建设的。不论是伟大的工业革命，还是伟大的文化革命，不论是摧枯拉朽的人民战争，还是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无不体现了鲁迅的思想，鲁迅的抱负。因此，鲁迅必定是本世纪中国最伟大的灵魂。

鲁迅作为“民族魂”的意义，并不在于什么“民族主义”的思想，而在于他坚定地站在民众的一边，坚定地以反对奴役和压迫的革命造反精神为武器，指引着我们苦难的民族摆脱三座大山，摆脱落后愚昧的观念羁绊。

鲁迅作为“独立知识分子”的意义，并不在于“个人解放”的价值，而在于震响了旧中国万马齐喑的知识界“于无声处”的惊雷，在于绝不宽恕哪怕一个“帮忙”、“帮闲”的奴才文人，在于对人民当家做主的大多数穷困人民对少数敌对分子的绝对专政坚决的维护。因此鲁迅的独立在于他是唯一的成熟的人民作家，唯一的从旧营垒来的无产阶级的忠实的代言人。那些被人民专政打得头破血流的资产阶级文人妄言什么‘凭鲁迅的血性，在解放后也绝没有好下场’，他们是大错特错了，因为对他们的专政正是鲁迅的意图，剥夺他们的权利正是鲁迅的追求。鲁迅作为新时代新人的风骨是根本上与那些蝇营狗苟的畜类们截然不同的。他们从丧家之犬的实用主义利益出发来看待伟大、光荣、正确的鲁迅，只能是可耻的，可笑的。

因此，无论从什么角度，无论用什么工具来看鲁迅，都是人们的英雄，都是正气凛然、光焰万丈的伟人。如果因为这样的事实，有些人就说我们把鲁迅送上了神坛，那么，我们就永远让鲁迅高居在神坛之上，永远以我们喜欢的“高、大、全”的面目让敌人彻夜噩梦、胆战心惊去吧！

因此，一切想要去掉鲁迅“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的光荣的称号中任何一项的人必将遗臭万年！

因此，一切无视鲁迅作品的质量、数量的优越、并企图用剥削阶级的文艺观来衡量人民艺术辉煌成就的小爬虫必将遗臭万年！

因此，一切复辟者遗臭万年！一切既得利益者遗臭万年！一切个人主义者遗臭万年！一切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遗臭万年！

这是迄今为止，对鲁迅的“最高评价”：鲁迅不再是“小兵”，而是“新中国蓝图”的制定者，因此，“伟大、光荣、正确”这样的特定的“桂冠”现在也被戴在鲁迅的头上了。因此鲁迅被派定去“维护”在他死后才建立起来的“新中国”的“绝对专政”，去指导他无法预知的“伟大的工业革命”、“伟大的文化革命”、“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以至“摧枯拉朽的人民战争”。

因此，公开宣布要将鲁迅“送上神坛”就是顺理成章的。但当这位作者进一步宣布，那“高、大、全”的面目是“我们喜欢的”时，也就暴露了他们自己也是用“实用主义”的态度去制造鲁迅的“英雄”形象的。

本来，作者的观点也不无合理的因素，例如强调鲁迅“坚定地站在民众的一边”。或许作者是针对将鲁迅“右派化”的倾向，而有意地将鲁迅“左派化”的。但我不理解的是，为什么总要从

一个极端跳到另一个极端？而且，鲁迅是能够用这样简单的“右派”、“左派”的政治划分来概括、归类的吗？

更让我感到惊异的是，为什么如此轻易地把不同意见者打入“另册”，动不动要人“死”，并且“遗臭万年”？还有什么“小爬虫”、“畜类”，这都是“文革”时期的语言，是鲁迅早就严厉批评过的“辱骂与恐吓”的“流氓”语言，为什么到了“21世纪即将到来”的今天，仍然如此津津乐道？这莫非也是一种预兆？

记得一位学者断言，在新世纪里，鲁迅将继续成为人们阅读、思考、研究、言说的对象，这我是相信的。但将会有怎样的阅读、思考、研究、言说，却是无法预计的，也是我感兴趣的，只有拭目以待了。

1月26日补记

# 我在做这些事

——2000年总结

一

这一年，我在做什么事呢？

主要做了两件事。

第一件事，是为中学生编一套大型课外读物——《新语文读本》。我和编委会的朋友都自称为理想主义者，给自己立下的宗旨是：“把我们民族与人类文明的结晶，把最好的精神产品贡献给我们的孩子”，在一定意义上，这是为未来做建设性的奠基工作，同时这这也是一个学术工作，期待在编写过程中逐渐形成自己的中学语文教育的理念与教育体系。我为这两个目标兴奋不已，不仅投入了极大的精力，而且可以说是把整个心都扑上去了。

于是我的日记里就有了如下记载——

1月31日——2月9日 为《新语文读本》选目，并起草《编写大纲》。（《新语文读本》编选工作于1999年9月17日启动，并于1999年9月、12月开过两次编辑工作会议。）

2月10日——2月19日 在广州召开编辑工作会议，提出选目草案。

3月23日——4月1日 审读《新语文读本》篇目。

4月26日——4月30日 将篇目最后定稿，并起草《编者的话》。

5月1日——5月4日 在上海召开编辑工作会议，讨论“注释”与“阅读建议”。

6月16日——8月15日 审读全书，逐篇修订白话文部分的注释与阅读建议（有相当部分系重写），并输入电脑。

8月16日——8月24日 在广州召开编辑工作会议，将全书定稿。

10月1日——10月8日 总结《新语文读本》的编写工作，撰写《答记者问》与《编辑手记》。

将以上工作日程表与我编写的《“大批判”记实》相比较，就可以发现，每一次批判高潮都伴随着一个工作高潮。特别是6月至8月那两个月，面对外界空前的压力，我每天早上七时起床，中午稍事休息，一直工作到深夜十二时。后来统计了一下，两个月输入电脑的文字竟有二十余万字。后来为保证我们的心血之作《新语文读本》能顺利出版，送到中学生手中，我和几位朋友决定退出编委会。当天我的日记里这样写道：“晚开会，报告此事时，竟哽咽无言，众亦默然。会后回到房间，坚持将读本编完，已是凌晨二时。”虽已退出，我仍觉得自己责任未尽，又利用国庆长假，赶写总结文章，竟以每天五千字的速度，七天之内（八天中休息了一天）写了三万五千字。——以高强度的工作来对抗外在高压，这是我“文革”中养成的习惯：每次批斗会后，我都是读书或抄书到深夜的。

而且，只要一进入工作状态，我就会忘记一切，沉浸在另一种境界之中。

我在给一个关心我的不相识的年轻朋友的信中，这样写道——

尽管有压力，但我仍然生活得很好。我在工作。这是一

件极重要，也极有诗意的工作。我因此生活在“诗”中。就以此，以心中的光明，来对抗外在的黑暗。

我确实是把《新语文读本》当作一首“诗”来编写的。首先，我们设定的两大目标本身就极有诗意。我曾经写过这样一段文字：“我想象着，当新世纪的曙光初照，这本精美的读物，送到孩子们的手中，将带来多少惊喜，微笑和沉思啊。刹那间，我真的陶醉了……”

其实，就在编写过程中，我已经不只一次的陶醉过了。曾有过这样一次难忘的生命体验：那天清晨，我在审读从梭罗的《瓦尔登湖》里选出的一段文字，眼睛突然一亮，不禁大声朗读起来——

每一个早晨都是一个愉快的邀请，使得我的生活跟大自然自己一样地简单，也许我可以这样说，同样地纯洁无瑕。……据说在成汤王的浴盆上就刻着这样的字：“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我懂得这个道理。……在休息了一夜之后，人的灵魂，或者说就是人的官能吧，每天都重新精力弥漫一次，而他的禀赋又可以去试探他能完成何等崇高的生活了。可纪念的一切事，我敢说，都在黎明时间的氛围中产生。《吠陀经》说：“一切知，俱于黎明中醒。”诗歌与艺术，人类行为中最美丽最值得纪念的事都发生于这一个时刻。所有的诗人和英雄都像曼依，那曙光之神的儿子，在日出时他播送竖琴音乐。……早晨是我醒来时内心有黎明感觉的一个时候。……（我渴望着）生活得诗意而神圣。……人类无疑有能力来有意识地提高他自己的生命。



我的心突然变得柔软，仿佛那曙光之神的儿子的琴弦轻轻拨动我的心弦，而且真的有一种“黎明感觉”向我悄悄袭来……那是生命的“黎明”：人重新开始一切，“跟大自然自己一样地简单”，像婴儿一样地“纯洁无瑕”，用好奇的眼睛去发现世界，也发现自己，饱尝着发现的喜悦，生命也获得了“日日新”的新鲜感，进入一种“诗意而神圣”的境界。我直觉地感到自己似乎抓到了生命的真谛，生活的真谛，文学的真谛，写作的真谛；于是，用颤抖的手写下了如下“阅读建议”——

你早晨起来，内心有作者所说的“黎明感觉”吗？你向往“生活得诗意而神圣”的境界吗？

后来，在另一篇选文《散文的诗意》的阅读建议里，我又写了这样的一段话——

作者建议向画家学习观察。作者说，真正的画家总是和孩子一样，“用初次的眼光去观察一切，没有因袭的重担，每次都像重新观察”。——这对你的作文写作有什么启示？请“重新观察”你每天都要走过的“上学的路上”的景色与人物，写一篇短文。

显然，我是把自己对作品的发现与体验写到阅读建议中去了。——我的研究从来都是有主体投入的，这甚至形成了某种学术风格。现在，没想到连编书也如此的投入，真是本性难移了。但这样的主体投入也并非完全没有意义。我们的新语文读本有一个基本观念：阅读就是读者与作者之间的对话；而学校里的阅读教育的特点在于它的阅读材料是按照一定的教育目的编写的，学

生的阅读活动又是在教师指导下进行的，这就产生了编者、教师、作者与学生互动的多重对话关系。这包括编者与作者的对话，编者与学生的对话；教师与作者的对话，教师与学生的对话；而以上对话最终目的又是要促进学生与作者的对话：这才是阅读教育的根本。从这样的观念出发，我们读本编写工作就是与选文的作者进行精神的对话与心灵的交流。而我们的作者又何等样的人物啊：那是荷马、苏格拉底、但丁、布鲁诺、莎士比亚、塞万提斯、卢梭、雨果、托尔斯泰、泰戈尔、居里夫人、爱因斯坦……是孔子、庄子、老子、屈原、司马迁、陶渊明、李白、杜甫、苏轼、蒲松龄、曹雪芹……是鲁迅、老舍、沈从文、冰心、茅盾、巴金……还有许多当代的杰出作家、思想家……在6至8月的两个月里，我就是这样整天地读啊写啊，超越着时空，和这些思想的巨人，文学的大师，这些民族与人类文明史上的灿烂群星，交谈着，争辩着，忽而畅怀大笑，忽而默默沉思。然后，我牵着中学生的手，把他们引导到这些巨匠的身边，互作介绍以后，就悄悄地离开，让他们——这些代表着辉煌过去的老人将与创造未来的孩子在一起心贴心地谈话，我只躲在一旁，静静地欣赏，时时发出会心的微笑……就为了这个瞬间，我无论付出什么样的代价，都是无怨无悔的啊。当我与人类文明的代表对话，精神随之升华到一个新的高度。

这真是一次奇异的生命体验：一方面是对我的咒骂声不绝于耳，一方面却在进行美妙无比的精神对话；头顶着吓人的罪名和随时都会落下的惩罚的利剑，内心却充盈着对孩子、对民族与人类未来的爱；自然时节正当酷暑，却吹拂着阵阵政治的冷风，而自我灵魂深处又分明洋溢着盎然的春意：就这样，冷与热，善与恶，美与丑，真与假，爱与恨，光明与黑暗……竟在同一时刻如此猛烈地加诸一身。这是难遇的人生经验，我由此而懂得不管外

在环境如何险恶，人仍是可以创造并且坚守住自己的“诗意而神圣”的精神生活的，我并且建立起了一个信念：“人类无疑是有力（依靠自己的力量）来有意识地提高他自己的生命的。”但无可否认，这同时是对人的身心的巨大伤害：在两者的对抗稍有缓解时，我就被病魔击倒了。

## 二

但这是年底的事。在此之前，我还做了一件事：和许多没有见过面的大朋友与小朋友通信。

我过去就很重视与读者的通信，认为这是学院高墙内的学者与读者以至社会发生联系的一个有效的方式，我曾颇为自豪地宣称自己与大多数省份的读者都有联系，拥有大批没有见过面的朋友。最近这几年，由于我对中学语文教育的关注，特别是2000年的大批判把我推到了一个引人注目的位置，更是收到了大量的中学教师、学生以及大学生的来信。我于是将与这些读者的通信当作一件重要的工作来做。2000年这一年，除了平时随看随复之外，还在5月与9月先后用了二十多天的时间集中偿还信债，全年大概写了三百多封信，有的还输入了电脑，保存下来，算起来竟也有六万多字。

我从来认为自己与读者的交往，绝不是单向的给予：在某种意义上，我从读者那里得到的比我给予他们的要多得多。特别是2000年，当语文教育界的“权威”向我大加讨伐时，处于基层的语文教师与中学生的声音，对于我就有着一种特殊的意义：我真正应该倾听的是他们的意见，并从他们那里获取力量。在我收到的大量来信中，也有对我的批评。如一位老教师来信说我对第一线的老师批评过严，体谅不够（这可能有某种误会，我当过中学老师，自认是能够理解他们的难处的，《审视中学语文教育》一书

中，有些作者对老师的苛评我也是不同意的)；另一位则含蓄地提醒我：在中国的条件下，“婉言要比直言的效果好”，对这样的善意的批评我是十分感激的。当然，不赞同我的教育观点的老师是大有人在的，这很正常，但他们一般不会写信给我，这一点我心里是有数的。因此，写信的老师与同学，大多数对我都有一种认同感，于是就有了坦诚的心碰心的讨论与交流。

一位上海的中学老师来信，自称是我的“受害者”——当年因读了我的《名作重读》而懂得了理想的中学语文教育应是怎样的，却陷入了现实的困惑中。这封信给了我很大的震撼，牵动了我的绵绵思绪，于是，在回信中，写了这样一番话——

你我都清楚，我们正在进行的教育改革，包括中学语文教育改革，所能达到的程度是极其有限的，甚至随时有走过场甚至变质的危险。但这毕竟又是一个时机，我们不可能坐等一切条件具备了再来进行。这样，我们只能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尽可能地多做点事，同时又不能寄以太大的希望。这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非得有鲁迅倡导的韧性精神不可。在这一过程中，就不免会产生你所说的种种困惑，陷入“语文困境”之中。但又必须坚守教学岗位，这是你这样的有思想有追求的教师真正感到进退两难之处。而像我却是主动跳入这一黑洞之中，就遇到了许多麻烦，这也是自讨苦吃。你说我“害人”，其实是首先“害己”的。而我们这些“害人者”与“被害者”，却又偏偏要在一起讨论把自己害得不浅的语文教育问题。在有些人看来，这是不可思议的，就只能“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说我们“别有用心”了。这是多么可悲的隔膜啊。

收到了一位浙江的年轻教师的来信。几年前我曾经在一封信里鼓励他坚守在中学语文的教学岗位上，此番来信却告诉我，他“无法再忍受下去”，已经考上了某大学的研究生，“中学吸引不了优秀的人，他们来了也会走掉”。他在信中说：“终于要走了，我很庆幸，也很失落，我就这样离开了我所热爱的教育事业，离开了我的理想，离开了恰恰需要我这样的老师的学生们。”信的末尾，他这样写道：“钱老师，我不知道该说什么，我只想告诉您，我要走了，我还希望您能快活地生活，因为您是‘好人’。我无力去阻止那些对您的伤害，我只能说：我更尊重您，爱您。”

这一回，我是真正地感动了，而且有一种说不出的幸福感。于是信笔写下我的内心感受——

……你说我是“好人”，就如同我的学生说我“很可爱”一样，都让我开心，并感到一种温馨。我们都是普通的人，自己面对压力时，只能默默忍受，看到他人受难，也只能以无言表示声援，如你信中所说，“不知该说什么”——也正是这“不知该说什么”，让我深深地感动了。

于是，我仍“快乐地生活”着——真的，快乐的。我的老伴也说我这几天心情特别好，原因就是我在给你这样的朋友们写信。写着，写着，心就变软了，变热了，以致什么也说不出来了。

你终于走了，“离开了恰恰需要我这样的老师的学生们”，我理解你，又不免感到惆怅。但相信你还是会关注中国的孩子——他们实在是太应该让我们关注了。相信这几年的教学生涯将对你今后的研究发生影响。——职业可以变，心却是不变的。

我就是这样的大量通信中，在中国教育第一线的普通老师与学生中找到了自己的知音。更准确地说，这是相互寻找。我曾经在一篇文章中谈到，真正愿意献身于教育、有志于改革的老师在教师中的比例目前还不算大，但中国人口多，教师队伍也十分庞大，其绝对数量还是相当可观的。这样的有独立思想与追求的老师“应该互相了解，相互支持，进行心灵的与实际经验的交流，在‘相濡以沫’中，会感到自己并不孤独，还有‘真同道’在”。正是在遭遇“大批判”的这一年，我得到了一批真同道，好朋友，这是一个意想不到的收获。

我还经常收到来自全国各地的大学生、中学生、自学青年的来信，提出种种要求，我基本上是每信必复，尽量满足，尽管为之付出了极大的精力，但仍乐此不疲。这是有两个我自己的原因的。一是我在贵州十七年的生活深刻地影响了我的为人处事，我没有忘记自己是来自于社会的底层，我知道一个基层的（特别是边远地区的）老师或学生要与我这样的京城里的大学教授通信，是多么的艰难——我至今也没有忘记，当年我想向我的大学里的老师请教一个关于鲁迅的问题，竟是犹豫再三，最终也没有勇气将信寄出；正是这样的人生记忆使得我必须认真对待今天这些普通学生的来信，我害怕看见他们失望的眼神。另一方面，这也事关我的教育理念：在我看来，真正的教育必须落实到每一个具体的个体生命，教师应该把他的关怀与爱给予每一个需要自己帮助的学生。现在这些不相识的学生出于对自己的信任，来信提出了这样那样的要求，尽管自己能力有限，甚至并不能解决他们的问题，但我也必须尽力：这都是送上门来的小朋友，我的心应该向他们敞开。

此刻我的书桌上就放着一大叠来信，这都是一个北方的小镇上的女孩子写给我的。应该说她的生存环境与学习条件都比较

差，但她却喜欢文学，富于幻想，并且越来越不为周围的人所理解，在极度的孤独与绝望中给我写来了信，我回信表示了对她的理解，于是，她几乎隔一两个星期就给我写封信，谈她的欢乐、苦恼、日常生活与种种幻想……我在给她的回信中这样说——

谢谢你对我的信任，随时把你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想，讲给我听。我也愿意这样倾听你讲话。只是有时不能立刻给你回应。不过，请你相信，远方有一位老人，总是在倾听，并且理解你。

我知道，这位女中学生也并不企望我每信都复，她只是有一种倾诉的欲求，希望有人愿意倾听，并且理解。其实，我在与所有的孩子的通信中，所扮演的主要是一个倾听者的角色，因为我远在北京，是不可能给他们以具体的实际的帮助的，而且说到底，学生们所遇到的问题，只能靠他们自己去解决，成年人（老师、家长……）是不能越俎代庖的。这里实际上是有有一个教育学上的问题的：成年人在对孩子的教育中主要职责是什么？在我看来，第一就是倾听：这里要有一个前提，即承认孩子是一个独立的生命个体，他在成长的过程中，就自然会遇到各种问题，并会有自己的苦恼，疑惑，等等，于是就产生了倾诉的欲求；成年人的责任就是充当这样的倾听者，首先要取得孩子的信任，使他愿意把心里的话说给你听，同时要以平等的态度，尊重与理解孩子的想法，其实做到了这一点，孩子倾诉完了，他的问题已经解决了大半，成年人只需要提出一些建议，做必要的提醒，剩下的问题孩子自会去处理解决。而我们现在的问题，恰恰是学生们心里有话找不到倾听者：周围的成年人（老师、家长）或者根本想不到他们还会有自己的问题与想法，或者只顾训导，而不愿意听他

们讲话。于是，有的孩子就只好千里迢迢地找到我这个老头子了。尽管我为此深感荣幸，但有时也不免想到，如果我们的每一个老师、家长，都能成为自己身边的孩子与学生的可信赖的倾听者，如果进一步全社会的成年人都尽到倾听者的责任，那将是怎样地有利于我们的孩子的成长啊。

真的，人是需要相互信任、理解、沟通与爱的；有时你无意中为别人做一件小事，却会引起你意想不到的反应。这又是一次普通的通信：几位重庆的读者来信倾诉了他们对北大的向往，我照例回了信，正好收到了我编的《走近北大》的样书，就顺便请研究生帮我寄去。不久，就收到了这样一封信——

我想，在你的面前，不需要伪装什么，今天，在我接你寄来的书的那一刻，我哭了。原来幸福时也可以流泪，而且这种感觉很美，很美。

没有想过你竟然也记得我们，因为我们之间近似于陌生人。你离我们是那样的遥远。但当我拿起这本书时，却觉得你无比地熟悉而亲切。也许你觉得你只是做了一件很普通的事：我们喜欢北大，而你就送一本关于北大的书，也许你把我们当作一群追梦的孩子，而你所做的只是让我们离梦更接近一点。但是，你难以想象这本书在我们，至少在我的心中，引起了怎样的波澜。

在学校，很少有老师喜欢我，有时读完两三年书，认识我的老师也不过一两人。而这一两人记得的也是“××”这个名字，而不是这个人。在学校，我也几乎不招呼老师。因为师德有问题的老师被我鄙视，而在我喜欢的老师面前，我又往往手足无措。当他们快要经过我的身旁时，我往往会很紧张，把头埋得很低，因为我觉得自己不是好学生，没有资格



叫他们，甚至怕自己会亵渎了“老师好”这三个字。当他们走远时，我才会抬起头，望着他们的背影，在心里祝福他们。要是有一天我碰到了你，也多半会是上面这种表情。

所以当时的心情绝不是感动二字就能概括的。曾经看到这样的故事：一个人在自杀时，仅仅因为想起美术老师对他赞扬的一句话而放弃了自杀，决心重新生活。以前总怀疑它的真实性。不过现在不了。真的，有时只是因为你对别人说了一句很普通的话或做了一件很普通的事，而引起这个人的某些变化，就像你对我，你让我知道了应怎样去面对我的学生。

面对这样一番肺腑之言，我还能说什么呢？但我仍然回了这样一封信——

你的来信让我感动。

字里行间充满了爱。——不只是你我之间，我们也应该用这样的爱对待周围所有的人。

这里有一种心灵的沟通。——我们这个社会太需要这样的沟通了。

从信中看到，你现在是一位教师。你说你知道“应该怎样面对我的学生”，这个问题也是我一直在思考的。在我看来，教育的本质就是将学生内心深处的善良、智慧……这些最美好的人性因子激发出来，加以培育和升华，以此来压抑人的内在的恶的因子。——按照我的人性的观点，人是善、恶并存的；问题是我们要“扬”什么，“弃”什么。而善的激发，是需要一种爱心的。这种爱是发自内心的，是自然的，如你信中所说，是毫不经意的，而不是着意的表演。在当下社会

里，这样的爱的表演也实在是太多了。

你的来信，引发了我的思考，谢谢你。

是的，在爱的彼此浸润中，我们的精神都升华了。——我正是从这样的通信中，获得了力量。

于是，就有了2000年10月28日“长江《读书》奖”颁奖大会上的致辞——

当走上领奖台时，我想起了中国古代哲人的一句话：“泉涸，鱼相与处于陆，相响以湿，相濡以沫，不若相忘于江湖。”

我们确实活得艰难，写得艰难。——要承受种种外在的压力，更要面对自己内心的困惑。

在苦苦挣扎中，如果有人向你投以理解的目光，你会感到一种生命的暖意。

现在，我正是从参与文章奖评奖的读者、推委、评委，以及今天到会的朋友们这里，感受到了这样的温馨，或许仅有短暂的一瞥，就足以使我感奋不已。

是的，我存在着。我努力着。我们又这样彼此搀扶着。——这就够了。

但我又是怎样地神往于那“相忘于江湖”的境界。——那将是一个永远的梦。

这里的每一个字都凝结着这一年的生命体验。有朋友说我那天神采飞扬，我自己心里明白，这是长期郁积的生命的突然爆发，并因此而预感到将要发生什么事情。

到了11月8日，我就病倒了。

于是，又有了静养中的这些思考与总结。——我希望借此使人生中的这一段历程有个了结，并由此走上新的旅程。

此刻，我心中正充溢着黎明的感觉，一切将要重新开始。

2001年1月18日写毕

## 2001 年回顾

2001 年是新世纪的第一年。在这年的 11 月 19 日，我在上海大学主办的“全球化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转变”国际学术讨论会上，说了这样一段话——

今年在国际、国内都发生了一些将决定中国与世界的命运的大事件：21 世纪中国的格局，世界的格局由此已初见端倪。它应该引起一切关注中国与未来的人们的重视，思考与研究，而绝不能麻木不仁，掉以轻心。我自己从今年酷暑以来，就一直在痛苦而紧张地思考，以至于寝食不安。而且我至今也没有将这些“事件”消化，无法作出理论上的分析。但我却直觉到：那“不再杀人”的幻想破灭了，那种和谐、统一、协调、公理确立……的“全球化”预言像是在做梦。直觉告诉我：世界将不得安宁，中国也恐怕未必太平；21 世纪将仍然是一个充满矛盾，充满对立与斗争的年代。

这几乎概括了我对这一年国际国内形势的发展的基本估计与我的心境。

我的内心矛盾有增无减：既对正在建立与完善的以政治、经济、管理、技术精英为阶级基础与群众基础的新模式持批判态

度，同时又绝不愿意回到十七年与“文革”模式中去，这就与各类知识分子存在根本性的分歧，但却只能坚持自己的“反对一切形式的奴役制度”的基本立场，同时又明知这样的否定性立场背后的理想的彼岸性，又确实提不出在现实操作层面上的建设性的可行的主张，这就陷入了深刻的困惑与无奈之中。而对自己在80年代的立场的反思，又引发了更为沉重的自责：“对中国的改革的这一最后结果，自己应负什么责任”这一问题梦魇般的压在心上，其中又包含了难言的苦衷以及不被理解的悲哀。

而且依然运交华盖。讨伐余威尚存——居然出版了一本专著，汇集了批判我与另外一位年轻人的文章，题目就颇吓人：《改革还是改向》。另一彪勇猛的年轻人又杀上门来：2001年5月5日《北京晚报》发表一条耸人听闻的消息：《张××：〈鲁迅先生〉是演给王朔钱理群他们看的》。这位张某人要写一个“高唱《国际歌》的鲁迅”，这本是他的事，与我无关，但他却要拉上我（还有更与我不相干的王朔）来陪绑，罪名是“营造”怀疑鲁迅的“时尚”。这真是从何说起！后来总算是有个说明：“我不惯的是霸占着话语权力很风光的那些人，我不打死人打活人。……钱理群不是搞了一个审视中学语文教材吗？他希望鲁迅的文章和体现集体主义精神的文章从课本中消失，我是针对这个说的。”（见《南方周末》2001年5月10日：《张××：我们要狠狠作秀》）——又是将《审视中学语文教育》中的某些作者的观点算在我的头上。再看看他们要说的话：忽而说自己的文艺观概括一句话就是“焦大的文艺观”（2000年12月27日张某在人民大学的讲演），忽而宣称自己“针对的是未来的观众，而不是现实的观众”（2001年5月5日《北京晚报》报道），这真是不知说什么好了。但这件事所提供的信息却不可小看：一些人的“革命”是要以我这样的知识分子来开刀的。这似乎也可以理解：在某些人看

来，我这样的所谓“名教授”是既得利益者。因此，从激进的“革命”立场，既得利益者的批判是可疑的，并且更加危险，也非打倒不可。这大概是批判知识分子的宿命。而我要坚持自己的“不属于任何势力与派别”的独立立场，就非得“横战”不可。

在“9·11”事件中，我再一次处于不得不“横战”的尴尬境地。事件刚刚发生，我就被惊呆了。因为我曾写过文章祈望在新世纪人们“要懂得人的生命是最可宝贵的”，从此不要再杀人，并且以为这是一个回到常识的最起码的“低调”期待。不料21世纪刚开始，就以这样的残暴的方式滥杀无辜平民：我还是太天真、太善良了。后来我上街与出租汽车司机谈起“9·11”事件，不料他竟表示高兴，认为“美国受到惩罚，真解气”，我立刻和他争辩起来；这位司机告诉我，在这一天的乘客中我是唯一的对恐怖事件持批判态度的人：这又使我大吃了一惊。不久我在网上看到一批知识分子发表宣言，表示无条件地站在美国这一边，宣称“今夜，我们是美国人”；接着又有人断言“这不仅是向美国的攻击，这是向整个文明社会的攻击”，因为“美国是自由的勇敢代言人，她在世界各地一向乐善好施，仗义执言！回顾历史，环看四周，与美国为敌的，是为封闭、狂热、残暴和无知所支配的人群；而与美国为友的，是以开放、理性、尊重、富足和文明为向导的地域”；接着还有人撰文扬言“灾难使美国拥有了足够的资格，以强化其世界领袖的地位”，“灾难也使美国生发更大的动力，更深、更坚定、更不妥协地参与国际事务”，“对抗或是顺从”成了唯一的选择，“世界（将）真正实现单极化，在坍塌的废墟上，出现世界历史上的美利坚时代”；接着又有文章宣布美国轰炸阿富汗是“正义的事业”，即使因此杀害了无辜平民也是应该付出的代价：面对这样的知识分子的高论，我再一次地目瞪口呆。并且意

识到在这要求明确站队的时刻——一篇网上文章就这样斩钉截铁地宣布：“对于这一事件的态度已经成为正义与邪恶、文明与野蛮的分水岭和试金石——无论对于集团还是对于个体”，我的立场的不合时宜。我当然要批判恐怖主义：不仅是出于我的尊重人的生命价值的人道主义立场，也是因为我不能认同恐怖主义“为达到某种纯粹的理想，可以不择手段，甚至牺牲无辜平民的生命”的内在理念——在我看来，这是一切极端主义的原教旨主义的共同特点，在20世纪曾给中国和世界带来巨大的灾难，这样的历史是绝不能重演的。但我绝不能因为谴责恐怖主义者对美国平民的残杀，而将美国视为“人类文明与正义的化身”，进而为美国霸权主义辩护并为之大开方便之门；我同时警惕并心怀隐忧：在“反对恐怖主义”的旗号下，建立以美国为首的新的“大国、富国联盟”，同时开始大国之间的新的争夺，并在此基础上建立“大国、富国压制小国、穷国”的所谓“世界新秩序”——在我看来，这很有可能成为21世纪世界的主要危险。对于我来说，“反对对人的生命的杀戮”的人道主义立场必须是全面而彻底的；因此，我同时反对美国对阿富汗无辜平民的杀害，愿意参加世界反战运动的行列，又为在中国竟然没有表达自己这一意志的自由而感到悲哀。同样，我的反恐怖主义的立场也是彻底的：我不但反对国际恐怖主义，也反对国家恐怖主义，尤其对“反恐怖主义”旗号下的恐怖主义抱有高度的警惕。这样，我就根本无法像人们所要求的那样，用简明的一两句话来表明自己的所谓鲜明的立场，我的表达必须是复杂的，因而不免是模糊的，而在中国，就根本不存在这样的表达的语境，于是我终于陷入了“失语，无言”的状态——最近这几年，大概是从科索沃事件开始，我就始终处于这样的状态中。如我今年在上海会议上所说，“把所有的话都说出来，就会成为（大多数中国人和知识分子的）‘公敌’”。更重要的是自己

内心的困惑：“实际上我究竟赞成什么，主张什么，自己也想不清楚；我只能说‘不应该’这样那样，对‘应该’怎样怎样，交的是一张白卷。而且说到底，我对自己的立场与态度也是怀疑的。于是就只剩下无词的言语，只能沉默。”

也正是在这“失语，无言”的状态中，我与鲁迅相遇了。如果说在“文革”后期以及80年代初期我与鲁迅有过一次相遇，产生了《心灵的探寻》；那么，在这世纪之交，又有了第二次相遇。可以说当处于内外交困、孤立无援、身心交瘁、极度绝望、彷徨的生命的低谷时，我与鲁迅，特别是晚年的鲁迅，发生了心灵的感应：我突然觉得曾经是谜一般的“最后十年”的鲁迅竟是这样的容易理解，又是这样的亲切，我甚至可以感觉到病中的他的沉重的呼吸；鲁迅就这样自然而然地进入了我的生命的深处，他说的话正是我想说的，更确切地说，我想说而说不清楚的话，他说出来了，我想不清楚的问题，他一语点破了，我的思考浅尝辄止之处，他深入了，我想不到的地方，他想到了……鲁迅在那些被封杀的日子里，成了我唯一可以促膝交谈的朋友；在令人窒息的高压下，与鲁迅无拘无束的对话成了我精神的唯一依托。这是寒冽的空气里吹拂的阵阵“热风”，我的心终于沉潜下来：不是对现实痛苦的回避，而是使这痛苦更加刻骨铭心，并超越一己的苦痛，思考国家、民族、人类的大问题，感受人生的大悲欢，生命因此得到了升华与自赎。这从低谷逐渐走向高山的体验，在人的一生中也是可遇不可求的；这要感谢命运对我的眷顾：既加我以苦难，又赐我以鲁迅，又一次将苦难转化为精神资源。

而且我还有北大讲台这最后一块栖息之地：这几乎是近两年来留给我的唯一的精神空间，而我告别它的时刻又越来越近。于是，2001年我在北大讲了整整一年的鲁迅：上半年我一个人讲，下半年我与学生一起讨论。不用说听课是空前的热烈，讨论也非



常的认真，这都使我深受感动。这是同样深刻的心灵感应和精神的相互支撑：北大与青年学生再一次与我共渡艰难，这又是我的不幸中之大幸。因此而产生了“北大演讲与对话录之二”，准备就命名为《与鲁迅相遇》，这或许将标示着我的学术研究，特别是鲁迅研究所达到的新的水平。这也是已经过去的这一年的最重要的收获——来之不易的收获。

2001年年底，我在汉城“韩国现代文学学会第七届国际学术讨论会”上，做了一个题为《鲁迅：中国“真的知识阶级”的历史命运》的发言。结束语中有这样一段话——

永远站在普通平民这一边，反对来自一切方面的一切形式的压迫与奴役，“对于社会永远不会满意”，因而是永远的批判者。——我以为，这正是鲁迅对我们的最重要的启示。

这也正是这一年的思考与自我选择的最重要的结论。

2002年1月1日—4日



## 第四辑

# 炼狱之火

在北大校园里，我是一只什么样的鸟？在有些人的心目中，我大概是一只乌鸦，老给他们的节日添乱。其实，一所学校，一个国家总是要有乌鸦才好，想想如果满天飞翔的都是喜鹊，那会是一个什么局面？当然，只有乌鸦恐怕也不行，总得有乌鸦，也有喜鹊，还有其他什么鸟，这才会形成一种合理的生态平衡吧。



# “民国以来最黑暗的一天”

——“三一八”惨案七十三周年祭

## 一

三十三年前，1966年3月18日，周作人在自己的日记里写道：“今日是‘三一八’纪念，倏忽已是四十年，现在记忆的人，已寥若晨星矣。”但他自己，或者说，他那一代知识分子中凡有良知者，却永远也忘不了这一天。这是压在心上的坟，随时都会流淌出血来：惨案发生后，周作人写了《关于三月十八日的死者》等文；是年六月二十八日，他写了“百日”祭文；一九二八年当国民党“狂热地讨赤”，屠杀革命青年时，周作人又想起“三一八的死者”，将燕京大学魏士毅烈士纪念碑的照片寄给《语丝》发表<sup>[1]</sup>；二十年后，一九四五年三月十八日的日记里，血的记忆又奔涌于他的笔下：“三一八”的第二天，下着小雪，铁狮子广场上还躺着好些尸体，身上盖着一层薄雪……”

人们可能要问：为什么“三一八”惨案会在周作人这一代人的心中留下如此刻骨铭心、须臾不忘的记忆？周作人自己有过一个解释，他在一篇论及“五四与三一八”的短文里，这样写道：“正如‘五四’是代表了知识阶级对于北京之后政府进攻的成功，三一八乃是代表北京政府对于知识阶级以及人民的反攻的开始，而这反攻却比当初进攻更为猛烈”，“在三一八那年之前，学生和教授在社会上似乎保有一种权威和地位，虽然政府讨厌他

们，但不敢轻易动手”，“及至三一八那时，执政府卫队公然对学生群众开排枪，这情形就不同了。对知识阶级的恐怖时代可以说就此开始了”<sup>[2]</sup>。周作人将“三一八”惨案与五四运动联系起来考察，这是显示了他的历史眼光的：“三一八”的受难者是以“五四”为开端的中国争取现代民主与自由的伟大斗争的第一批牺牲者。这是中国反民主的独裁专制势力对民主力量对爱国学生与知识分子的第一次大开杀戒：如周作人所说，在此之后，有1927年4月28日奉系军阀对北京大学教授李大钊等的杀戮<sup>[3]</sup>；以后又有1945年国民党独裁政权制造的“一二·一”大屠杀以及对闻一多、李公朴教授的暗害——闻一多在“一二·一”惨案发生的当晚即将这次屠杀与“三一八”惨案并提，认为这是一个“更凶残更黑暗的日子”<sup>[4]</sup>。而周作人在本文开头所提到的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前夕所写的日记里，重新记起“三一八”惨案，更是一个不祥的预兆：一次新的大屠杀正在向知识分子逼近，周作人自己也正是在这场全民族的浩劫中丧生。而历史的残酷性更在于一部分青年学生（当然不是全部）在这新一轮的屠戮中竟被驱为“杀手”，这对热血青年的蒙蔽、利用是更令人憎恶的；而当青年人终于觉醒，要继承他们的前辈的民主事业时，却又遭到了更为残酷的镇压：这都是人们记忆犹新的。这样，我们就从一个特定的角度，勾勒了一部“五四”以来的“血写的历史”，而且是青年学生与无辜民众的血，这就格外的惊心动魄。这是我们在纪念“五四”八十周年，回顾一个世纪的历史时，绝对不能忘却与回避的。鲁迅在“三一八”惨案发生后，即已指出“真的猛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今天，这一召唤依然新鲜而有力。每一个人都应叩问自己的良知：我遗忘了那段历史了吗？我有勇气正视那“淋漓的鲜血”吗？

## 二

当年，执政府门前的那阵阵枪响，把所有的知识分子的灵魂都震撼了。鲁迅停止了正在进行的写作，愤然写道：“实弹打出的是青年的血”，“笔写的，有什么相干？”他把这一日称作是“民国以来最黑暗的一天”，并且预言：“这不是一件事的结束，是一件事的开头”，“拖欠得愈久，就要付出更大的利息”<sup>[5]</sup>。而亲历了这场大屠杀，从死尸堆里爬出来的朱自清，则感到这是一个“可怕的日子”，他奋笔写下了《段政府大屠杀记》，要国人“看看这阴惨惨的二十世纪二十六年三月十八日的中国”，他说那滴在身上的死者鲜血的“红色我永远不忘记”，近在耳旁的伤者的“呻吟我也永远不忘记”，“这真是永久的战栗啊”<sup>[6]</sup>。时为北师大的教务长的林语堂，在悼念他的学生刘和珍、杨德群的文章中，说自己经过了“有生以来最哀恸的一种经验”，“觉得二女士之死，不像单纯的本校的损失，而像是个人的损失”<sup>[7]</sup>。刚在医院动了手术的梁启超也特地接见记者，对府卫开枪“轰击群众”表示“极为愤慨”，认为“无论在何国家均非依法从严惩办不可”，不如此，“是政府自弃于人民矣”<sup>[8]</sup>。“呜呼三月一十八，北京杀人乱如麻”，刘半农的诗句，经赵元任谱曲传遍全城<sup>[9]</sup>，全国上下整个社会舆论尽是一片抗议之声<sup>[10]</sup>，即使有人要为政府辩护，也不得不先承认开枪之违反民意。如此地激起公愤，除了这是一次爱国的和平的情愿，却惨遭屠戮，更因为被杀害的是未成年或刚成年的青年学生。如《北师大教职员宣言》中所说：“夫北京何地？学生何人？今乃以战地夹攻之术，施之于赤手空拳毫无抵抗之力之幼弱学生。孰无子女，宁忍出此！”<sup>[11]</sup>周作人也表示他的哀感是来自“未完成的生活之破坏”<sup>[12]</sup>。鲁迅的忧愤则更为深重，他指出：“中国只任虎狼侵食，谁也不管。管的只有几个年青

的学生，他们本应该安心读书的，而时局漂摇得他们安心不下。假如当局者稍有天良，应如何反躬自责，激发一点天良？”<sup>[13]</sup> 胡适后来在总结“五四”学生运动的历史经验时，也表示过类似的意思。他认为，学生本应“安心读书，安心过少年幸福（生活）”，而把国家大事交给中年以上的成年人去负责，但“在变态的社会与国家内，政治太腐败了，而无代表民意机关存在着；那么，干涉政治的责任，必定落在青年学生身上了”，而学生却“非独牺牲学业，牺牲精神，牺牲少年的幸福，连到他们自己的生命一并牺牲在内了”<sup>[14]</sup>。因此，面对青年学生的流血牺牲，每一个未尽到责任而天良尚存的成年人，是应该感到羞愧的。作为学校里的师长更会因未能保护学生（这也是教育者的天职）而痛责自己。据当时的北京报纸报道，在北京大学公祭大会上，作为代理校长的蒋梦麟在发言中即有这样的沉痛之语：“我任校长，使人家子弟，社会国家之人才，同学之朋友，如此牺牲，而又无法避免与挽救，此心诚不知如何悲痛。”报道说，“蒋氏言至此，潸然涕下。于是全场学生相向而泣，门外皆闻哭声”<sup>[15]</sup>。蒋梦麟此种态度在北大是成为一个传统的：二十年后，“一二·一”惨案发生后，时为北大校长的傅斯年赶到昆明，见到对开枪屠杀学生负直接责任的关麟徵，第一句话就是“从前我们是朋友，可是现在我们是仇敌。学生就像是我的孩子，你杀害了他们，我还能沉默吗？”<sup>[16]</sup> 这其实是为师者的一条起码的线：作为一个校长与教师，如果不能保护学生又不自责，甚至为虎作伥，帮助当局诬陷与镇压学生，那他就必定为教育界所不齿，被永远钉在耻辱柱上。而对于一个政府，一个军队，这同样也是一条线：一旦向无辜的青年学生与平民百姓开了枪，自身存在的合法性就受到了动摇。著名的新闻记者邵飘萍在他主编的《京报》上就是这样提出问题的：“试问如此无法无天之行为，尚可居政府之地位否？以如



此无法无天之凶行而可丝毫不加惩治，中国今后尚欲有政府有秩序否？如此故意犯罪凶杀多人之巨案，而司法机关不能尽职以正其罪，今后法律尚有一条一字可以有效否？”<sup>[17]</sup> 直接凶杀青年学生的段祺瑞执政府及国务院卫队，从此为全民所共弃之，时负责警卫全城的国民军也受到了严厉的谴责。周作人在《为三月十八日国务院残杀事件忠告国民军》中这样写道：“我们于国民军平素毫无私人关系，但以其比较地能接近民众，所以觉得较为可取。国民军自己要知道他的名誉与信用完全存在这一点上，倘若这一点没有了，那么在我们看来便与非国民军没有什么区别”，而这“同情，信用与期望之损失是无可估量，也无法挽救的”<sup>[18]</sup>。后来邵飘萍因为他仗义执言（也包括“三一八”惨案中的上述言论）而被枪杀，但正如鲁迅所说：“屠杀者也绝不是胜利者”<sup>[19]</sup>，甚至连“段祺瑞”的名字在现代史上也成了“千古罪人”的代名词，“谁向青年学生与平民百姓开枪，谁就是段祺瑞”，这成了人们的一种共识，而且几乎像梦魇一般缠绕着后来的统治者。以致蒋介石在“一二·一”惨案以后，也再三电令关麟徵：“不能再在学生中发生流血事件。”<sup>[20]</sup> 但为时似乎已晚，“一二·一”及以后惨杀闻一多等的枪声，几乎把所有的知识分子都推到了反对面。历史的教训是如此的深刻，连自称“和尚打伞——无法无天”的毛泽东，后来也发出过这样的警告：“凡是镇压学生运动的绝无好下场。”不论毛泽东的这句话的具体背景如何，作为一个“命题”，是可以看作是对本世纪自“三一八”惨案以来的历史经验的一个总结的。

因此，对杀人者与指使者、策划者追究法律的责任是必然的。时为北京大学教授的王世杰在惨案发生后，连续在《现代评论》杂志上著文，明确提出了法律制裁的问题。他根据大量的事实，断定“此次残杀，是一种预定计划，不是偶然发生的事实。

段祺瑞以及其他参加残杀计划的决定的人，自然要与他土匪式的卫队，同为本案的责任者”。那么，“元首犯罪，也能与庶民百姓一样受制裁吗？”回答是肯定的。尽管明知在中国的现实情况下是不可能实行的，但王世杰仍在文章中表示了这样的信念：“当他（凶杀案制造者）站在政治舞台上面的时候，纵能逃脱法律与法庭的制裁，当他下台以后，却不能保障不能同他算账”，因此他认为“目前最要紧的手续，便是收集这回惨案的一切证据”<sup>[21]</sup>。当时各校都对死难者进行认真的尸检，有严格的记录<sup>[22]</sup>。京师地方检察厅也进行了大量调查取证，并发表正式文件，认定“此次集会请愿宗旨尚属正当，又无不正侵害之行为，而卫队官兵遽行枪毙死伤多人，实有触犯刑律第三百十一条之重大嫌疑”<sup>[23]</sup>。尽管人们仍不满意地检厅未能进一步“对他职权所能支配的一切犯罪者实行诘追”<sup>[24]</sup>，但正如周作人所说，毕竟还有地检厅多少“维持一点司法独立的精神，也替国民保存一点异于禽兽的人格”<sup>[25]</sup>。

### 三

当然，尽管可以利用手中的权力一手遮天，杀人者，特别是主谋者仍然是心虚的。当时的报纸曾有过一个关于惨案发生后当局内幕的报道。据说在内阁召开紧急会议商量对策时，“五人阁员之中，对此次事件，又分软硬二派”，但“大家均觉此事倘没有一卸责方法，则死伤如此之多，责任所在，无以自明。遂决定将历次在天安门以群众领袖自命之徐谦、李大钊、李煜瀛、易培基、顾孟余等明令通缉，加以‘共产党’称号，此事便算有了归结”<sup>[26]</sup>。于是就有了所谓“说明真相”的《通电》与《通缉令》，把青年学生的和平请愿说成是“暴徒数百名”在徐谦等“共产党”的率领下，“闯袭国务院，泼灌火油，抛掷炸弹，手持木棍，丛击军警”；自己的蓄意残杀也变成了“各军警因正当防御，以至互有死

伤”；最后还要将受害者横加“聚众扰乱，危害国家”的罪名，并故意危言耸听：“国家秩序，岌岌可危”，要求各地军警“严重查究，以杜乱源”<sup>[27]</sup>。本来就是要推卸罪责，自然是颠倒黑白，不但漏洞百出，而且杀机毕露。因此，《通电》、《通缉令》一出，全国舆论哗然，一时成为众矢之的。后来京师地方检察厅的公函里，根据当日在场的巡警与警官及受伤府卫兵的证词，也完全否定了“暴徒”以手枪等凶器“丛击军警”的谎言，证明政府送去验伤的卫兵系被他们自己所杀伤。真相大白后，作为“罪证”的“洋铁水壶”也成了笑柄<sup>[28]</sup>。而“墨写的谎说，决掩不住血写的事实”<sup>[29]</sup>；1926年4月1日《晨报》公布了“三一八”惨案伤亡者的名单：死者四十六人，伤者一百五十四人。人们还揭露，在通缉徐谦等六人之外，还有一个五十人的通缉名单，鲁迅、周作人、林语堂等都赫然在内，无非是要借此剪除异己<sup>[30]</sup>。这自然吓不倒任何人，只是使执政府自身更加陷入重围之中。连本已成为摆设的国会也召集非常会议，通过了屠杀学生的“首犯应听候国民处分”的决议<sup>[31]</sup>。于是又有了国务院“阁员总辞职”与段祺瑞颁布对死难者家属的“抚恤令”<sup>[32]</sup>。对各校举行各种悼念活动、3月30日全市召开“国民追悼大会”以及各报刊的广泛而详尽的报道，当局也未敢加以阻拦。1945年“一二·一”惨案之后，国民党政府也有过类似的姿态：直接责任者关麟徵在蒋介石授意下，“自请处分”，十五万人的公祭也得以顺利进行。这自然都是人们斗争的结果，绝不意味着杀人者有任何悔悟，如一本历史书所说，这不过是一种“欺骗手段”<sup>[33]</sup>。

#### 四

周作人在“三一八”惨案当时与以后，都谈到了知识分子的分化。他指出：“‘五四’时代北京各校教职员几乎是一致反抗政

府”，这回大屠杀之后，却“不能联合反抗”<sup>[34]</sup>。据报道，惨案发生当晚召开的北京专门以上学校校务讨论会与九校教职员联席会议上，就出现了三种不同的意见。“稳健派主张政治应与教育完全分离，故对于诘问当局责任一层，恐因此卷入政治旋涡，颇为踌躇”，据说“此派意见，自不能邀多数之赞同，盖以此事件意义之重大，自不能漠漠无过问”。“激进一派，则颇欲将此次风潮扩大，主张以罢工罢课或全体辞职为反抗当局之武器，并欲将此次事件完全归责于当局，尤其段内阁，对于群众领袖不欲有所责备”。一些人又不能接受激进派的观点，“于是有折中派出”，提出三项主张：“对此次学生惨祸，以师长资格表示歉憾及哀悼；认为此次惨剧，政府及军警当局应负法律责任；群众领袖对于立在前线独被残祸之少年，应负道义上的责任”。据说这三项主张以二票之多获得通过，但因有人反对而未正式发表。以后九校教职员又单独发表宣言，谴责“政府当局”对于惨案的发生“负重大之责任”<sup>[35]</sup>。从公开发表的言论看，大体上有三种倾向。一部分基本上站在政府的立场上说话，如时为执政府秘书长的章士钊所主持的《甲寅》月刊发表的关于“三一八”惨案的“时评”，就几乎照抄了当局《通电》上的文字<sup>[36]</sup>；研究系的机关报《晨报》上刊登的署名文章虽也轻描淡写地表示要“纠正政府之错误”，重心却在呼吁“制止共产党之暴动”，完全与政府同一腔调地诬陷青年学生“啸众男女，挟持枪械”，“殴击警卫”，“铤而走险”；并攻击群众领袖“欲置千百珍贵青年于死地”，以与《通缉令》相呼应<sup>[37]</sup>；大概任何时候都有这样的自愿充当“帮忙”与“帮凶”的知识分子吧。引起争论的是陈源在《现代评论》上发表的《闲话》，他一方面批驳政府方面污蔑和平请愿的青年学生为“暴徒”的谎言，强调对杀人的凶手、谋士“一个都不能放过”，一面又暗示群众领袖有“欺骗”群众之嫌，并具体指明“三一八”惨案的

牺牲者杨德群是被人“勉强”而去请愿的<sup>[38]</sup>。他的这一指责遭到了杨德群的同学的据实反驳<sup>[39]</sup>，后来陈源在编《西滢闲话》时也未将此文收入。鲁迅、周作人、林语堂等都对陈源与前述《晨报》的文章提出了尖锐的批评。他们认为，群众领袖的失误与政府蓄意谋杀是不同性质的，将二者相提并论，本身即有为当局开脱罪责之嫌；而“倘要锻炼群众领袖的错处，只有两点：一是还以请愿为有用；二是将对手看得太好了”，说他们“欺骗”群众，进而断言（或暗示）死难者“受人利用”，不仅是不符合事实，而且会曲解这次学生运动的性质。陈源的《闲话》引起鲁迅们如此强烈的反应，原因即在于此<sup>[40]</sup>。周作人在他的文章中，还多次提醒人们要对“国家主义”思潮保持警惕<sup>[41]</sup>，这是别具眼光的。惨案发生后，当局的《通电》、《通缉令》里，之所以一再歪曲事实，把和平请愿者说成受“共产党”的唆使，目的就是要给学生运动横加“武装颠覆国家政权”的“罪名”。而故意危言耸听“国家秩序，岌岌可危”，正是要给自己的镇压行为披上“维护国家利益”的合法外衣。当时也确有御用文人心领神会，在文章中大谈国家问题丛生，解决之方法，“自有其一定之步骤与方略”，青年学生贸然行事，“不但无益，抑且有伤元气”，然后笔锋一转：“苟非别有所图，何忍出此”，这就成了“学生误国有罪”了<sup>[42]</sup>。难怪周作人不无悲愤地说，四十多个“被害的人都是白死”，“这在所谓国家主义流行的时代或者是当然的”<sup>[43]</sup>。以后不是果真有了“为了国家的发展，社会的进步（？），镇压是必要的，牺牲也是必要付出的代价”这样的“高论”吗？

这类“高论”的背后，隐藏着的是对人（特别是年轻人）的生命的漠视；这是“三一八”惨案的亲历者所绝对不能容忍的。鲁迅、周作人他们正是站在“珍惜人（年轻人）的生命”的立场，捍卫牺牲者的生命价值，为他们洗清官方强加的罪名与泼来

的污水；出于同一立场，他们对运动本身也进行了认真的反思，他们并不回避群众领袖的“错处”，不是追究责任，而是为了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如前文所引，鲁迅认为群众领袖的最大“错处”，或者说运动的最大失误，就是“还以为请愿有用”。梁启超在接见记者时，也发表了类似的意见：“政府不知尊重民意，纵使千万次请愿，亦岂有裨于国家耶？”“因此而牺牲许多可贵之青年生命，殊为可痛”，他表示“切望青年以后当格外慎重，苟非万不得已，切不可再作此种无谓之举”<sup>[44]</sup>。这大概代表了相当多的知识分子的一种共识。鲁迅在有关“三一八”惨案的文章里，反复讲一个道理，或者说一个常识：人的生命是应该珍惜的，“战士的生命是宝贵的。在战士不多的地方，这生命就愈宝贵”。他忠告致力于中国的改革的人们：“改革自然常不免于流血，但流血非即等于改革”，“以血的洪流淹死一个敌人，以同胞的尸体填满一个缺陷，已经是陈腐的话了。从最新的战术的眼光看起来，这是多么大的损失”<sup>[45]</sup>。直到多年以后，鲁迅还在讲：“革命是并非教人死而是教人活的”<sup>[46]</sup>。每一个生命（特别是年轻的生命）的丧失，都给那一代人带来深切的痛苦，因为失去了的生命是永远也无法弥补的；任何以死去的生命为儿戏、做买卖的行径都会引起巨大的愤怒。鲁迅因此向我们每一个人，向我们民族，提出了一个不能、也不容回避的问题：你感到了、并且记得“死尸的沉重”吗？他说：“会觉得死尸的沉重，不愿抱持的民族里，先烈的‘死’是后人的‘生’的唯一的灵药，但倘在不再觉得沉重的民族里，却不过是压得一同沦灭的东西。”<sup>[47]</sup>可悲与可怕的是，我们这个民族恰恰是不知道“死尸的沉重”的；鲁迅在《纪念刘和珍君》中早就说过：“时间永是流逝，街市依旧太平，有限的几个生命，在中国是不算什么的，至多，不过供无恶意的闲人以饭后的谈资，或者给有恶意的闲人作‘流言’的种子”<sup>[48]</sup>。现在恐

怕连“饭后的谈资”也不以此为话题了。中国特色的遗忘术与恐惧术早就把人心麻木了。但还是鲁迅说得好：“既然有了血痕了，当然不觉得要扩大”，“血不但不掩于墨写的谎言，不醉于墨写的挽歌；威力也压它不住”，总是有人记得并且要说话的。

依然是鲁迅所说的：“苟活者在淡红的血色中，会依稀看见微茫的希望；真的猛士，将更奋然而前行”<sup>[49]</sup>。

1999年4月19日写毕于燕北园

## 注 释

[1] 周作人：《三一八的死者》，载《语丝》4卷5期，1928年1月出版。

[2] [3] 周作人：《红楼内外》，载《子曰》4期，1948年10月出版。

[4] [32] 北京大学历史系《北京大学学生运动史》编写组：《北京大学学生运动史》，198页，206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第2版。

[5] [13] [19] [29] 鲁迅：《无花的蔷薇之二》，《鲁迅全集》3卷，264、263页，263页，263页，263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6] 朱自清：《执政府大屠杀记》，《朱自清全集》4卷，182、186、188页。江苏教育出版社，1990年12月版。

[7] 林语堂：《悼刘和珍、杨德群女士》，收《剪拂集》，84、85页。上海书店影印本，1983年12月版。

[8] [44] 见1926年《晨报》（北京）报道。

[9] 见鲁迅保存的传单，署名“范奴冬女士”，原件藏鲁迅博物馆。

[10] 参看1926年3月24日、25日《京报》报道：《京内外各界对惨案之愤慨》。

[11] 《女师大教职员宣言》，载《女师大周刊》123期，1926年3月24日出版。

[12] 周作人：《关于三一八的死者》，载《语丝》72期，1926年3月29日出版。

[14] 胡适：《五四运动纪念》，《胡适文集》730、731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11月版。

[15] 见1926年3月25日《晨报》报道。

[16] [20] 《西南联大两外籍教员访问关麟徵》，收《一二一运动》485页，484页。

[17] 飘萍：《警言司法界与国民军》，载1926年3月21日《京报》。

[18] 周作人：《为三月十八日国务院残杀事件忠告国民军》，载1926年3月21日《京报副刊》。

[21] 王世杰：《论三月十八日的惨剧》，载《现代评论》3卷28期，1926年3月27日出版。

[22] 参看《女师大刘和珍君女士被害记》、《女师大杨德群女士被害记》，载《女师大周刊》123期，1926年3月24日出版。

[23] 《京师地方检察厅公函》，载1926年4月4日《京报》。

[24] 王世杰：《京师地检厅与三一八惨案》，载《现代评论》3卷70期，1926年4月12日出版。

[25] [28] 周作人：《洋铁水壶与通缉令》，载1926年4月7日《京报》副刊。

[26] 《通缉令决定之经过》，见1926年3月20日《晨报》。

[27] 见1926年3月20日《京报》报道。

[30] 参看鲁迅：《大衍发微》，《鲁迅全集》3卷，575—581页。

[31] 见1926年3月27日《京报》报道。

[33] 北京大学历史系《北京大学学生运动史》编写组：《北京大学学生运动史》，206页，北京出版社，1979年出版。

[34] 周作人：《怒府卫》，载1926年4月2日《京报》副刊。

[35] 见1926年3月21日《晨报》报道。

[36] 平：《三月十八日》，载《甲寅月刊》1卷34号，1926年3月20日出版。

[37] 林学衡：《为青年流血问题敬告全国国民》，载1926年3月20日《晨报》。

[38] 西滢：《闲话》，载《现代评论》3卷68期，1926年3月27日出版。



[39] 陈源等：《杨德群女士事件》，载《现代评论》3卷70期，1926年4月12日出版。

[40] [45] 鲁迅：《空谈》，《鲁迅全集》3卷279页，281页。

[41] [43] 周作人：《关于三月十八日的死者》，载《语丝》72期，1926年3月29日出版；参看《对于大屠杀的感想》，载1926年3月20日《京报》副刊。

[42] 渊泉：《群众领袖安在？》，载1926年3月22日《晨报》。

[46] 鲁迅：《上海文艺之一瞥》，《鲁迅全集》4卷，297页。

[47] 鲁迅：《死地》，《鲁迅全集》3卷，267页。

[48] [49] 鲁迅：《纪念刘和珍君》，《鲁迅全集》3卷，376、377页。

# 我感到惊心动魄

——黄昌勇《王实味传》序

作者希望我为本书写几句话。

我读完，放下书，就沉默了。

我感到惊心动魄，却无法理清我的思绪。

脑子里反复地轰响着一个声音：“暗暗的死”，“暗暗的死”，“暗暗的死”……

这是本书引述的鲁迅的话：“我们试一推测死者的心，却一定比明明白白而死的更加惨苦。”（《且介亭杂文末编·写于深夜里》）

这是发生在 20 世纪 40 年代中国的一个“暗暗的死”。而如作者所说：“他的悲剧意义早已逾越了作为个体生命本身的遭遇沉浮，他的悲剧其实已经预示了一大批中国现代知识分子未来的人生轨迹。从某种程度上说，王实味的遭遇可视为中国现代知识分子中某种重要类型的起始点，回首既往的历史，我们会看到无数后来者在类似的境遇，不同的时期演出的一幕幕沉重的历史剧。”

但半个世纪过去了，这依然是一个不明不白的死。而且似乎已经被人忘却了。——人们忙于世纪末的狂欢，有谁想到去“推测死者的心”，有谁听见死者亲属的哀哀的哭声，更有谁愿意正视与承担这死尸的沉重，思考这历史的沉重？！

我们即使无力（似乎也不允许）深入地思考这一切，至少也应该把“死”的来龙去脉、“死”的真相弄清楚，还一个“明白”，也算是对这“暗暗的死”，对这段历史有个交代。

本书的作者，正是怀着知识分子的良知，学者的历史责任感，走出了这第一步。这其间的艰难是不难想象的。

本书所揭示的大量事实，则足以使读者悚然而思。而且不同经历、背景的读者都可以从中引发出不同的联想与思索——在某种程度上，这也是我们自己的历史。

我关注的是以下几个事实。

这是1927年的春天，王实味与中共北大党支部书记的一场激烈的争吵。在王实味看来，这是对他的私生活的粗暴干涉，是家长制的封建作风的表现，必要据理抗争；而支部书记则动员组织力量展开批判，并扬言要将他开除出党：人们不免要联想起1942年的那场运动。前后两次批判是否存在着某种内在联系，历史的路是怎样走到后来这一步的：这都发人深省。

事件所暴露的王实味的个性：那暴烈的火性，讲话无遮无掩，不计后果地坚持己见，无所顾忌地顶撞上司……使人们有理由为他的命运担心。作者来信说，他之所以要我写几句话，是因为王实味也是北大的校友。那么，面对这位老学长的性格与命运的关系，北大人将会有怎样的反应，这也是饶有兴味的。

当然，最让我震惊的，还是本书对批判王实味及所谓“五人反党集团”运动的组织与发动过程的详细披露。特别是作者引述的康生1943年8月在陕北公学训练班上的讲话的原始记录稿，所透露的“细密处见功夫”的机心与手段，确实让人大长见识。中国以后所发生的许多事情，包括1957年的“阳谋”，在这里都已见端倪。理清中国现代思想史与知识分子命运史上的这条线索的重大意义，是不言而喻的。

作者以“不为尊者讳”的史家态度与笔法，对知识分子（包括一些声名显赫的知识分子代表人物）在批判王实味运动中的种种表现，所作的如实叙述，是特别让人感到沉重的。本世纪为什么一再出现鲁迅所说的“使劲的拉住了那颈子上套上了绞索的朋友的脚”的悲剧，这是人们不能不深长思之的。

本书所揭示的值得注意的历史事实，还有很多。作者自有他的见解，也只是点到为止。进一步的思考留给了读者。作者自己也表示，他还要将他的思考写成专论。那么，本书只是一个开始，下面要做的工作还有很多。但我们仍要感谢作者：他帮助我们“明白”了许多事情。——尽管直到五十七年以后的世纪末，才有了这点“明白”，似乎迟了些，但却来得不易：我们懂得这分量。

1999年12月25日写毕于燕北园

## 对共和国历史的另一种书写

——在《一个平民百姓的回忆录》座谈会上的发言

作者比我大四岁，那么，我们就是同时代的人了：都是出生在30年代后期，主要成长在五六十年的共和国的普通公民。因此，我是以“读自己的历史”那么一种心态来读这本书的，觉得很亲切，读的时候既放松又投入，有时会心一笑，读到有些地方心里酸酸的，想哭又不想哭。这些年已经很少有这样的阅读体验了，单凭这一点，就应该感谢作者：他的笔触动了我的心灵深处的某一角落，又让我得到了精神上的某种满足。一本书，能够引起读者（我相信绝不止我一个人）这样的感应，就足够了。所谓评论界如何评价是无关紧要的，似乎也不必去追求多大的“意义”。

作为读者，这样放松地阅读，愿意想就想想，不愿意想就这么读下去，读下去，这也就够了。不幸的是，或者说讨厌的是，我还有另一种身份：除了是这段历史的亲历者外，还是一个研究者。这就糟了：书读完了，还要想想历史观、历史写作这一类的所谓“学术”问题；而且今天请我到这里来，大概也是要我谈谈这方面的话题。于是我也只能按照派定给我的（某种程度也是我自己选择的）角色说话，就有了下面这一番议论。——但我希望，我姑妄说之，大家也就姑妄听之，是不必过于认真的。

今年是共和国成立五十周年。自然免不了要出现关于这一段

历史的种种叙述。历史叙述总是有所遮蔽的。就我已经读到的有关共和国历史叙述，就有种种遮蔽，而被遮蔽（特别是有意遮蔽的）部分是特别有意思，让人要好好想一想的。这是一个有很多的话可说的话题。这里仅就这本书所涉及的谈一点。人们爱谈的是决定亿万人的命运的大人物的历史活动，恰恰忽略了那“亿万人”的活动：自己的命运先天地被大人物决定了，那么他们又是如何活下去的呢？人们还喜欢描绘大的历史事件，土地改革、反胡风运动、大跃进、文化大革命、改革开放，等等，但这些大事件在一个个、具体的、而非抽象的共和国普通公民的心灵上留下了什么痕迹呢？这些就不谈了，被历史叙述省略了。而没有人，特别是没有人的心灵的历史又是什么样的历史呢？这会不会造成某种根本性的残缺呢？我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的通行的历史叙述的遗憾，而看重这本共和国普通公民的回忆录的：它以“野史”的个人性的，带有很大的随意性，相对自由、松弛的笔调，揭开了被“正史”所遮蔽的历史的某些侧面，我从中读到了许多别处读不到，而又发人深省的东西，从而加深了对共和国历史的认识。

比如说吧，共和国是一场革命的产物，所谓“革命”就是对原有社会结构与秩序的一次大颠倒，导致了原有阶级的、社会的、人际的关系的大变动——这都是众所周知的历史事实，一般的历史叙述也都是写到此为止。但其实是还应该追问下去的：这样的大颠倒、大变动，对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地位、利益各不相同的普通人的命运，以及他们的日常生活，发生了什么影响呢？他们各自对此做出了怎样的行为的、情感的、心理的……反应呢？缺失了这些的共和国历史至少也是不完整的吧。从这一角度来读这本回忆录，就十分有意思了。作者出生于一个大家族，原本是处于社会结构的上层的，正是革命的对象。因此，社会上这一部分人的命运，他们的情感生活，从来都是被排斥在共和国历史叙

述视野之外的，即使偶尔在文学作品中出现，也都是被妖魔化（非人化）的。而本书却提供了一种真实，包括在土地改革风暴来之前，作者的父辈所做出的反应，都让人触摸到了面对必然到来的大变动的历史当事人心灵的颤动。而作者本人以后的种种经历：他怎样应对“从众星捧月的少爷成为人人可欺之的贱民”这样的人生巨变；他怎样又从普通平民的生活中找到了位置，不仅生存了下来，也寻得了爱情，并且形成了自己的处世哲学；而在世纪末的社会变动中，他又怎样奇迹般的获得一次发挥自己的才能的机会（不仅是经商，也包括本书的写作），而这才能恰恰是从父辈那里遗传下来的。这“一个人”身上所显现的历史沧桑，正是真实地显现了共和国的革命历史的丰富性、复杂性与戏剧性的。——真的，我在正规的历史书中还未见到过这样有深度的历史呈现。

这里还可以再举一个例子。共和国在前三十年是一个高度计划化的社会，生活在共和国土地上的每一个公民与非公民，都毫无例外的处于几乎是无所不在的计划控制之内，不用说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就是人的感情生活、家庭生活，甚至是床第生活……所有最私人化的生活，都纳入了计划的控制轨道。这是生活在另一种社会的人所绝难想象的。在我看来，这或许是后人理解与重述这一段共和国历史最大的难点之一。而本书恰好以大量的具体可感的历史细节真切地呈现了这一切，这就有可能让后人不是从理性的分析中，而是从感性上去感觉、触摸这一带有根本性的共和国历史的真实，这是偏于宏观大叙述的历史著作所不能替代的。刚才许多朋友的发言对此已经有了很透辟的分析，我就不多说了。我想谈的是另一方面。面对这样一个计划化控制的社会，没有亲历过的后人可能要问：在如此严密的控制下，人们是如何活过来的呢？本书的作者正是从自己的生活经历出发，

以同样丰富的历史细节对此作了具体呈现。控制自然是有效的，并且已经渗透到人的日常生活中；但人们却也总能从严密的控制中找到某些空隙，并以中国平民百姓特有的生活智慧，尽量地加以扩大，从而为自己以及家人获得某种生存的空间。这种生活的智慧自然是令人心酸的，但它也表现了一种坚韧的生命力，这正是中华民族文化中所固有的，并且是深扎在中国普通民众的精神结构的深处的。它在共和国的历史上，事实上是构成了对前述计划控制的反力，对总体的有效性形成了无形的破坏与削减，它不显山不露水，甚至不易被觉察，却又是极其顽强的。而且最终的胜利者仍是这平民百姓的生活逻辑，或者说历史总是要回到这块土地上的大多数人的生活逻辑上来。——尽管处于历史辉煌位置的大人物们永远也不会承认这一点，而普通平民百姓也永远是沉默的。某种机遇却使这本书的作者开了口，并且凭借书的形式得以传播；我有机会读到了它，并因此看到了一些被掩盖了的东西：这都是一种难得的幸运吧。

最后还有一个不能回避的问题：本书的历史叙述有没有被遮蔽了的内容？我想，大概是有的。根据也是我的阅读体验。坦白地说，尽管从理性分析的角度，我对本书1949年以后的叙述最有兴趣；但凭感性的直观感受，对我最有吸引力的，却是1949年以前的部分。与后者的酣畅淋漓、轻松自如相比，作者写到共和国这段，就常常语焉不详，从有意无意的回避中，可以感到作者内心的某些紧张。其实也未必有什么具体的压力，而是已经内化为生命的一部分的人生经验（这是我们这一代人都有的），在暗暗地提醒着、监视着作者。这本身就是共和国人灵魂史的一个不可忽视的部分。

1999年4月2日写于燕北园



## “燕山偶语遭奇祸”

——《燕山夜话》的命运及其影响

这本是一本普通的杂文集——1961年，《北京晚报》约请时为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的邓拓，用马南村的笔名，开设“燕山夜话”的专栏时，是把它定位为“知识性的专栏杂文”的；因此，作为专栏的第一篇文章，题目就叫《生命的三分之一》，讲的是如何“利用夜晚的时间”，“在整天的劳动、工作之后，以轻松的心情，领略一些古今有用的知识”。当然，既然是文人作文，在谈天说地之时，也会涉及时弊，比如一篇题为《智谋是可靠的吗？》的文章，就批评了那种“喜欢自己逞能”，“不接受下面群众的好意见”的作风，强调要“重视群众的智慧”——其实作者也并没有越出毛泽东所说的“群众才是真正的英雄”这类的话题。但在当时算是说了一些真话，再加上具有知识性与趣味性，因而受到了读者的普遍欢迎；后来《燕山夜话》结集出版，前后共印行了三十万册。《燕山夜话》之外，北京市委主办的《前线》杂志还开辟了《三家村札记》专栏，作者是邓拓、吴晗（著名历史学家，北京市副市长）、廖沫沙（杂文家，北京市委统战部部长）三人。《三家村札记》里的杂文也受到了读者的欢迎。

《燕山夜话》写作时间并不长，始于1961年3月，到1962年9月就中止了。作者在《燕山夜话》第五集出版时，写了《奉告读者》，特意说明：“由于近来把业余活动的注意力转到其他方面，

我已经不写《燕山夜话》了。”在此之前（1962年7月），作者在为书的第四集所写的《编余题记》里，曾提到对《夜话》里的文章也有不同的意见，因此期待“各抒己见，畅所欲言”，“真正做到百家争鸣”，“假如一时弄不清是非，那又何必着急呢？至于有些问题根本难断谁是谁非，那就更不要操之过急了。也许有些问题提出来，又搁下去，经过多数人慢慢研究，原先不同的意见慢慢地又可能一致起来。因为是非终究有客观的标准啊”。

以后的事实却证明：这都是书生之见——作者虽为中国共产党的高级干部，他对60（70）年代的中国政治实在是太不了解了。

时隔四年，1966年5月8日，“文化大革命”刚刚开始，《解放军报》突然以显著地位刊登了江青“写作班子”署名为“高矩”的《向反党反社会主义黑线开火》的文章；同日，《光明日报》也以显著地位刊登了署名为“何明”（即关锋）的《擦亮眼睛，辨别真假》的文章。仅隔两天，姚文元在上海《解放日报》、《文汇报》又抛出了《评“三家村”》的长文。这些文章以同一腔调，给《燕山夜话》与《三家村札记》横加“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的罪名，并且勒令全国报刊一律转载：这完全是一次有领导、有组织、有计划的“大围剿”。

请看他们是如何给《燕山夜话》罗织罪名的——

前述《生命的三分之一》一文，本来是鼓励人们在劳动、工作之余，多读点书，不要让时间白白地浪费掉；姚文元却偏说劝人业余读书，就是要“腐蚀”人们的生命的三分之一，并由此而为“和平演变”组织力量，以便“颠覆整个无产阶级专政，实现资本主义复辟”。

《智谋是可靠的吗？》如前文所说，是批评“不接受下面群众的好意见”的作风，本是泛指；到了姚文元的笔下，就变成

了“要党中央接受他们支持的那条修正主义路线”。

还有一篇《堵塞不如开导》，原意是强调对事物的运动，应避免用鲇鱼那样的“堵”的办法，而要像禹一样地实行“开导”。姚文元却抓住文章中的两句话：“一切事物都有各不相同的种种特征”，要“积极开导使之顺利发展”，然后任意嫁接为一句话：“一切事物都应积极开导”，于是大加引申，发挥：“这岂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帮分子也要积极开导，顺利发展？”

《燕山夜话》里有一篇《交友待客之道》，本来是为在北京举行的第26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而写的，所以有“要欢迎朋友比自己强，这对自己有好处，因为可以向他学习，提高自己”这样的话。姚文元笔头一摇，就变成了邓拓“鼓吹要‘学习’‘团结’‘比自己强’的国家”，再一变就变成“恶毒攻击我们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要求把修正主义请进门，引狼入室”。

大概无须再作举例，就可以看出，横加给邓拓等人的“罪名”完全是莫须有的，姚文元这类刀笔吏先定了罪名，再去搜罗“罪证”，不惜移花接木，断章取义，张冠李戴，牵强附会，无限上纲，指鹿为马，混淆是非，颠倒黑白……把中国历史上专制强权统治下，罗织人罪的所有伎俩，都无所不用其极——这是典型的文字狱！

但这中国文字狱新的一章却打着革命的旗号，是在“防止中国实现资本主义复辟”的“大义”下，有组织进行的，其社会动员力量是惊人的；因此，它似乎很容易地就煽起了全民族的“革命义愤”：报纸上连篇累牍地发表着工农兵代表、各条战线先进人物，以少数民族代表人士……的批判文章；中国每一块土地上的每一个单位，从工厂、机关、学校，到军营、农村……到处都在召开声讨大会，贴满铺天盖地的大小字报；甚至连街头跳皮筋的小女孩都唱着这样的儿歌：“吴晗、邓拓、廖沫沙，一根藤上仨

黑瓜。打，打，打，我们坚决打倒他！”——邓拓等真的陷入了“人民群众的汪洋大海”之中，这样的全民参与的文字狱，是中国的独特创造，令人无奈而恐怖。据说曾长期担任《人民日报》总编辑的邓拓，面对报纸上的大批判文章，神经高度紧张，又不停地喃喃自语：“群众是对的。既然宣布我反党反社会主义，那就是敌人，他们当然理应表示憎恨。群众从来是相信党，相信党报的。”

1966年5月18日凌晨，邓拓含冤自尽。

1968年3月，吴晗的妻子袁震被关进劳改队，折磨致病而死。同年10月11日，吴晗在狱中被迫害致死。1976年9月23日，吴晗的女儿吴小彦在狱中被逼疯，自尽。

廖沫沙是“三家村”作者中的唯一幸存者，但也被监禁、流放了整整十年，愤激之中，写下了“燕山偶语遭奇祸”的诗句。

受难者远不止邓拓等三人，不仅株连九族，而且实行瓜蔓抄：曾办过类似专栏的各报的负责人、编辑与作者首先遭到同样迫害；接着凡对《燕山夜话》表示过赞扬，甚至只要读过作品的读者都被牵连进来；随着批判运动的深入，即使没有读过、不知道《燕山夜话》为何物，只要喜欢业余读书、写作，彼此有过文字交往的，都成为怀疑对象，于是，几乎每一个单位都揪出了大大小小的“三家村”、“四家店”、“邓拓、吴晗、廖沫沙式的人物”——文字狱就这样迅速遍布全国！

批《燕山夜话》、《三家村札记》仅是一个开始。姚文元在他的《评“三家村”》里杀气腾腾地叫嚷：“不管是‘大帅’，是‘权威’，是三家村或四家村，不管多么有名，多么有地位，是受到什么人指使，受到什么人支持，受到多少人吹捧，全都揭露出来，批判它们，踏倒它们”，并要挖出“最深的根子”。这里所说的“挖最深的根子”，就是要顺着“邓、吴、廖（他们都是北京

市的领导成员)”三根“藤”，挖到以彭真为首的北京市委，再由彭真挖到作为“文化大革命”的主要目标的刘（少奇）、邓（小平）司令部。这就是所谓“上揪”。此外，还有所谓“下扫”，即是要将“邓拓、廖沫沙式”的党内知识分子，“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吴晗式”的思想、文化、学术、教育……各界的专家、学者（“反动学术权威”），以及据说是作为他们的社会基础的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右（派）……通通扫荡以尽。“上揪下扫”合起来就是所谓“横扫一切牛鬼蛇神”，这差不多概括了“文化大革命”的全部目的与内容。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批吴晗的《海瑞罢官》是准备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一个试探，而批邓拓的《燕山夜话》与邓拓等的《三家村札记》，则是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一个突破口与“样板”。以后在中国发生的各种惨事、怪事、荒唐事，都可以在对《燕山夜话》的批判、对邓拓等的迫害中，找到最初的样式。比如姚文元的“檄文”中“全都揭露出来，……踏倒它们”这一句话，后来就成为对“牛鬼蛇神”进行武斗（所谓“踏上一只脚，让他永世不得翻身”）的文字根据。

可以说，对一本书（《燕山夜话》）的批判引发了十年浩劫，一个人（邓拓）的死成为一个民族旷世苦难的开端。

而且影响并未因十年浩劫的结束而消失：它所留下的民族心灵的创伤是难以愈合的，它对民族精神的毒害更是后患无穷。我们已经说过，十年浩劫中把文字狱扩大到全社会的每一个基层单位，而且是全民参与的：全国上下都从公开发表的与私人的未发表的文字的字里行间去找问题，抓“反革命”，制造了无数的冤假错案。尽管后来都平了反，但其背后的“可以根据一个人的思想、文字（包括私人的，没有造成社会影响的文字）定罪”的理念，却很少受到质疑，这就不可能从根本上杜绝文字狱，从而留

下了隐患。而十年浩劫中，经过对大大小小的“三家村”的斗争，人们学会了从微言中发现大义，甚至无中生有地凭想象去搜寻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证。这种畸形的政治想象力普及到每一个老百姓身上，是极为可怕的。而且已经形成了某种思维定势，总是习惯于从他人的文字中想象出种种罪名。在这种社会氛围下，人的每一句话，每一个字，都有可能成为罪状，带来骇人的后果，这就根本谈不上思想、文化、学术的独立、自由地发展。

因此，《燕山夜话》的命运，应该成为一个永远的警示。鲁迅曾一再沉重地谈到，我们这个民族最大的毛病，就是“没有记性”，总是有意无意地掩饰、遗忘历史的苦难与灾难，这样，历史可能重演，灾难也会重来。他因此提倡写“文祸史”，让后人知道，先辈们为追求知识与真理，曾付出过怎样的代价。《燕山夜话》正是本世纪的文祸史的重要一页，我们今天在这世纪之末，重提这本书，除了表明没有忘却，更要表达一个愿望：文祸史再也不能在下一个世纪继续写下去了！

1999年6月28日写于燕北园

（本文在写作中曾参考了任文屏《一桩触目惊心的文字狱》，子伶、子真《吴晗和〈海瑞罢官〉》，刘茵《繁星闪耀——记廖沫沙》，袁鹰《玉碎》，柏生《吴晗和他一家》等文，特此说明，并向有关作者表示感谢。）

# 面对血写的文字

——初读林昭《致人民日报编辑部信》

一

这十四万个血写的文字送到我的手中，已经很久了：我感到艰于呼吸，更无以言说。

我周围的狂欢的盛典也不知举行过多少次了：我感到窒息而艰于言说。

我只剩下了无词的言语。

但我却无法忘记林昭那凄苦的声音——

能把血流在光天化日之下众人眼目之前亦云不幸之幸矣！  
林昭的血都是一点点一滴滴洒在无人看见阴暗角落里的！……

又是一个“暗暗的死”！

真的要让它暗暗的泯灭，在人们的记忆中永远消失吗？

然而，血已经流了，那就再也抹不掉了！

记着林昭的话：“在历史的法庭上我们将是原告。”

这血写的每一个字都是控告词！

## 二

每一个良知未泯的中国人，请直面林昭的《血衣题跋》——

一九六五年八月八日，被移解而羁押于上海第一看守所。在彼处备遭摧折，屡被非刑，百般惨毒，濒绝者数！寸心悲愤冤苦沉痛激切，不堪追忆，不可回想，不忍言说！忆之如痴，想之欲狂，说之难尽也。呜呼！哀哉！此是何世？！我是何人？！所怀何志？！所遇何事？！天哪，天哪，尚得谓有天理，谓有国法，谓有人情，谓有公道耶？！此衣是一九六四年八月间穿上，时正在桎梏之下，又无纸笔，乃在背上血书“天日何在？”四字，聊当窦娥自诔。八月下旬重某日遭女监众鸨婆榜掠，两襟“冤枉”、“死不甘心”等字即受刑时所写。在襟并前胸淋漓血迹则是同年十一月十日困穷乞现之日誓死明志以玻璃片割裂左腕脉管所沾染。一九六五年五月卅一日“宣判”后重到上海市监狱，六月十九日初次接见至亲胞弟，见面之际，恍若隔世！旬日以后第二次接见并送入衣物，方遵慈谕恃此衣换下。自怜遭际，谁解苦心，前尘历历，永志弗忘！

一九六五年七月六日林昭志于  
上海市监狱女监三楼53号囚室

还有林昭的眼睛——

人们不只一次地说我：“你的眼睛里有一种光，挺奇怪的，有时看起来很怕人！”

怕人吗？也许是罢。既然我的眼睛看见了比地狱还更悲



惨、更阴森、更血腥淋漓地可怕的地狱！既然我的眼睛看见了最阴险恶毒、最荒谬可耻的罪恶谋杀！——看见了最怨恨深重最凄怆沉痛的不幸的死亡！

我们有勇气正对这双眼睛的逼视吗？

### 三

我们还要思考林昭的意义。

诚如林昭自己所说，她是凭“感性的直觉”去“行动”的；因此，她不同与张中晓、顾准，不是思想家型的战士，而是以道德、情操的崇高和反抗行动感召人、震撼人心的一位受难的殉道的圣女。

但这并不等于没有她的思考及思考的价值。

她的价值或许可以用她的自我命名来说明。

在这封带有很大的自白性质的《致人民日报编辑部信》里，她最频繁地使用的自我命名是“年青的反抗者”。在附录的《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检察院起诉书》里，曾对林昭列有“1957年因反党反社会主义而沦为右派”的罪名；林昭大义凝然地批驳说，这是“极权统治者所惯用的伪善语言，其颠倒黑白而混淆视听可谓至矣！这句话正确地说，应该是：1957年在青春热血与未死之良知的激励和驱使之下，成为北大‘五一九’民主抗暴运动的积极分子！”。她昂然宣称：“‘五一九’的旗帜绝不容其颠倒！‘五一九’的传统绝不容其中伤！‘五一九’的火种绝不容其熄灭！只要有一个人，战斗就将继续下去，而且继续到他的最后一息”。这段反驳词写在1964年，也即为“右派”平反的1979年的十五年前，在那样的时刻，林昭对“五一九运动”的旗帜与传统的坚守，不仅表现了非凡的勇气，更表现了一种坚定的信念。我们说，北京

大学的“五一九”民主运动是“五四”精神的继承与发扬，在中国现代民主运动史上具有重要意义；那么，林昭以“年青的反抗者”的姿态自觉地将“五一九”开创的事业继续下去，并因此而献出了自己的生命，她也就当之无愧地成为“五一九”民主运动的杰出代表，“五一九精神”的继承与发展者。

林昭又自称“大陆青春代自由战士”。林昭身上有明显的理想主义、浪漫主义与英雄主义的气质，她的反抗具有鲜明的“青春代”的色彩。但更为可贵的是，她同时清醒地意识到青春激情被利用的可能性。她自己就有过这方面的深刻教训。因此，她在反抗外在的压迫的同时，更以同样非凡的勇气反省自己“政治上的幼稚”和应负的历史责任，她说，“在严肃而沉痛的自我审判中林昭对于自己的责备那是比别人之别有用心地提问更要尖锐而严厉得不知几多”。在这个意义上，她又是一位已经清醒、觉悟了的不被利用的“青春战士”。在这一点上，林昭具有一定的超前性：因为在她以后，就发生了红卫兵的青春激情被利用的悲剧。

林昭之所以能够走出青春激情被利用的危险区，一个明显的标志，是她从自己被打成“右派”、惨遭迫害的生活经验中产生了发自生命内部的信念与追求，这就是“自由”与“人权”。如果说“五一九”运动中的主要口号是“民主”与“法制”，林昭则在坚持“民主化”，特别是“政治民主化”的同时，更进一步提出了“人权”与“自由”的概念：她自称青春代“自由战士”正是表明她是以“还我人权与自由”作为自己的主要奋斗目标的，这一点在1949年以后的中国历史上自然是有着重要意义的。

林昭又自称“捧着十字架作战的自由战士”，这也很值得注意。

她在文章中一再表示赞同这样的观点：自由“是一个完整而不可分割的整体，只要还有人被奴役，生活中就不可能有真实而

完整的自由”，并做了这样的发挥：“除了被奴役者不得自由，那奴役他人者同样不得自由。”于是，她如此提出问题：“身受着暴政奴役切肤之痛再也不愿意作奴隶了的我们，是不是还要无视如此悲惨的教训，而把自己斗争的目的贬低到只是企望去作另一种形式的奴隶主呢？”而结论是：“自由的性质决定了它不能够以暴力去建立，甚至不能以权力去建立”，“即使在中国这么一片深厚的中世纪的遗址之上，政治斗争是不是也有可能以较为文明的形式去进行而不必定要诉诸流血呢？”林昭在身受空前的暴力迫害、并以自己柔弱之躯进行拼死反抗的情况下，仍然坚持探讨如何走出“以暴易暴”的怪圈，这本身即有一种特殊的感人力量与思想价值。或者如她自己所说，这是“有一点宗教气质——怀抱一点基督精神”的，她自称“奉着十字架作战的自由战士”大概也是要强调这一点。而林昭对被奴役者提出的不要“企望去作另一种形式的奴隶主”的警告，在现代中国更有着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在随即发生的“文革”中，许多因受压迫而奋起反抗的年轻的造反者，在掌握了权力之后，都纷纷成为新的奴隶主；反观林昭在1965年，也即“文革”前夕发出的警告，就不难看出她的思考的前瞻性。

林昭就这样在1957—1966年的中国民间思想发展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

2002年4月29日写毕

## 二十九年前的—封书信

这又是一篇被埋没、被遗忘了的文字，在人们将鲁迅陈尸街衢争论不休时，它突然出现在我的眼前——这是当年一位知青留下的《劫灰残编》，如今却如鲁迅《蜡叶》里那“乌黑”的“蛀孔”，“明眸似的”“凝视”着我，让我悚然而思。

我又回到了那个时代。

我曾经说过，我自己，我们那一代人，或者还包括知青那一代人中相当一部分人，是在“文革”后期走近鲁迅的。这里有两个机缘：首先是我们——中国的知识分子和众多的年轻人被毛泽东赶到了中国的农村，这自然是一种反智主义的强迫改造，不能将其美化或理想化；但当人们离开城市与书斋，来到了中国的社会底层，与生长于斯的中国农民有了实际的接触以后，在思想感情上所发生的变化，也同样是真实而不可否认与抹杀的。这本《劫灰残编》的作者说得很实在：“到了山西沁县一个叫李家沟的小村，我才知道了什么叫中国，才知道我们的百姓是多么的苦又是多么的好。”这两个“才知道”，其实是非同小可的；尽管有些人后来又忘记了或故作不知道，但知道了并永远牢记在心、念念不忘者，就此生此世再也摆脱不了所谓底层情结了。而这正是走向鲁迅的通道。人们只有在现实生活中（而不只是在书本上）发现了鲁镇、未庄，发现了阿Q、闰土、祥林嫂，更发现自己就是阿Q与孔乙己时，才真正懂得了鲁迅。鲁迅的灵魂，他的

思想艺术的生命之根是深扎在中国这块土地上的，他和中国的底层人民有着血肉般的联系；不了解中国的底层，特别是中国的农村，永远也不可能理解中国和他的最忠实的儿子鲁迅。

更重要的是“文革”后期，特别是林彪事件发生以后，我们终于从迷狂中清醒过来，用怀疑的眼光重新审视人们告诉我们的一切时，我们经历了一次最深刻的绝望，按一位知青在一封通信里的说法，这是一种走向地狱般的刻骨铭心的生命体验：“用最冷酷的眼睛来观察这个社会，抛掉了那种行尸走肉还不能舍弃的装饰，我得到的就是最真实的结论：凡是死亡的事物，都带上了死亡的色彩，而这色彩，是用什么颜色也掩盖不住的。”（参看《民间书信（1966—1977）》，安徽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388页）有了这样的绝望体验，人们就从根底上接近了鲁迅。《劫灰残编》的作者，正是在自己感悟到“前面是坟！坟之后是什么，我不知道”这一瞬间，读懂了《过客》与鲁迅的。这是一次历史的遇合：正当中国社会孕育着巨大的变革（这就是后来的改革开放），敏感的民间思想者意识到自己的历史使命，自觉地为此寻找与磨炼思想武器的时候，他们重新发现了鲁迅。鲁迅终于摆脱了意识形态的曲解与利用，以其独立、自由、批判与创造的本来面目，参与到“文革”后期民间独立思考中，成为新的探索的重要的思想资源。《劫后残编》的作者十分生动地回忆了他当年“在只有三条腿的歪斜的桌子上，伴着一豆油灯”深夜读“幸免于灰烬的鲁迅的书”的情景与感受：“读他的小说、散文、杂文、诗歌，就仿佛他所痛陈的一切、他所愤怒的一切、他所蔑视的一切、他所悲怜的一切、他所热切的一切，都直指着我们直斥着当世的非人的一切。我常常边读边感到心灵的震颤。”这发生在鲁迅和经历了“文革”的中国知识分子与年轻一代之间的生命深处的共振，影响将是深远的。

于是，顺理成章地出现了这篇我们所说的被埋没、被遗忘的文字——这是《劫灰残编》的作者卢叔宁于1972年11月11日写给他的知青朋友志拴的一封信，是那个时代民间交流中的“鲁迅论”。

这封信是作者对收信人一个多月前的来信的回应。来信所讨论的中心问题是：如何为新的“启蒙运动”做准备，这正是“文革”后期的民间思考与讨论中的一个重要内容。这是可以理解的：“文革”中发展到极端的专制集权，使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中国封建专制的根深蒂固，它的根基，远比枝干更深更长更广的根基，牢牢地密布于它所依附的大地上”。如作者在信中所说，“如果说中国未曾有过资产阶级的启蒙运动是一个遗憾的话，那么能够进行更广泛得多的无产阶级启蒙运动不仅可以补前者之不足，而且可以是一次社会思想的飞跃”：这几乎是当时很多人的共识，而事实上成为80年代的思想解放运动和启蒙运动的先声。我们感到兴趣的是，鲁迅正是被这样一个已经呼之欲出的历史运动召唤出来的：他从一开始就被认定为几乎是“唯一的一个”“真正的启蒙者”。这个认识决定了鲁迅对80年代的启蒙运动的决定性影响：这一事实无疑是有思想史的意义。

因此，“文革”后期人们在思考鲁迅的意义时，是与对中国历史的反省联系在一起的。于是，就有了这封通信中的如下讨论：“你提到启蒙运动，细究起来中国何曾有过启蒙运动呢？相反有的是蒙昧时代。自然启蒙也是有过的，但一旦启蒙者也坐上了以往自己所攻击的王位宝座时，启蒙者就变成了蒙昧者，启蒙运动也就为蒙昧教育所替代了。往日的市野上的革新者一变而成了王族、幸臣、侍从。”这里所说的“启蒙者变成蒙昧者，革新者变成新的统治者”的历史循环，正是鲁迅所要揭露的“彼可取而代之”

之”的“阿Q式的造反（改革）”的本质。他早就预言：“此后倘有改革，我相信还会有阿Q似的革命党出现。我也很愿意如人们所说，我只写出了现在以前的或一时期，但我还恐怕我所见的并非现代的前身，而是其后，或者竟是二三十年之后”。鲁迅在离世前三个月还在一封通信里，特地谈到后人不能理解他的这一“本意”的担忧。而鲁迅这一预言，却在“文革”中又一次得到了证实。那个时代有一句相当响亮的口号，叫作“权力与财产的再分配”，讲的就是“彼可取而代之”；因此，“文革”的所谓“造反”，不过就是以连起码的游戏规则都不讲的新贵（以“四人帮”为代表）取代多少还讲点规矩的老官僚。因此，可以想见，1972年的这些民间的思想者在面对这样一个“走不出的蒙昧与奴役时代”的历史与现实，他们的心情是相当沉重的。而要走出这样的怪圈的第一步，就是要如鲁迅那样，敢于正视与揭露：不仅是“现代的前身”，就是“其后”也会产生新的蒙昧主义与新的奴役这一历史的循环现象。——正是在对任何形态的蒙昧与奴役的再生产保持高度警惕这一点上，鲁迅显示出了他的真正的启蒙者的意义。

不过，通信的作者卢叔宁和他的朋友首先要做的，却是要抹去“文革”的蒙昧主义强加于鲁迅身上的历史的灰尘。于是，又有了这同样沉重的文字：“鲁迅的境遇，在生时受到的是无穷的攻击和暗箭，而死后在一些人则欣喜地将他忘却淹没，……更有一些人则以尊崇他的姿态将其摆在他们宗祠的祭坛上加以顶礼。其目的不过是用一个新的神像来装饰自己的门面或驱斥自己的政敌。……鲁迅的向着自己、他人、社会刺去的解剖刀变成了专向不祈祷不跪拜的异教徒的严厉的法剑。鲁迅在生时所无限同情又无情地批判憎恶的阿Q们，还有那鲁迅用厌恶与蔑视之笔画下的聪明人们（奴才、假洋鬼子等）在鲁迅死后，倒反过来

将他‘聪明地’‘阿Q’化了，这是怎样的一种讽刺和怎样一种痛心的悲哀啊！”没有比将蒙昧主义的死敌变成蒙昧主义的工具，更令人憎恶与痛心的了；这是中国的“聪明人”惯用的伎俩，而善良的人们总是对之缺乏警惕。卢叔宁们由此而意识到自己的历史责任：“揭示这些该是新启蒙者的任务之一吧。‘还我鲁迅’该是鲁迅精神真正继承者的口号。‘还我真貌’则是鲁迅幽灵哀痛而深沉的呼号了。”——今天我们可以看得很清楚：80年代学术界所提出的“回到鲁迅那里去”的主张，正是对这一历史呼唤的回应。这本身就构成了80年代思想解放与启蒙运动的重要内容。写作于“文革”后期的这封通信也因此获得了某种文献的价值。

当然，这封通信最值得重视的，还是作者对鲁迅的价值的正面阐述：“鲁迅对中国是太宝贵了。他是中国昏沉沉几千年产生的第一个最无情最彻底深刻地对中国社会的揭露者、批判者。中国在昏睡状态中度过了几千年，却没有一个人像他那样了解他们所生活的社会，或者说没有一个人能够 and 敢于将中国的真面目揭示出来。总是欺骗着别人也蒙骗自己，骗者也被骗着。在无数的礼节和假面中活着。统治者高兴在假面后面将自己扮成人民的救星，上帝的使臣，人们则甘于在假面具后面求得苟活。而一旦人民试图揭露那假面，看穿那统治者的狰狞贪婪的真貌时，则遭到最残酷的镇压。于是在被血装饰的假面后又恢复了双方的平静，虽然是像在森严的大殿里一样可怕的平静。”这里，又是一个永远也走不出“瞒和骗的大泽”（鲁迅语）的历史循环，这几乎是传统中国到现代中国的一个摆脱不掉的梦魇：从一个假面再到另一个名目的假面，中国人任何时候都生活在不断创新的假面具中，而且是由赵太爷们与阿Q们共同制造的。当作者说到“被血装饰的假面”下的“平静”时，心中是绝对不平静的：那正是1972年



的中国的现实，“于无声处听惊雷”，历史已经到了一个必须变革的临界点。鲁迅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向卢叔宁和他的朋友，向所有的民间思想者显示出他的力量与价值的：作为“中国昏昏沉沉几千年产生的第一个最无情最彻底深刻地对中国的揭露者、批判者”，在现代中国，他几乎是能够帮助我们走出“瞒和骗”的大泽的第一人。

通信的作者对鲁迅的揭露与批判的力量有着十分深刻的体认：“是鲁迅第一个不仅揭露了统治者的丑恶真貌而且第一个更深刻地将自己所深挚热爱同情的人们的被愚弄被歪曲被压抑而畸形化的精神心理揭示出来。前者的揭示不是由鲁迅始的，……而后者的揭示却是鲁迅独得的伟大。历来统治者不仅想隐瞒自己的真相，更恶毒比隐瞒自己更坏千百倍的是，不让人民认识自己，自己的缺陷自己的力量自己的信心自己的前途，这是最可怕的愚昧和奴化。”这里涉及到了知识分子与人民的关系问题，这是一个现代思想史上始终纠缠不清的问题，也是知识分子最容易失足之处。如作者在信中所说，曾有过对劳动者“崇以虚名”的做法，这是“文革”（及“文革”以前）的一个占主流地位的思潮：将知识分子与人民（劳动者）对立起来，美化后者而贬抑前者，当然也就从根本上否认了启蒙的意义与价值。作者看得很清楚：这样的“自发论的推崇者十有八九是可鄙的骗子”，鼓吹“人民至上”是假，不过是要以“人民代言人”的身份与名义，实行反知识、反文明的蒙昧主义与思想统治，所以作者说这是“最可怕的愚昧和奴化”。但同样值得警惕的另一个倾向，即是知识分子的自我神化，自认为是代表先进的先知先觉的救世主，而视普通劳动者为阿Q，甚至是必须排斥的消极、反动力量，这样，也从根本上否认启蒙，或者把启蒙变成强行灌输与改造的新蒙昧主义。鲁迅正是在这里显示了他的榜样的力量：一方面，他敢于正视并无情揭

露人民“被愚弄被歪曲被压抑而畸形化的精神心理”——如作者所说，“鲁迅在揭露阿 Q 的伤疤的时候似乎比那些说阿 Q 的伤疤有独特之美的人要遭到他人（甚至阿 Q 本人）的责骂。但真正爱阿 Q 的不是后者恰恰是揭露者的鲁迅”。另一方面，他十分明确，揭露的目的是让人民认识自己（包括自己的缺陷与力量），以便更自觉地掌握自己的命运。——可以看出，通信的作者的这些论述，是对“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鲁迅自述的一种理解与阐释，又显然包含了作者及他那一代人的“文革”经验（包括上山下乡身处底层社会以后的体验）的一个历史的总结，因而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

作为“文革”历史经验的总结，作者由以上对鲁迅的启蒙主义的理解，引发出的两个结论也许是特别值得注意的——

从这里我们可以找到一个识别一切统治者的标准。竭力掩住人民的耳目，混淆他们的视听，却将自己装扮成人民的代表者的统治者是骗子强盗。不仅相信人民的力量而且竭力使人民认识自己的力量、缺陷，使人民成为自己的自觉的主人者是人民的真正代表者。

不可小看这一“标准”。鲁迅曾经说过，他的一些文章“是见了我的同辈和比我年幼的青年们的血而写的”（《写在〈坟〉后面》）；那么，这里的总结却是“文革”的被欺骗、被镇压的历史的经验的结晶。

“启蒙的意义目的，我看就在于让人民认识自己，使人民成为一个自觉的社会成员，而不是一个盲目的人类生存者”。“劳动者一天不觉悟，一天不能认识自己的地位，一天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一天不能直接参加社会生产的管理，那么他们也就一天不能

结束自己过去那种被人愚弄摆布的可悲地位。新的‘资产阶级’就一天不会放弃他们的特殊权力，劳动者一天不会成为自己的实际的主人（而不是主义上的）。”——这是那一代民间思想者经历了“文革”的磨难，经过艰苦的独立思考与探索（在那个时代做这样的探索是要冒生命的危险的），重新确立的理想与价值理念；是他们对即将到来的中国思想启蒙与解放运动和社会变革的一个理论的设计与期待。经历了以后的一切的我们，今天再面对当年我们自己也曾参与的这一切，自会有无限的感慨，引发出更为深广的思索与反省。

令人遗憾的是，由于“文革”期间达于极致的思想与舆论控制，使得这里所进行的思考与理论成果，只能以私人通信的方式在极少数人中流传，而不能及时地转化为社会思想财富。以致在“文革”结束以后，我们根本不知道曾经有过这样的思考，无法在前人已经达到了高度继续前行，而不能不一切从头开始，这就是有些学者已经指出过的“思想史的断裂现象”，这是应该引起注意与反思的。正是这种断裂，使人们产生了一种错觉：似乎“文革”时期的中国的思想界只是罪恶与谬误的堆砌或仅是一片精神废墟。这是不符合事实与思想发展的逻辑的：凡有人的存在，就会有人的思索；思想是任何力量也禁止不了的。即使是最黑暗的年代，也会有思想的创造，也总有这样那样的理论成果作为历史的幸存者通过不同的渠道保留下来。即使是“残篇”也掩饰不了其思想锋芒与价值。后来者没有权力因为忽视而将其再度淹没。正因为如此，我愿意向学术界的朋友介绍这本《劫灰残编》，这封二十九年前的通信，希望人们在鲁迅诞辰一百二十周年的庆典中，注意一下这当年民间的默默纪念。——这将是鲁迅接受史、“文革”思想史上的重要文献，它标志着，穿越“文革”的民族与个人的苦难，中国的民间思

想者对自己的精神同道鲁迅的体认，所达到的时代与历史的高度和深度。

2001年8月17日写毕

（《劫灰残编》，作者卢叔宁，为《学术·思想·生活丛书》中的一种，靳大成、奚耀华主编，中国文联出版社，2000年版）

# “咬紧泥层根不死”

——读韩乐群《刺梨蓬草》

一

乐群的第一本歌词集《山里山外》是由我作序的，这一本诗词集更是力作，却只有“自序”。我理解乐群的心情：他要借此作一番自我反省，将一生的曲折、得失，毫不掩饰地向世人和盘托出，为自己竖立一座真实的人生纪念碑。

于是，我们读到了如此沉重的文字——

卖稿维持饭碗，一槌而定终身；焉期相许词家，半纪全操贱业。大颂红旗三面，聊剩废品一堆；高歌跃进千首，难吐真言半句。……

睁开双眼，写自己之所该写；唤醒痴迷，言他人之所未能言。勒马回缰，词句改吟诗句；回头是岸，赞歌且作悲歌。……

这里所叙说的，岂只是乐群？岂只是他的歌词？这几乎是概括了我们这一代人：我们就是这样唱了大半辈子的颂歌，以致今天也依然颂歌入云。颂歌或许也是有它的意义的吧，有人愿意将颂歌唱到底，也自是他的自由；但有一个事实却是不能、也无法掩饰的：正是在一片颂歌之中，中国这块土地上真实存在的悲剧

被遮蔽了，人民痛苦的呻吟与哀哭声被压抑了，我们的父母兄弟身上流淌的汨汨鲜血被打扫得干干净净了！

我曾在一篇文章中这样谈到中国的“永远的歌者”：“在同伴上了绞刑架时，诗人们没有反抗之声，只是高唱颂歌；当全民族陷入（“大跃进”、“文革”）的迷狂之时，诗人也没有自己的冷静、迷惘的歌唱，仍然唱着更加迷狂的颂歌：这是可悲的精神的死亡，诗人死亡”——这难道不是事实吗？

现在已是世纪之末，无论国家、民族，还是个人，都应该做一次世纪结账。

但又有多少人“敢于正视这淋漓的鲜血，敢于直面这惨淡的人生”？

更有多少人敢于公开承认，大声忏悔：我也曾是这样的歌者，我也无意地充当了“从血泊里寻出闲适来”的帮闲？！

我们中国有的是演戏的传统，有的是“另变一人，和‘以前之我’绝无关系”的魔术和“忘记术”：“白一白眼，反问道：‘这是我的账’？”（鲁迅：《准风月谈·查旧账》）

而且越到世纪末，越是演得起劲，忘记得彻底。

正是在世纪末的疯狂与迷乱中，我们听到了乐群清醒的自省。“废品一堆”云云，这里内蕴着怎样一个残酷的真实，包含了多少沉重、难堪与无奈，人们回避之不及，乐群却要公开坦诚说出，这又是怎样的大智大勇！

都说“难得糊涂”，但我看来，更是“难得明白”。经过半个世纪的磨难，末了才得这点明白——这确实可贵，却也太惨了。

何况还有至今不明白、也不愿意明白的呢？

## 二

而且本世纪最大的中国剧作家曹禺还有句话：“明白了，人却

残废了。”不仅是身残，更是心残，曹禺以及许多人因此沉默了。而另外一些人，因为看透了一切，也沉默了。

而乐群却于“勒马”之后还要“回缰”，“回头”了更要另寻他“岸”，真正是“敢把痴心痴到底”了（《编后感》）。于是，“已届望七之年，难攀期颐之寿。仅储酒坛半罐，还拼颈血一腔”，乐群开始了觉醒后的最后歌唱：“藉忧患而遣毫端，不辞苦语；借酒杯以浇块垒，敢作豪吟。”（《自序》）

于是，神州大地的哀鸣从诗人的笔端流出：“瘦手嶙峋翻上下，秃头疲软扭西东”（《哀童工》），“脑袋空空钱袋满，长街到处有文盲”（《悲童商》），“弃婴异地无人问，拐女他乡有贼催。劝尔投胎需切记，阎王贿把后门开”（《愍女婴》），“针筒吸瘦伶仃骨，坡土催肥索命捐……谁云人血浓于水，四百西西五十元”（《吸血鬼》），“都道工人老大哥，熬干血泪待如何。开门七字般般涨，卖铁还须砸铁锅”（《下岗愁》）……正是：“纵观海内尽诗人，绿俏红艳满目春。独有沅江歌哭者，行行血泪吊黎民”（《〈路边杂吟〉增订本读后》）。

“贪残满目心悲愤”（《杯底余光》），郁积于平民百姓心中的不满、不平之声，本已借助于民歌、民谣在民间不胫而走，现在也在诗人的笔下冲决而出：《官倒难倒》、《反腐》、《官迷》、《吃公宴》、《涨声》、《裙带风》、《枕头风》、《造坟热》、《斗富狂》、《硕鼠》、《官蠹》、《大出丧》、《行路难》、《哭笑难》、《特区舞厅》、《色魔》、《造神》、《假祸》、《名骗》、《赌风》、《逆子》……单是这些诗题，就足已表明：“心事浩茫连广宇”，作者的悲欢是与普通民众相通的，他完全自觉地以“指陈时事，针砭世风”为己任，正所谓：“应从民怨铸民魂，休管弥天鬼气深”，“行将七十老衰翁，何必奴颜曲背弓。几笔真情留后辈，怀沙沅水也从容”（《杯底余光》）。

乐群终于找到了自己的人生之路，文学之路：一条忠实于自己与时代，直面人生的道路，一条通向人民的道路。

我要说的是，对于乐群，以及和他的同代同类的知识分子，在人生的最后一程走上这条道路，也并不是偶然的。这不仅是因为中国古代就有“哀民生之多艰”的屈原传统，“文章应为时而作”的白居易传统，现代中国更有作为“民族魂”的鲁迅传统，乐群在他的诗词里多次提到“但使鲁翁重秉笔”（《复古风》），并仿《卖炭翁》而写《卖珠叟》，这都是表明了上述传统对于这一代人的深刻影响；但也许更为重要的是，他们在自己的人生道路上是与自己的人民共命运的。乐群把他的诗词集命名为《刺梨蓬草》，是大有深意的。“刺梨果结刺梨蓬，长在黔山大壑中”，这贫瘠的土地上培育出来的“真色真香真野味”，连同一身尖刺，自可视为乐群的诗词的象征；而“常年总在大山行，坐地花丛细细吟”（《编后感》），乐群和同伴在蒙受苦难时，是“大山”和她的子民们接纳并抚慰、养育了他们，“咬紧泥层根不死”（《〈路边杂吟〉增订本读后》），这一代人的根是扎在乡土中国的。诚然，与底层人民的同命运，是在那曲扭的时代，以一种曲扭的形式实现的，因而也必然带有负面的沉重阴影。比如，这一代人就曾经陷入人民崇拜的迷误，并由此出发，走上了自称人民利益代表的人民领袖崇拜的迷途，前文所说的唱了大半辈子的颂歌，就是在这样的思想基础上，半是违心、半是真诚地，半是被迫、半是自动地唱出来的：这历史的教训永远不可忘却，这样的悲剧也是万万不能重演的。但我们也不能在泼去脏水时，将孩子也都倒掉：那与人民，特别是底层人民的血肉联系，是不能割断的。在清洗了人民与人民领袖崇拜的精神愚昧的历史尘埃，恢复了自身的思想与人格独立以后，知识分子应该更坚定地立足于中国的大地，关注于生长于斯的普通人民的真实生活，倾听他们的呼声，继续从



中吸取精神的与文学的养料。——这正是我读了乐群的这本诗词集以后受到的启示。这也可以说是一种落叶归根吧，老而有归；这是一种值得羡慕的精神境界，作为老同学、老朋友，我更是为乐群感到高兴。

而我尤其感到欣慰的是，乐群并不孤立。几乎在读到这本《刺梨蓬草》的同时，我还收到一位云南的老革命、老知识分子力从文先生寄来的“内部交流”的诗集：《凡恋》。同样是到老年“回顾自己的一生”：“终于看到 / 它是那样地令人失望 / 在一场疲劳而漫长的梦里 / 留给我的 / 只是一条痛苦和悲伤的痕印”；同样是痴心不变，矢志不移：“但我还是愿意 / 把仅剩的鬼魂作为投枪 / 对准黑暗 / 猛掷过去。”（《正果》）而那首《招魂》，更是如雷般地敲击着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你永远消失了吗？ / 那坦荡的心灵 // 你永远逝去了吗？那无垢的天真 // 你永远不再回来了吗？ / 那纯洁的信仰 // 不 我想回来 / 但我再也回不来了 / 不信，数数你脸上的鸿沟吧 / 那是冷酷、无情、谎言、欺骗 / 甚至是血腥斗争所设下的 / 一道又一道路障。”确实，很多的人都“回不来了”，这样的历史的代价让人难以喘息；但仍然有人，有乐群，有力从文先生，还有不少的朋友，却没有被苦难的历史压倒，在晚年“招”回了自己的“魂”。这同代人的“凤凰涅槃”，使我从绝望中看到微茫的希望。

文章写到这里，又收到了刚寄来的1999年最后一期《上海文学》，编者的一段话引起了我的注意——

不管21世纪会给这个世界，会给中国，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文学的立场仍然应该是人民的立场。文学实现的，不仅是它的艺术良心，还应该有它的社会良心。文学和人民在一起，和正义与批判在一起。在这样一个时代，文学的目光不

妨再往下一些，关注一下人民的真实生活。

与我们正在进行的这番思考，正是不谋而合。——这里所说的，自然不只是文学，而是一种知识分子基本立场的选择。这样的选择发生在世纪之交，无疑是意义重大的。我们自然无意将其绝对化：它只能是众多的选择中的一种。但毕竟有了同道者，这还是令人欣慰的。——乐群，你说呢？

### 三

乐群这本诗集在文学上的价值与启示，我还想说几句。

当乐群决心“回头是岸，赞歌且作悲歌”时，选择了古体诗词作为自己的武器，并且获得了成功；这不仅显示了乐群古体诗词的修养与驾驭的功力（这正是我深为感佩的），这一事实本身就很有意义：它至少说明古体诗词这种形式在经过一定的改造以后，在表现现代人的思想感情方面仍然具有生命力，可以而且应当与新诗互为补充，相互渗透、影响与制约，构成更为健全的中国当代诗歌的发展格局。

而且古体诗词写作的崛起，也成为八九十年代重要的诗歌现象，很值得注意。当然，在崛起中也还有一些令人忧虑之处，在我这外行看来，吟风咏月、颂德歌功，似已成痼疾，旧功底若无新思想是不会有活力的。一些愤懑、怨天之作，也限于一己的悲欢，缺乏更为深广的关怀而显得气度狭小。乐群在他的《某些获奖诗作读后》里发出感慨：“诗词何日到民间”，大概不是无的放矢。而我总要想起鲁迅的话：“中国人向来因为不敢正视人生，只好瞒和骗，由此也生出瞒和骗的文艺来，由这文艺，更令中国人更深地陷入瞒和骗的大泽中，甚而至于已经自己不觉得。世界日日改变，我们的作家取下假面，真诚地，深入地，大胆地看取人

生并且写出他的血和肉来的时候早到了”，“没有冲破一切传统思想和手法的闯将，中国是不会有真的新文艺的”（《论睁了眼看》）。中国古体诗词写作的新的生命力也正有赖于此。我们或许也应该从这一角度去看乐群所作的“眼盯当代，心贴民间，敢为真声”的试验的意义：他至少提供了一条古体诗词写作的路子，尽管绝不是唯一的。这当然不是通向鲜花的坦途：走出瞒和骗的大泽，发心声说真话本身就是要付出代价的。乐群在“自序”中早已有言：“孤僧命蹇，不合潮流”，做了这样的选择，就逃不脱这样的宿命。我在这年末写这篇“读后”，就算是一种声援吧。乐群在风雨如磐的70年代曾有诗赠我：“最堪愁：微雨上征程，冬寒夜”（《满江红：赠钱君理群老同学》）。那么现在，我们又一起走向新的征程了。前景如何，且走着看吧。

1999年12月16日写毕于燕北园

# 失败者的不归路

——蔡玉镶《突围——一个底层知识者的人生体验》序

一

尽管我一再地表示想要摆脱身外与身内的沉重，但依然如山般的压来——这又是一部让我无法平静地对待的书稿。

书写得并不漂亮，但却十分的真实——正是这真实令人战栗。

单是这篇《矮子家族史》里的这一声长嚎：“矮子，苦哇。”就足以催人泪下。有谁会想到，身材的矮小与其貌不扬，竟给人带来了如许的屈辱；仅仅是要与别人平起平坐，活得有头有脸，都要付出常人难以想象的代价！又有谁会关注，这“矮小”的身躯承受着多少精神的与肉体的苦难，蕴藏着怎样一个巨大而复杂、丰富的精神世界：那异乎寻常的自卑与自傲，与身体的矮小形成巨大反差的内在的志气、英雄气、风云气、大丈夫气，那越是受压受挫而越加强烈的内心的不平、焦灼、愤激、狂躁……水里浸泡过千百次、烈火里熔炼过千百次、污血里爬滚过千百次，仍然不屈不挠的钢筋铁骨般的顽强的生命力，那拼将青春抛掷，不惜血肉溅飞，不达目的绝不罢休的舍命挣扎，屡战屡败，屡败屡战，一代人倒下，下一代接着冲上去前仆后继的奋斗……这些都构成了一部历史：作者个人的血泪史，蔡氏家族的血泪史。而且

我要说，这一切，包括“矮子”的意象，都具有一种象征性：难道你不会由此而联想起我们的国家、民族？作者说，他发现本世纪曾对中国历史进程产生深刻影响的孙中山、鲁迅以及邓小平，都是矮子；这事实或许有某种偶然性，但把它视为一种象征，也是可以的。自从上一个世纪中叶，中国的国门被迫打开以后，在与世界各国的比较中，中国人突然发现了自身的“矮小”（落后），由此而开始了一个多世纪的屈辱史、挣扎史、奋斗史。于是，本书作者和他的矮子家族所显示的前述精神特征，固然带有明显的个人性与家族性，但却具有更普遍的典型性，这是一个本世纪的典型精神现象，它是能够让人们联想起我们这个民族百年奋斗中丰富而复杂的心理内容的。

但我最想强调的却是本书的另一种典型性：“矮子”是可以视为受屈辱、被损害者的代名词的。作者把他的这部血泪之作称为“一个底层知识者的人生体验”，是大有深意的。作者一刻也没有忘记，他的祖辈、父辈都是农民；即使他已经脱离了土地，成为一个知识者，但依然没有忘却、也不可能摆脱自己与生俱来的底层性。于是，他不能不面对这样一个事实：尽管正是农民及底层人民养育了中国这块多灾多难的土地，他们为这个民族的生存与发展付出最多，牺牲最大，但却因为贫穷，因为没有文化，而长期被人矮视，受尽屈辱，而且前述民族的屈辱主要是由中国的底层人民承担的，可以说，他们是将民族的、阶级的屈辱集于一身的。这正是构成了本书作者这样的“底层知识者”最根本的生存体验，他（他们）对“矮子”的处境的特殊敏感，格外深切的痛苦，其实是包蕴着这更为深广的历史内涵的。

因此，尽管如鲁迅所说，这还不是沉默的国民自己发出的声音，但这些底层知识者的挣扎与呻吟，是应该倾听与关注的。而这恰恰是当今中国被压抑了的声音。我在刚写完的一篇文章里写

道，在这世纪之末，听见的是一片狂欢之声，早已将弱者的哀哭掩埋。知识精英依然高谈阔论，但中国的“矮子”们，这些备受歧视，备受凌辱的人们的真实的痛苦，却不在论题、视野之内，君子远离庖厨，大家相安无事，大概就要在太平声中迎来新的世纪吧。

那么，这执拗如怨鬼的一声声“矮子，苦哇”，实在是有点扫兴。不知道愿意倾听的人，还有没有？

## 二

本书最动情的篇章都是献给奶奶、母亲、父亲、哥哥与妹妹，献给自己家族的。这是作者和中国的底层知识者的生命之根。

于是，我们听见了：“一字一顿，几乎是从喉咙管里扯出来的，奶奶咳着，喘着，用整个生命唱出的”歌谣——

天——公——公——喂  
 地娘——娘——喂  
 保护——我家小——毛  
 升——学——堂——喔

作者告诉我们：“当天夜里，奶奶便离我而去了。……这是奶奶留给我的最后一支摇篮曲，我流着泪，默默地唱着哭着重复着，于是它变成了一首古老缠绵悲凉凄惨和深刻沉重的安魂之曲，在我的耳边永远回荡……”（《摇篮曲》）

大概每一个来自底层的知识者都有过类似的体验：他们的耳边永远响彻着这古老的生命的呼唤。

这古老的声音是来自中国农民的心灵深处的：他们几乎一字

不识，深信自己的一切不幸都与此有关；于是，知识、文化、学堂，在他们的心目中，具有一种神圣性，他们是如此虔诚地祈祷着上苍，让他们的子孙后代，能够念书识字，有着另一种命运，这是整个家族希望之所在。让孩子上学，有个“出息”，光宗耀祖，成为一代又一代中国农村吃苦耐劳的父母的生命存在的全部价值。对于作者这样的“矮子家族”，读书就更具特殊的意义。这是奶奶临终前的嘱咐：“孙子都矮，不考学堂就要投人家降”；这是父亲的信念：“人矮并不可怕，最可怕的是人矮又没有本事”；于是形成了儿子的理论：“矮子的强大靠的是精神，矮子必须从智慧方面发展。”这可以说是物质贫困、苦难深重的中国农民，以至中华民族，一代又一代，从自身的经验中提升出来的生存哲学，这是绝境中的希望之光：读书，追求精神的丰富，成了“矮子家族”的唯一生机。因此，当读者看到作者的父亲怎样逼孩子念书，扯耳、碰壁、踢腿、罚跪……是不能不受到震动的：在这几乎是不近人情的残酷背后，隐藏着的是怎样巨大的期待与爱！中国的农民的孩子是懂得这一点的，他们不会埋怨自己的父辈，只会把这一切深埋起来，成为刻骨铭心的原始记忆，化作最基本的生命欲求：无论如何艰难，也要读好书，报答父母，为“矮子家族”争口气！作者说，奶奶歌谣里的期待是他生命的“安魂曲”，这是实在的：不读得个“出息”，这些农民矮子的子孙的灵魂是永远也不得安宁的！

这样，中国农民、大地母亲哺育了自己的儿女，又把他（她）们送出了土地，并且期待再也不要回来。

### 三

本书的作者和他的同辈，于是在父辈的瞩望中，走上了永远的不归路。

这历史的选择发生在 80 年代的中国。

那是一个激情澎湃，充满理想的年头，是一个做梦的时代。在作者的笔下，成了永远怀想的“那个时候……”：“那个时候，散了多少步啊，那个时候说了多少话啊，那个时候写了多少信啊，那个时候吹了多少牛啊……”“那些放言肆胆谬谈阔论的日子，真不知天高地厚”啊！（《今夕何夕——致洪波书》）于是作者做起了“文学梦”，一个玫瑰色的梦。作者在 90 年代回忆说：“本世纪七八十年代的中国青年中做得最多的恐怕就是文学梦”，“那时候的风气是不爱做官爱文学，不像现在文学很臭，每一个人摸到自己的肚脐眼都是钱”（《大哥的文学梦》）。他说的完全是事实，尽管在今天的青年看来，这更像是一个现代神话。正是文学把这个矮子家族里的后代内在的英雄气、丈夫气全部诱发出来，使他坚信：通过文学的天梯定能使自己由躯体的“矮子”变成精神的“巨人”。整个家族也这样期待着他：“我家的玉镶佬将来在文学上大有前途！”在那个“文学是崇高的事业，每一个有可能成为作家的文学青年都被捧为天上的星座”的时代，这无异于宣布，他将从根本上振兴蔡氏矮子家族！——这志气，这责任，这预言，这自信，以后就成为一个挣不脱的梦魇，永远追踪着他，压迫着他的灵魂。

本书的作者就这样在 80 年代的梦幻中，从一个农民的儿子蜕变成一个充满浪漫气质的知识者。

他在中国中部的一个小城里安身下来。——终于脱离了土地，却又开始了新的生命的苦难历程。

无论如何，总算成了“公家人”，这应该是有了“出息”，家族的梦想至少是部分地实现了。

但他不能，他仍不得安宁。

他陷入了中国小城镇的灰色生活的尘埃之中。这就是本书“生



存之累”中所描述的那些“有聊”的与“无聊”的日子，“教书，回家，吃饭，屙屎，困……”（《无忌的诗》），“生活的轮子艰难地朝前滚动着，碾碎了我的青春。头发，白了；胡子，硬了；眼角，有了皱纹。生活的轮子继续无情地朝前蠕动着。无声无息。无香无臭。没有留下任何一丝痕迹。”（《过年》）

这无血的杀戮，在契诃夫的小说，叶圣陶、芦焚……的小说中都曾出现过，这几乎是一个永恒的苦恼，因而通常也是依靠时间的流逝造成的麻木来自行消解的，至少对大多数的小城镇的居民，包括其中的知识者，都是如此的。

但本书的作者，这位念念不忘振兴矮子家族的大业的农民英雄的后代，这位80年代的乌托邦的梦幻者，却长久地沉浸于真正的恐惧之中。他害怕自己陷于“危城”里不能自救，反复告诫自己：一定要冲出去！（《冲出危城——致唐师》）

于是，开始了他的“突围”的悲壮历程。

而且他还必须面对新的时代的挑战。这大概是出乎这些80年代的中国的大学生们们的意外的：当他们怀着种种英雄梦走出校门，还没有来得及大展宏图，就被铺天盖地的商业大潮淹没了。“时代”翻了一个脸：理想主义、启蒙主义被送上了审判台，金钱与权力突然受宠，钱权交易成为时髦；追求精神被视为神经有病，快乐、纵欲成为唯一原则；文学从神圣的殿堂上跌落下来，成为嘲笑的对象……

于是这些无论如何要弄出点出息的中国农民的子孙，又面临着选择的分野。——或许我们应该从这一角度，来看待本书写到的发生在90年代的蔡氏兄弟的论争。

大哥本是这个家族痴爱文学的传统的始作俑者，但也正是他首先提出疑问：“精神，纯洁到纤弱的精神，又怎能逃脱力大无穷、美丽无比的物质巨人的强奸呢？”（《长兄致二兄书》）他发现

文学梦将把他自己，连同深受他影响的弟弟、妹妹，以及整个家族引进一个死胡同。于是，开始用嘲讽的语气来重述自己当年被退稿的故事，而在此之前，他的每一次叙述都是以感伤的唏嘘作为结束的。他以对待文学那样的疯狂的热情投身于政界，并且很快就获得了成功，以县办公室主任的身份成为地方上的头面人物，一举而实现了光宗耀祖的世代农民的梦。而做弟弟的却仍痴迷、忠实于文学，在他看来，哥哥是在“以《红与黑》中削尖脑袋往上钻的于连为榜样，摇唇鼓舌来为当官的歌功颂德，圣洁的高贵的文学女神的贞操被一次次地出卖给了浑身酒臭的县处级官僚，独立的文学的人格变成了御用的工具”。兄弟因此不再通话，直到那一个春节，哥哥大醉之后，重又叙述那个古老的退稿的故事，却拿出一箱纸色发黄但却保存完好的文学手稿，边说边哭，动情处竟至顿足捶胸，弟弟这才明白“文学梦”依然深藏在哥哥心灵深处（《大哥的文学梦》）。更料不到的是，不久，哥哥因劳累过度，脑溢血突发而猝死。

这故事发生在90年代是有一种典型意义的，或许那令人感伤的结局才多少有些偶然性。本书的作者在哥哥的身上看到于连的影子，这更是一个相当深刻的观察。底层生活的经历与体验，那因被压抑而变得加倍强烈的出人头地的欲望，也是能够孕育不择手段的野心家与赌徒的。在这个意义上，哥哥是一个不彻底的于连，他还没有把自己完全出卖给金钱与权势的魔鬼，他的天良未泯，因此才有那失声痛哭，他仍然是一个牺牲品，最后的结局或许有一种必然性也说不定。而在90年代的中国的现实生活中，成功的于连是大大有人在的。他们在爬上了政治或商业的高位以后，以百倍的疯狂攫取原先不可能染指、因而显得格外耀眼的“黄色”（金钱）与“红色”（权力），或许自以为是在复仇，其实疯狂吮吸的正是养育自己的父老乡亲的骨肉。这是一个远为深刻的悲

剧，但不在本书的叙述范围之内，这里也只是顺便提及。

回到本书作者的选择上来：如果说80年代对文学的迷恋完全是一个美丽的梦，90年代在文学已经失去光彩以后，仍然痴心不改，就多少具有某种挣扎的意味。作者说他是在“坚守着这最后一道防线”（《哥哥的文学梦》）。他要坚守的不仅是他的矮子家族的振兴梦，更是那早已渗入血液的家族哲学：要以自身精神的强大对抗外在的磨难。这里是内含着一种中国农民的执拗、自尊与诚实的：一切仰赖自己而不做任何非分之举。作者内在的农民气质正是在这里显示出来：他不怕吃苦，准备独自承受一切物质与精神的苦难，只要能突围出来！他同时坚守的是80年代的理想主义与精神至上：多少个孤独的夜晚，他伏案疾书，也是在喃喃自语：“精神与物质的重建是同步的。更何况在世界民族之林里，所有的民族的最后都是以精神作为其归宿点”（《坚守精神——致思潮书》），“人们啊，永远不要忘了，人类在摆脱了物质上的流离失所之后，便必然要走向精神的家园，那是上帝指引给我们的最后的处所”（《沐泉》），“我热爱生命，我热爱文学，文学便是我的第二生命，不，文学便是我的第一生命，为此我押下了生命和青春的赌注”（《莫斯科不相信眼泪》），“我永远不让我的头脑给人跑马，直到它被砍掉，或者被埋进泥土”，“世界上最大的刑罚是剥夺人的思想，剥夺人的精神生活，让一个嗜好读书的人没有书读，一个酷爱写作的人根本无作可写”（《莫斯科不相信眼泪》）……这是真正的“身无分文，心怀天下”，是关于民族的、人类的归宿的大思考、大忧虑。这是绝望的抵抗：抵抗物欲横流对精神的侵蚀，抵抗权势对精神自由、独立的剥夺，抵抗世俗对精神对文学的轻蔑与亵渎，同时也抵抗着自身的软弱与可能的动摇，他一再地激励、警戒着自己：“可千万不能舍弃和退却呵，在这最后的关头”（《拒绝平庸——日记五则》）。在一篇文章里，他

说自己的住房“颇像一个封建的遗老”（《坚守精神——致思潮书》），他正是80年代时代精神的最后一个守望者，尽管守得如此艰辛，如此力不从心。

即使是回到现实的层面，他也是别无选择。中国的底层知识者要想依靠自己的本事突围而出，唯有科举考试一路。这是传统，也是现实——至少在本书作者的眼里是如此。他只有仰赖拼命地写作，以图发表而一夜之间改变自己的命运；同时拼命地读书，以图考上研究生，跻身于学术界，满足对精神的迷恋也改变自己的处境。

于是，就有了本书所深情描述的“不醒文学梦”。

#### 四

这条路在八九十年代的中国，也是有典型性的。当我们考察当今中国文学界与学术界的构成时，不难发现，其中有不少人都是农家弟子，或者是有底层生活经历与体验的，在某种程度上，他们都是矮子家族的后裔，并且都是通过文学或读书的通道突围而出的。这样的背景与他们今天的文学与学术的关系是复杂的，也是因人而异的，非三言两语所能说清；但这却是一个饶有兴味的话题与研究课题：作为生命基础的原始的底层体验与利益关系，怎样深刻而又曲折地影响着这些文人学者今天的思考与言说，他们因此拥有了什么资源，又可能承受着怎样的负担……

但这都不在本书的描述与议论范围之内。——和这些生存竞争中的不同程度的成功者与幸存者不同，本书的作者是一个失败者与被淘汰者。

命运在他面前充分展现了全部残酷与狰狞：上百万的生命结晶无一得到发表面世的机会。无数次的投考全以失败告终。连“乘桴浮于海”逃到异土也被押送回国（《莫斯科不相信眼泪》）。

所有的文学门都对他关上了。所有的学校门都对他关上了。所有的可能突围的出路都被堵住了。

他还有一条路：回到生他、养他的农村故土去。

他太想回去了。多少次，他对自己说：“你缩在这黑屋的一角，离了阳光，没有明月，空气都好像一个死，……视野早就窄了啊！……你生命的源，是在山里水里，花里草里，风里雨里雷里电里。……你忘了？你最初的根，是扎在黑色的泥土里，……在对面山上的竹子里！……我是从大山里走出来的，心灵里有农夫的创伤，毛孔中有泥土的气息……我应当回到山里去。……呼啦啦地，山风在外面唤我呢。我的头发蓬乱，大胡子长长，我并且归去，山不弃我。”（《归去，归去——写给自己》）这真是“梦里多少还乡路”啊！在本书中，写得最有灵气的文章都收在“伤心自然”这一辑里：《山之梦》、《山径》、《山中日记》、《山里的故事》、《夜读山》、《读夕阳》、《读雪》……那是写不尽的真山真水，永不枯竭的文学想象的源泉啊！

但他回不去，不能回去。

作者说：“不是我走在道路上，而是道路走在我的身上。由石块，水泥，风雨，年华，岁月，历史所组成的几百年几千年的经历和途路全部走在儿子的身上，儿子的骨头被压得铮铮作响。”（《爱的负荷——致弟书》）矮子家族送你出来的，是一条“不归路”啊！天意不可违，奶奶的临终嘱咐山一般不能动摇啊：“孙子都矮，不考学堂就要投人家降……我晓得孙子将来都有出息，可惜我看不到喔……就到我坟前放一千炮……”（《矮子家族史》）。没得出息的子孙怎归家啊，那是向命投降啊！……

不，我不投降，拼死也要拒绝投降！作者在《游子不归书》中对父母说：“儿之读书矢志，垂十有八年，未尝一刻懈怠，亦未尝一刻窥园也。其志在必得……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

索——遥想过年之家中，严父慈母拭目以待之，请看三男之将来。”真是不到黄河心不死啊！

前无出路，后无退路：玉镶佬啊，你把自己逼到绝境上了。

面对这不认输、不回头的失败者，人们还能说什么呢？

每一个成功者的背后，都有这样的数量多得多的失败者。但有几个成功者会想到他们呢？

而且正是这些失败者为成功者垫了底，或者如鲁迅所说，没有泥土，是不会有天才的花的（《未有天才之前》）。但历史从来是成功者的历史，在历史的叙述里是不会有失败者的位置的。

但我仍要说：请记住这些不屈的失败者吧，请倾听他们的充满血和泪的心声吧。而且我坚信，他（他们）的事业纵然失败，但在拼死搏斗中所显示的某些精神，却可以而且应该成为后来者的精神资源的。

但在这位身心交瘁的作者面前，我又能说什么呢？

一切安慰与鼓励的话，都是无力的。我只想和他讨论更为严峻，甚至是残酷的话题：在充分肯定了该肯定的精神的同时，是不是可以再对自身做出某些反省呢？或者说，能不能对某些作为前提的东西——底层的期望，80年代的时代精神，提出某种质疑呢？我提到了大哥的信中的一段分析：“在你的身上，充满了各种错综复杂的矛盾：相对丰富的文学书本知识与极端贫乏的生活知识；极端的精神和物质欲望与相形见绌的实际运作能力；千变万化的社会现实和一成不变的人生追求，等等，这些矛盾的客观存在，从根本上制约了你在事业、婚姻等方面的发展，叫你很难如愿以偿”（《尔非真英雄——大哥回信》）。这里，有没有某种合理的因素呢？

不久，我收到了作者的来信，其中有这样一段话：“矮子家族在文学上的悲剧意义是发人深省和惊心动魄的。它至少给人以两

点启示：一是一个人如果奉行‘文学至上主义’，或者说是‘文学唯一主义’、‘文学清高主义’，那么他在底层社会与环境的冲突并被环境所淹没，就几乎是必然的；二是一个人如果奉行‘个人奋斗’，或者说是在行为上奉行经过美化了的‘个人孤独主义’，而不知和整个社会大势结合起来，必然为时代所抛弃，形成身体孤岛与精神孤岛”。来信还讨论了“个人野心与个人才质的矛盾，人的无限的精神苦斗与社会家庭环境的有限性的矛盾”等等。

这自我反省的勇气同样给我以震撼。尽管我直观地感觉问题可能没有这么简明。但一时我又确实做不出作者期待我的“毫不留情的解剖与彻底的批判”，坦白地说，我没有也无法想清楚这一切。但我仍从这讨论里感到了作者的清醒与成熟，并且产生一种信心：他会继续寻找（或许能够找到？）自己的路。作者说：“我只能做鲁迅笔下状貌困顿的过客，一个劲地朝前走，好像前面有一个声音在叫我。”（《坚守精神——致思潮书》）——这也是我和他共同的宿命。

让我们“相濡以沫”吧。

1999年11月22日—25日写于病中

# 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的声音

——读文有感

这是《北京观察》杂志记者对原中共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和国务院政策研究中心主任杜润生的采访记录，发表在《北京观察》1999年第一期上。杜老强调了两点，一是“社会主义就是要解放生产力，共同富裕的目标不能放弃”；二是提出了“农民应变成个‘自由人’”的改革方向。虽然只有两句话，却具有极强的针对性与现实性。这些年中国社会所出现的严重的两极分化，垄断的政治权力向经济暴利的转换，以及二者的结合，引起了一切关注中国命运的人们的极大忧虑。“消灭一切人剥削人的现象”，这本是包括我自己在内的许多人从年轻时代就建立起来的理想；我们这些人就是由此而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面对新的剥削现象的大量出现，人们重又肯定了年轻时代的理想，强调中国的改革必须以“共同富裕”为目标，这本身即有着重大的意义。杜老的讲话更引人注目之处还在于他所提出的“自由人”的问题。这本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命题。去年是《共产党宣言》发表一百周年，引起了人们对马克思、恩格斯所提出的共产主义理想的重新关注，其中就包括了在《共产党宣言》里所提出的“自由人”（“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的“联合体”的理想。杜老重提这一点（同时强调的还有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的理想），并且是作为今后中国农村改革（实



际上也是整个中国改革)的发展方向提出来的,这就有了一种特殊的意义。

而他结合中国改革的现实与中国的社会现状,对“自由人”的阐释与实施目标的设想,更是引起了关注中国未来发展的人们的极大兴趣。杜老解释说,他所说的“使农民成为‘自由人’”,其实质就是“使农民变成有完整权利的公民”。在他看来,所谓“完整权利”应该包括“经济上的自主权”、“政治上的民主权利”与“发展文化,受教育的权利”。他由此而提出了一系列带有可操作性的主张。例如,要“使农民进一步走出封建社会与自然经济残余的阴影”,“成为独立的商品生产者”,“就目前而言,农民独立发展的机会还不充分,他们还缺乏充分的市场自由,迁移就业的自由,家庭的自主权是残缺的,……希望尽早走出过渡阶段”;“要使每个农民都能受教育”,“农民应成为有知识有文化的劳动者,提高他们的竞争地位,在起跑线上就会处于平等的地位”:这些意见应该说都是抓住了要害的。而杜老关于农民应有的政治民主权利的主张也许是更为重要的。特别是他在强调要“进一步扩大村民自治,乡镇干部通过直接民主选举产生”的同时,又提出了以下主张——

农民还应该有自己的团体,地方政府如果乱搞收费,或者有其它侵犯农民行为,农民应具有谈判地位和自我保护的权利,有自己的代表或代理人。比如减轻农民负担,现在中央高度关心,新闻界也替农民说话,但是他们没有自己的代表和政府直接对话。

应该说,这个问题的提出,是一个重要的突破,可以澄清许多混乱的思想。长期以来,我们一直强调政府就是人民(当然包

括农民)的代表,即使是自己的利益受到了侵犯(甚至是来自政府方面的侵犯),人民只能反映(而且必须是逐层反映)意见,提出请求,而绝不能“具有谈判地位和自我保护的权力”,如果各阶层的人民要组织自己的团体与政府“对话”,就会反过来被认为是政府对权利的侵犯。这样,一方面,就事实上颠倒了“主人”与“公仆”的关系,“主人”只能处于被动的地位,等待“公仆”对自己的关心,等待“为民做主”的“青天”的出现;另一方面,由于政府与人民之间缺少“直接对话”的渠道与制度保证,一旦双方发生矛盾,就很容易趋向激化,产生严重后果。而有的知识分子总是把人民看作是“暴民”,怀有先天的疑惧,宁愿自己来做他们的“代言人”,而反对人民(农民)有自己的团体与相应的民主权利。且不说这种自认的“代言人”本身就很可疑,即使有的知识分子以一个朋友的身份,真诚地同情人民(农民),为他们说话,这本身当然是有意义的,应该受到欢迎,但这并不能代替人民(农民)的自我保护与自我争取,其实这也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原则:人民只能自己解放自己。也正是立足于这样的基本点,杜老又进一步提出,“农民应该既有自主权,又能相互合作,共同抵御自然灾害的侵袭,共同参与市场的竞争,避免孤军作战,弱肉强食。这个过程就是先让农民具有独立性,变成个‘自由人’,最后形成‘自由人’的联合”。——这也正是杜润生这样的老共产党员为中国的下一步的改革提出的新思路。

读了杜老的这些意见,我不仅得到了极大的启发,而且深受感动。我从中看到了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的风范。正像杜老自己所说,“历史是发展的,马克思主义也是发展的”,杜老的这些意见,正是在当今中国改革面临极其复杂的情况下,既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想与原则,又从中国实际出发,具有可行性的。当然,要真正使中国的各阶层的人民都变成“有完整权利的

公民”，成为“自由人”，再进一步实行“自由人”的“联合”，这将是一个历史的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但却应该及时的起步，在人民享有“完整权利”问题上的延迟，不仅会对现有的改革形成掣肘，甚至会影响改革的方向。而杜老对农民命运的持续关注，是格外可贵的。这不仅是因为农民问题始终是中国国情中的核心问题，而且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本来就与中国的农民有着密切的联系，农民当年为支持中国的革命是付出了极大的代价的，因此，如果农民不获得真正的独立、民主、自由、平等与富裕，中国的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是无法心安理得地去见马克思的。我相信，杜老正是怀着这样的无法推卸的历史责任感与某种程度的负疚感，在八十五岁的高龄，仍然冒着某种风险，提出“农民应变成‘自由人’”这一关系重大的命题的。正是这一点，赢得了我对杜老以及像他这样的中国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的极大尊敬。中国有这样一批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还有许多并不接受马克思主义，但却在为中国人民的利益奋斗不息的仁人志士，我正是从这里看到了中国未来的希望。

1999年1月29日写于燕北园

## 另一种纪念

——《我们心目中的蔡元培》序

世纪末的事儿真多：北京大学的百年校庆刚刚过去，又要迎接“五四”运动八十周年纪念了。这些纪念在不同的人那里引起的反应是不相同的。作为北京大学的普通老师与学生，像我们这样的知识分子，在这样的时刻，总要想起老校长蔡元培——“蔡先生的名字永远与北京大学，与‘五四’新文化运动连在一起”，这几乎已是所有北大人的共识。

于是就有了北大百年校庆时《蔡元培》话剧的演出，这是由几位普通教员自动发起，由校友与在校师生自编自演的；人们称之为“另一种纪念”，亦即不同于国家与学校仪式化庆典的民间纪念。

正如一篇报道所说，这次北大校庆“已经不仅是一个著名学校的生日，它甚至超乎教育界而成为整个国家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因而具有了极强的政治功利色彩；“与此相辉映的还有‘商业大战’”，以致一位校友产生了“怎么看也觉得喧闹的校园更像个集市”的印象。在这样的气氛下，真正开创了北大传统的蔡校长在正式的纪念中被有意无意地淡化，是必然的。但并不具有政治与商业眼光的校友与师生，更看重的是心的沟通与精神的传递，于是，对蔡校长的怀念，更准确地说，是对老校长所代表、象征的北大精神的向往，就成为许多北大人的一种难以摆脱的情

结，而且是随着百年校庆的日益逼近、终于来临而愈加强烈。在这个意义上，《蔡元培》剧组虽然是少数人自发创建的，但却是有着深厚的群众基础的。也正因为如此，剧组的成立以及以后的活动，以至最后的演出，尽管始终受到“不反对，不鼓励，不宣传”的待遇，却得到了师生、校友与校外人士的广泛参与和支持。我曾经因此把剧组称之为“自愿者的精神自由集合体”，这本身就是对蔡校长开创的传统的一个继承。剧组从成立时，即已明确：演出话剧只是最后的成果体现；重要的是参与过程。因此，剧组用了很大的精力进行“传播蔡元培思想与精神”的活动：组织对与蔡先生有关的老人、专家的采访；举办各种学术讲座；发动校友、师生撰写研究论文；举办有关读书、图片展览；开辟宣传橱窗；印发《编演资料》……这样的普及工作的影响也许是更为长远的。而剧组自身的活动，从收集原始材料，酝酿、构思，剧本写作，到排练、演出、宣传、策划……则始终是一个学习、研究、思考的过程，是剧组的成员与我们的老校长不断进行心灵的对话的过程，于是，每一个人的精神境界都不同程度地得到了某种提升：这也许是参与者的更为根本的收获吧。而许多校内外的专家，各行各业的朋友（开列出来将是一个很很长很长的名单）多方面的支持，几乎在每一个关键时刻，在我们觉得几乎要支持不下去的时候，总是有人会挺身而出，给予决定性的援助，这是让我们惊叹不已、感激不尽的，由此而建立起一个信念：蔡校长不仅属于北大，他更是所有中国人的。还要特别提到的是蔡先生的亲属，他们给予我们的，不仅是支持，更是一种精神的感召：这是每一个剧组成员，以至每一个观众都能感受到的。就是这样，这一次民间的纪念始终充溢着一种精神的力量，它的源头来自蔡校长。最后，又通过舞台的表演，传递给了观众，北大的师生员工与校友。它所引起的强烈反响，既在意料之中，又出乎

意外。人们说，这是北大百年校庆中震撼人心的一刻，这大概是表达了许多人的真实感受的。所有这一切，都会在人们的心中留下美好的记忆。

当然，留在参与者的记忆里的，或许还有许多应有、不应有的争论、矛盾，以至纠纷，所引起的愉快的、不那么愉快的以及很不愉快的种种感受。客观地说，对蔡元培校长的崇敬，对北大传统的向往，这构成了这次民间纪念的每一个参与者的共同思想基础，这在前文已有论述；但再深入探究，就必须正视一个事实：在如何认识与评价蔡校长的思想，以至如何认识蔡元培其人，他在现代中国的命运，他对于当下中国思想、教育，对于面对教育危机的北京大学具有怎样的意义，人们的认识是并不一致的，或者说，每一个参与者的心中的蔡元培，在总体一致的前提下，又有许多不一致，甚至互相冲突之处，由此也决定了人们在参加剧组活动时，各人的预期是既相同、又不同的。这就引发出了种种争论，有时甚至达到了十分激烈的程度。这其实是更反映了一种真实的，甚至可以说这也是北大传统的一个不可或缺的方面：从蔡元培时期的北大开始，北大人就一直在不停地争论，剧本中“雄辩会”那场戏就是一个形象的展现；这一百年中也有一个时期用强力压制不同意见，强迫停止争论，以形成“高度的稳定”，但那是以“万马齐喑”作为代价的，这恰恰是北大历史上最为黑暗的一页。当然，这种好争论的传统也有其负面，是我们在下文所要讨论的。

这里不可能对所发生的争论作具体的描述；细心的读者从本书第一辑“重评蔡元培”里所收入的文章里，大概也不难看出分歧的存在：在一些作者的心目中，蔡元培是一个高大的“完人”，他们是怀着一种理想主义的神圣感，去看待与谈论蔡校长所开创的北大传统的；他们为失去了精神的北大与中国的现状忧心忡

仲，希望“回到蔡元培”那里去。而另外一些作者，尽管对蔡元培的思想与人格也给予很高的评价，但他们却更关注蔡元培思想与行为的内在的矛盾，关注“一个伟人在那一历史中的内心世界”，于是他们注意挖掘老校长的孤独感与寂寞感，强调如实反映作为先驱者的蔡元培“思想的超前造成的不被理解的精神痛苦，以及如何从这样的痛苦中挣扎出来，坚定不移地走自己选定的道路”。在这个意义上，他们认为蔡元培是一个悲剧性的人物。在这些作者看来，蔡元培在现代中国的历史命运是更带有一种悲剧性的，他的理想，包括改造北大的种种设计，只是在很短的时间里，在一种特殊条件下，得到了部分的实现。有的作者指出，“蔡元培之所以备受尊崇，与其说是因为他实际上做了些什么，毋宁说是因为他曾经尝试去做些什么”。人们通常所说的北大传统、北大精神，在某种意义上，实际上已经成为人们的一种精神向往与象征，一位作者甚至认为“蔡元培和‘五四’北大的种种话题那么引人注目，以至已经超出了纯粹学术研究的范围，走进传说及神话的领域了”，因此提出了“还原神话背后的历史”这样的命题。谈到蔡元培对当代中国与北大教育的意义，一些作者在强调老校长的教育思想与制度建设今天仍然具有生命力的同时，又认为今天北大面临的问题已不是简单地“回到蔡元培”就能解决的；有的人则更进一步提出，对蔡元培的传统，不仅要继承，同时也要立足于发展。《蔡元培》一剧的文学本的结尾，有这样一段对话：当终于把蔡校长“请回北大”（这一情节本身就具有一种象征性），一位学生拊掌大笑：“北大有救了！”一位教授又加了一句：“中国的教育有救了！”听了这些话，蔡元培苦笑着问夫人：“仲玉，你看我……我真有这样的能耐么？”——这样的描写其实是反映了今日北大人对蔡先生的不同期待的；顺便说一句，在最后的演出本中，蔡先生的苦笑被删去了，代之以强烈的追光与雄壮的

音乐，这样的英雄化的结尾也许与校庆的气氛更为吻合，人们不希望给人留下过于沉重、悲凉的印象的善良愿望是可以理解的。

有意思的是，剧本写作与演出中的分歧，似乎已经被敏感的记者捕捉到了；一篇报道就从两代人的不同期待的角度这样写道：一些老师“深信自己从事的这一项事业对于北大和中国的重要意义，并怀着一种理想主义的崇高感来予以推行。但是参加话剧的学生没有同样的理解与信仰。一些学生演员坦承，他们对蔡元培怀有敬意，并不认同老师们所主张的那种高度的意义。许多人是为了过一把戏瘾，或者是出于一种建功意识，希望在百年校庆历史上留下自己的身影，或者还有其他的目的来演戏的。一位九四级的企管系的学生说，通过演出，他对北大精神的理解上升了一个层次。但他并不赞同老师们将蔡元培的精神当作北大的象征，因为‘蔡元培也有他的局限，他不过是群星灿烂的夜空中的一颗明亮的星星’”。而这篇报道的最后总结也是客观的：“不同的几代人，当然有不同的理解。如果《蔡元培》能像一位学生说的那样，促使北大人思考北大的传统是什么，我们继承了什么，又失去了什么，那么这正是对百年校庆一种最好的纪念方式”。——北大人之间的相同点毕竟是主要的；和而不同，也正是蔡校长所倡导的“兼容并包”的传统的一个体现。

当然，争论的负面影响也是客观存在的。记得担任过北大校长的蒋梦麟先生在谈到北大的“大度包容”与“思想自由”时，也曾指出“我们有了这两种的特点，因此也产生两种缺点。能容则择宽而纪律弛。思想自由而群治弛”。好争论，而且常常无休止，并且总要夹缠着某种人事的纠葛……这就不仅老是形不成统一意志而误事，而且也会伤害当事人的感情，败坏人的心境。而争论的最后，为了保证演出，总是要形成某种妥协，做出某种决断，这在一些敏感年轻人的心灵里，也会产生失望感，以至委



屈感，以及其他一些更为复杂的感情反应：舞台也是人生，参与者们从中获得了一些意想不到的人生经验与生命体验，这或许也算是一种收获吧。

不过，这一切都已经过去了。百年校庆的热闹过去了，《蔡元培》剧演出的激动也过去了。一位剧组的成员这样写道：“时间慢慢蚕食着记忆，仅存的片段也只能重现于梦中。”但我们却要编一本书，把剧组组织写的观点各不相同的研究论文汇集，把《蔡元培》的剧本及有关资料收入，还让策划、编剧、导演以及演职员们写下自己的种种感受、体验，借以将我们共同参与的校园里的这段生活，用文字凝定、保存下来：这毕竟是我们的生命的一个部分。同时也为以后人们回顾与研究北大百年校庆这段历史，留下一份别具特色的民间资料。

而且我们还要公开出版——这要感谢四川人民出版社的领导与有关编辑朋友。这自然是出于“蔡先生与北大是中国的”这样一个信念。我们愿意借此机会向读者们介绍蔡元培先生对我们民族的贡献，他的思想的方方面面；我们也相信，北大内外具有不同经历与文化学术背景的老、中、青几代学者以及90年代的北大学生对蔡先生的认识的相同与相异，不仅具有接受史上的学术价值，而且也是关心北大与中国教育的读者感到兴趣的。这本寄寓了我们部分北大人热情与思考的书，得以在纪念“五四”新文化运动八十周年的时候出版，大概也是别有一种意义的吧。

1999年3月28日写毕于燕北园

## 也算“立此存照”

——1999年4月10日在北京大学中文系  
演讲的开场白

### 写在前面

这是北京大学纪念“五四”八十周年活动中的一个插曲，反映了世纪末的北京大学不可忽视的一个侧面：中文系学生会组织了一个有关“五四”的文化讲座，请中文系的老师向全校同学作演讲，其中也邀请了我。我本不愿意讲，因为我知道今年的“五四”是不可能谈什么的；但经不住同学的再三约请，最后还是同意讲了，而且定下了“‘五四’话题今日说”这么一个题目，准备给学生讲讲鲁迅关于“改造国民性”的思想。以后却没有了下文。有一天去学校开会，无意中看到宣传橱窗上公布了讲座的演讲者的名单，却没有我的名字。当晚接到了主持讲座的一位女学生的电话，说是安排我在周末的晚上（这时同学们都在忙着自己的事），在中文系会议室（只能容下三四十听众）举行讲座；一方面说明这时间与地点都不能更改，又一再地对我表示歉意，并且恳求我一定要答应去讲。我当然明白发生了什么事情，第一个反应就是拒绝去讲，但主持者的言语中流露出的尴尬与无奈却又使我难以拒绝：为什么要让这些尚不知政治的险恶的孩子为难呢？继而又想，既然有人如此怕我讲，那我就偏要讲，哪怕只有一个人听，我也要讲，何况人少了，更可以放开来讲。于是我答应

了。主持者如释重负地笑了。我的心却沉甸甸的。

今天我来得稍微早了一点，就在校园里走走，来到了未名湖，看到迎春花开了，柳树发芽了，突然意识到春天来了。想到在这静静的春夜里，同学们放弃了周末休息的时间，到这里来听我演讲，我心里有说不出的感动。而我一走进会议室，就看见放在讲桌前的这朵小红花，我明白同学们的心意，并且感到了温馨。我今天就是因为这温馨而来，尽管我们面临的现实是严峻的，而且我下面要讲的话题也是十分的严峻。这温馨与严峻或许就构成了我们生存境遇的某种真实吧。

刚才在散步时，还听见了树林中的鸟鸣，突然想到：在北大校园里，我是一只什么样的鸟？其实这几天我也一直在想这个问题。在有些人心目中，我大概是一只乌鸦，老给他们的节日添乱。去年北大百年校庆，我就当了这么一回乌鸦，说了一些扫兴的真话，以致有些人至今仍是耿耿于怀。其实，一所学校，一个国家总是要有乌鸦才好，想想如果满天飞翔的都是喜鹊，那会是一个什么局面。当然，只有乌鸦恐怕也不行，总得有乌鸦，也有喜鹊，还有其他什么鸟，这才会形成一种合理的生态平衡吧。老实说，我每次给同学们演讲，从来并不指望，也不希望同学们都能接受我的观点，只不过是给同学们提供另一种声音，让同学们自己去思考、判断，从而形成自己的看法。也许有的同学会同意我的观点，有的只部分同意，也必然有的完全不同意，甚至根本反对，这都是正常的，关键是同学们自己开动脑筋了，我的目的也就达到了。因此我下面要说的意见，我姑妄说之，同学们也就姑妄听之，是不必过于认真的。如果有人因此而紧张，那就有点滑稽了。

我在最近写的一篇文章中说到中国的世纪末有一个特点，就是节日特别多。去年有北大百年校庆，而且搞来搞去，成了国家

的政治活动；今年又是五四运动八十周年，北大因为是五四运动的发源地，于是又成了众目睽睽的中心，恐怕再一次要成为提供表演的舞台。今年的“五四”纪念会成为什么样子，只能拭目以待。不过，随着节日的临近，我感觉到了越来越浓厚的宣传气息，而且好像还有某种统一的宣传口径。我是不看报的，但我每天都看电视新闻。这几天就看到了两条有关“五四”的消息。一条与我们北大有关，据说北大学生向全国青年学生提出倡议，要以“科教兴国”作为纪念“五四”的主旋律。另一条说是在北京开了一个学术讨论会，提出“五四”的基本精神就是“爱国主义”。这些说法，随便听听，似乎也有道理；但我这个人有点讨厌，遇到这样的宣传，总喜欢想一想，这一想就出了问题了。强调“科教兴国”这当然很好，因为我这样年纪的人都还记得，在我们这个共和国，曾经有将近三十年的时间，是不但不承认“科教兴国”，连说说都是有罪的，因为说“科教兴国”，就有点“科学救国”、“教育救国”的味道，据说这是典型的“资产阶级的改良主义”，是与“唯有革命才能救国”的正统观念相对抗的，当然绝对不允许。现在，总算承认“科教兴国”了，这自然是一个历史的进步。但这回把它定为纪念“五四”的“主旋律”就有了可议之处。所谓“主旋律”自然是宣传的中心，要大讲特讲，而其他“非主旋律”则要少讲或不讲。单单把“科教兴国”也即“科学”置于主要地位，那就自然要提出这样的问题：将把“民主”置于何地呢？是不是因为未列入主旋律，就应该少讲或者不讲呢？而在人们的心目中，正是“民主”与“科学”，构成了“五四”精神的两个不可分割的基本侧面。这是以大量的历史事实作为依据的。陈独秀在《青年》（后改名为《新青年》）创刊号上发表的《敬告青年》一文中即已明确指出，“科学”与“人权”，“若舟车之有两轮焉”。而中国第一个提倡“科学救国”的中国科学社创办

的《科学》杂志，在其发刊词中也旗帜鲜明地提出，“民权”的发展必与“学术”之进步“为平行线”。科学的发展不但必须以一定的民主作为前提，而且科学一旦与民主分离，就会产生极为严重的后果；鲁迅早就指出，“电”的发明，既可以用来造福于人民，也可以作为残害人的工具（例如“电刑”），给人类带来无穷的灾难。民主也同样必须建筑在科学的基础上，一旦离开了科学的理性精神，民主也会造成极大的混乱与破坏。本世纪的中国不但吃够了缺乏科学与民主之苦，也深受将科学与民主人为的分离、阉割的祸害。正因为有了这样的历史教训，我们在追求“科学与民主的统一”这一点上，在理论与实践上都是绝对不能让步，也不能有任何含糊的。

“‘五四’精神与爱国主义的关系”也是相当复杂的，不能把它简单化。这个问题去年我在讨论北大传统时其实已经谈过。“五四”学生运动所提出的“外争国权，内惩国贼”的口号，其爱国主义的立场自然是十分鲜明的。而“五四”新文化运动也显然存在着“爱国救亡”的思想背景。这都是不能否认与忽视的历史事实。但我们也不能忘记与抹杀另一个事实：“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先驱者们对打着爱国主义旗号的国家主义思潮的批判。李大钊在写于1919年7月1日（即“五四”之后两个月）的《我与世界》一文里，曾发出这样的召唤：“我们现在所要求的，是个解放自由的我，和一个人人相爱的世界。介在我和世界中间的家国、阶级、族界，都是进化的阻碍，生活的烦累，应该逐渐废除。”与李大钊相呼应的，还有被称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灵魂的陈独秀。他早在《偶像破坏论》中，就已提出要防止把国家“偶像”化。他甚至提出了“我们应当不应当爱国”这样的问题来进行讨论。他指出，“爱国大部分是感情的产物”，容易陷入“盲动”，“往往失了理性”而易于被利用。其实早在1914年他在《爱国心与自觉心》一文中就提醒国人，要拒绝借口国家利益至上而要求人民

放弃“自由权利与幸福”，“供其牺牲”的蛊惑。正是出于对在“爱国”口号下对人的个性自由的剥夺的警惕，李大钊才着重提出：“我们应该承认爱人的运动比爱国的运动更重。”（《“少年中国”的“少年运动”》）这样看来，把“五四”精神简单地归结为爱国主义，是有可能蕴含着某种危险的。——我所说的这些具体意见与分析，当然也是可以讨论的。我的主要意思是要提醒同学们注意，在纪念“五四”八十周年时，你们将会听到各式各样的说法，大家一定要坚持独立思考，最好是自己去认真地读一些有关“五四”的原始材料，自己研究，自己辨别，得出自己的结论。记得当年毛泽东曾说过这样一段话：要“提高嗅觉，……对任何东西都用鼻子嗅一嗅，鉴别其好坏，然后才决定欢迎它，或是抵制它。……对任何事情都要问一个为什么，都要经过自己头脑的周密思考，想一想它是否合乎实际，是否真有道理，绝对不应盲从，绝对不应提倡奴隶主义”。这些话今天听起来好像依然新鲜。

1999年4月10日

## 附记

这天晚上我讲了一个半小时，又与同学们一起讨论了一个半小时。因为人比较少，讨论反而比较深入。演讲结束，同学们又把我送到了校门口，说了许多很动情的话。告别时，一位男同学突然深深地向我鞠了一躬。我弄得不知所措，又感动得不能自己。这个春天的夜晚的演讲，在我的心中，大概还有一些同学的记忆里，都会留下难忘的、美好的印象。

1999年4月11日补记

## 致北大校长的一封信

× 校长：

您好。

我是中文系的教师钱理群。我认为有些事应该向您报告：

(一) 去年 10 月以后，有两个学生社团邀请我给他们作学术演讲。我答应了，但他们在提出申请时，却被有关部门以“没有教室”等不能成立的理由拒绝了。

(二) 今年 4 月，中文系学生会与团委组织全校性的文化讲座，学生也约请了我。我因为有前述经验，开始一直婉言拒绝，但经过学生再三恳请，我还是同意了。不料学校有关部门得知后，就给中文系打招呼，不准我在全校作学术演讲。中文系出于无奈，只好安排我在一个星期六的晚上，在只能容纳三十人左右的系会议室作报告，在校内与中文系内都没有贴海报，大多数学生（包括中文系学生）都不知道。——此事中文系的领导都清楚，您可以去调查。

(三) 7 月 20 日，我收到了北大爱心社的邀请书，请我于 7 月 24 日上午 9 时半去参加“九九爱心万里行”出征仪式活动。我仍然婉言拒绝，我不愿意可能引起的麻烦，使邀请我的学生在心灵上受到损伤——前次中文系活动的主持者曾为对我的不公正的安排而失声痛哭，我至今仍感到不安：我即使有天大的“罪过”，为有关方面所不容，也应由我一人承担；让天真的学生的心灵因此

蒙上阴影，这是残酷的。但学生一再打电话来坚请，我还是动摇了。而且这次不过是与学生见见面，随便说几句，估计不应有什么问题吧。于是我决定放下手头正在写的一篇重要文章，冒着酷暑，参加学生的活动。但我仍然是太天真了：23日深夜，负责与我联系的学生来电话通知我，有关方面认为我“不适宜”参加这样的活动。这位学生痛苦地说，他不明白这是为了什么。我也不明白：这一切是为了什么？难道今天的北大，已经容不得学校里的一个教授，竟要一而再、再而三地剥夺他与自己的学生见面、谈话、作学术演讲的权利？这岂不是对北大科学、民主的传统，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传统的一种亵渎与嘲弄？

在中文系演讲事件发生以后，有不少学生或当面询问，或来信、来电话，表示不能理解，有的甚至认为这是对他（她）对北大的信念的一个打击。还有的学生告诉我，今年“五四”北大演讲比赛时，有不少同学要求请我担任评判员（这是因为我曾任去年百年校庆演讲比赛的评判，并发表讲评，给学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也遭到了有关方面的拒绝。而且好像在一次学生干部会上谈到这件事，因而在一些学生中传开了。

面对年轻人真诚、困惑的目光，我作为一个把与青年学生的血肉联系视为自己的生命的教师，感到揪心的痛苦。而且，坦白地说，我真正地愤怒了。——我要维护作为一个教授，一个知识分子的尊严和自己应有的权利。

这样的事发生在刚刚纪念过百年校庆的北大，这不能不说是北大的耻辱，北大的悲哀。

我把这些事向您报告，并不是期望您来解决这些问题。只是觉得，您作为一个北大校长，应该知道校园内发生的这些并不小的事情。

我作为一个历史的研究者，却发现了其中的典型意义：它确



实反映了世纪末的北大所存在的某些深层次的问题。因此我认为它或许具有某种进入北大历史叙述的价值，而不仅仅是我个人受到了不公平的待遇。从历史学者的眼光看来，我写给您的这封信，也是一个“立此存照”。

即颂

夏安

钱理群

1999年7月24日写于燕北园

# 我的某种不安

——致一位年轻朋友的信

× ×：

你好。最近，读了你同时发表在好几个地方的《昆德拉与哈维尔——我们选择什么，我们承担什么？》，有些不同的意见，或者说有些不安。那天我已当面说了这个意思，因为旁边有人，不便详说。后又想，口说可能讲不清楚，还是用笔写吧，于是就有了这封信。

我能够理解你对中国知识分子的人格弱点的的天与批判，实际上我自己近年来也一直在作这方面的反省，而且这样的反省与批判还应该继续下去。但任何合理性往前多跨一步，就有可能产生意想不到的问题。在我看来，你的文章中的某些观点，就存在着这样的危险。这就是我感到不安，并急于与你讨论的原因。我想分几点来说。

第一，你在文章中引用了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与哈维尔的话，强调“在整体性的罪恶中，知识分子罪不可赦”。这使我想起最近也有人在强调红卫兵、知青都应该进行自我忏悔，这好像已经形成了一种舆论，而且乍一看也似乎有理，是对前一时期一些知青、红卫兵的自我吹嘘以及一些知识分子缺乏自省精神的一种反拨。但是，我们却没有必要为了批评一种倾向就非得走向另一个极端。有一个基本的事实，或者说中国的特殊国情决定的我们

的特殊语境是不可忽视的：在雅斯贝尔的德国，对法西斯的极权主义的体制是进行了彻底的清算的，有关的罪犯都受到了法律的惩罚；而哈维尔的那番话，如你在文章中所说，是发表在“‘天鹅绒革命’成功以后”；而我们这里，是连基本的罪责都没有、也不允许分清，更不用说法律的追究与体制的清算了。正因为如此，当有人号召进行“全民忏悔”时，我的导师王瑶先生曾十分激动地质问：“应该对罪恶的历史负责的还没有承担罪责，为什么要我们忏悔？”他当然不是拒绝自我反省，而是强调首先要分清极权体制下的统治者、压迫者和受害者的界限；然后再检讨受害者自身由于容忍、接受，并在一定程度上的参与而应负的责任。应该说，这是两种不同性质的责任，如果因为强调“罪责是全民的”而有意无意地抹杀这二者的界限，那将是危险的。除此之外，还应该划清“奴隶”与“奴才”的界限。这个问题是鲁迅提出的，可是人们却不加注意。身为奴隶而不知反抗，自然是应该反省的，所以才有鲁迅的“哀其不幸而怒其不争”；但这与奴才的卖身投靠，自觉充当帮凶还是有区别的。当然，奴隶身上也有奴性，而且奴隶是有可能发展为奴才的，但两者的界限却又是存在的，不可因不满奴隶的不觉悟而抹杀他们与奴才的界限。在我看来，中国的知识分子中真正的奴才还是少数。因此，笼统地说“在整体性的罪恶中，知识分子罪不可赦”，既可能混淆压迫者与受害者的界限，也会抹煞奴隶与奴才的界限。尤其在极权体制与这种体制的既得利益者、主要维护者未受到彻底批判，而且正在压制这方面的任何批判的中国语境下，把主要批判锋芒指向知识分子、知青、红卫兵，过分地追究他们的历史责任，单方面要求他们忏悔，那就可能放过真正的元凶，走到了原初愿望的反面。鲁迅早就提醒人们注意，以为“文人美女，必负亡国之责”，“卸责于清流或舆论”，这是“古已有之”的老调子——这传统，我们是万万

不能继承的。

第二，你在文章中对哈维尔的“灵魂自足”与道德勇气给予了高度的评价，这是我完全认同的；你进而认为哈维尔的选择具有榜样的意义，这在我个人（请注意，我说的仅仅是我自己）也是可以接受的。但你再进一步，以你所称为的哈维尔这样的“圣人”的选择作为一个道德的价值尺度，来评判中国的知识分子在“文革”中的表现，做出了“沉默也是一种犯罪”的严厉判决，并且声称“对知识分子必须严格严格再严格”。这样，你也把自己的观点推向了极端：你实际上是在宣扬一种“不是圣人，就是罪人”的道德观，这里的逻辑确实十分明快，却是危险的。

人们首先要问：是不是每一个人都能成为“圣人”？鲁迅曾经说过，“别国的硬汉比中国多，也因为别国的淫刑不及中国的缘故。我曾经查看过欧洲先前虐杀耶稣教徒的记录，其残虐，实不及中国”。我体会鲁迅的意思有两方面：一是强调中国的“硬汉”（也即你说的“圣人”）的难能可贵，同时也说明，不是所有的人都能成为“硬汉”（“圣人”）。承认这一点，会不会导致道德上的虚无主义、无是非观呢？不，在“非圣人”的选择中，也还有别的界限，例如，不能主动地“为虎作伥”，充当帮凶，也即你文章中说的“不参与整人、打人”，或者用今天的流行语言，不能触犯法律，侵犯、伤害他人；尽管你对这样的选择很不以为然，但确实是一条底线。这至少说明了：并非“不是圣人就是罪人”，在道德评价上，不能只有少数“圣人”才能达到的高线，而没有大多数人可以、而且必须做到的底线。我们可以宣传、鼓动，号召人们向“圣人”学习，却不能轻率地宣布，达不到圣人的道德高线就是犯罪。要求人人都成为“圣人”，最起码说，也是一种“乌托邦”的幻想，对于大多数普通人（包括知识分子）的人性的弱点，是应该有一种理解，甚至是谅解的。

还有一个尖锐的问题更是不能回避的：你自己能不能像“圣人”那样行事？比如说，面对今天中国的许多违反人权的事，我们像哈维尔那样提出了抗议了吗？至少我没有这样的勇气。那么，你所宣布的“沉默也是一种犯罪”的逻辑是不是也适用于我们自己呢？更重要的是，如果自己都做不到，又有什么权利裁判他人呢？不错，我自己是时时为自身的软弱而自责的；但我也仅能限于自责，而不能以一种居高临下的姿态去要求、责难别人。这里确实有一条原则，说是道德原则也可以，就是律己要严，或者用你的话来说，要“严格严格再严格”，但对于他人，只要不是“主子”与“帮凶”，则是应该尽量宽容的——不是不可以批评，但这种批评应以理解为基础，是“劝说”而不是“判决”。这就说到了另一个层次的问题：即使我们自己做到了，也没有权利裁判他人。周作人曾这样谈到中国传统与现实中的道学家，说他们“不知道自己也有弱点，只因或种机缘所以未曾发露，却自信有足以凌驾众人的德性”，“依恃自己在传统道德面前是一个完人”，相信在“圣庙”中有自己的份，便任意地“裁判”他人。这样的“传统”我们当然不能继承。——我完全清楚，你的本意并非如此，我是故意地把话说得如此严重，无非是想提醒你：某种极端观点的逻辑推演，是会落入自己绝不愿意、也从来没有意料到的危险的陷阱中去的。

其实，在这类问题上，早就有过惨痛的教训。毛泽东当年就大力提倡过这样的“圣人伦理”。他不是高歌“六亿神州尽舜尧”吗？他就是以“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圣人道德”来要求每一个中国人与知识分子的，强制人们“在灵魂深处爆发革命，狠斗私字一闪念”，进行“脱胎换骨的改造”。在这样的伦理观的统治下，每一个有“私心”的人都真的成了罪人，当年盛行一时的“早请示，晚汇报”，其中一个重要内容就是为自己的“私心杂

念”而忏悔、请罪。——“六亿神州尽舜尧”的乌托邦理想就是这样变成思想控制与专制的。这难道还不够怵目惊心吗？还可以再举一个血的事实：在50年代的朝鲜战争中，由于指挥员的失误，曾有几十万的志愿军成了美军的战俘。其中有一部分经过英勇顽强的斗争，回到了祖国，却出乎意料地受到了严厉的审判，依据就是所谓“圣人道德”：被敌人抓住了，就应该杀身成仁，以死报国；你现在没有死，活着回来了，这本身就是有罪。惩罚是空前残酷的，多少人因此而家破人亡。我曾经为此而写过一篇文章，称之为“共和国历史上最可怕的一页”。这篇文章当然不能发表，但其中的教训是任何时候都不能忘记的。此刻我在向你——没有经历过那段历史的年轻朋友重述这一切的时候，我的心仍在颤抖，并且突然有一种恐惧感：当随着时间的流逝，血迹洗涤已尽，历史真的会重演吗？

第三，你的文章是以昆德拉与哈维尔的选择做对比来展开讨论的，而且明显地倾向于哈维尔，这都是没有问题的。尽管我并不赞成你将哈维尔称作“圣人”——坦白地说，我对“圣人”这个词有着本能的反感；而且我觉得你将“圣人”（这包含着一种道德的评价）与“智者”（这是一种知识的评价）对称，褒前而贬后，这多少有一点道德主义的味道，也是我不太赞同的——不过这都无关紧要，或者说仅是小的分歧。但当你推论到中国知识界的现实，我却产生了某种隐忧。不错，你也说了“钱钟书的学术成就和王小波的文化意义自然是不容忽视的”这样的话，而且你个人也完全有权利不选择他们的道路，因此对他们的选择提出种种批评——在我看来，任何一种选择都存在着某种陷阱，因而是可以批评或者提出某种忠告的。你的批评意见中有的我有同感，有的则不敢苟同。比如，你把“专家”这种职业化身份的选择，与现实保持一定距离的纯学术、文化研究的选择，也就是我们通

常所说的“学院派”学者的选择，判定为是这些知识分子“人格与精神资源稀薄”的表现，甚至断言他们“元神出窍”，指责他们的选择是“为了生存”而“放弃所有的原则和所有的承担”，这就很难让人接受。不排斥有的学院派的知识分子可能会有你所说的情况，但就整体而言，你的这一判断是缺乏分析，并不符合实际的。更重要的是，你这里遵循的仍然是“不是圣人就是罪人”逻辑，于是你发出了这样的质问：“这样的知识对于特定时空内的‘中国’来说，是不是‘有机’的知识呢？”这里的意思是十分明白的：至少说当今的中国，是不需要学院派知识分子，以及他们所做的纯学术研究的；中国当代知识分子的唯一出路就是“走向哈维尔”。这样，你又把自己具有合理性的选择推向了极端。我于是想起了周作人的一个观点：“过于尊信自己的流别，以为是唯一的‘道’，（以）至于蔑视别派为异端”，尽管“原也成一家言，有相当的价值”，也会产生“许多流弊”。不管你现在怎么看待周作人，但他的这一提醒还是不可忽视的。

我还要谈谈历史的经验教训。在本世纪，中国知识分子中，一直存在着“革命救国”与“科学（教育、文化、学术）救国”的不同选择。到1949年，革命胜利了，新中国诞生了，这一历史的结果，几乎是顺理成章地对知识分子中的这两种选择做出了一个价值判决：“革命救国”的道路实践证明是唯一正确的，而且具有道德的崇高性。许多学院派的知识分子都真诚地忏悔了：在革命者为国家流血牺牲时，自己却为了一己、小家的生存而躲在书斋里，这是有违良知的。正是这样的道德自责使许多知识分子“心悦诚服”地接受了“改造”，轻易地否定了自己所从事的学术、文化、教育工作，认为那是“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是为反动统治服务的，不但一无可取，而且是有罪的。从这样的逻辑出发，最后推导为知识分子的原罪性：知识、学术本身就是无用而

有害的。——知识分子的不无真诚的自我反省，就这样最后陷入了文化专制主义与反智主义的陷阱。这也是血的教训：知识分子自有弱点，中国知识分子更有许多劣根性，这是需要反省与批判的；但千万要注意，不能把这种反省与批判，变成对知识与知识分子本身的否定。——当然，你的这篇文章并没有走向这样的极端。

这封信写得比我预料的要长得多，但我还要再说几句。你在文章中谈到了鲁迅，我自己也是不断地从鲁迅那里去吸取精神资源的。最近我也在反省自己的鲁迅观：或许我们在强调鲁迅的怀疑主义，他的精神上的沉重面的时候，对他的理想主义的生命的亮色注意得不够；我们在突出他的批判的尖锐、激烈、不留情面的时候，对他精神气质中的宽厚的一面有所忽略。而这种亮色与宽厚更可能是构成他的生命的底气的东西。——“底气”是我最近考虑得比较多的问题；在好几篇文章中我都提到《红灯记》中李玉和的那句话：“有妈这碗酒垫底，什么都能对付”；在我看来，鲁迅正因为有了这样的亮色与宽厚做“底”，他无论怎样悲观与愤激，都不会走向极端。——正因为如此，鲁迅才一再提醒人们，对那些故作激烈的言辞要保持高度的警惕。我想，这对我们大家都会有启示作用。记得我们在一次交谈中，我提醒你，在对一种社会文化现象做批判的时候，言辞不妨可以尖锐一些；但在批评具体的人，特别是指名道姓的批评时，则要谨慎，要充分地考虑到批评对象的复杂性、多面性，批评要有余地，不要只图自己说得痛快而有意无意地伤害别人，也就是说，既要坚持原则又要宽厚待人。你对我说，你的内心深处，其实也有宽厚、甚至软弱的一面，这我是相信的，有你的一些散文为证。因此我希望你在今后的写作中，更好地调动与发挥自我生命中的各种因子，既要保持批判的激情与锐气，又要以对人的宽厚与理解做底；在坚



持某种选择的同时，不但不要轻易地否定不同的选择，而且自己也不妨从这些不同的选择中吸取有益的养料。你知道我是最尊崇鲁迅的，并不认同周作人的选择；但我仍从周作人那里得到了很多东西，据我的经验，以某一种选择为主，同时对他种选择有所择取，达到互补，这对我们自身思想、人格、性情的健全发展是大有好处的。——当然，这仅是供你参考而已。

其实，我上面所说的一切，不仅是与你商讨，更是对自我的一种反省，或者说是一种自我警戒。很希望能听到你的意见。这封信当然不准备发表。如果你愿意，也可以给摩罗等朋友一阅，或许能引发出某些讨论。

祝  
好

理群

1999年1月10日—12日陆续写成

## “伪士当去，迷信可存：今日之急也”

——王东成《生活与艺术人格》序

东成先生的这本心血之作，本是应由他的恩师李景隆先生作序的——尽管我至今未曾与李先生见过面，但通过东成的叙述，对这位“历经磨难”而“蔼然面对人生”的“儒雅”之士，却已如故人，并怀着深深的敬意。但先生重病在身，无力提笔，只能由我作为东成的一个朋友来写几句话了。

但我却有些为难。这是一本文艺理论的著作，我的专业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而我早就给自己定了一个规矩：不对自己没有研究过的问题发言。而且我对理论界（包括文艺理论界）历来有些望而生畏：记得鲁迅曾经说过，创造社的才子们说话、写文章都摆出一副“创造脸”；理论界也有那么一些人（当然不是所有的人，特此声明，以免发生误会），俨然以“天堂的把门人”自居，一面宣示不容置疑的真理，一面对认定的异端大加讨伐，这副道学家面孔也是够吓人的。但东成先生毫无道学气，他倒是以凡人自居的，一再地声明，自己说的全是常识，是可以、而且欢迎读者和他进行讨论的。东成还有点草根气，他不但鼓吹“草根意识”，而且自己在写作中也时常不顾所谓“学术规范”，跳出来直接抨击时弊，说些不合时宜的话，完全不像一个学院里有涵养的绅士。这一点，倒对了我的脾气，我也是因为喜欢乱说话，而让一些人觉得不像个教授的。单凭这一点，我就应该破破自己的规

矩，来为东成的这本书说点外行话了。

何况东成的有些观点（当然不是全部）还引起了我的共鸣与进一步的思考，似乎也有一些话可说。

如本书的标题所示，东成先生是非常强调“艺术人格”的。在他看来，“醇正、深厚的艺术良心是一切真正的文学创作一块须臾不可离开的‘通灵宝玉’”。他强调“一个真正的作家、诗人、艺术家”应该是一个“有信仰”的人，“一个‘精神漂泊者’，永远不停止对彼岸、对精神理想的追求，因此，永远对此岸、对现实感到不满”，保持“精神独立，思想自由”，“不媚权，不媚俗，不媚钱，……‘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即所谓“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东成先生之所以如此大声疾呼，是因为现实生活中，“一些人，特别是一些握有生杀予夺大权的‘彻底的唯物主义者’，心中没有爱和怕，没有热爱、悲悯与谦卑，无法无天，无所畏惧，太轻慢、无视乃至践踏常识和规律了”，因此，他认为，呼唤“正直的、富有理性和良知”的真正的“知识分子”，是发展中国的文学艺术、思想文化的当务之急。

我于是想起了20世纪初，鲁迅在《破恶声论》里发出的呼唤：“伪士当去，迷信可存，今日之急也。”——当然，鲁迅的思考是更为深广的；因此，我想就鲁迅的这一命题作一点我的阐释，与东成先生和读者一起讨论，希望能使东成先生所提出的前述问题的思考更加深入一步。这应该不算是跑题吧。

鲁迅在这里引人注目地提出了一个“伪士”即“假知识分子”的概念。按照鲁迅的解释，所谓“伪士”主要有两个特点。首先，他们打着“科学”、“适用”等旗号（也即东成先生所说的“彻底的唯物主义”），动辄指责别人（例如“气秉未失之农人”）“迷信”，其实质是他们自己“精神窒塞，唯肤薄至功利是尚，躯壳虽存，灵觉且失”，鲁迅因此称他们为“无信仰之士

人”。非但如此，他们还要扼杀人们的信仰，即鲁迅所说，“自唯为稻粱折腰；则执己律人，以他人有信仰为大怪，举丧师辱国之罪，悉以归之”，颠倒黑白，竟至于此。但他们有时也把自己打扮成“信仰”的捍卫者，并动辄指责别人“无信仰”或“背叛信仰”：这同样是一个混淆视听的表演。鲁迅因此又提出了“正信”这个概念。所谓“正信”，首先是自命为“正确”，而且是唯一而排他的，是对真理的垄断，即所谓“正统”，而实际上不过是某个时代、某种社会利益集团的多数派的意志。这些“正信”的垄断者其实是没有真正的发自自己内心的信仰的，在“万喙同鸣”中他们早已失去了自我，却要以“多数”做权威，“灭人之自我，使之混然不敢自别异，混于大群”。因此，“正信”的另一个方面，就是它是“敕定”的，即是自上而下的强加，是与真正的信仰的自发性与内发性相背离的，因此，实质上是一种“伪信”。“伪信”而又要强制别人接受，这正是显示了“伪士”们既无信仰而又行专制的特征：这正是鲁迅认为“伪士当去”的原因。

与“正信”对立的是所谓“迷信”，这是一个被“伪士”们扭曲、丑化了的观念，因此，鲁迅先要为其正名，他明确指出：“虽中国志士谓之迷，而吾则谓此乃向上之民，欲离是有限相对之现世，以趣无限绝对之至上者也。”鲁迅在这里所强调的正是东成先生在本书中所竭力鼓吹的“对彼岸、对精神理想的追求”，也即人的超越性的形而上的终极关怀，或者说，所提出的是一个“信仰”的问题，所谓“迷信”实质上就是追求信仰的执著与痴迷，在一定程度上，这也是对“宗教”精神的肯定。——如日本学者伊藤虎丸先生所说，“鲁迅对宗教的肯定只限于对‘伪士’的批判，他本人并不站在一切特定的既成宗教的立场上”，他肯定的是“一切自发的、发自内心的信仰”（参看《早期鲁迅的宗教观——‘迷信’与‘宗教’的关系》，载《鲁迅研究月刊》1989年

11期)。如鲁迅所说：“人心必有所冯依，非信无以立”，这是鲁迅所倡导的“立人”思想中的核心。在鲁迅看来，中国的思想文化界，中国的知识分子中所多的是无信仰、假信仰的“伪士”，缺少的是有着坚定、执著的信仰的“精神界战士”，这是抓住了要害的。

值得注意的是鲁迅在强调“迷信可存”时，使用了“神思”的概念。在鲁迅看来，宗教与文学，甚至科学，作为人类的精神现象是有着根本的相通的：它们同是人类自由精神的产物。因此，对彼岸的关怀，理想、信仰的追求，总是同时伴随着“神思”，即人的自由无羁的想象，所谓“顾瞻百昌，审谛万物，若无不有灵觉妙义焉，此即诗歌也，即美妙也，今世冥通神网之士之所归也”。鲁迅一再发出感慨：“太古之民，神思如是，为后人者，当若何惊异瑰大之”，“念古民神思之穷，有足愧尔”。鲁迅显然从自由创造精神的不足，想象力、幻想力的贫乏里，感到了某种危机。这就抓住了中国人（包括知识分子）精神发展与思想文化文学艺术发展的另一个要害。

问题的严重性，或者说让我们后人感到特别难堪的是，鲁迅在世纪初所指出的两大匮乏——精神信仰的匮乏与自由创造精神、想象力的匮乏，到了世纪末，不但没有得到弥补，甚至是更为严重了，并且依然是当今中国精神发展、思想文化文学艺术发展的瓶口问题。这确实让一切多少还保留一点理想追求的朋友们感到忧虑。我在东成先生的这部新著中感到并共鸣于这种忧虑，故写此文，以作声援。而我引为资源的，仍是鲁迅的近百年前的思想。这样，我的说话仍然没有脱离专业的范围；这也可能是我的一种局限，但也只能如此了。

2000年4月9日写于燕北园

# 坚守我们的信仰，在今天的中国

——读裘沙《新诠详注〈文化偏至论〉》

裘沙先生这本装帧高雅、内容厚重的书，给我带来了惊喜，并引起了共鸣与深思。

令人惊喜的是，裘沙先生是一位著名的画家，竟然以如此大的精力来为鲁迅的著作专作“新诠详注”，这是我们这些专业的鲁迅研究者深感惭愧的。

裘沙先生说：“这是我和伟君两人梦想了近三十年，想以自己的微力构建起这座鲁迅思想殿堂的一个至关重要的组成部分。”这句话让我想了很久。

“近三十年”前，正是“文革”的后期。记得裘沙先生说过，他和王伟君先生是经过“文革”的民族与个人的大苦难，在极度的绝望中发现、认识与接近鲁迅的。他们也同时发现、认识与接近了马克思主义。这就是为什么在这部主要阐释鲁迅“立人”思想的专著中，裘沙先生要郑重其事地引述马克思与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的原因。

这一切都是我所能理解的：这里正包含了我们这一代人精神发展的历史。

我在很多的场合都说过，我们是读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毛泽东的著作以及鲁迅的著作长大的。而无可回避的事实是，开始时我们的阅读是被规范化的，因而不免是盲目的。我们其实更

多的是读讲解马克思主义与鲁迅的小册子，现在就看得很清楚，其中有许多私货，灌输给我们的有不少是“假马克思主义”与“假鲁迅”的东西。真正由“要我读”变成“我要读”是在“文革”的后期。在我们从精神的迷狂中醒来，开始用自己的眼睛看世界、用自己的脑子想问题的时候，迈出的第一步就是甩开各种各样的小册子，直接读马克思主义的原著与鲁迅的原著。于是，我们在将生命一并投入的如饥似渴的阅读和独立思考中发现了属于自己的马克思与鲁迅。这种发现的喜悦我至今还难以忘却。记得当我在恩格斯的《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里读到下面这段话时，我感到的是一种刻骨铭心的灵魂的震撼——

这种辩证哲学推翻了一切关于最终的绝对真理和与之相应的人类绝对状态的想法。在它面前，不存在任何最终的、绝对的、神圣的东西；它指出所有一切事物的暂时性；在它面前，除了发生和消灭、无止境地由低级上升到高级的不断的过程，什么都不存在。……它的革命性质是绝对的——这就是辩证哲学所承认的唯一绝对的东西。

同样的震撼发生在读鲁迅的《关于知识阶级》时，他在那里强调“真的知识阶级”是永远不满足现状的永远的批判者：于是，我发现了马克思与鲁迅的相通，并由此找到了自己的哲学，找到了自己作为“批判的知识分子”的存在价值和理由。——我相信这样的心灵的震撼与选择也属于裘沙先生、王伟君先生；他们在本书中一再强调“辩证唯物主义的哲学”的意义就是一个明证。

当然，他们在三十年前更注重的是鲁迅的“立人思想”。我曾在一篇文章里提到，“裘沙、王伟君两位艺术家，比我们中很多人

都要早、也更深刻地认识了鲁迅的真正价值”。他们在“文革”后期，即发现了鲁迅的《文化偏至论》的意义（而那时最流行的观点，是视之为鲁迅前期思想的局限性的表现的），并根据鲁迅在世纪初确立的“取今复古，别立新宗”的目标，提出了“鲁迅新宗”的概念，认为鲁迅建立了一个以“立人”为中心的思想体系，这是20世纪终于诞生的中国的“新宗”。他们由此而做出了一个决定后半生命运的重大选择：“以自己的微力构建起鲁迅思想的殿堂”，“为鲁迅的新宗奋力呐喊，这是时代赋予我们的使命”。在他们呕心沥血，用画笔完成或部分完成了《鲁迅之世界画集》、《鲁迅之世界画传》两部艺术巨作的同时，又献出了这本对“鲁迅新宗”作理论阐释的学术著作。三部作品有如三足鼎立，互为呼应，本身也自成一个体系。为此，他们花费了整整三十年的时间。

“三十年”，这是一个相当沉重的数字，我掂量着它的分量。这三十年，中国以及我们自身发生了多么大的变化啊，曾有过多少彷徨、动摇、“昨是而今非”啊。这两位艺术家却始终坚持着三十年前的选择，不摇摆，不犹豫，心无旁骛，埋头苦干，不知老之将至。这种力量与境界，不是用毅力所能解释的；在我看来，最根本的原因在于，他们已经将鲁迅的“立人”思想化作了自己的理想与信仰：他们是为自己的理想与信仰而拼搏不止啊。

这是怎样一种理想与信仰呢？

裘沙先生告诉我们：鲁迅的“立人”思想的核心内容是力主“根柢在人”，“首在立人，人立而凡事举；若其道术，乃必遵个性而张精神”，即把发展人的个体精神自由作为“立国”的根本。裘沙先生发现，鲁迅的这一“立人”思想，与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的下述论断是根本相通的：“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



里，每一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而按恩格斯在一封通信里所说，这条原则是最能概括“未来新时代的精神”的。

可以说，正是前述永远的批判精神与这里所说的追求个体精神自由的理想（在我们看来，这两点正是马克思主义与鲁迅思想根本相通之处），经过几十年的磨炼，已经成为像我以及裘沙、王伟君先生这样的知识分子的基本信仰。它决定了我们在现实生活中的基本立场与选择。

在“文革”以后的三十年里，有两个最响亮的口号，一是“实现现代化”，一是“发展就是一切”。而作为一个有理想与信仰的批判的知识分子，我们还要追问：这是什么样的“现代化”，什么样的“发展”？

裘沙先生在他的《鲁迅的一篇纲领性的论文——〈文化偏至论〉》里，分析了曾经有过的几种现代化的发展模式：一是为个人私利而大挖国家的柱石，即所谓“个性与物质的结合”，这是鲁迅在《论雷峰塔的倒掉》里曾经批判过的，他称之为“奴才的破坏”；一是大跃进时期全民炼钢式的抛弃了科学精神的群众性建设狂热，那是“众数与物质相结合的社会实践”；一是文化大革命时期鼓吹精神万能的群众运动，这是“尊众数而张精神的全民大实践”。而历史已经证明，所有这些发展模式都给中国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灾难。历史是不能倒退的。

但我们任何时候都不能放弃“立人”的目标：物质的富裕与国家的富强，必须以保障每一个具体个体生命的精神自由为前提；如果相反，以对个体精神自由的剥夺与压抑来换取物质富裕、国家富强，人依然没有摆脱精神被奴役的状态，这绝不是我们所追求的现代化。

任何时候都不能忘记：“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

展的条件。”我们所追求的是共同富裕与共同发展，是每一个具体的生命个体的物质的满足与精神的自由。只要还有一个人或一个群体没有获得自由发展，我们自己就是不自由的，我们自身的发展也是不健全的。我们必须对作为社会的弱者、弱势集团的中下阶层以更多的关注，无视甚至鼓励两极分化、只着眼于少数富人的发展，绝不是我们所要的发展。

我们必须坚守这一切，尽管在今天的中国，一切理想与信仰都变得不合时宜。

我们必须坚守这一切，尽管我们清楚理想与现实的距离，尽管我们意识到自己的理想、信仰的某种乌托邦性，在本书所引述的恩格斯的书信里，在用《共产党宣言》里的论断来“概括未来新时代的精神”时，就已经说明：这是免不了要“坠入空想主义”的。

但我们仍然要坚守这一切，不仅因为人是不能没有乌托邦的，更是因为只有有了彼岸的理想、信仰的追求，我们才能永远不满足于现状，对现实保持清醒，不断地发出我们的批判的声音。

这篇书评，越写越近于夫子自道，这不仅是情不自禁，更是因为我一直把裘沙先生视为我的精神兄长，我们是“心有灵犀一点通”的，于是就有了这样的由共鸣而产生的任情发挥。应该感谢裘沙先生的大作给我及每一个读者的丰富的启示。

2001年8月19日写毕于燕北园

## 我的忧虑、困惑和挣扎

——在上海大学“全球化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转变”国际研讨会上的发言

听了会上很多朋友的报告，特别是一些年轻朋友的发言，受到了很大启发，甚至可以说是震动，但我还来不及仔细消化，这里只能谈谈我的初步感受：按照我的思维习惯，外在的刺激，最终都会转化为对自我灵魂的审视与拷问。

昨天的发言中，郜元宝先生谈到了知识分子的“失语”，我也经常处于这样的失语、无言的状态：不仅是外界的压力，使我不能自由的言说；而且所有的外在的黑暗都会转化为内心的黑暗，产生根本性的焦虑和困惑：我已经没有能力来解释周围的世界，也没有能力做出明确的判断——而我们又处在一个要求站队的时代，总是在要求人们明确表态：赞成，或者反对。而我的反应、态度却往往是复杂的，立场就不免是模糊的：很可能既不赞成（反对）这，又不赞成（反对）那，把所有的话都讲出来，就会成为“公敌”，就得“横战”。而实际上我究竟赞成什么，主张什么，自己也想不清楚：我只能说“不应该”这样那样，对“应该”怎样怎样，交的是一张白卷。而且说到底，我对自己的立场与态度也是怀疑的。于是就只剩下无词的言语，只能沉默。

在学术上也是如此。尽管我知道自己在学术上可以做什么，不能做什么，但对于学术界热门话题我往往觉得无话可说。我经

常收到各种学术会议的邀请书，常常是看到会议的议题就发怵：题目太大，无从说起。于是就只有逃会。坦白地说，包括这次会议的题目：“全球化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转变”，也让我犯难；如果不是晓明允许我先不发言，听听再说，我很有可能也是一躲了之的。

就拿“全球化”来说，尽管尾崎先生在刚才的发言中，提醒我们：“全球化”也即“世界一体化”已经成为我们的生活事实，是谁也回避不了的；我承认这一点，但确实想不清楚，“全球化”将给我们带来什么。有人许诺我们，也有人一相情愿地想象、希望：全球化将给我们带来富裕，带来自由、民主，带来全人类的协调、合作，带来人类公理的确立，带来“世界融入中国，中国影响世界”的辉煌……但我怎么也看不到这样的前景。21世纪一开始，就让我目瞪口呆。

在20世纪末，我曾写过一篇关于“对新世纪期待”的短文；和众多的豪言壮语相反，我自认唱的是低调，只提出两点希望：一是“懂得人的生命的宝贵，不要再杀人”，二是“回到常识，不要再做梦”。而今年发生的“9·11”事件，却无情地表明，21世纪一开始就在杀人，而且就在此刻，杀人也还在继续。这无疑给我的所谓“低调期待”以当头棒喝：我还是太乐观、太天真了。

今年所发生的几个事件，都是将决定中国与世界命运的大事件：21世纪中国的格局，世界的格局由此已初见端倪。它应该引起一切关注中国与世界未来的人们的重视、思考与研究，而绝不能麻木不仁，掉以轻心。我自己从今年酷暑以来，就一直在紧张而痛苦地思考，甚至寝食不安，而且我至今也没有将这些大事件消化，无法做出理论上的分析。但我却直觉感到：那“不再杀人”的幻想破灭了，那种和谐、统一、协调、公理确立……的“全球化”预言都像是做梦。直觉告诉我：世界将不得安宁，

中国也恐怕未必太平：21世纪将仍然是一个充满矛盾、充满对立与斗争的动荡的年代。

全球化将给中国带来什么，更是我所忧虑的。前几天，我紧张地观看香港凤凰卫视所播发的有关中国人世的报道——说起来这真是中国人与中国学者的悲哀：我们不能享有最起码的知情权，我们至今也不知道中国在入世谈判中做了哪些让步，达成了什么协议，我们只能从香港与国外的报道中去做揣测。于是我听到了某位被官方认可的经济学家的告诫：中国不应该成为农业大国，而应该在入世以后的“国际分工”中成为蔬菜与花卉的生产国。这样的全球化的“国际分工”，让我不寒而栗。我由此联想到我们的学术：正像罗岗先生昨天的发言中所说，会不会出现这样的学术“国际分工”：从西方进口“理论”，然后根据“理论”对第三世界的“原料”进行加工，最后再出口到西方世界？难道这就叫“与国际学术接轨”？！

再看看我们当下的学术环境。我们讨论学术研究的当代性，首先就要看看我们的真实的（而非一相情愿地想象的）生存环境。在我看来，我们正面临着两大危机。一是“学术体制化”的危机。今天上午的发言中，有朋友谈到了科举制度；其实新的“科举制度”正在我们国家形成与完善：人们越来越看清楚，这些年一直纠缠着学院里的知识分子的评职称，评学术带头人，评硕士、博士点……都无非是“请君入瓮”；而可悲的是，我们明知如此，还不得不往里钻。这样的体制化的学术，对我们人文学者的要求，主要是两条：一是为决策服务，或为之出谋划策，或用自己的研究来为决策的正确性与合法性做解释与证明。如果做不到，至少也不要添乱，起一点粉饰太平的作用。在这样的要求下，就绝不可能有学术（包括现代文学研究）的独立与自主。而同时存在的学术商业化的危机，也同样威胁着学术研究的独立性

与自主性。对这一方面已经谈得很多，我就不再多说。这样，今天我们又再一次面临着鲁迅说过的成为“官的帮忙、帮闲，商的帮忙、帮闲，大众的帮忙与帮闲”的危险。这是我们必须正视的一个现实。在这个前提下，我愿意为学院派的研究说几句话。应该看到，能够成为前述御用学术对抗力量的，除了带有比较强烈的批判性的学术研究之外，就是与现实政治保持一定距离的所谓“为学术而学术”的研究；而前者在中国的现行体制下是很难生存的，随时都有被扼杀的可能，能够起抗衡作用的，很有可能就是学院派的研究：在我看来，真正的学院派的研究其最重要的特征就是要坚持学术研究的独立性与自主性。当然，无论是批判性的研究，还是“为学术而学术”的研究，都存在着自己的陷阱与危险。批判性的研究需要警惕历史实用主义，更要防止成为一种表演。我曾说过，“精神界的战士”是有真、假之分的。区分的一个基本标准，就是要看能不能把批判指向自身，像鲁迅那样，“无情地批判别人，更无情地批判自己”。因此，我赞成倪伟先生的意见：研究者对自己所占据的主体位置、思想立场缺乏反省，是当下许多研究的一个致命问题。我们尤其要警惕那些把自己置于道德的制高点，以审判别人为己任的“假道学式的批判家”。学院派的研究的陷阱在于将学术研究变成熟练的学术操作，成为一种智力游戏，而根本丧失了学术的生命活力与意义：看似漂亮，其实只是一束苍白的纸花。学院派的研究更要警惕将必要的学术规范变成限制与压抑学术创造性的话语霸权。学院派的真正危险还在体制的招安，要防止将自己的研究变成粉饰太平的小摆设。如此看来，学术研究，无论选择的是哪一种路向，在存在着自己的价值的同时，也都处处充满了陷阱。在今日之中国，要真正坚持学术研究的独立性与自主性，谈何容易，谈何容易！

尽管我的思考偏于悲观，但对于我自己的选择：我能做什

么，不能做什么，还是心里有底的——尽管这种“底”也还不过是一种挣扎。

我赞同王晓明先生与张新颖先生的意见，并且也是努力地追求自己的研究与当代生活保持一种息息相关的联系。在我的理解中，这包含以下几层意思。一是充分重视中国本土的经验。二是研究的问题意识必须产生于当代中国与世界的现实，但思考与研究却要保持一定的距离，应该是学理的，更带根本性与超越性的，以实现现实关怀与超越性关怀的有机结合。三是要处理好当下性与历史性的关系，既要对当事人在什么样的历史情境与历史语境下做出这样或那样的选择，有一种理解的同情，又要正视与揭示这些选择所产生的后果：这后果是历史当事人所不可能预知，而又是研究者所面临的当下现实。我知道，要在自己的研究中，真正实现这些原则是相当困难的，但这总是自己的努力方向吧。

那么，具体地说，我想做与能够做的是什么呢？或者说，我打算通过什么途径来实现我作为一个知识分子，一个学者与当代中国的现实的有机联系呢？明年我就面临着退休，要离开我多年坚持的大学讲台，但我或许还可以继续工作十多年，我想做的事有两件：一是继续关注中小学语文教育。我说过，我在进入老年以后，对一切都已经看透、因而感到绝望，而唯一没有绝望，更准确地说，唯一不敢绝望的，是我们的孩子。为此，我提出了一个教育理想：把我们民族及人类最美好的精神粮食提供给我们的下一代。我在这方面做了一些工作，尽管遇到了空前的压力，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但我绝不后悔，还要继续做下去。而且我是把这当作一个学术工作来做的；从我的专业现代文学研究的角度来说，则是一个学术普及的工作：在我看来，这样的学术普及，其意义是并不亚于学术研究本身的。

谈到我的学术研究，我还是想着眼于对中国本土经验的历史研究与理论提升，也还是我过去说过的：将个人与民族的苦难转化为精神资源。关于这方面的研究，过去我有各种说法，现在我想做一个新的概括，叫作“中国社会主义文化”的研究。

选择这样的课题，我有两个方面的考虑。

首先是出于对20世纪中国与世界的总体考察。社会主义运动的兴起、发展、瓦解与变革，无疑构成了20世纪世界历史的一个重要方面，不管人们对之做出什么评价，这都是一个不可回避的世纪遗产。而20世纪世界范围内的社会主义文化的理论与实践是有多种模式的：有前苏联式的，有东欧式的，有越南、古巴式的，也有中国式的；而中国式的社会主义文化也许是最有特色、最丰富，而又未经真正的认真的科学研究的。就其丰富性而言，据我初步的研究，它本身就包含了三种模式：“十七年模式”、“文革模式”与改革开放二十年所建立起来的“新模式”。这三个模式之间，自然存在着前后一贯的、基本的共同点，但却又是各有鲜明特色，呈现出某种复杂性。也正因为如此，这样的“中国式的社会主义文化”所提供的研究空间就是十分广阔的。当然它也有其特殊的困难之处，但这本身也构成了巨大的挑战性，从而具有某种特殊的魅力。

如果再放眼于刚刚开始的新世纪，就会注意到，20世纪中期以后出现的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大阵营的对立，它本身就形成了一种制约。到20世纪末，随着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瓦解，制约消失了，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的头目美国获得了绝对的权力。但“绝对的权力必然产生绝对的腐败”，美国在建立起自己的绝对的世界霸权的同时，自身的制度性的缺陷也就随之暴露与发展，并必然引起世界性的反弹，形成新的反抗力量。这种反抗的文化资源可能是民族主义的，可能是宗教的，也有可能是社会主



义的。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的经验就有可能重新产生影响。我个人在“9·11”事件中，就看到了毛泽东的幽灵：从恐怖分子的理念及其所采取的手段中，不难看到毛泽东“为了达到某种自认的神圣目的，不惜毁灭一切”的思维，“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道德范式，以至“美帝国主义是纸老虎”的信念，还有“以小攻大”、“以土攻洋”、“攻其不备”等游击战术。这恐怕并非奇特的联想，而是多少预示着毛泽东思想在21世纪很有可能以我们今天还难以预料的形式再度对世界与中国发生影响。而毛泽东思想在20世纪的中国与世界是既带来了一些新的积极的因素，又造成了巨大的灾难的。如果承认具有毛泽东某种程度的“复活”的可能性，那么，对毛泽东及其在中国进行的社会主义试验的认识，无论将其妖魔化，还是将其理想化，都会产生严重的后果。应该说，对毛泽东的遗产，特别是他所领导的中国的社会主义的试验，没有进行充分的研究与科学的清理，是近二十年学术研究的重大缺憾，已经并将继续对中国的发展产生消极的影响。我们现在正急需补这一课。

当然，毛泽东的社会主义试验是全方位的，我们的现代文学、思想史的研究只能涉及“社会主义文化”这一侧面。昨天的讨论中，倪伟先生提出了如何使我们的研究“与当下的社会实践结合紧密，能够对变化中的社会和世界做出应答和解释”的问题，王晓明先生则关注“如何处理文学所凝聚、所体现的‘本土经验’，如何通过此种丰富经验的描述、分析和阐发，向当代世界提供多样的思想资源？”我想，“中国社会主义文化”的研究，或许正可以从这两方面做出有力的贡献。我特别看重的是这一课题本身具有的理论前景：如果说对苏联、东欧经验的研究曾取得了巨大的理论成果，那么，远为丰富与复杂的中国式的社会主义文化的研究也同样有可能取得某种理论上的突破，这是中国的人文

学者有可能为世界思想文化的发展做出独特贡献的一个领域：至少我们是可以这样期待的。

至于如何进行这样的研究，我自己也在思考与探索中。初步的想法是这样的研究应该跳出简单肯定与否定的二元对立模式，采取更为复杂的科学分析的态度。昨天几位年轻朋友对于“文化研究”的设想，也打开了我的思路。例如倪伟所谈到的“文本政治分析”、“对日常生活形式的关注”、“对文学流通与消费过程的研究”，薛毅先生所提醒的“对社会主义历史上的专制主义的批判，应该纳入到对现代性的批判之中”，都是具有启发性的。

当然，学术研究最终还是个人性的。因此，以上所说，仅是我个人根据自己的条件与兴趣所做的选择，它只是多元化的研究总格局中的“一个”：每一个具有独立、自主意识的学者都会找到适合于自己的路，并且坚持走下去。在今天的中国，这样的坚持，只能是一种挣扎；在寂寞、艰难的挣扎中，就需要相互搀扶。我今天的发言，也算是一个求助吧。因此，我要对会议主持人给我这个机会表示感谢，也要对大家耐心地听我的倾诉，说一声“谢谢”。

2001年11月19日

# “真的知识阶级”：鲁迅的历史选择

——在韩国学术讨论会上的发言

本文所要讨论的是“最后十年的鲁迅”。这是鲁迅研究中争论最大的一个话题。我想换一个角度来重新加以审视。

鲁迅1927年10月在上海劳动大学做了一个题为《关于知识阶级》的演讲，提出了一个“真的知识阶级”的概念，并且做了两点界定：“他与平民接近，或自身就是平民”，“因此他确能替平民抱不平，把平民的苦痛告诉大众”；“他们对社会永不会满意的，所感受的永远是痛苦，所看到的永远是缺点”，并且“不顾利害”，“要是发表意见，就要想到什么就说什么”。<sup>[1]</sup>这正是鲁迅的一个自我定位：他将站在平民这一边，做永远的批判者——或者像他在1926年所写的《中山先生逝世后一周年》一文中所说，做“永远的革命者”。<sup>[2]</sup>值得注意的是，在这次演讲中，鲁迅还提出了“思想运动变成实际的社会运动”的问题。在我看来，以上两个方面：对“真的知识阶级”的认定与追求，以及“思想运动”与“实际的社会运动”的结合，构成了鲁迅“最后十年”的思想、文学与社会活动的一个基本贯穿线索。

一

我们首先关注的是，在最后十年的战斗中，鲁迅的批判锋芒所向。

或许可以从一个“小问题”说起。鲁迅曾在一篇文章中谈到“严肃正确的批评家”和“深刻博大的作者”常能够“贴切”地抓住批判对象的本质特征，“制出一个简括的诨名”，“神情笔肖”，“这才会跟着他跑到天涯海角”。鲁迅说，这样的可以永存的“诨名”，有“‘五四’时代的所谓‘桐城谬种’和‘选学妖孽’”，“到现在，和这八个字可以匹敌的，或者只有推‘洋场恶少’和‘革命小贩’了罢”。鲁迅接着又说了一句：“前一联出于古之‘京’，后一联出于今之‘海’。”<sup>[3]</sup>我们是不是可以这样说：鲁迅在“五四”时期和《新青年》的战友们主要着力于对“古之‘京’”所代表的传统中国文化的批判，而到了30年代，鲁迅更为更关注的是，对“今之‘海’”所代表的现代中国文化的批判性审视呢？而我们知道，在30年代的中国，以上海为中心的南方城市有一个工业化、商业化的过程，按照西方模式建立起来的现代都市文明得到了畸形的发展，以上海百乐门舞厅、国际饭店等建筑物为标志的消费文化曾有过极度的膨胀。这样的现代化新潮成了众多的文学者的描写对象，构成了人们经常说的“文学的现代性”的重要方面。而作为一个“真的知识阶级”的鲁迅的独特之处，正在于他“所看到的永远是缺点”：他以批判的、怀疑的眼光烛照被人们认为具有“普范性”的现代化新潮，揭示其表面的繁荣、发展背后所掩盖的东西。——如果说，鲁迅早在本世纪初在《文化偏至论》等著作中，就有过对西方工业文明所进行的理论上的批判性审视；那么，在30年代，这样的现代都市文明的西方模式，尽管经过许多变形，但已成为鲁迅自己生存的具体环境，他的感受与批判自然是更为深切的。而他作为一个文学家，他的批判又是通过对在这样的现代都市文明土壤上生长出来的新的社会典型的观察、描写来实现的，而且如前文所说，他总是以一个“贴切”的“诨名”来加以概括。

于是，鲁迅的笔下，出现了“资本家的乏走狗”。近年来人们关于鲁迅与梁实秋的论战谈了很多，却忽略（甚至是回避）了他们之间的一个实质性的分歧：梁实秋公开鼓吹“攻击资产制度即是反抗文明”，“一个无产者假如他是有出息的，只消辛辛苦苦诚诚实实的工作一生，多少必定可以得到相当的资产。这才是正当生活争斗的手段”。<sup>[4]</sup>在鲁迅看来，这种将资产奴役制度合法化的说教，正是对被压迫的劳动者的蓄意欺骗：“虽然爬得上的很少，然而个个以为这正是他自己。这样自然都安分地去耕田，种地，挑大粪”，“认定自己的冤家并不在上面，而只在旁边——是那些一同在爬的人。他们大都忍耐着一切，两脚两手都着地，一步步的挨上去又挤下来，挤下来又挨上去，没有休止的”。<sup>[5]</sup>——在梁实秋（及其同类知识分子）无条件地认同与美化的资本主义的“自由竞争”的背后，鲁迅看到的是这样的血淋淋的压榨与倾轧：“吃人肉的筵席”正在“资本”的名义下继续排下去，而“梁实秋教授”们却以冠冕堂皇的理论“将悲惨的弱者的呼号遮掩”<sup>[6]</sup>，这自然是鲁迅绝对不能容忍的。

于是，鲁迅在现代都市文明中发现了新的压迫与奴役关系的再生产<sup>[7]</sup>，而一切为新的奴役制度辩护的谎言，在他那里都会受到无情的批判。鲁迅在一篇文章中就揭露了这样一种“高论”：“反抗本国资本家无理的压迫”，鲁迅一针见血地指出：这实际上是在鼓吹一种“有理的压迫”，而所谓“有理”就是要求被压迫的工人“必须克苦耐劳，加紧生产……尤应共体时艰，力谋劳资间的真诚合作，消弭劳资间的一切纠纷”<sup>[8]</sup>。永远站在被压迫的平民、弱者这一边的鲁迅敏锐地看到，这样的“压迫有理论”本身即是一种精神的压迫，“无刀无笔的弱者”因此“不得喘息”，现在他还有一枝笔，自然要用来反抗。<sup>[9]</sup>

鲁迅还从30年代的中国社会结构中发现了“西崽”。早在

1927年，鲁迅就这样描写他所看到的香港社会：“中央几位洋主子，手下是若干颂德的‘高等华人’和一伙作伥的奴气同胞。此外即全是默默吃苦的‘土人’。能耐的死在洋场上，耐不住的逃入山林中，苗瑶是我们的前辈。”<sup>[10]</sup>以后他又如此写到他眼中的“上海租界”：“外国人是处在中央，那外面，围着一群翻译，包探，巡捕，西崽……之类，是懂得外国话，熟悉租界章程的。这一圈之外，才是许多老百姓。”<sup>[11]</sup>在“五四”时期，鲁迅曾揭露了中国传统社会里金字塔形的封建等级制度：“有贵贱，有大小，有上下，自己被人凌虐，但也可以凌虐别人。”<sup>[12]</sup>现在他在中国的现代都市社会里又发现了新的圈子型的等级制度的再生产。值得注意的是，鲁迅由这样的上海租界的社会结构，引发了对文学发展的一种结构的揭示：“梁实秋有一个白璧德，徐志摩有一个泰戈尔，胡适有一个杜威，创造社有革命文学，时行的文学。”<sup>[13]</sup>这里仍然是以某一外国作家为中心，存在着某种依附的关系。鲁迅是主张对外国文学实行“拿来主义”的；但问题在于这种“拿来”必须是“放出眼光，自己来拿”，是具有独立自主性的；如果变成一种顶礼膜拜，一面附骥于洋人，一面又以此炫耀于国人，那就形成了一种文学的等级关系。在鲁迅看来，对西方的这种依附是全面存在的。在著名的《“友邦惊诧”论》里，他这样揭示中国的政治结构：我们有“怎样的党国，怎样的‘友邦’。‘友邦’要我们人民身受宰割，寂然无声，略有‘越轨’便加屠戮；党国是要我们遵从这‘友邦人士’的希望，否则，他就要‘通电各地军政当局’，‘即予紧急处置，不得于事后借口无法劝阻，敷衍塞责’了”<sup>[14]</sup>。这里所说的“党国”正是准确地概括了30年代中国政权的国民党“一党专政”的本质。而“党国”尽管有着表面的独立，实际上却是依附、听命于“友邦”，即西方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的。这样，鲁迅在30年代现代中国的政治、社

会、文化结构中都发现了一种“半殖民性”。这就是说，中国30年代的现代化进程是与“半殖民地化”相伴随的：对这一历史事实是不能回避的。

“西崽”正是在这样的土壤上生产出来的。鲁迅说上海滩上洋人的买办、租界上的巡捕的可恶并不在于他的职业，而在其“相”。“相”是内心世界的外在表现：他觉得“洋人势力高于群华人，自己懂洋话，近洋人，所以也高于群华人；但自己又系出黄帝，有古文明，深通华情，胜洋鬼子，所以也胜势力高于群华人的洋人，因此也更胜于还在洋人之下的群华人”。所以鲁迅说西崽是“倚徙华洋之间，往来主奴之界”，其实是依附于东西方两种权势，因此是双重奴才，却以此为资本，把同胞视为奴隶，这正是西崽的可恶、可憎之处。值得注意的是，鲁迅特意强调，这些西崽虽然吃洋饭，却迷恋传统，“他们倒是国粹家，一有余闲，拉皮胡，唱《探母》；上工穿制服，下工换华装，间或请假出游，有钱的就是缎鞋绸衫子”。<sup>[15]</sup>鲁迅透过这些表面现象所看到的是新旧两种文化的杂糅，新的奴役关系中依然保留与发展着旧的奴役关系。鲁迅站在“群华人”即中国大多数老百姓的立场上，他就发现在现代中国社会里，中国人受到了三重压迫：既是中国传统势力、传统统治者的奴隶，又是西方殖民主义统治者的奴隶，还是依附于二者的西崽的奴隶：这三重奴隶状态的发现是触目惊心的。

上海滩上还滋生着“洋场恶少”。鲁迅说他们虽是文人，但在文学论争中从不说出“坚实的理由”，“只有无端的诬赖，自己的猜测，撒娇，装傻”，<sup>[16]</sup>这就颇有些流氓气了。鲁迅曾这样刻画上海滩上的流氓：“和尚喝酒他来打，男女通奸他来捉，私娼私犯他来凌辱，为的是能维持风化；乡下人不懂租界章程他来欺侮，为的是看不起无知；剪发女人他来嘲骂，社会改革者他来憎恶，

为的是宝贵秩序。但后面是传统的靠山，对手又非浩荡的强敌，他就其间横行过去。”<sup>[17]</sup>可见上海流氓也是既以传统为靠山，又以洋人的“章程”为依托的，而其最基本的职责就是维护现存“秩序”。所以鲁迅说：“殖民政策是一定保护，养育流氓的。”<sup>[18]</sup>这样，“流氓文化”也就必然构成30年代上海现代都市文明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鲁迅说其特点是将“中国法”与“外国法”集于一身，可以说它是西方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中最恶俗的部分的一个恶性嫁接。鲁迅说：“无论古今，凡是没有一定的理论，或主张的变化并无线索可寻，而随时拿了各种各派的理论来作武器的人，都可以称之为流氓。”流氓文化的最大特点就是无理论、无信仰、无文化，“无所谓法不法，只要被他敲去了几个钱就算完事”。<sup>[19]</sup>所以，流氓文化的“横行”本身就标示着社会的腐败，无序与混乱，这其实是一种“末路现象”，如鲁迅所说，“这些原上海滩上久已沉沉浮浮的流尸，本来散见于各处的，但经风浪一吹，就漂集一处，形成一个堆积，又因为各个本身的腐烂，就发出较浓厚的恶臭来了”。也还是鲁迅说得好：这样的“流尸文学”仍将与流氓政治同在”。<sup>[20]</sup>

而作为一个彻底的批判的知识分子，鲁迅的最大特点，还在于他对现代文明的批判，最终都要归结为对知识分子自身的批判性审视。他发现，处于中国式的现代化过程中的知识分子，不仅不能根本摆脱传统知识分子充当“官的帮忙、帮闲”的历史宿命，而且还面临着新的危机：在20世纪初，鲁迅即已发出片面地追求物欲，可能使人成为物质的奴隶的警告，而夸大“众治”的力量，也会产生新的危险；现在，在30年代一切都商业化、大众传媒笼罩一切的现代社会，以及将“大众”神圣化的时代新潮中，鲁迅又看到了知识分子有可能成为“商的帮忙帮闲”与“大众的帮闲”的陷阱。<sup>[21]</sup>因此，对这三种类型的“帮忙帮闲”的批



判，就成为鲁迅 30 年代文化批判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最易遭人攻击的，直到今天也还没有停止。鲁迅自己早就引述过一位德国的马克思主义者的话：“在坏了下去的旧社会里，倘有人怀一点不同的意见，有一点携贰的心思，是一定要大吃其苦的。而攻击陷害得最凶的，则是这人的同阶级的人物。他们以为这是最可恶的叛逆，比异阶级的奴隶造反还可恶，所以一定要除掉他。”<sup>[22]</sup> 鲁迅对形形色色的帮忙、帮闲文人的批判确实显示了他在现代中国的知识分子群体中的叛逆性与异质性。但当他面对知识分子在现代中国沦为三重奴隶的现实，却无法掩饰自己内心的沉重：他的所有的毫不留情的批判，未尝不可以看作是一种自我警戒。

## 二

而对上海滩上的“革命奸商”、“革命小贩”<sup>[23]</sup> 与“革命工头”<sup>[24]</sup>、“奴隶总管”<sup>[25]</sup> 的发现，对鲁迅自身或许有着更为严重的意义。

鲁迅在前述《关于知识阶级》的演讲中，强调“思想运动变成实际的社会运动”并不是偶然的。在此之前，他在黄埔军官学校的演说中讲到“一首诗吓不走孙传芳，一炮就把孙传芳轰走了”<sup>[26]</sup> 时，就已经透露了这方面的消息。在发生了 1927 年蒋介石政权屠杀革命青年的“血的游戏”以后，鲁迅更是痛切地“悟到凡带一点改革性的主张，倘与社会无涉，才可以作为‘废话’而存留，万一见效，提倡者即大概不免吃苦或杀身之祸”。<sup>[27]</sup> 正是对单纯的启蒙无用的痛苦的反思，使鲁迅这样的批判知识分子感到有与实际的反抗的社会运动结合的必要。何况，鲁迅始终对底层的民众怀有深刻的理解与同情，与那些视民众的反抗为洪水猛兽的所谓“特殊的知识阶级”不同，鲁迅对被压迫的民众的反抗的合理性，是从不怀疑的，他有句名言：“人被压迫了，为什么不

斗争？”<sup>[28]</sup> 因此，他后来对当时中国唯一反抗国民党一党专政的共产党领导的工农革命运动，采取同情与支持的态度，并且与共产党人合作，共同发起左翼文艺运动，都是一种自觉的选择。当他目睹年轻的革命文学者为了自己争取民众解放的信仰不惜流血牺牲，更是用少有的热情由衷地赞扬“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和革命的劳苦大众是在受一样的压迫，一样的残杀，作一样的战斗，有一样的命运”<sup>[29]</sup>，这与前述站住普通平民这一边，做永远的革命者的“真的知识阶级”的定位，是完全一致的。或者说，一个“真的知识阶级”几乎是必然要做这样的选择的。

但鲁迅仍然不同于那些抱着罗曼蒂克的幻想，甚至某种投机心理来参加革命的知识分子，他从来不曾将民众的反抗的社会运动理想化，更不用说神圣化：这正是他与太阳社、创造社的“革命文学家”的根本区别所在。他一再地提醒人们必须抛弃革命的“乌托邦主义”，正视革命必然充满了污秽和血，但同时也会有婴孩。<sup>[30]</sup> 而且他从一开始就深知，一旦参与社会实际运动，就有被利用的可能：他完全清楚自己做出这样的选择必须要付出的代价。而作为一个永远的批判者，他一面参与社会实际运动，一面又在紧张地观察与思考发生在中国这块土地上的社会运动（改革或革命）可能的走向。早在1926年所写的《学界三魂》里他就特地考察过中国历史上的“匪”，即所谓“农民革命军”，并且引用一位学者的意见，指出农民革命不会根本改变封建奴役制度，是要“自己过皇帝瘾”的。由此得出的结论是，在中国“最有大利的买卖”就是“造反”。<sup>[31]</sup> 其实鲁迅的《阿Q正传》写的也正是这样的“造反”。现在在30年代的所谓现代革命中，他又发现了“革命奸商”与“革命小贩”：所谓“革命奸商”是用“共产青年，共产嫌疑青年”的血来做大买卖的；“革命小贩”的门面尽管小一点，因而不免牢骚满腹，但依然是出卖同志以作投机。于是，鲁迅看

到：“人肉的筵席”还在排着，不过这回借助的是“革命”。这使得鲁迅不得不再一次回到他的关于“阿Q造反”的命题上来：直到离开这个世界的三个月前，他还在一封书信中对大多数评论者都不能理解他写《阿Q正传》的“本意”而感慨不已。<sup>[32]</sup>而“本意”他是早已说清楚的：“此后倘再有改革，我相信还会有阿Q似的革命党出现。我也很愿意如人们所说，我只写出了现在以前的或一时期，但我还恐怕我所看见的并非现代的前身，而是其后，或者竟是二三十年之后。”<sup>[33]</sup>这字里行间巨大的隐忧是显而易见的。

而且，鲁迅自己很快就在与中国共产党上海组织负责人的接触中，感受到了新的压迫。他在给友人的信中写道：“以我自己而论，总觉得缚了一条铁索，有一个工头在背后用鞭子打我，无论我怎样起劲的做，也是打。而我回头去问自己的错处时，他却拱手客气的说，我做得好极了，他和我感情好极了，今天天气哈哈……真常常令我手足无措，我不敢对别人说关于我们的话，对于外国人，我避而不谈，不得已时，就撒谎。你看这是怎样的苦况？”<sup>[34]</sup>他更公开揭露：这些“自以为在革命的大人物”<sup>[35]</sup>“抓到一面旗帜，就自以为出人头地，摆出奴隶总管的架子，以鸣鞭为唯一的业绩”<sup>[36]</sup>。这里，鲁迅再一次发现了新的奴役关系的再生产，但它却是由前述现代奴役制度的反抗者所制造的，这自然是更为严重，也更加触目惊心的。对鲁迅而言，这都是他的同盟者，一方面同情并支持他们对现行奴役制度的反抗，另一方面又要反抗他们自身正在形成过程中的新的奴役，防范从背后射来的冷箭。鲁迅甚至感到“手足无措”：面对四面来敌，他只能“横战”，“瞻前顾后，格外费力”。<sup>[37]</sup>但对于认定要反抗一切奴役与压迫，“不顾利害”的“想到什么就说什么”的“真的知识阶级”的鲁迅是别无选择的，他对为他的处境感到忧虑的朋友一再表示：这绝非个人间事，必加揭露，“那么，中国文艺的前途庶几有

救”。<sup>[38]</sup> 鲁迅当然知道这一切的后果，他对自己的命运也是洞如观火，在给友人的信中这样写道：倘旧社会“崩溃之时，竟尚幸存，当乞红背心扫上海马路耳”。<sup>[39]</sup> 但即使如此，鲁迅仍然要支持这些革命者，因为在现实的中国，他们依然是唯一的反抗力量：这期间的苦况确实是后来者所很难理解的。

鲁迅可以说是在“横战”中坚持到生命的最后一刻的。而他留下的遗言是：“我的怨敌可谓多矣。倘有新式的人问起我来，怎么回答呢？我想了一想，决定的是：让他们怨恨去，我也一个都不饶恕。”对鲁迅来说，这不仅是要坚持论战中的是非，更是要坚持他的“真的知识阶级”的立场：永远站在平民这一边，反对来自一切方面的一切形式的压迫与奴役，“对于社会永远不会满意”，因而是永远的批判者。我以为，这正是鲁迅对我们的最重要的启示。

2001年12月5日写毕

## 注 释

[1] 见《鲁迅全集》8卷188、190、191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2] 见《鲁迅全集》7卷294页。

[3] 《五论“文人相轻”——明术》，《鲁迅全集》6卷382—384页。

[4] 梁实秋：《文学是有阶级性的吗？》，收《恩怨录：鲁迅和他的论敌文选》，588、589页。今日中国出版社，1996年版。

[5] 《爬与撞》，《鲁迅全集》5卷261页。

[6] 《灯下漫笔》，《鲁迅全集》1卷217页。

[7] 鲁迅在现代教育、现代传播、现代商业、现代文化、现代学术中都发现了这样的新的压迫、奴役关系的再生产。由于这一问题的重大与复杂，将另作专论讨论。

论，本文从略。

[8] 《从盛宣怀说到有理的压迫》，《鲁迅全集》5卷133页。

[9] 这里借用鲁迅当年与陈西滢们论战中的说法。参看《我还能“带住”》，《鲁迅全集》3卷244页。

[10] 《再谈香港》，《鲁迅全集》3卷541页。

[11] 《现今的新文学的概观》，《鲁迅全集》4卷133页。

[12] 参看《灯下漫笔》，《鲁迅全集》1卷215页。

[13] 《现今的新文学的概观》，《鲁迅全集》4卷134页。

[14] 《鲁迅全集》4卷361页。

[15] 《“题未定”草（二）》，《鲁迅全集》6卷354—355页。

[16] 《扑空》，《鲁迅全集》5卷351页。

[17] 《流氓的变迁》，《鲁迅全集》4卷156页。

[18] 《“民族主义文学”的任务和命运》，《鲁迅全集》4卷311页。

[19] 《上海文艺之一瞥》，《鲁迅全集》4卷297—298页。

[20] 《“民族主义文学”的任务和命运》，《鲁迅全集》4卷312页。

[21] 参看《门外谈》，《鲁迅全集》6卷101—102页。《帮忙文学与帮闲文学》，《鲁迅全集》7卷382—384页。《从帮忙到扯淡》，《鲁迅全集》6卷344—345页，等。

[22] 《二心集·序言》，《鲁迅全集》4卷191页。

[23] 《答杨村人先生公开信的公开信》，《鲁迅全集》4卷629—630页。

[24] 致胡风，《书信·350912》，《鲁迅全集》13卷211页。

[25] 《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鲁迅全集》6卷538页。

[26] 《革命时代的文学》，《鲁迅全集》3卷423页。

[27] 《答有恒先生》，《鲁迅全集》3卷457页。

[28] 《文艺与革命》，《鲁迅全集》4卷83页。

[29] 《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和前驱的血》，《鲁迅全集》4卷283页。

[30] 《〈毁灭〉第二部一至三章译者附记》，《鲁迅全集》10卷336页。

- [31] 《鲁迅全集》3卷207页。
- [32] 致沈西苓，《书信·360719》，《鲁迅全集》13卷397页。
- [33] 《〈阿Q正传〉的成因》，《鲁迅全集》3卷379页。
- [34] 致胡风，《书信·350912》，《鲁迅全集》13卷，211页。
- [35] 致曹靖华，《书信·360515》，《鲁迅全集》13卷379页。
- [36] 《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鲁迅全集》6卷538页。
- [37] 致杨霁云，《书信·341218》，《鲁迅全集》12卷606页。
- [38] 致王冶秋，《书信·360915》，《鲁迅全集》13卷416、426页。
- [39] 致曹聚仁，《书信·340430》，《鲁迅全集》12卷397页。又据李霁野写于1936年11月11日的悼念文章《忆鲁迅先生》中回忆，鲁迅曾对F君（冯雪峰）说：“你们到来时，我要逃亡，因为首先要杀的恐怕是我。”据说F君听了这话，“连忙摇头摆手的说：那弗会，那弗会！”李文收《鲁迅先生纪念集》“悼文”1辑68页。1979年上海书店据1937年初版本复印。

## 心有灵犀——一束通信

—

(一位浙江的读者来信向我揭露了几位北大毕业生与在校研究生的一件丑闻。)

××先生：

你的来信确实让我感到震惊。尽管我早已意识到，并且多次谈及某些北大人的堕落，却没有想到已经达到了如此惊人的程度。这恐怕不是孤立的现象。我在一篇文章谈到，经过近二十年的经营，现在中国已经形成了一个与权力结合在一起的利益集团。这个集团的最大特点是已无任何信仰、道德原则，一切都出于利益驱动。这利益集团中就有不少年轻的所谓“知识精英”。你信中点出名来的这几位人士就是其中的成员。他们私生活如此糜烂与无耻，在政治生活中却是道貌岸然，也同样无耻。这是一个流氓政治、流氓经济、流氓文化充斥的时代，也是流氓横行的时代。

但正如鲁迅引用的爱伦堡的一句名言所说：“一边是荒淫无耻，一边是庄严的工作。”当这些“精英”在肆无忌惮地嫖娼，自己又充当政治、经济、文化娼妓的时候，也总有人在默默地艰难地进行着看起来不合时宜的精神的坚守。我想，这正是你、我以

及许多朋友正在或将要做的。……

祝  
好

理群 5月30日

二

（一位多才多艺的家在重庆的女孩子给我寄来了她的文章：“我有一个梦，圣洁的关于诺贝尔奖的梦，只有北大能帮助我”，“真的，我多么需要同时得到最好的中文教授和理工科教授的帮助，我多么需要摆脱专业的束缚，在大学里拼尽一切力气学习更多、更广、更深的知识，我多么需要在最活跃的科学空气中尽情地呼吸。而这，只有北大。”同时寄来的是一封给“北大人”的“自荐信”：“真羡慕你——能够呆在北大，一个离教条很远，离梦想很近的圣洁的地方，多么幸福。”）

××：

今天重读你的来信，突然感到了灵魂的震动。

因为就在几天以前，我的一个学生横遭暴虐死去了。

她是你的同乡，曾和你做着同样的梦。

她实现了自己的梦想，成了你所羡慕的“北大人”。

然而，她却被残暴地杀害了。

学校当局的冷漠，更让人震惊——在他们的眼里，在“压倒一切”的稳定面前，一个学生的生命是微不足道的。

圣洁被玷污了。

我们所有的人的梦想都破灭了。

也许圣洁根本就不存在。



我们被自己制造的梦欺骗了。

这女孩子的血使我们惊醒。

如果我们早一点从梦中醒来，不那么麻木，如果我们早就直面北大与社会的黑暗，提出抗争……也许悲剧就不会发生。

面对死者，我们每一个老师，每一个学生，每一个北大入，都感到内疚与羞愧！

……………

怀着难以抑制的痛苦与自责，我把一切都告诉你了。

你还愿意来北大吗？

我仍然欢迎你，不是为了寻梦……

祝

好

理群 2000年6月4日深夜

### 三

（一位山西的中学生读了我的《话说周氏兄弟》以后，来信提出了一些问题。）

××：

……你的信中所提出的，实际上是一个“国家”与“每一个具体的公民”的关系问题。于是就有了如下几个需要进一步追问的问题：

1、谁是国家的主人？

2、管理国家的公务人员是怎么产生的？是民选的，还是上级委派的？他们向谁负责：选民还是上级？他们受不受监督？是终身的，还是有期限，随时可以罢免的？

3、国家公务人员代表谁的利益？如果他们任意侵犯公民利益和权利，他们还代表国家吗？

……………

这就涉及国家体制的问题。一个真正属于人民的民主国家，每一个公民的个体精神自由是应该得到尊重与保护的。在这个意义上，也只有在这个意义上，“立人”与“立国”是统一的。

当然，公民也应该对国家履行宪法规定的义务。国家利益与公民个人利益有时也会发生冲突，这就需要在宪法的范围内来进行协调——请注意，我说的是“协调”，而不是“绝对服从”。如果要求公民无条件地绝对服从国家利益，那就成了国家至上主义。国家至上的危险性在于，它实质上不是国家利益至上，而是自称代表国家的某个集团、个人的利益至上。

以上这些都是我个人的理解，仅供你参考。重要的是，你要自己独立地思考这些问题。作文也一样，要写自己想说的话，这就自然有新意了。

即颂

学安

钱理群 5月30日

#### 四

（一位读者来信和我讨论鲁迅，并寄来了他的一篇被退回的诗稿。）

××同志：

我读了你的《中国文人》，觉得很不错，没有什么“不便发”的。诗中自有你的锋芒，或许就为此让有些人感到“不便”吧。

现在的文禁是各种各样的。有的是明禁，更多的是造成一种气氛，主编、编辑因为自危而自律过严，形成了许多自定的禁令，一些诗文也就“不便发”，实即“不能发”了。

这是我们必须面对的现实，也似乎无能为力。于是，大作也只能作为“抽屉文学”而存在了。

不亦悲夫！

即颂

文安

钱理群 5月31日

## 五

（一位陕西的理科大学生和他的朋友在年初寄来了他们自己办的刊物，我却忙得没有时间回信，心里很不安。）

××：

我一直欠着你和你的朋友的情——信债，更是情债。你们把心血浇灌的《百草塬》馈赠于我，我却迟迟不予回报。今天早上醒来，突然想到你就要毕业了，再也不能拖下去了，于是匆匆提笔。当初也是因为想好好地写一写，却找不到整段时间从容交谈，反而拖下来了。而今天大概也只能简要地说几句感想，这也是要请你原谅的。

你们刊物里的文章一篇篇读下来，我的心也一直往下沉，沉……一个问题苦苦地缠绕着我，最后竟变成了一个声音固执地追逐着我：命运，命运，命运……

这是你我都在紧张而痛苦地思考的“当今中国思想者的命运”。曾经有人问道：“中国有没有思想家？”在我看来，这对当下

的中国是一个过于高远，甚至是奢侈的问题：今天要做一个思想者，能够独立地思考，发出自己的声音，就很不容易，实在是太难太难了。

你们的刊物就是一个证明。你们的切身体验化成的文字，则向人们揭示了中国思想者的种种困境——

他们面对体制的强大压力——这个体制正在“忙于与世界接轨”，结果就如鲁迅所说，“旧疾”与“新疾”并存，不但旧的专制压迫依存，中国人还要“六岁就开始与人竞争”，于是，“长时间大规模有组织有计划地制造阉人”的“传统”更有了创造性的继承与发展。

作为学院里的知识者，他们时刻面临大学官僚体制的压制——“这儿没有真正独立自由的社团生存的环境，同样丧失了自发组织真正社会实践的自由。我们无法发表真正想说的东西……我们的嘴巴除了吃东西外，已不是为自己所生；我们的大脑除了装下统一配给的东西外，已不再是为自己思考”，而一旦“被划为思想的异端”，今后的命运更是不堪设想。

他们更面对成为“文明的奴隶”的危险：电视、电脑……“支配着每一个现代人的生活，是我们发明的‘暴君’”，对“我们的思想进行着掠夺同化”，“不知不觉让我们交出了一切：时间，空间及思考”，“在未解除身体被奴役”的同时，我们的思想紧随网络时代文明“变化的迅速及无孔不入而丧失独立”。

而所有这一切外在的压制，都会转化为内在的困惑，对自身价值的怀疑：“自身的种种矛盾和混乱，时时将我们逼近分裂与崩溃的边缘”，“每每在动笔写作的时候，本意以之摆脱孤独与寂寞，却更深地感到恐惧和寒冷，感到自己的无力，或许，这就是鲁迅所说的：‘当我沉默的时候，我觉得充实；我将开口，同时感到空虚’”……

这也许是更为可怕的。

于是，我们每一个愿意做一个思想者的人，自身对独立、自由的思想的追求与坚守，就有了一种意义与价值：它不仅是一种对抗——即使失败了，也能够像鲁迅说的那样，使那些思想的压迫者的一统天下不那么圆满；它或许也是一个压不垮的“生命萌芽”。

如果我们以某种方式联合起来（你们的刊物就是一个尝试），互为声援，也会使这种意义扩大。尽管也是极其有限的。

我愿这封信也是一种声援。不仅是对你们已经做出的努力；以后，当你们以任何方式进行思想的拼搏与坚守时，都会有一双关怀的眼睛在注视着你们，也从你们那里吸取。

如果你们终于放弃了，那也没有什么。毕竟坚持过，并且“坚持到了最后”。

“我的剑未刺向敌人，已先置己于死地。”都是如此的。

而且总会有后继者。作为个体会由于各种原因或坚守或放弃，作为一个思想者的谱系，它总是会一代一代地承继下去的。因为，思想，对精神的追求是人的本性，在任何时候，或者说在有人的地方，就会有思想者存在。这或许正是希望之所在，也是我的对于人的有限的乐观主义吧。

但是，你们要毕业了。几乎可以断定，当你们告别校园，投入生活的旋涡中时，很快就会发现，现实比你们想象的要险恶得多。只有到那时你们才会更深切地认识到今天所做的一切的意义。你的预感是有道理的：“这大学四年，可能仍是我一生中最为自由，最快乐，最作为一个人而生活而存在的四年。”但你又预言：“之后更深深地被同化和异化，也许是我的宿命。”这又是我不同意。走向社会以后，当然存在着被同化与异化的危险，对此做最充分的思想准备是完全必要的；但这恐怕不是必然的宿

命——退一步说，即使这是宿命，也仍然要挣扎与反抗。因此，我更愿意说，反抗与挣扎才是每一个曾经是、并努力继续做一个思想者的个体生命的宿命。而且你要相信，总会有与你同在挣扎的人存在，因此，你还要继续地去寻找你的真同道。“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这是从屈原到鲁迅的中国知识分子的传统，应是我们最宝贵的精神后盾。鲁迅还有一句格言：“永远进击。”这是我年轻时的座右铭。那是在文化大革命后期，陷入极度困惑与痛苦之中，正是这句话支撑着我走出了精神的低谷，并照亮了以后的人生道路。现在我把它转抄给你和你的朋友，就作为毕业赠言吧。

祝  
好

理群 6月12—13日

## 六

(一位读者寄来了他的一篇《论自由》的文章。)

××：

……当你提出你的“自由”理想时，我们之间就可能出现了一些分歧。特别是你在《论自由》一文中反复申说的观点——

“对于那些思想条件成熟的人，思想自由是他们不可缺少的条件；他们能够依靠自己本身的能力去行动，从而经过努力，以达到自己的理想与目标。他们是真正具备生命力的人，他们需要自由给他们以行动的空间，以便使他们有所展示，有所行动。如果被剥夺了自由，那么他们势必感到了障碍所带来的压抑，他们势必去想尽一切办法，用尽一切力量来摧毁外界的障碍而获得自

由。因为有了自由，就等于限制了他们的生命的成长，也就是取消了他们的真正存在。但也只有这些人才真正配得上自由。

“对于那些思想条件不成熟的人而言，他们本身缺少生命力，也就没有生命自身的表现与行动，他们是不需要自由的。这些人只有在别人的命令、指挥与管束下才能做到安分守己，才能生存下去。他们唯一的品质就是服从。对于他们，自由不但无用途，反而有害。

“唯一的办法只能使他们的思想成熟起来，这是他们获得思想自由的先决条件。而对于那些不能达到思想成熟条件的人，只好让他们再回到过去那种自己服从别人的思想状况中去，作思想的奴隶而已。”

恕我直言，你的这些高论里弥漫着如此浓烈的法西斯气息，让我感到窒息。但我仍要感谢你的坦白，因为某些“理论家”用曲曲扭扭的语言竭力想说而又不敢说出的话，被你如此明白地和盘托出，就可以起到引起警戒的作用。而且我还得承认，你的“理论”正在当今中国的许多地方不露声色地变成现实。这也是我为之感到痛苦的。但这并不能证明你的“理论”的正确。一切迫使他人成为“奴隶”的行为与为之辩护的“理论”都是我所不能接受，并要据理批判的。请原谅，我只能拒绝你的高论。

## 七

（一位边疆的朋友寄来了他的一组杂文，以作交流，遂写了自己的“读后感”。）

××：

拜读了大作，不少地方都引起了共鸣。记得当年鲁迅与瞿秋白曾经提醒人们要注意区分“真假堂吉诃德”。在我看来，大作所

提出的也是一个“区分真假……”的问题，这在当下思想文化界是有一种重要意义的。

你在《浅说知识分子》一文中提出：“知识分子要批判社会，也要勇于批判自身”。我以为这里实际上是提出了一个区分“真假批判型知识分子”的标尺。居高临下地对他人进行宣判，或把自己想象为真理的化身（代言人），向自己心目中的愚众宣喻真理，这是圣徒，是道学家，而非真知识分子。——顺便说一句，批判只是知识分子的一种功能；在现实社会中，一些知识分子着重于发挥这方面的作用，是可以的，也应该受到尊重，但似不宜夸大这一作用，更不能因此而否定或贬低另一类型的知识分子的另一种选择。

你在《驳第三个“爱国”观念》一文中提出了“区分真假爱国主义者”的问题，更是具有极大的现实针对性。当年罗兰夫人说：“自由，自由，多少罪恶假汝之名以行。”今天，我们也可以说：“爱国，爱国，多少罪恶假汝之名以行。”你说得很好：貌似爱国者“其传统的表现是自觉不自觉地跟随皇帝的心态和视角，很习惯地把以往皇帝治下的一切，说成是最辉煌最伟大的一切，把其他国家和民族一律放到次于自己而必需臣服于自己的位置”；而“真正的爱国，应该是正视自己（的不足与现实的黑暗面），不是表演爱国，也不是鼓吹文化沙文主义”。——而现在“表演爱国”实在是太多了：这也是世纪末景观之一种吧。

《两只眼的英雄和三只眼的英雄》大概是最不合时宜的了，但我也最看重这一篇，并以为这是你的一大发现：“两只眼的英雄品格虽然很高尚，但只克己而不犯上，不追求人的自由，作为良民的榜样去推广，可以让民众弯腰低头只顾苦干，生产驯服工具”；而“三只眼的英雄在既得利益者看来就可怕了，他们能洞穿一切，是清醒者，追求思想自由，不盲从，不但克己而且克他，动



摇包括自己在内的不合理的现实存在”。这样，你所指出的现实也就一点也不奇怪了：“谁动员过学习林昭，学习张志新，学习彭德怀，学习遇罗克，学习黎九莲？当前评这先进，那先进，什么光荣称号都有，但你见过‘反腐败斗争积极分子’这个称号吗？”——没有，当然没有。这确实发人深省。不过，我倒不希望有“反腐败斗争积极分子”这样的称号，因为那也可能成为表演：现在是什么都要演戏化，游戏化，这是更可悲也更可怕的。

你的《可怕的灵魂之死》一文刻画了一类知识分子的典型：他们一生经历了“信念坚守者——保守者——奴隶——奴才的灵魂衰死过程”。正如你所说：“人到了这一步，自我完全根绝，个人意志完全被铲除，留给自己的只是迷信，只是为人生符号而进行圣教徒式的誓死捍卫，一个运动只要一调动起那个符号，他们便高度昏热起来，疯狂起来。‘文革’之所以能搞起来，不正是因为成千上万失去灵魂而只有人生符号的人，一面在热昏中大歌大颂着，一面在疯狂地摧残着破坏着而酿祸于天下的吗？”——这样的人，显然是具有悲剧性的，他们曾有过自己的信念，这是好事，本值得尊重；但他们一则“以此为牢，丧失批判精神”，进而将自己本具有一定合理性的信念绝对化、凝固化，从而从根本上失去了发展的生机，走进了死胡同，二则将自己的信念唯一化，将他人的其他选择视为异端而必灭之而后快，这就成了一条棍子，由理想主义走向专制主义。这两个方面都使他们走到了自己追求的反面，这里确实包括着深刻的历史教训，值得认真总结。同时，也要看到，这些人在90年代的变化：他们的言行中信念的成分越来越稀薄，而代之以利益的驱动，在一定程度上，他们是为失去的和还拥有的权力与相应的利益而疯狂，并越来越自觉地在90年代的中国思想文化界扮演警察与告密者的角色，而为一切尚有良知的人所不耻。但他们在一定的条件下，也会兴风作浪，

甚至有效；正是这种有效性提醒人们注意：在中国，发生文化大革命的温度并没有根除，社会基础还依稀存在。因此，你的文章中重提“文革”的历史教训，就有一种警世的意义，也是深得我心的。

这封信写得比预计的要长，这要感谢你的高见引发了我的思考与这一番议论。就此打住。

祝

文安

理群 2000年9月13日

## 八

(通过写信我与江西的一位作家成了没有见过面的朋友。我们在通信中，讨论他的创作，也探索中国国民性的问题。在最近的一封信中，他谈到了“怨恨”的问题，提出“怨恨使毛泽东成功，怨恨又最终使他走向反面”。)

××：

拜读大札，颇受启发。“怨恨”确实已经注入了中国国民的血液之中。几十年的反复折腾，不断地“革命，革革命，革革命，革革命……”（鲁迅语），使所有的中国人都在成功与失败、整人与被人整……中轮回，就造成了对他人，对社会的极度的怨恨，毒化了整个民族的心灵。——我们在反省极权体制对人的心灵的影响时，注意了“奴化”这一面，却忽略了“毒化”，其实，这也许是更为深刻的。这个民族已经不懂得爱，不知道对生命（人的生命、大自然的生命）的敬畏，而是无所畏惧、肆无忌惮地怨恨、践踏、破坏、毁灭一切有价值的东西。问题是不仅是掌权

者、胜利者如此，就是受迫害者、失败者也是如此，这是一个全民族的怨恨、破坏、腐败与专制，这是极为可怕的，是中国式的极权结出的最大恶果，要真正从我们民族心灵中消解这种渗入骨髓的怨毒，恐怕要经过几代人的努力。

这也是我对中国现实的一个最大的隐忧。记得十年前，我曾经在一篇文章里指出，“现在的中国文坛与知识界，一方面是自我感觉过于良好，一方面，又充满了不满、不平，甚至怨毒、仇恨。试看今日之域中，何处不再怨气冲天地发牢骚”；这使我想起了鲁迅的一段话：“我觉得中国人蕴蓄的怨愤已经够多了，自然是受强者的蹂躏所致的。但他们却不很向强者反抗，而反在弱者身上发泄，……再露骨地说，怕还可以证明这些人的卑怯……卑怯的人即使有万丈的愤火，除弱草以外，又能烧掉什么呢？”（见拙作《反思三题》）十年过去了，现实的中国怨愤不是减弱，而是愈加强烈，几乎到了临界点。对此，坦白地说，我的内心反应十分复杂：一方面，我非常清楚，这“是受强者的蹂躏所致”，它内蕴着一种合理的反抗性；但我又确实担心，会导致盲目的非理性的破坏。因此，我希望能如鲁迅所说，在合理的反抗中注入“深沉的勇气”与“明白的理性”。这本是知识分子的责任。但正是这十年中，中国的知识分子始终陷于自怜与自恋之中，事实上已经脱离了中国民众的大多数，失去了对现实中的问题做出反应的欲求与能力，将来中国无论发生什么，知识分子都将被无情地抛弃，这几乎是一个无可改变的趋向。而这样的结果不仅是中国知识分子这个群体的悲哀而已。这是一个更为重大的话题，以后再从容讨论吧。

再回到“怨恨”这个话题上来。最近这一两年，我经常收到一些年轻人的来信，谈到他们精神的历程：开始时，天真地相信人们告诉他们的一切，用玫瑰色的眼睛看待一切；后来，由于种

种原因（也包括看了我们这些人写的书），他们“睁开了眼”，开始正视现实的黑暗。从“瞒和骗”的大泽中走出来，这本是一种觉醒，但我从这些年轻人的来信中却隐隐感到了新的危险：有的人在为上当受骗而失悔的同时，又似乎失去了对人的信任，在用新的怀疑的眼光看待世界与他人时，处处都看到了黑暗。于是，在字里行间，流露出了怨恨：对曾经欺骗过他们的成年人与社会的怨恨。这引起了我自己的反省：我们在尖锐地批判现实的时候，是否有意无意地也流露出了内心的毒气（“批判”从来都是双刃剑，在杀伤批判对象的同时，也会伤害了自己），而对青年产生负面的影响。我们确实应该引导青年“睁眼看现实”，不仅是要正视真实的黑暗，同时也要看到真实存在的光明，最终的目的是要唤起年轻人灵魂深处的善良美好的人性因子，加以细心地培育与升华，以内在的光明来抵御外在与内心的黑暗。年轻人，特别是处在成长时期的中学生、大学生们，他们的思想具有一种不稳定性，看问题容易走向极端，而且经常在两个极端中摇摆；因此，成年人的引导应该十分谨慎，在唤起他们的批判、怀疑精神的同时，更要引导他们敬畏生命，对他人、人生、社会……保持一种基本的信任与爱，在任何时候都不能以怨恨毒化他们的心灵。

来信中还谈到，“苦难并不能让人摆脱卑微，只有彻底摆脱那个权力网络，在天地中自然行走，才能摆脱卑微”，这也是我十分赞同的。前几年我提出“怎样将苦难转化为精神资源”，就包含有这样的意思。张中晓说得好：当人们处于苦难中时，是存在着两种可能性的，一是精神得到升华，走向“天堂”，另一是走向“地狱”，精神也沉沦了。这种精神沉沦就包括前面所说的“怨恨”。其中也有你所说的“对强权者膜拜、诱惑的精神内伤”。

你对“前胜利者”即“共和国”的受益者的观察也很深刻：“那些当家做主，一脑子天真的国民（红色家庭），其实都是

精神内伤者。”这一命题还需要进一步展开。

“揭示国民精神内伤”，这是一个极重要的课题，希望不断看到你的新作，并经常进行这样的讨论。

祝

好

理群 9月17日

## 九

(一位中学老师写信来与我讨论思想文化界的一些问题。)

××：

来信中谈到“批判的激情有变成另一种专制的可能”，这其实也是20世纪思想文化史上最重要的历史教训之一。今天的中国，一方面是批判精神的匮乏，另一方面一些批判者又往往缺乏自省精神，易把自己的批判推向极端，而产生某种危险，例如变成道德审判而显示出某种专制倾向。而一些人在批评这种倾向时，似乎又走向了否定批判的意义的另一个极端，这同样令人忧虑。

需不需要批判，怎样批判，这仍是一个当下思想文化界未解决的问题。这都需要我们共同探讨。

祝

好

理群 9月16日

## 十

(一位湖北的大学生寄来了他的一篇文章，题目是《天之骄子，我来剥你的皮》。文章尖锐地指出：“这个时代，大学生差不

多早已变得不大会说属于自己的话了。有个朋友说：从我们进大学的那一天起，我们就不断被教导、被灌输、被暗示、被诱逼，哪些话该说，哪些话不该说，见到甲该怎么说，见到乙该怎么说，在台上该怎么说，在台下该怎么说。我们已经丧失了大学生自己的灵魂。‘告别万岁’的大学生并没有成为真正的自我，没有塑造出自我健康的人格。告别权威，他们又走向了另一个极端：盲从社会，迷信流行，没有自己的观点，缺乏智慧的思想。”“他们成为了什么？”“他们在实践中追随一种普遍流行的服从，满足于自我精神深度模式的消解和平面化的现状，虚伪、形式化的思想行为正成为一种流行的时尚”，“一些人‘平日则放荡冶游’，考试则熟读讲义，不问学问之有无，唯争分数之多寡”，“一些人放纵着自己的情欲，寻求生活的刺激和伪先锋式的潇洒”，“一些人醉心于‘理论联系实际’所获取的可观报酬，他们过早地走进了商业操作的流程”，“一些充当‘学生精英’的学生干部，以锻炼能力的谎言和借口，满足权力的角逐欲和官瘾，沉醉于发号施令和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精神鸦片之中”。)

× ×：

坦白地说，读了你的大作，我的心情颇为沉重：至少你说出了相当程度（当然不会涵盖大学生的全部）的真实，我在北大这块被称为“精神圣地”的地方，也看到了许多这样的学生。我曾经因此感叹北大教育的失败：许多学生都是满怀理想与激情考入北大的，四年教育的结果使学生失去了追求。上学期一位学生在作业中的一段话曾使我震惊：“我很欣赏老师的这门课，这种生活方式。虽然有现实生活中的种种的束缚，还是能活得很自由自在，在思想上始终坚持一种自由的状态，永远对自己的爱好、自己的事业充满激情，对自己的生命也充满激情。而回想我这几年

的的大学生活我觉得我的心态已经老了，我对一切都抱着一种顺其自然的心情，这可以说是宽容，更残忍也是更确切的说法是，这是一种消极的生活态度。现在的我还是在这样的心态中生活着，自己觉得很可悲，但已经很懒再去改变了，我想等我跨出校门之后我或许会改变。”这年轻人心态的衰老与倦怠是可怕的，而且我相信它具有一定的代表性，这就更使我感到悲哀。你在信中也谈到了你的困惑：“我不明白的是，现今的大学生不是不知道自身的浅薄、工具化。但他们为什么甘于这样，为什么安于这样的状态，存在总有其合理性，更深层次的心态到底是什么？”这确实值得探讨。你和你的朋友自身就是大学生，当然更有发言权。我想到的有两方面。一是外在的社会的原因。尽管我们现在口头上也在大谈“创新人才”，但实际上在现行体制下需要的是有效率的工具，国家与商业机器上有用的“螺丝钉”；另一方面，“官本位”的体制也从根本上扼杀了人的创造性与积极性，再加上不公平的竞争，由此产生的腐败，人与人之间的敌意、相互伤害等社会风气的毒化……这都会造成年轻人的工具化、浅薄化与老化。从大学生自身来看，我以为根本的问题在于缺乏信仰，失去了追求的目标与动力。没有了精神的信念、信仰与追求，失去了生活的目标感，人成了“空心人”，只能把人本能的欲望膨胀到极端，或者依靠利益的驱动，不择手段地在名利场（官场与商场）上追逐，有的则消极退缩，陷入遁世或混世。因此，现在的中国，最迫切的是文化的重建，其中一个重要方面就是价值观、理想、信念与信仰的重建。如你所说，即使有的大学生不满于自身的状态，但只要新的精神信念未立起来，他们也就必然处于迷茫中，或按照现有生活的惯性继续生活下去。但这样的重建，是不能靠他人来指点的，只能由青年人自己来寻求、创造。因此，我非常赞同鲁迅当年的观点：“青年又何须寻那挂着金字招牌的导师呢？不如寻

朋友，联合起来，同向着似乎可以生存的方向走。你们所多的是生力，遇见深林，可以辟成平地的，遇见旷野，可以栽种树木的，遇见沙漠，可以开掘井泉的。问什么荆棘塞途的老路，寻什么乌烟瘴气的鸟导师。”你在信中说你们已经有了一个民间的思想村落，这就是一个好的开端——路正在你们的脚下，这是确实如此的。

祝  
好

理群 9月24日

## 十一

（一位贵州的老乡，曾经做过我的访问学者，来信向我述说他的苦恼：“回到贵州，我仿佛又回到了一个遥远的星球”；表达他对北大的怀念：“常在静夜中凝视北方的天际，那里有一个光辉灿烂的星系，真想从中得到一种力量，鼓舞我走完前方的路。”）

××：

我理解你对北大的情感，而我这样的身在北大的人，却更多看到它“失精神”的那一面。在我看来，北大已经越来越成为人们心目中的一个梦。人总是要做梦的，尤其在当下“满目的贫瘠与荒凉”之中，人们更需要一个远方的净土。北大实际上就扮演了这么一个角色。这是令人感慨的：明知是梦，却依然要做下去。

我也理解你的处境与苦恼。这里仍然存在着一个反差：我这样的一个生活在抽象精神的象牙之塔里的知识分子，常常会羡慕世俗生活的现实感与人情味。而你身处于世俗之中，却苦闷



于“杂事如蚕丝一样缠得人日益消沉，人的精力就这样毫无意义地一点点消失，如指缝间不断漏落的沙子”。理想的人生大概是应该自由地出没于精神的象牙塔与世俗生活之间吧。

感谢你的来信引发了我这些思考。

有什么需要我出力处，请尽管来信。

祝

好

理群 9月15日

## 十二

(一位读者来信问鲁迅《弟兄》的“深意”。)

××：

鲁迅的《弟兄》无非是通过小说主人公下意识的梦，来揭示人心灵深处的自私，对所谓“兄弟怡怡”提出质疑。鲁迅作品未必篇篇都有深意，不必过于深究。

匆匆即复。

祝

好

理群 9月14日

## 十三

(一位退休教师寄来了他多年研究的成果：一篇分析《阿Q正传》的论文，希望和我进行讨论。)

× ×:

你的大作引发了我对《阿 Q 正传》的重新思考，这是首先要感谢你的。

你对鲁迅自己关于《阿 Q 正传》的论述所做的梳理，详尽而准确，令我叹服。这些材料过去都看过，但经你前后贯穿，详加分析，竟有耳目一新之感，像是第一次读到似的。于是，你引述的鲁迅逝世前三个月所写的一段话，引起了我的注意与思考——

“《阿 Q 正传》的本意，我留心各种评论，觉得能了解者不多。搬上银幕以后，大约也未免隔膜，供人一笑，颇亦无聊，不如不作也。”（《致沈西苓》，1936 年 7 月 19 日）

这就是说，鲁迅在他的生命的最后时刻，还在为很少有人了解他写《阿 Q 正传》的“本意”，他与他的读者、评论者之间的“隔膜”，感到悲哀。

这确实令人震撼。

那么，鲁迅写《阿 Q 正传》的“本意”究竟是什么？

其实，鲁迅自己就有过说明，这也是你的文章里着重引述与讨论的——

“民国元年已经过去，无可追踪了，但此后倘再有改革，我相信还会有阿 Q 似的革命党出现。我也很愿意如人们所说，我只写出了现在以前的或一时期，但我还恐怕我所看见的并非现代的前身，而是其后，或者竟是二三十年之后。其实这也不算辱没了革命党，阿 Q 究竟已经用竹筷盘上他的辫子了。”（《〈阿 Q 正传〉的成因》）

这里，鲁迅说得很清楚：“人们”所不了解的，是他关于“阿 Q 似的革命党”、“阿 Q 似的”改革的思考的深意。这一思考，也就是《阿 Q 正传》所着力描写的，有两个侧面：一是中国已经发

生、正在发生以及将要、可能发生的“改革”（“革命”）是什么样的；二是这样的“改革”（“革命”）与“阿Q们”（中国以农民为主体的国民）的关系如何。鲁迅特意强调，他“所看见的并非现代的前身，而是其后”，说明他关注的是中国进入“现代”历程“其后”的问题，这其中核心就是现代“改革”（“革命”）。这正表明了鲁迅忧虑的深广，他的思考的超前性。这几乎涵盖了从辛亥革命直到今天的改革的全部历史。在这个意义上，《阿Q正传》确实是20世纪中国历史经验的总结——在他写作的20年代中期，这种总结带有很大的预测性，却被其后的历史所证实。这样的“思想史与文学史上的奇迹”来源于鲁迅对中国社会、中国文化、中国人的深知与真知，这是现代中国无人可以企及的。人们与鲁迅的隔膜，说到底，是对中国的真正国情（绝不是今天已被说滥了的“国情”）的隔膜。这也是《阿Q正传》对处于世纪之交的中国人、中国知识分子的最大启迪：需要重新认识我们的国情，以此作为我们的新的思考与探讨的出发点，其中一个重要方面，就是重新思考鲁迅在《阿Q正传》中所提出的那两个问题。

当然，即使弄懂了鲁迅的本意，也不算完成了对《阿Q正传》的研究。因为作品的实际内涵远比作者的本意要丰富得多。在这方面，给读者与研究者的再阐释留下了极大的余地。也就是说，每一个认真的读者与研究者对《阿Q正传》都可以、可能有自己的发现。在这个意义上，《阿Q正传》和所有的不朽的著作一样，是说不尽的：它的魅力也正在于此。

你看，读了你的大作，我竟是思绪绵绵，情不自禁地说了这么多的话，现在真应该打住了。但我的心中依然激荡着欢乐的水花——这是思考的欢乐，是与没有见过面的朋友切磋学问、探讨真理的欢乐，我真要陶醉其中了。

再一次谢谢你。

祝

好

理群 9月24日

## 十四

(一位朋友寄来了一篇《创建地球村大学》的文章，提出了他的教育理想与理念，其要点有：1、“贯彻人类精神大融合的宽容思想。防止和减少种族、地域、国家、体制、党派的人为限定和隔阂，使人类资源共享，人类教育共建。培养站在人类共同立场上面向真理、捍卫人类尊严的，无偏见的，优秀的地球公民”。2、“办学思想应该是：精英化与大众化结合，人类永恒准则与生存现代化结合，人类文明智慧和伟大自然共存共生”。3、“办学形式：私立，自主”。4、遵循“教育财政公平”原则和“人类资源从富裕流向贫困”的原则。5、“校园建设要体现伟大自然与人类智慧的完满结合，使神圣与人道合一，实用和节俭合一”。6、“对教师的人格要求：无偏见，反对暴力，捍卫人类共同尊严，关怀我们共同生存的地球和宇宙”。)

× ×：

拜读了大作，颇受启发。这样一种更加彻底的教育改革的理想，是十分吸引人的。但对现实的中国，这只能作为长远的目标，以你所说的“坚定信仰之下的永不放弃的坚韧精神”，持续努力，才能在某一阶段开始实施。

首先要走的一步，是实现“教育的独立”。这是从根本上制约中国教育发展的“瓶口”问题，要害问题。这里，又有两个方面

的问题，一是国立学校的体制改革，另一方面是私立学校，特别是私立大学的开禁。中国的教育改革的突破，大概也正应从开办、发展私立大学入手。有了私立大学的竞争，才有可能促进国立大学体制的变革。

但在中国，要发展私立大学是十分艰难的。除了政治上的种种压制与限制，也还有投资者——中国的民间企业家本身的局限：一是脱离了官方他们几乎无法生存，因此，总要与官方建立千丝万缕的联系，这在初创时期几乎是不可避免的，但也会因此造成他们先天的妥协性，而不可能实现真正的教育独立；二是他们自身的文化素养的不足，人文精神的稀薄，过分追求商业的利益，很容易把私立大学办成你所说的“讲习班”，同时又竭力控制学校，随意地干涉校政，从而从另一方面影响教育的独立。——中国早期的民营企业家大都有家长式专制的倾向，这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制约因素。这样，要创建我们所理想的真正意义上的私立大学，是很不容易的：我们将长期面临理想与现实的矛盾与困惑。对此，必须从现在开始，就有足够的思想准备。

但不管怎样，路总是要走，有一个开端就好。

这也是我退休以后，所想要参与的工作。但不知道是否有这样的机会。我们可以有种种的设想，但在实际运作中却始终处于被动的地位：这大概也是我这样的人文知识分子的悲哀吧。

祝

好

理群 9月15日

## 十五

（一位年轻的读者寄给我一篇他写的《钱理群先生的困惑》，是

对我在《文学评论》上发表的《矛盾与困惑中的写作》的回应。作者把现在的时代称为马尔库斯等说的“实验的时代”：“（它）具有折中、脱离权威范式而进行观念游戏等的特点，它提倡展示与反省，对于在实践中的事物采取开放的态度，对于研究方向的不确定性和不完善性采取宽容的态度。”文章说：“钱理群先生的矛盾与困惑正是实验时代中宽容精神的体现，他的困惑是真诚的拷问而非激烈的批判，我形象地认为钱先生是站在波涛汹涌的海岸边，有着一一种坦然的精神和气质。但无疑，钱先生是从‘历史进化论及历史决定论的文学史观’的深刻影响中走过来的，这种思想的直接作用是崇拜权威和渴望成为权威。钱先生在文章中流露了相似的意思：他希望能有一个对20世纪中国文学的‘属于自己的，稳定的，具有解释力的总体把握与判断’，相信正是如此重的使命感使得钱先生的困惑更加深入和广泛，有了‘丰富的痛苦’。但是，我愿意在这里坦率地说：钱先生无疑看得太重了。就史而言，客观、公正远比‘稳定的，具有解释力的’要重要得多。”）

××：

谢谢你对我的关心与信任，谢谢你的坦言。你说得很对：“摆脱旧的体制，将整套的机制放到一个具有灵敏反应能力的充满活力氛围中去”，这确实是发展中国思想、文化、文学、学术的关键之一。这里的“摆脱”，既指外在的摆脱，即体制的根本改革，更指内在精神的摆脱。这对我们这些在旧体制下成长起来的知识分子是更为困难的。而我们的困惑确实比你想象的更为深刻。这几乎是要像鲁迅当年所说的那样“横战”，既要抗拒现行旧体制的权力的压制，又要应对仍然沉湎于旧体制的同代人的嫉恨，甚至是千百倍疯狂的压制（鲁迅早就引用过梅林格的话：“在坏了下去的社会里，倘有人怀一点不同的意见，有一点携贰的心思，是一

定要大吃其苦的。而攻击陷害得最凶的，则是这人的同阶级的人物。他们以为这是最可恶的叛逆，比异阶级的奴隶造反还可恶，所以一定要除掉他”），还要面对强大的社会习惯势力的压力，更要直面更为年轻的一代的误会与利用……这一切外在的黑暗都会转化为自己内心的黑暗：自我价值的怀疑、绝望、无助、恐惧、怨愤……这就要求有极大的精神的光明力量来抵御这外在与内在的黑暗。但又面临这光明的精神资源来自哪里的问题……这都会形成一种巨大的，难以言说的困惑。

而我们也只能在困惑中挣扎着前进。真是一步一个血印。

再一次谢谢你对我的启发。

祝

好

理群 9月15日

## 十六

（这是一封压了很久、也许是终于寄不出去的信：收信人当时还是高三的学生，现在大概已经考上了大学，因为我弄丢了他的地址，没有及时回信而失去了联系；而我信中提到的那个孩子，却在那个令我震撼的电话挂上以后，消失在茫茫人群中，再也没有他的任何信息。但我仍要记下这一切，算是给有类似情形的中学生的一个告诫，也作为自己的永远的警戒。）

× ×：

……接到你的来信与文章，我犹豫了很久，不知道该怎么回信。一方面，我确实欣赏你的独立思考与批判锋芒；另一方面，又为你的锋芒毕露、赤膊上阵而担忧。你让我想起了一年前发生

的一件事，它一直压在我的心上，如果不如实地讲给你（以及所有的年轻朋友）听，我将永远不得安宁。

那是去年春节之前，刚放寒假的一个晚上，我突然收到一个电话，一个陌生的声音，带着哭音，劈头说了一句：“钱教授，我被学校开除，走投无路了！”我吓了一跳，在反复的询问和他断断续续的叙述中，我才弄清楚：这是一个山东农村里的男孩子，开始一切处于懵懂之中，后来读了一些书，好像也有我的书，于是，开始用一种新的眼光来看周围的一切。首先感到的是现行中学教育对自己创造力的压抑。于是，开始反抗，与班主任、校领导都发生了冲突。最后拒绝上课，躲在家里自修，竟凭着自己的天赋与努力，以全县第一的成绩，考取了北京医科大学。于是，充满着幻想地来到北京，以为从此可以进入一个自由的学习天地，使自己的创造力得到充分的发挥。但敏感的他很快就发现大学并非他所想象的那样，他再一次感到了压抑，并又开始了反抗：一等地逃课，去读自己想读的书，同时，不断地给班主任，以至校领导写信，对学校的教学提出尖锐的批评，并因此得罪了各级领导。校方决定以他旷课太多为理由对他进行纪律处分。他的家长闻讯赶来，向校方求情，校方提出要他承认错误，他认为自己无错，拒绝做任何检讨。事情越弄越僵，校方最后做出了“取消学籍”的决定……听着他的这番叙述，我的心一直往下沉，沉……一时竟至无语。我知道，这孩子是无辜的，这件事确实暴露了我们的大学、中学教育的许多问题；但我还能鼓励他去反抗吗？——他现在连最基本的学习与生存条件都没有保障了！于是，我对他谈起了鲁迅关于“不要赤膊上阵”，关于“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要善于保护自己的思想，希望他做一些必要的妥协，以获得继续学习的机会。这孩子听了我这番话，只冒出了一句：“你为什么不早说这样的话？！现在说什么都不来



及了!”我的心受到猛烈的一击,还来不及反应,电话挂上了……整整一夜,我无法安眠,此后只要一想起这件事,我的心就隐隐作痛,即使是此刻我终于写下了这一切时,我的手仍在颤抖:一种刻骨铭心的负罪感永远追随着我,而且永远不会有弥补的机会:我不知道这孩子的名字,不知道他现在在哪里,如何生活,不知道在经历了这一切之后,他对人生、社会会有怎样的看法,他将怎样继续走自己的人生道路……而且,坦白地说,对发生的这一切,我至今也没有想清楚,不知道该怎么办。现在,我如实地讲给你(以及和你一样的年轻朋友)听了,希望能引起你们的思考,倾听你们的意见。我愿意和你们一起来讨论这些人生的难题……

祝  
好

理群 2001年2月5日补写

## 十七

(2001年的最后时刻是在和相识与不相识的朋友的通信中度过的。这是其中的一封:一位河南的中学生小朋友已和我通了好几封信。在最近的来信中写道:“先生谈到‘现行教育制度的种种弊端’,其实不仅仅是‘现行’的‘弊端’,连‘改革’的‘弊端’也尖锐地叫喊。现在不是‘素质’起来了么?然而孩子依然在题海中挣扎,也间或有不平,然而班主任的一句‘真话’便震慑住了:‘什么素质,高考还是要分数!’我现在大概是喜欢听‘真话’的吧,然而也骇然了(也许‘真话’还不够‘耳顺’)。这便是现实,我们的不幸的孩子碰在现实的壁上,鲜血逆流,可以‘漂槽’了。或许也有不‘逆流’的,那是血已经被榨尽者!古人曾用‘挂羊头卖狗肉’讽刺货假价虚的商户。然而我总觉得我们的

改革简直是‘挂羊头卖真空’，连空气也一并收回，人迟早要窒息。”“我发现现在还有一些老师在做着屠戮青年的刽子手。如果不是侵犯权利的话，我引一段朋友的信，给先生看那青年的血：‘……而且历史老师讲了一句话：现在我们班开始两极分化了，这是件好事！天啊！这是多么大的打击！！……我真的快失去最后一点信心了，帮帮我，好吗？’我见着我的朋友流血了，触目惊心！诚然这一番话在强者可以不理睬或者竟作为上进的动力；但在弱者，却只抹杀了那最后一点光明，‘恩赐’以完全的黑暗，从此完全的痛苦或竟至消失。这样的老师就应该受‘最黑最黑最黑的诅咒’！”）

××：

……信中所说的“我们班开始两极分化了，这是件好事”的言论确实触目惊心。但岂只是班级，岂只是教育，在我们整个社会不正流行着这样的“两极分化好得很”的言论吗？而且有些知识分子不也正在散布这种言论吗？——尽管他们用的是煞有介事的“学术语言”。在这个意义上，这位老师还算是可爱的：他起码还有几分坦诚。用冠冕堂皇的理论来掩盖吃人的真实，这是更应该用“最黑最黑最黑的”语言来“诅咒”的！

我也很赞成你的观点：我们不仅应对“现行教育制度的种种弊端”进行质疑，也应该对所谓“改革”进行质疑，因为当前的“教育改革”很有可能成为一种“表演”。当然，也可能出现某些缝隙，为真正有志于改革的人提供某种空间——尽管极其有限。

读来信，感到了你的敏感、思想的某些尖锐性，同时也担心你的愤世嫉俗，会使你看不到生活中某些光明美好的东西。——就我的观察与体验，黑暗与光明是同在的，只是后者常处于受压制的地位，需要更用心地去发掘与发现。

当然，你现在最重要的，还是要努力地充实自己，打好精神的底子，以更有力量地（我指的主要是自我内在的精神力量）对抗外在与内心的黑暗。

我所能帮助你的，只能寄一点书给你——当然是无偿的。不过，要等几天，等我的学生有空时再寄给你。我自己已经无暇去邮局寄书了。

致

新年的祝福

理群 2001年12月31日

## 十八

（一位云南某工厂的读者来信和我讨论我的《鲁迅与20世纪》那篇文章。）

××：

……来信字里行间充满了对民族、国家、人民的命运的关心，读之令人感动。实际上我们都是在紧张而痛苦地思考着，因此，来信引起了我的极大共鸣。尽管我们的意见有一致之处，也有不同之处。

所谓“重新来过”当然不是要重新打倒什么，来一次暴力革命。我个人也是主张走和平的逐步改革之路的。但对当下中国的改革也确有反省的必要。我之所以重提“立国”与“立人”的问题，也正是要促进这样的反省。

信中提出要每一个人为国家的生存、发展做出牺牲的问题，从原则上说起来似乎不错，但正如你在信的后面所说，还有一个什么样的国家的问题。在一个“主仆颠倒的国家”里，为国家牺

牲实质上就变成了为国家的掌权者（他们自认是国家利益的代表，国家的代言人）牺牲，成为国家中的强势集团、既得利益集团奴役、压制弱势集团、普通民众的一个借口，一个理论根据。

“消灭一切人压迫人、人奴役人的现象”这其实是一个终极性的目标，只可能无限地趋近，却不可能完全实现。在这个意义上，它确实具有乌托邦性质。但我认为，人是不能没有乌托邦的理想与信念的，有了这样的信念和目标，才可能对现实保持一个永远的批判的清醒立场：“压迫与奴役现象不可能完全消灭”这一判断绝不能引出对现实压迫与奴役现象的容忍与辩解。而批判一种奴役现象与如何消灭（或缓解）这种奴役，又是不同性质的问题：前者主要是思想、观念层面上的，后者则还有一个操作层面上的问题。而作为一个知识分子，特别是我所认同的批判的知识分子，他对于一切压迫与奴役现象都必须坚持一种批判的立场，不能有任何的让步与妥协，但他又要认清自己批判立场的有限性。在实际政治、经济、文化……的操作中，必须是渐进的，这期间就不能不有许多妥协。而对自己批判的有限性的清醒认识在批判的知识分子自身不能不时产生绝望与无奈之感，但又不能因这种绝望与无奈而放弃自己的反抗。这就是鲁迅所说的“绝望的反抗”或“反抗绝望”。这也是我在自己的文章中不时谈到绝望的原因与意思。

以上所说，都是我个人的意见，仅供参考。再一次谢谢你对我的信任，并要感谢来信引发了我的进一步思考。

即颂

冬安

钱理群 2001年12月28日

## 十九

(一位江西的女中学生来信倾诉她的孤独感。)

× ×:

……谢谢你对我的信任，愿意把内心的苦闷向我倾诉。

我知道自己不能给你以具体的帮助。因为我坚信，任何人的问题只能靠自己来解决。他人只能是一个倾听者。

但我这个你说的“远方的老人”正是真诚地愿意做一个倾听者，怀着最大的善意，并且努力理解。

我理解你与周围人的格格不入，理解你的孤独与敏感。但你能不能试图从现实生活中发现、发掘哪怕是最微末的美好的东西？在孤独中你是否可以从书本中去寻找“远方的友人”？

至少现在你有一个倾听者了。而且我还要送一套我和朋友们一起编的《新语文读本》给你——你将和世界上最善良、最有智慧的人对话，处处看到美好的人性的闪光，愿它能温暖你的心。

今天是岁末，就致以  
新年的祝福

理群 2001年12月31日

## 二十

(一位学院里的学员来信谈他的理想的破灭、他对现实的绝望。)

× ×:

……从信中看，你的思想正处于极度的矛盾之中。也许经过这几个月的思考，你已经从中解脱出来。

记得俄国批评家、教育家别林斯基说过，人的一生的要经历三个阶段。首先是做梦的时代，这大概是在学校里受教育的阶段，充满了理想，却不知人事，也就是你信中所说的，“沉湎于天性中的纯净的世界”吧。以后，人开始接触现实，就会出现理想的破灭，并时时感到理想与现实距离的矛盾、冲突与痛苦。据我看，你现在正处于这个阶段。而且才是开始：以后你介入现实越深，这样的冲突与痛苦还要加深，对此你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这是一个人的一生中的关键阶段，有的人就真的为现实吞没了，一味地适应现实，根本放弃了自己的理想。而另一些人则坚持着挣扎，既在操作层面上不得不对现实做出某些妥协，同时又在对自己原先的理想的质疑中，有所坚持，有所调整，又有所扩展与深入：正是在这挣扎的过程中，建立起真正属于自己的信念与理想。——这个理想、信念，不是原先未经实践检验、因而不免幼稚的理想、信念的简单重复，而是在更高层面上的否定中的肯定。它已经化作了自己的血肉，因而是坚定的，能够在与现实的冲突中，始终坚守不变。我希望并且坚信你能够通过人生第二阶段的挣扎达到第三阶段的坚守。

以上这段话就算是我对你的新年祝福吧。

理群 2001年12月31日

## 二十一

（一位河南的大学生来信谈到他的一个苦恼：在毕业前夕，学校强迫每一个学生都要对某一事件表态，否则不予毕业，甚至会有更严重的后果。他不愿违心地表态，不愿说假话；但不说就会威胁到自己的生存。“我于是屈服了，投降了，他们于是满意了，‘孺子可教也’。出来后，我分明地感到了一种恐惧，一种鲜

活的恐惧，一种烈日下的恐惧，从此我不信鬼神却怕人了，害怕各种主义，害怕思想，害怕……参照一下鲁迅，我更感到了他的勇敢、伟大、坚韧不屈，那有形的小的障碍无形的无物之阵，正张着血口要吞下去一个虚弱的灵魂，我感到了无能为力，怕也有被吞没的危险。……毕业宴会上位朋友的话凄凉而又悲壮，至今不忘：‘你们别劝我了 [我们劝他通融一下，拿到毕业证书再说]，我要在大学的最后保持最后一分纯洁，进入社会，我一定会适应它。’这究竟是谁的错？”)

× ×：

……实际上我们每一个人每天都在面临着“说谎”还是“说出真实”的矛盾。鲁迅去世那一年写的一篇文章题目就叫《我要骗人》，这可以说是终生困扰着鲁迅的人生课题之一，鲁迅的《伤逝》描写的也就是这个问题。在我看来，这是现实生活中的人的基本生存困境，而在操作的层面上，则有几条线。首先是高线，即说出自己心里的话，说出真实。如果不能说、不许说，就求其次，维护自己沉默的权利，即不说不想说的话。有时候，连沉默的权利也没有，只能说违心的话。但这仍然有几条不可逾越的底线：第一，要清醒：自己是在说假话，这是一个错误。这个是非界限必须清楚。千万要警惕，不要说假话成了习惯，把假话当作真话，甚至不知道如何说真话了。第二，说假话必须是被动的、无奈的，千万不要为了达到私利的目的，主动地去说假话。这个“口”一开，那就收不住了。第三，说假话也要以不伤害他人作为底线，也就是说，说谎话的苦果只能自己尝，绝不能因为自己的谎言而伤害他人。——以上也算是我的人生经验，这经验是苦涩的，是为我自己的；因为你的信中涉及这样的问题，也就随手写出。

你大概就要（或者已经）走向社会了。进入以后就会有一个“适应环境”的问题。但这里仍有一个“度”。即是要在适应中保持一定的原则。这很难，但也非绝对做不到。人的一生大概就在这两者间不断挣扎吧。——挣扎也仍有意义，最可怕的是，连最后的挣扎都没有，那就真的被社会所改造，不，吞没了。

我也正在挣扎着。因此才有了以上这番话。匆匆写此，即颂  
文安

钱理群 12月30日

## 二十二

（一位上海的研究生寄来一幅书法作品。）

××：

……谢谢你对我的关心与理解。

“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悠悠苍天，此何人哉”，正是我这几年的心情。我也由此得知“知我者”多有所在，我因此而感到欣慰。

在去年最艰苦的时候，我曾经说过：“我存在着。我努力着。我们又相互搀扶着。——这就够了。”先生的来信，使我更坚信这一点。

谢谢了。

赠上今年出的新著，算是对先生雪中送炭的答谢吧。

致

新年的祝福

理群 12月31日



## 二十三

(一位年轻的学者寄来一篇关于“安徒生在中国”的论文。)

× ×:

……读了大作，感到很兴奋。因为安徒生是曾经给我以深刻影响的作家，以致从少年时代我就开始了做一个儿童文学家的梦。我所崇拜的外国儿童文学家还有一位是苏联的盖达尔，你可能已经不熟悉了。以后又有了研究儿童文学的梦，安徒生自然是主要研究对象之一。可惜时间和精力都不允许我涉足儿童文学，但每当看到这方面的研究成果，总是很高兴，甚至会产生一种羡慕之情。儿童文学所展示的是人的最美好的情感，儿童文学研究更需要一颗美的心灵，这是一个美的阐释与创造的事业，是值得为之献身的。祝贺你有了一个好的开端，并坚持走下去。我们这个污浊的世界，实在是太需要美了。

即颂

文安

理群 12月28日



## 第五辑

# 魂归何处

可以这样说，二十年来我所做的工作，集中到一点，就是“讲鲁迅”，并且试图“接着往下说”，以便把民族、家庭与个人的世纪苦难转化为精神资源。



## 能写的与不能写的

——《拒绝遗忘：钱理群文选》序

坦白地说，对这本书的编选，我是踌躇再三的：这几年我的书出得不少，今年还会出好几本，现在又拿出这个选本，会不会增加愿读我的文字的读者的负担呢？朋友们却这样说服我：此书是给并不了解你的读者看的；难道你不愿意有更多的读者听到你的声音吗？这倒也对，写文章又公开发表了，当然是希望有人读，而且读的人越多越好的。这本《文选》就这么编出来了。但我并没有因此而获得轻松：当要求我写篇“序言”时，竟久久交不出卷，不仅是因为忙（我是以此为理由一推再推的），更是由这本书的编选引发出许多自我的反省，一时竟是理不清楚了，即使是此刻坐在电脑前，也不知从何说起。而交稿的期限已近，又不得不勉力写几句，哪怕只是开一个头——我真的如一些朋友所说，成了写作的机器与奴隶了。

径直说，面对这一大堆选出来的文字，也可以说是自我生命的结晶吧，不能不给自己提出这样一系列的问题：你写了什么？你写的这些东西有什么意思？又可能存在什么陷阱？你在能写什么的同时，又不能写什么？这不能显示了你的自我的一种什么样的界限，或者局限？你还能写下去吗？你准备怎样继续写下去？……如此等等。要回答这些问题，就必须对自我进行一番刨根式的清理。或者就从我的成长背景这一点切入吧。这本也是我

多次谈到过的：作为五六十年代接受中学与大学教育的知识分子，我是在“批判封、资、修”的人文环境中长大的，这就决定了我的知识结构存在着某些先天性的缺陷，例如不懂外语，对20世纪西方文化的完全隔绝，对中国之外的东方文化的隔膜，以及中国古代文化修养的不足，并由此造成的思维与视野等方面的种种局限。但我也有自己的优势，这就是一生目睹与经历了太多的苦难，套用年轻时最喜欢引用的阿·托尔斯泰《苦难的历程》扉页里的那句名言，可以说是在“血水里浴（过）”、“碱水里煮（过）”，是与自己的民族、人民共同煎熬过的，因此，对中国的国情、民性、人心，有着较为深切的观察，积累了丰富的的人生经验，也有着同样丰富的生命的体验。正是这些“丰富的痛苦”帮助我逐渐接近与认识了以鲁迅为代表的“五四”新文化，并且化作了自己的血肉。前几天我还和大学的一位同学谈到这一点：20世纪中国有了鲁迅，这真是我们民族的大幸；对于我这一辈的知识分子更是如果没有鲁迅精神的支撑，几乎就失去了安身立命的基础。尽管不断有人说什么“对鲁迅讲得太多，太过头”，宣布要将鲁迅“送进博物馆”，使其成为与现实无关的“古董”，甚至批判与否定鲁迅；我仍然固执地认为，我们至今对鲁迅对我们这个民族的意义，对未来中国发展的潜在价值，还是认识得不够，现在不是讲得太多，而是要求讲得更深入，更不能将鲁迅送进博物馆，而要进一步在知识分子与全民族中发扬鲁迅精神传统。我也正是在这里找到了自己的生命与学术、写作的基本立足点，可以这样说，二十年来我所做的工作，集中到一点，就是“讲鲁迅”，并且试图“接着往下说”，以便把民族、家庭与个人的世纪苦难转化为精神资源。具体地说，我的关注、思考与研究主要是四大块：一是对历史与现实的国民性弱点的反省与批判，二是对知识分子（首先是对自我）的弱点的反省与批判，三是对本世纪

思想文化发展的历史经验教训的反省与总结，最近几年又涉及鲁迅对现代性问题的思考与现代性目标的确立等为现实生活所激发的新问题；四是对鲁迅式的“精神界战士”的寻踪，精神谱系的续接。——这就是我想写、能写，并且已经写了的；这大概也构成了本书的主要内容，读者自可去看文章，就不必多说了。

要说的是我的讲说的局限与可能存在的陷阱。前述先天的不足，知识结构的缺陷，使得我对鲁迅的“讲”与“接着说”在深度与广度上都受到了极大的限制，并难免出现误读与盲点，这都是一眼就可以看出的；坦白地说，我对此感到十分的痛苦与无奈，正因为如此，看到一切超越于我，比我更深刻、更富有创造力的讲说，我都会感到极大的欣慰，尽管也不免暗含着几分嫉妒与对自己无能、无力的沮丧，但我仍从中吸取，丰富自己，为此而暗暗感激这些我的同行，并期待着有更多的给我以刺激与启示的后来者。而对我自身的讲说，特别是这些讲说在学生与读者中产生了一定影响，我是一则以喜——有了回响，说明自己的工作于己于人都有点意义，自然是高兴的；但又不能不继之以忧——会不会因为我讲得不准确，或者不清楚，而造成某种误解，以至曲解呢？会不会再度出现世纪思想史中曾经发生过的“从这间屋子走进去，却从那间屋子走出来”的悲喜剧呢？记得鲁迅当年对他说的话（“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就曾“附加几句话以免误解”：“我之所谓生存，并不是苟活；所谓温饱，并不是奢侈；所谓发展，也不是放纵。”（《北京通信》）那么，对我自己的讲说，是否也应该附加几句话呢？大概是有必要的吧。

比如说，批判历史与现实的国民性的弱点，不能因此而导致对民众的蔑视、恐惧与排斥；同样，对知识分子弱点的批判，也绝不能引向对知识分子与知识的贬抑与否定。——以上两种倾向在本世纪都曾出现过，但是被鲁迅所明确拒绝与批判的；在鲁迅

看来，“觉悟的智识者”是既“不看轻自己，以为是大家的戏子，也不看轻别人，当作自己的喽罗”的（《门外文谈》）。而今天似乎也还有这样两种立场或倾向，却也都是我所不能接受的。更重要的是，当我们在检讨本世纪历史中的许多弊端时，不能忘记一个基本的历史事实：无论是普通国民，还是知识分子，他们中的大多数都是处于被奴役、压迫的境地，尽管他们自身的弱点，特别是根深柢固的奴性，成为了强权统治的社会基础，但“奴隶”与“主子”、“奴才”的区别却是不可混淆的（至于“奴”与“主”之间的转化是另一个问题）；因此鲁迅对国民性的批判，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目的是要启发民众自己觉悟，反抗压迫与压迫者。鲁迅是把自己的批判锋芒最终引向奴役者与奴役制度本身的，并因此对任何有可能（无论有意还是无意）帮助压迫者逃脱罪责的言行保持着高度的警惕，他尖锐地指出：“倘使对于黑暗的主力，不置一辞，不发一矢，而但向‘弱者’唠叨不已，则纵使如何义形于色，我也不能不说——我真也忍不住了——他其实是杀人的帮凶而已”（《论秦理斋夫人事》）。鲁迅还向人们发出过这样的警告：以为“文人美女必负亡国之责”，“卸责于清流或舆论”，这是“古已有之”的老调子（《1934年4月30日致曹聚仁书》），这个传统我们今天是万万不能继承的。

这里，也还有一个在进行国民性弱点与知识分子劣根性的批判时，将自身置于什么位置的问题，这涉及我们对所说的“鲁迅式的精神界战士”的理解与认识。鲁迅指出：“他只是大众中的一个人，我想，这才可以做大众的事业。”（《门外文谈》）这就是说，这种批判，不是高居于众人之外、之上的审判，而是把自己也摆进去的，因此鲁迅说，我无情地批判别人，更是无情地批判自己的。当然，由于思想的超前，或者如鲁迅说的比别人更敏感，看得更透，精神界战士身居于大众之中，也会有一种孤独



感、寂寞感与绝望感。但首先这是一种建立在对国家、民族、大众、他人，以至人类、世界、宇宙的大关怀、大悲悯基础上的大孤独、大寂寞、大绝望，而绝不是对一己的悲欢的感伤的咀嚼，那只能显示自我精神之“小”。于是，在感受着孤独、寂寞与绝望的同时，又怀疑于这样的孤独、寂寞与绝望，并努力地“反抗绝望（孤独与寂寞）”，在任何时候都不放弃对同道者的寻求，病态的孤芳自赏正是鲁迅和一切真正的精神界战士所深恶痛绝的。因此，如许广平所说，他们虽则“自己所感觉的是黑暗居多，而对于青年，却处处给予一种不退走，不悲观，不绝望的诱导，自己也仍以悲观作不悲观，以无可为为可为，向前的走去”（《两地书·五》），终日愁眉苦脸、呼天抢地的，是鲁迅批评的“零余者”，而绝非精神界的战士。真正的精神界战士确实尖锐地批判着、反省着国民性与知识分子的弱点，但人们可以从中感受着一种对人的爱与宽厚之心，他们绝不以道德与真理的化身自居，作苛刻的道德与政治的判决，在这方面，精神界战士可以说是历史与现实中的道学家的天敌。以上所说，都是在划清界限。这不仅会有助于识别真、假精神界战士——当今社会假冒伪劣充斥一切，思想文化界也不例外，保持这样的警惕与识别力是完全必要的；而且对我们自身也是一个警示：任何追求都有一条线，过了线就会走向反面。

再往下就要讲“我不能说什么”了。我一直以鲁迅的一段话提醒自己：“专门家除了他的专长之外，许多见识往往不及博识家或常识者的”，“社会上崇敬名人，于是以为名人的话就是名言，却忘记了他之所以得名是那一种学问或事业。名人被崇敬所诱惑，也忘记了自己之所以得名是那一种学问或事业，渐以为一切无不胜人，无所不谈，于是乎就悖起来了。”（《名人与名言》）这些年写了点文章，知之者多了起来，就经常接到电话或收到来信

要求就专业之外的问题发表意见或写文章，每回我都感到十分惶惑与紧张。我知道自己吃了几碗干饭，在专业范围内——鲁迅、周作人以及现代文学，大概是可以发表点意见的，说起话来大体上是有把握的，除此之外，就谈不上什么了——老伴经常说我的平均智商在中下等水平是有道理的。当然，对专业之外的有些问题我也有兴趣，不免也会发表些意见，但大都是在朋友之间私下胡说乱侃，上不了台盘，有时也会写成文章，那是作为一个普通人谈谈自己的看法，而不是以专家的身份发言——本书中有不少文章就是这么写成的。我也会不断扩大自己的研究范围，以增加发言权，但那也是要在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之后。前面已经坦白交代，我能做的事是“讲鲁迅（或者再加上现代文学）”与“接着往下说”，这构成了作为教师与学者的钱理群的一种存在价值，同时也就划定了一条线。读者们看我收入本书或未收入的文章，不难发现，我几乎在发表所有的意见的时候，都是从鲁迅（或现代文学）出发的，很少在此之外去旁征博引，我知道那样做了就会露馅，这或许也可以说是一种扬长避短的写作策略。这既构成了我的说话、写作的特色，也显示了一种局限。因此，对当今中国社会，特别是思想文化上的种种问题，我只能就某些方面发表看法，而且因为充分利用了鲁迅为代表的现代文学、现代思想文化的精神资源，而引起了一些读者与朋友的注意；但在更多的场合与更多的问题上，包括许多争论的热点话题，我都是沉默的，当然，也有的是有想法而不愿卷入。

随着时代的发展，到了世纪之交，中国与世界所面临的问题，无论是社会问题，还是思想、文化、学术问题，都越来越复杂，提出了许多前沿性的课题，我越来越发现自己已经力不从心了。——如前所说，我坚信，鲁迅为代表的现代思想文化资源仍然具有尚待开掘的潜力，我因此还有事可做；但另一方面，也必

须看到，面对先驱者们未曾遇到的许多新的问题，只是“接着往下说”已经不够了，这是需要新的突破与新的想象力与创造力的，我的力不从心就在于此。我这些年，一直把希望寄托于更年轻的一代的新的开创，就是出于对自己（或许还有我们这一代的学者）的某种难于突破的局限的一种估计。这种估计，对我来说，不会因此引出悲观与无所作为的结论：我还有许多要做、可以做、而且别人（包括年轻一代）未必能做的事，这些事对中国未来的发展，也许并非那么重要，那么迫切，却也还是有意义，有价值的。我在十三年前，开始独立的研究，发出自己的声音时，曾在《心灵的探寻》的“前言”里，对自我研究的追求做过这样描述：“它既自尊，清楚自己的价值，又自重，绝不以否定或攀援别一种研究道路来换取对自己的肯定。那种‘肯定’实际是对自己的辱没。它更公开宣布自己的不足，因此也就为自己取得了一种开放的态势。人们不但可以从这样的研究中得到启示，而且可以从其不足之处开始，进行新的更富有创造性的开拓。其研究的生命力恰恰也在于此。”现在，在我回顾这些年风风雨雨中所走过的道路，并走上人生与学术的最后历程之时，仍然坚持着这样的追求，要说的也还是这些话。

1999年2月12日写毕于燕北园

# 本应归全家所有

——《钱理群文集》（四卷本）后记

今年是我的本命年。能够出四卷本的《文集》，为已经过去的六十年的生命、二十年的写作生涯做一个小结，这在我是一个极其宝贵的纪念。这要感激几位老朋友的真诚帮助。此刻，我特别怀念我的家人——长眠于地下的父亲与母亲，大姐、大姐夫，大哥，三哥，二姐与二姐夫，仍然健在的大嫂，三嫂，四哥、四嫂，三姐、三姐夫，五哥、五嫂。作为“小弟”，六十年来，受到了全家人无微不至的照顾与厚爱，这永恒的亲情注入我的生命中，成为我的精神支撑，帮助我度过了一个个的人生的难关；而全家人在本世纪的历史大变动中所做的不同选择，所走过的殊途同归的曲折道路，更是我的“知识分子心路历程研究”的最初动因，并且潜在地影响着我的价值取向，显示出某种复杂性与矛盾性。在这个意义上，我的研究中，不仅有我自己的主体经验与体验的投入，也融入了对我们家族的历史经验的反思。因此，我愿意将这百万字的生命结晶奉献于亲人面前，这本应是全家所共有。

1999年1月1日—2日写于燕北园

附记：《文集》早已经过三校，只待于2000年出版，但突然运交华盖，被点名批判，自然夭折，我也不再过问。留下这篇短短的“后记”，就算是为一段历史作证。

2004年7月1日

## 后 记

1993年我自己出了一本《删余集》，只印了五十本，散发给朋友，并且煞有介事地编了号。这是为了使“知识者的文化厄运下的悲号”不被“席卷全国的‘发财梦’、‘淘金热’所淹没”，而特意留下的“民间记录”，并且认为“这本小书的种种遭遇本身已经构成了中国思想、文化、出版史上的一个‘典型现象’”。后来这种现象甚至得到了一个名称，叫作“抽屉写作”。不过所谓“抽屉文学”也不是绝对的：《删余集》里的文章以后又陆续发表或收入文集，获得了面世的机会，但大都动了不同程度的手术，读者见到的依然是思想与文字的残体。

而《立此存照》本身却只能存在抽屉里，同命运的还有一批文章：从写作的动机上，就不准备发表，是为了及时记下自己的当时的真实的情感反应，内心体验与思考，以供他日写回忆录（这是我的晚年的一个大的写作计划）用，自然也是为一段历史留一个记录。因此，这些文章写得更为直率而较少顾忌。

于是，到了世纪末，我又有了一本只供自己（或许还有三五好友或学生）欣赏的书。

当然，这里有相当部分还是可以发表与出版的，在删去了前述不能问世的文章以后，足够编一本集子，也有出版社和出版商与我联系，希望出版，但我都拒绝了。原因是这一二年来，我几乎成了一个公众人物，忙于应付各种约稿，尽管具体写每一篇

时，还是很认真的，总力图写出一点新意，但因是应约被动的写作，选题难免分散与零碎，缺乏整体的构思，而且也不能避免内容的重复，合起来就会有分量不足之感。这使我很不安，以致没有勇气将这样的相对贫弱的精神产品贡献给我的读者，特别是那些对我具有某种信任感的所谓忠实读者，这样的读者虽然人数有限，但他们在我的心目中却有着重要的地位，我甚至害怕看见他们失望的眼神。这几年，特别是刚过去的这一年，我出版的书太多，现在应该冷一冷；更重要的是，自己要沉下心来，进行新的研究与思考，以获得新的发言权。这个问题，前年在编《话说周氏兄弟》时，就已经提出，但一直没有得到妥当地解决，整天忙着应对约稿、约会、约见与回信，自己的研究反而成了业余工作，靠挤零星时间断断续续地进行（比如我正在进行的“文革研究”就是如此）。这种状况至今也未见好转：2000年开初的这十天，就陷入了这样的困境，真让人烦恼与焦躁。眼下先要把这本“抽屉里的书”编好，也算完成了一件事。真该关起门来，写我的关于“文革”的书了。

2000年1月9日写于燕北园

## 再 记

又是新的一年的开始，照例地翻拣、整理已经过去的一年所写的文字。原以为在内外交困下，不会有多少东西，不料竟有三十多万字，连同前年写的，以及历年所写未发表的，大概有八十万字之多。只能一分为二，编成《中学语文教育门外谈》与《写

在世纪之交》两本书，前者为教育随笔与论文，算是开拓了一个新的领域，大概有希望在某一时机公开出版。后者内容较为庞杂，姑且称作思想与学术随笔，都是我这两年生命轨迹的真实记录，仍然是给自己和三五好友与学生看的“抽屉里的书”。

重读一年前所写的《后记》，自然有许多感慨。那时候真有些天真，以为新千年开始，可以“关起门来”写自己的学术著作，却不知有些人早已布好天罗地网，哪容逃脱？命中注定要“运交华盖”，这一年（更准确地说已经有好几年）确实被历史与现实的“炼狱之火”烧得焦头烂额。但我仍然于苦中求乐，偶作“精神的散步”，且不忘潜入“生命的沉湖”做学术的思考。尽管时至今日，仍是“未敢翻身已碰头”，但在编完两本书，将这段生命历程作做小结之后，就又开始重新开始，“关起门来，写我的关于‘文革’的书”。但已没有了自信，因为命运并不掌握在自己的手里。就算是一个梦吧，一年后再来看看：梦有没有可能变成现实。

2001年1月20日晨写毕

### 三 记

今天是2002年7月27日，距离写“再记”的2001年1月20日，又过去了一年半的光景，于是写“三记”。

“再记”的最后，谈到了新的一年里“关起门来，写我的关于‘文革’的书”的计划，但又觉得“命运不掌握在自己手里”，因而说要到“一年后”再来看“梦有没有可能变成现实”。结果怎样？计划又落空了。这倒不是因为又遭“华盖”——尽管依然“未



敢翻身”，“碰头”的事也时有发生，但外在压力毕竟有所减轻；但这一年半中，中国与世界所发生的事情，却让我的内心的焦虑、痛苦有增无减，以致陷入失语状态。祸兮福兮，却因此又与鲁迅相遇，于是，再“回到鲁迅那里去”：用了整整一年时间与北大学生一起读鲁迅，进入2002年就忙着整理成文，因此，“文革”的书虽然搁浅，却有一部《与鲁迅相遇》即将问世。这样，也算是可以交代过去了。——我的研究与写作，原本也是随心所欲，兴之所至的。

而且，又有出版社对我的“抽屉里的写作”有兴趣，希望整理出一本思想随笔。所谓整理，除了将新写的一些零散的文章补入外，主要是剔出若干文章，再在收入的文章中抽去若干骨头，就成了现在这个样子。而且，能否就以此模样与读者见面，甚至能否见面，我都没有把握，只有听之任之。

剩下的问题是，关于“文革”的书何时写出来，却不敢再宣布时间表。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只要身体允许，事情总会一件件地做成，做好。——可不是么，这一本《生命的沉湖》就这样编成了。

2002年7月27日

本书的文章，最早写于1998年，最迟也写在2002年：都已经是旧文了。拖到现在才出版，自然有许多故事，不说也罢。现在总算与读者见面了。这是要感激三联书店的朋友们的。

此外，就没有什么话要说了。

2006年3月18日晨补记

先生的课就是这么好听，怨不得人多。我们必修的只有三十几个吧，一百多人的教室却总是站了满满的人。外面的阳光正好，每个星期三的上午在美丽的阳光里听先生的课，真是幸福。最喜欢先生念文章给我们听。这个时候就可以轻松甚至慵懒地听先生念，出了神，或者小小地就溜了号，看见阳光很欢喜地舞蹈。

——北大“新青年”网站文《祝先生早日康复》

已经不止一次听见学生说我“可爱”了——坦白地说，在对我的各种评价中，这是我最喜欢、最珍视的，我甚至希望将来在我的墓碑上就写上这几个字：“这是一个可爱的人。”这正是我的终生最大追求。

我确实经常尖锐地批评北大，也不想否认对今日的北大的深刻的失望，我也因此被北大的某些人所厌恶，但真正懂得我对北大刻骨铭心的爱，并且支持我的，也是北大人：北大永远是我的精神圣地。

我想写20世纪“中国的故事”与“我的故事”，两者互为参照，互为补充，或许能构成一个体系。完成这样的工作，我的年龄大概是有一点优势的：比起年轻的朋友，我已步入老年，却有了他们所没有的阅历与体验；在老年社群中，我还是一个“小弟弟”，因此尚有精力作一点研究工作。

是的，我存在着。我努力着。我们又这样彼此搀扶着。——这就够了。

可以这样说，二十年来我所做的工作，集中到一点，就是“讲鲁迅”，并且试图“接着往下说”，以便把民族、家庭与个人的世纪苦难转化为精神资源。

——钱理群

ISBN 7-108-02463-2



9 787108 024633 >

定价：28.00 元